近代世界革命史

程浩 著

各國革命史講話

平心 著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82·
歷史·地理類

近代世界革命史

程浩著

緒論

本書底研究的對象是歷史，是近代世界革命的歷史，首先就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世界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大鬥爭，雖然第一次爆發於十六世紀初期的德國(宗教改革)，而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雖然最先發生於十六世紀之尼德蘭（主要是今之荷蘭）；但是真正具有重大意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則是從十七世紀之英國開始。所以，本書所研究的範圍，也是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端；繼續下去，則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上半期的革命運動，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及十八、十九世紀的歐美民族運動（內中包含：十八世紀的北美獨立運動及十九世紀的北美統一運動，東歐之波蘭、匈牙利、斯拉夫的民族運動，意大利的民族革命運動，德國的統一運動及愛爾蘭問題），直到第一國際與巴黎公社（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即告一段落。這中間，主要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時代歐美先進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至於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革命，則在本書的後部去敍述。

在沒有講到歐美具體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現在說到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用什麼方法來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

「歷史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及人類實踐活動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德意志的觀念形態」）而「歷史學是一種最具體的科學，它是以說明人類實踐活動及其發展過程爲任務底現實的實驗的科學」。

（同上書）過去以至現在一切舊的歷史學（不論是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或者說，觀念論的、機械唯物論的、觀念論辯證法的以至空想社會主義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的主要缺陷：

「第一，過去各種歷史理論，至多只是考察了人們底歷史活動觀念的動機，而沒有研究這些動機所以發生的原因，沒有找到社會關係系統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沒有把物質生產發展底程度當作這些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各種歷史理論，恰恰沒有包括人民羣衆底行動。」（列寧：「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在批評這般歷史理論而着重批評黑格爾的歷史理論的時候，他曾在給安列科克的通訊中，這樣說到：

「一言以蔽之，這不是歷史，而是黑格爾式的音樂，這不是通常的歷史，不是人類的歷史，而是神聖的歷史，觀念的歷史。據他們看來，人類是爲了發展而利用觀念或永久理性的工具。」

恩格斯也批評到舊的歷史理論，他說：

「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即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歷史全部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從那兒來到人類腦中的呢？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恩格斯一八七八年寫的「馬克思小傳」）

自然，根據這般舊的歷史理論來研究歷史，來研究世界革命的歷史，就不免落在這樣缺陷的泥坑

中。這樣，在根本上，就無法來認識歷史，無法來認識世界革命的歷史。

誠然，在馬克思之前在法國歷史家和部分的英國歷史家的新學派中，已經產生了這樣的觀念，就是歐洲歷史至少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的推動力，乃是新起的產業階級與封建階級之間為着爭取社會的政治的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然而，只有到了馬克思之無產階級的科學的歷史理論出現之後，完整的、唯物的、科學的、亦即眞正的歷史觀才建立起來。

只有拿這種科學的歷史理論去認識歷史，去研究一切革命的歷史，則這樣的歷史學才是正確的歷史學，這樣的革命史，才是正確的革命史。列寧曾經這樣指出馬克思的科學的歷史學的特點；他說：

『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只是積累了片斷收集的枯燥的事實，只是描寫了歷史過程的單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個社會經濟的起源、發展和衰落過程作包羅萬象和面面週到的研究途徑，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合，把他們歸納於社會各階級生活底和生產底可以確切決定的條件，摒除了選擇「至高」理想或解釋至高理想的主觀主義和武斷觀點，在物質生產狀態中，揭露了所有一切觀念和一切不同趨向的根源。』（『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譯本第三四頁）

馬克思的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麼呢？就是『唯物史觀』。

什麼是唯物史觀呢？

恩格斯說：

『……拿「歷史唯物論」（唯物史觀）一個名詞來表示一種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對於世界歷史進程的觀點，是要從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從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易中，從社會上由此產生的

階級分化中，從這些階級的鬥爭中，去尋求一切重要的歷史事變之基本原因和決定的動力。」（「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由是可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就是：

甲，用社會的存在來解釋社會的意識，生產與生產之後的產物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的社會形態中，生產品的分配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階級或等級的劃分，是依靠如何生產、生產之後如何交換之情形來決定的。這就是說，「社會的經濟結構是這個社會的實在基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築起來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也是適應着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生存，而是相反，人們的社會生存決定他們的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乙，社會是發展的、變革的，一切社會變革及政治革命的基本原因，不應該求之於人的腦筋之中，而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及交換方式的變更之中，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所反映底階級與階級的鬥爭及其發展之中。這就是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相當階段時，就和現存的生產關係，或是和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稱呼），發生矛盾，而生產力在過去曾經是在這些關係中發生的，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而變成生產力發展底枷鎖，那時就進到社會革命的時代」。（同上書）

丙，階級鬥爭是有階級以來的歷史社會變革的發動機，革命是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高度上打破現有政權和消滅舊來關係的一種政治行動。自有階級的社會以來就有階級鬥爭，「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原始社會的歷史除外——恩格斯補充說）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推動歷史

前進，由是而產生的革命，正是「諸階級達到最尖銳程度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列寧）革命是新社會的催生婆，「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在一切單純的與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所爭的只是社會上這些或那些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而已。只有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權，新興的階級要獲得統治權而已。只有階級消滅，階級鬥爭才能消滅。那一個階級的社會歷史都逃不出這個眞理之外。

丁，不只是認識世界，而主要的在於改造世界，認識與改造結合，理論與實踐一致。

戊，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担負改造現代社會的使命，無產階級變爲「自爲」的階級之後，就能夠實現徹底改造現代社會的使命。

己，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無條件的要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要找出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社會問題的具體特點，就是說要具體的、客觀的認識社會歷史，絕不能抽象的、機械的、主觀的、片面的來認識社會歷史。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顯示了科學思想的最偉大的收獲，在此時以前，關於歷史和政治方面完全被朦蔽和武斷的觀點所統治着，從此方能用完整的、嚴謹的科學理論以代之。」（列寧：「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唯物史觀在歷史上的顯著地位。

我們用什麼方法來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呢？就是用這個馬克思的科學的唯物史觀。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正確的認識這些革命史，才能正確的獲得其中的經驗教訓。

第二，要具體來研究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

一般說來，資產階級革命是表現資本主義要求發展的革命。其社會經濟內容，就是在封建社會經濟

結構內成長起來的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就與舊的封建生產關係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原來適應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封建生產關係，現在變爲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了。這種經濟結構中的矛盾就通過階級鬥爭及其發展形態的政治革命，才能得到解決。這種政治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封建社會經濟制度崩潰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上之不可避免的產物，是要除去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造成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條件。因而這種革命的政治任務就是要消滅國內封建政治制度，解決土地問題，實現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在有民族壓迫或民族分裂的國家，亦因本國資本主義要求發展而與壓迫民族或民族分裂的社會關係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一定發展階段上也不可免的發生民族運動民族革命，其任務爲解除民族壓迫求民族獨立，剷除民族分立求民族統一，達到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所以這種反封建反民族壓迫的革命，其性質不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這種革命不但不超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範圍，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反而擴大這一基礎。

然而，當着我們來研究這些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决不能把這些資產階級革命看成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與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混爲一談。不同的資本主義時代，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內容，不同的階級關係，不同的革命發展的過程，不同的革命結局與前途，這是應當去具體認識的。我們可以而且必須研究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規律，作爲研究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參考；然而我們决不能把資本主義發展時代資產階級革命的規律看成爲一般的唯一的規律，而忽視爾後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情況及其運動規律。例如說：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法國、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發

動，都是該國的資產階級領導，而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無產者被資產階級領導參加到反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並且，在英國、法國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而推翻了封建政體，成立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然而在二十世紀的俄國，當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資產階級就完全背叛了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達於完成，而且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才澈底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而在帝國主義時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又有這些國家的具體特點，總之我們要具體的研究不同資本主義時代不同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決不可千篇一律的去看待一切的資產階級革命。

並且，同樣是一個資本主義向前發展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與十九世紀的德國革命彼此間又有很多不同之點；同樣是一個民族運動，但是十八世紀的美國與十九世紀的德國、意大利、波蘭等，彼此間也不是完全一樣的。例如說英國革命發生在大工業還未形成之前，法國大革命發生在英國大工業開始形成而法國大工業還未開始之際，德國革命則發生於英法大工業發展起來而德國大工業亦已開始之時，不同的國家也有各自特殊的社會經濟內容，因而在革命過程中，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階級關係與不同的革命動態，因而不同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有不同的革命結局。英國、法國、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動，固然都是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者、無產者被發動起來，但成爲革命的主要力量，特別在英法革命中，農民供給了主要的戰鬥部隊。但是由於十七世紀的英國與十八世紀的法國那時還沒有形成近代的無產階級，其中雖然有大資產階級首先動搖叛變，而基本的資產階級仍然領導了其他革命階級達到推翻君主政體、樹立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至於在十九世紀德國革命中，由於近代無產階級已經形成，並有力的威脅到資產階級，遂使德國資

產階級在革命爆發之際，就很快的由動搖而走上背叛革命。又由於在革命過程中這些國家的政治環境、階級關係的特點，造成革命的結局都不一樣：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其最後結局是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妥協，是局部完成的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用反資產階級的辦法完成資產階級的事業，是完成了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則是主要由於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而無產階級及民衆力量又尙不能支持革命於澈底勝利，終使革命半途而廢，成爲未完成的革命。

但是，就這個時期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說來，資產階級革命的完結，是或多或少的或澈底或不澈底的廓清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終於奠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重心，終於造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總是以新的壓迫者剝削者代替了舊的壓迫者剝削者；同時，又總是急劇地暴露了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擴大了統治的資產階級與被統治的無產階級中間的階級鬥爭。結果，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力量大大發展，政治與組織力量大大提高，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已經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出現並日益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無產階級足以担負資本主義社會掘墓人之任務；另一方面，統治的資產階級力量日漸走向崩潰，而廣大勞動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亦因貧困與破產而傾向無產階級。到了資產階級不能繼續統治，無產階級與勞動民衆不能繼續被統治，則資本主義社會的葬鐘一響，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就成爲不可避免了，並且事實上也出現了。如果說：無產階級自覺的工人運動是從十九世紀前期開始，英國的憲章運動是西歐無產階級第一次的獨立的政治運動，一八四八年法國六月暴動是西歐無產階級第一次的與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決鬥；那末，一八七一年法國巴黎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則是世界上第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其所建立的巴黎公社卽是世界上第一次的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結局，是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前途：就是必然走到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以此爲過渡時期走上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主義不僅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證明了資產階級社會不可免的代替（而且有許多國家代替了）封建社會，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可免的要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並且闡明了作爲共產主義社會創造者底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指出無產階級爲解放而鬥爭的理論與方法，並且把一切社會民族的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在本書中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其在當時革命中之具體運用。

第三，爲什麼我們今天要來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首先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史？簡明的答覆，就是爲了中國今天的革命，同時也爲了中國將來的革命。

我們知道，中國現時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歐美最先爆發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它還只是近代世界革命史上資產階級革命之一部分（重要的還有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其中有許多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們去認識去參考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之後，中國社會最終也是不可免的要走向共產主義社會，這也是值得我們去認識去把握到的。我們開始去研究資本主義時代的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爾後我們再繼續研究到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在近代世界史上出現了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善於發掘這些革命中的經驗教訓以供今天以至將來中國革命之參考。

然而，我們研究近代世界革命歷史，研究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決不能把今天中國與從前歐美

這些國家看成一樣，因而我們也決不能拿從前歐美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與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機械地比擬。中國革命也有中國革命的許多特點。因而歐美那些國家過去革命的經驗教訓，只能做我們中國革命的借鏡。根據中國國情，使我們只能恰當的運用那些過去各國革命中可以運用的經驗教訓，來幫助我們中國今天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來走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非常必需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之具體運用，正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與中國無產階級成爲自覺階級的結果，也正是適合中國國情成爲解放中國社會的旗幟。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根據中國國情，善於運用各國以往的革命經驗，正確把握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完滿地、一貫地、澈底地提出了現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理論綱領與策略；同時，又毫不隱蔽自己最高的將來的政治綱領，即爲着將來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最終目的而奮鬥。因此，我們今天研究近代世界革命運動史，必須善於把握着運用在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才不致於機械地、武斷地或唯心地去了解與運用近代世界革命史的，首先是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史的經驗教訓。

目錄

第六章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

第一章　英國革命

本章研究提要　英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發生於十七世紀中葉，即一六四〇——一六六〇年，它是「資產階級與新的貴族聯合，反抗君主政體封建貴族以及統治的教會」（馬克思：見蘇聯小百科全書第一卷）的革命；它是「英國「史上的偉大時代，而英國庸人竟稱之爲大叛亂」」。至於一六八八九年的英國二次革命「只是以比較微小的改變爲結局的鬥爭，自由派的歷史家，則反稱爲「光榮的革命」」。（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序言）

研究本章時，須理解以下的基本問題：

㈠爆發英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政治根源何在？

㈡資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立場如何？

㈢小資產階級與無產者起了什麼作用？

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實質如何？

㈤革命結局如何走到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妥協？

㈥從英國革命中，可以得到一些什麼經驗教訓呢？

第一節　革命前英國的社會狀況

中世紀以來英國社會狀況概述　英吉利在紀元前還是凱爾特的一個種族不列顛人的住地，地名大不列顛島。紀元前一世紀到紀元後五世紀，它還是羅馬帝國領域之一部。五世紀時，日爾曼人之盎格魯撒克遜族侵入之後，原來凱爾特人全被消滅與驅逐。八世紀到十世紀，又有日爾曼人之另一部——諾爾曼人侵入。一〇六六年，威廉第一擊破了盎格魯，撒克遜人，而為英吉利國王。英國自諾爾曼人時代開始孕育起來的封建社會關係，至此遂正式形成；並且建立起強大的集中的封建主義國家。這個封建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封建領主貴族的大地主私有制以及與家庭手工業（及城市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業經濟。國王就是一個最大的地主。他從舊的貴族，修道院與自由農手中奪取了無數的土地分給他的臣屬，作為封土，這些封土又以租佃與莊園制的形式轉給農民耕種，就是少有土地的地主與農民，亦因戰爭關係而求得這般大封建地主的保護。這樣，一面就是大地主私有制；而另一面就是農民迅速轉化為束縛於領主土地上的農奴。這時英國的城市均為國王領主或寺院的領地，市民也如農民一樣應對領主繳納一定封建賦稅與担負一定的封建義務。不過由於交換、商業的發展，市民已有脫離封建領主束縛而要求城市自治權之趨勢。在政治上，從威廉第一起，又特別強化王權，使之成為強有力的階級統治的工具。然而，封建領主的勢力日益坐大，這就使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的英國史上，充滿了封建領主與王權的鬥爭。一二一五年失土王約翰所頒佈的自由大憲章★是英國封建領主想藉此以削弱王權並反映城市市民的

★ 自由大憲章規定：（一）不得大主教、主教、封建領主組成之會議同意，國王不得徵收任何賦稅；（二）倫敦及其他大小城市應享受居住與習慣的自由；（三）不經過國家法律與同等人的合作審判，不得任意逮捕監禁與放逐自由民，

利益；而一四五五——一四八五年的「紅白玫瑰戰爭」則是國王消滅舊的封建諸侯的勝利。

自十字軍東征以來，英國在經濟上亦起了變化。生產、交換與城市的發展，商業資本的利益擴大，一方面使城市與鄉村脫離，城市取得自治權而逐漸獨立，同時城市市民力量之發展，不僅在經濟上日益控制封建領主，並且在政治上，也要求自己的權力。一二一五年的自由大憲章運動，特別是一二六五年亨利第三時代，英國初次國會的產生，使英國市民中有產階層，開始在政治上取得一點地位，並日益與王權接近起來。

一三四六——一四五三年的英法百年戰爭，表面上雖是英法封建統治者中間的鬥爭，而實質上帶着兩國商業上的競爭（英人在尼德蘭地方與佛蘭德斯人的貿易，是法國嫉視英國的一個原因）。戰爭的結果，大有增強英國有產市民在國會中的地位。

商業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逐漸破壞農村舊的生產方法，並且更加擴大了封建領主們的消費慾，大大加緊了貴族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加之在百年戰爭中，農民担負加重與黑瘟疫盛行的結果，這無一不使英國農民急劇的貧困與破產。因此一三八一年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英國農民戰爭」，這個農民戰爭，是以泰拉為首領，基於廣大農民的騷動，五萬武裝的農民得到倫敦手工業者的幇助，一直攻入倫敦，曾經迫使國王一時屈服，允許農民的要求；然而由於農民缺乏組織，特別是沒有正確的領導，而終於迅速失敗了。但是這次農民戰爭動搖了英國封建制度的基礎，成為爾後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從這點說來它是有很大的歷史意義的。

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英國首先發生了「農業革命」。這是英國資本主義顯然發生的時代，也就

是英國封建主義大體崩潰的時代。由於國外市場（主要是尼德蘭）羊毛的需要，以及佛蘭德斯毛織工業的開始發展，羊毛價格大漲，牧羊比耕地更爲有利，於是土地所有者，不僅把租給農民的土地收回牧羊，而且強佔農民的私地與公共土地，把它圈起來作爲牧場。至十六世紀末，英國土地三分之二全入地主手中，這種所謂「羊吃人」（摩爾）時代，遂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變爲無產者。最後就是十五世紀末美洲的發現，環繞非洲航路的成功，促使英國亦繼西、葡、荷、法之後，加入海外殖民地競爭（如美洲、印度等），並囊括很大的海外殖民地領域。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引起英國宗教上的變革，即亨利第八時代創立英國獨立教會打破羅馬天主教之支配——凡此一切，就是英國在中世紀以來歷史上主要的變動，說明封建制度由強而趨於墮落，初期資本主義之成長與發展，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互不相容——這些變動，成爲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可避免的遠景。

十七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狀況　十七世紀初期，英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五百萬人口中，四分之三是從事農業。當時尼德蘭（即今之荷蘭等）已是一個較先進的產業國家，而英國還是一個農業佔主要地位的國家。當時英國的工商業，集中於九個中心區域，如倫敦、布里斯託、腦威池、赫爾、約克，而倫敦爲全國工業中心，商業則僅東岸一帶較爲發達，一般說來，還遠不及西歐與中歐。對外貿易中主要還是羊毛。

此時英國農村經濟怎樣呢？農奴制度在十四世紀末已經事實上消滅了。自十六世紀農業革命之後，地主都變爲羊毛的生產者，幾乎全國農業轉爲畜牧業。加以亨利第八時代（十六世紀中葉）沒收許多天主教的土地廉價拍賣與新的地主後，亦擴大了羊毛的生產。從前羊毛多輸出國外，現時本國毛織工業也

大加發展起來。羊毛的需要更增，於是不得不從國外輸入糧食。貴族地主經濟擴大，獨立自由農民的小土地，最大部分被圈成牧場，他們將成羣的佃農驅逐於固有土地之外。保護貧農領有一定數量土地的法律（一四八九年亨利第七所頒佈的命令）也取消了。女王依利沙白（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在位）到英國各地遊覽之後，大聲呼道：「到處是貧民」（「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農民失去了土地，有的變爲農村僱傭工人，有的則組成在手工作坊受僱的廣大無產者；另一部分是流爲流氓乞丐與難民。

英國當時農村中的階級矛盾，主要表現在封建貴族與農民的對立。貴族是大地主所有者，其中大貴族擁有大批土地，成爲當時王權的重要支柱。還有所謂「紳士」的中等貴族，這般人都是以前與國王政權有密切聯繫的，他們的口號是：「擁護國王與貴族」。另外還有一部分的小貴族，他們與當時國內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因爲商業受國家壟斷，使其輸入的麵包與生產的羊毛都只能廉價出賣，而買進來的生活品又如此昂貴，於是對現存政權表示不滿而成爲國王的反對者。這般貴族與其說是封建的，毋寧說是資產階級的。至於在農民方面，當時仍存在有約佔英國人口五分之一的獨立自耕農。這般農民成爲爾後革命軍的主要力量之一，除了這類農民之外，還有一種所謂自由的佃農，和一種不自由的佃農；在地主土地上作工的僱農以及找不到工作的貧民。所有這些農民，對於貴族地主之強佔土地與封建壓迫，極端表示反對，對於政府的商業政策，以致對整個專制政府都表示不滿，使他們在革命中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工業方面，由於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當時英國工業起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在十六世紀前半期，英國還只能製造很粗劣的毛織品，其餘工業品都由國外輸入；而到尼德蘭革命（一五六六——一

五八一年）期間，許多尼德蘭的職工逃入英國，大加助長英國毛織工業的發展。加之，國內市場需要的擴大，家庭工業代替了原來手工業，而成爲當時工業生產的統治形式。以後又產生了手工工廠，特別是毛織工業中顯出生產的相當大的集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資產階級也形成起來。他們不僅支配交換過程，並且支配生產過程。當時英國的城市中，一方面有公司股東、經理、銀行家、資本家；一方面有家庭手工業者，手工工廠的僱傭工人、碼頭運夫、海員等。

十七世紀初期的商業，僅次於尼德蘭。十六世紀以來，一面由於海外貿易的發展（如一五七七年的西班牙公司，一五七九年的東陸公司，一五八一年的土耳其公司，一六〇〇年的東印度公司……），特別是海外奴隸貿易得到了很厚的利潤；一面由於在西班牙與尼德蘭戰爭中英國捕獲了很多西班牙的商船，掠奪了他們的一些商場貿易，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遂使英國商業迅速發展起來了。英國海外貿易不僅即刻伸張於歐洲大陸，而且迅速在海外發展，並且逐漸的伸向遠東。十六世紀前半期，英國每年平均輸入值爲四〇二、九二〇鎊，輸出值爲四二七、八三〇鎊，到一六一三年輸入爲二、四八七、四三五鎊，輸出爲二、一四一、一五一鎊，到一六二二年出口總數爲四、九三九、七五一鎊。起先英國輸出品主要是羊毛，以後則是皮革、呢絨、鉛、錫及其他製造品，輸入品主要是由殖民地運來的糖、茶及其他由波羅地海諸國來的商品，而麵包亦佔重要地位。

由此看來，十七世紀初期，國外與國內的經濟條件，都給予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極便宜的機會。特別是由海外殖民地刼奪騙詐來的巨量財富，以及在國內呑併土地宰割農民與手工業者的結果，所形成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積累」，這種「原始資本積累」，造成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條件。可

是，因爲專制政府在對內對外之商業上的壟斷政策（除了麵包的國內貿易之外，幾乎一切商品都是被壟斷了），限制家庭工業與手工工廠的法律，以及產業中的封建行會制度，這無一不是束縛已經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的發展，成爲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大踏步發展的障礙。於是使已經有了經濟力量的英國資產階級在要求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上，不能不成爲當時封建制度及其護身符的舊宗教之反對者。至於那些紡織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雖然他們企圖恢復中世紀的經濟地位，亦開始與有產者鬥爭，並且，反對新工業形式，然而這種鬥爭還不十分顯著，而資產階級却把他們發動起來，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封建政體，以達到自己（資產階級）統治的目的。

革命前英國的政治制度　中世紀以來的英國專制政體，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障礙，一二六五年，雖因一部分貴族與市民反對王權，結果成立了兩院制的國會，下議院是代表城市有產階級、中小貴族及部分自由農的利益；上議院則是大地主與宮廷貴族的集團。百年戰爭後，下議院的權力頗大，不得到國會允可，國王不得擅自徵稅（納稅者均屬下議院的選舉人）。然而這般議員們並不輕於拒絕國王的經濟需要，更不常有反對國王的政策。他們對國王的不滿意，僅是表現於空文的奏章上，國王可以不理，亦可以隨便解散國會，充當議員的人亦不甚介意。不過自十六世紀下半期至十七世紀三十年代，由於資產階級力量之增大，使國會與政府間的矛盾加深並且進而處於敵視地位。國會向政府提出了許多請願書，要求確定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廢除障礙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國會方面不願意通過繁重的捐稅，而在政府方面又不願意放棄引起人民憤慨的賦稅，其對於國會的請願書亦均置之不理。國王在政治上建立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而國會則力圖限制王權的擴大。英國封建專制主義在斯都亞特王朝之詹姆

士第一（一六〇三——一六二五年）與查理士第一（一六二五——一六四九年）時代，表現得特別厲害，同時國會與王權的鬥爭亦趨於白熱化。

十七世紀初，英國與西班牙及愛爾蘭的戰爭，政府需款甚急，而國會拒絕籌款，並要求根本改革內政，於是查理士第一下令解散了國會，拒絕給納稅者以立法權；另外又添設了許多賦稅，橫征暴斂，這種苛徵可謂登峯造極。可是英國經濟命脈大都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王命自徵，畢竟所得有限並且是不經常的現象。而國內民衆對現存制度的不滿，愈益增加，資產階級、紳士、農民、手工業者、工人——幾乎个體民衆，都愈益站到反對政府的方面，而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大有與現存政府勢不兩立之概。一六四〇年蘇格蘭發生暴動，英軍鎮壓失利，這時政府不但需款日亟，而且懼怕人民離異。國王不得已，允許在同年四月召集國會。但是這個國會只存在了三星期，又被解散。即至十一月，蘇格蘭暴動勝利，國內民衆怨聲沸騰，國王又來召集國會，這次國會從一六四〇年起一直到一六五三年止，此即所謂『長期國會』，其在英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長期國會有生之日，亦即英國革命肇端之時。姑無論英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與統治的封建階級已經多少有些關係，然而國內社會階級矛盾的高度發展，至此，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反對封建政體的革命。恩格斯說：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處於增長過程中之城市資產階級，是其革命的因素。資產階級以前在封建制度內所取得的地位，已經變成太狹小，不夠它的發展了，資產階級的發展與封建制度，已成不能併立的形式，封建制度必須毀滅。』（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

第二節 由國會鬥爭進到國內戰爭

「長期國會」開始激烈鬥爭 長期國會的召集，就開始了英國革命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也就是反專制政體的統一戰線時期。長期國會中，資產階級與其他民主成分較前大增，而且更帶着對抗王權的性質。長期國會成立之日，首先就把查理士第一專權時代所頒佈的許多立法廢除，要求逮捕教主斯德拉福，並在強迫國王應允之下，經特別法庭審判後，即處教主以死刑。此外確定：不得到國會之完全同意。國王不得擅自收稅。國會行動雖如此激烈，國王亦無如之何，因爲除了國會，國王就無法得到金錢。

斯時倫敦市民（一萬五千）亦向國會提出許多請願書，要求政治改革與宗教改革，並提出「根本上消滅教主」。一六四一年，國會以一三九票對一〇八票通過了「改革宗教法案」。因爲英國把聖公教會代替了羅馬舊教（天主教）之後，聖公教會已成爲英國國教。原來這種宗教改革並沒有影響宗教本身，只不過是把教會與王權混爲一塊 教權附屬於王權而已。所謂聖公會者，就是教會以主教爲首領，而不服從於羅馬教皇，主教由國王指定。「王權乃上帝所賜」，王權高於一切，國王有權以任何賦稅加諸人民，且能任意佔據人民財產，教會則更明顯的成爲統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神上的工具。因此，當人民起來反對王權的時候，必然要遷怒於聖公會，而教會的最高首領就是國王，反對這個國教，又必然與反對國王的專制政體聯繫着。在當時教會的鬥爭中，一方面，貴族及顯貴紳士是國教的擁護者，他們認爲聖公教會是他們在教者的城堡，反對教會的利益是與反對他們私有財產有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反對國教

的市民，大部分信仰清教——即繼馬丁路德而起的加爾文教，這個清教「正適合當時最激進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的要求」（恩格斯）。資產階級在反對這教會特權的鬥爭中「最具有直接的利益」（同上）。他們要求取消教會中封建貴族的特權，並實現自己在宗教上的統治地位，可是資產階級中間亦有如克倫威爾這般穩健分子，他們反對宗教改革法案的理由，是害怕震動了國基，害怕完全滿足了倫敦市民要求之後，國會卽不能統治民衆。當時有一個代表曾經這樣說到：「我們的法律與現代的教會制度是酒與水的化合體。我認爲教主是保衛我們的圍牆，如果民衆將這種圍牆衝破了，則一切祕密均爲人民所揭破，以後人民對我們有所要求，我們將無從拒絕，如此防範人民侵害我們私有財產的責任，將不減於防範國王。」雖然如此，而一般的資產階級在廣大市民羣衆力量推動之下，還是逃不了它在歷史上的責任，仍然極力反對封建的國教。至於廣大城市市民及農村民衆均熱烈反對國教。「這種鬥爭的呼聲在鄉村民衆中在農民中獲得響亮的迴聲——當時農民到處向教會和世俗的封建主進行劇烈的鬥爭，以求得自身的生存。」（「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因此，由於反宗教鬥爭的開展，宗教改革法案居然以民主勢力佔優勢而在國會中被通過了。但是必須指出：宗教改革法案的通過，就已經暴露了國會內部的裂痕，這種裂痕不但表現於主要的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之間，而且表現於資產階級與民衆之間。資產階級希望民衆爲自己效力，但是，不許他們有超過資產階級利益所允許的範圍之外的獨立行動。這一面說明，反對封建王權之鬥爭更加白熱化，革命之如箭在弦的要爆發起來；另一方面，也隱約的顯出日後共同敵人消滅之後，資產階級對其同盟者將要作出些什麽事情來。

「大抗議」　國會通過了改革宗教法案之後，反王權之鬥爭愈加深入，於是又有第二件更重大的事件發生，這就是一六四一年秋天國會所通過的「大抗議」。國會表決這個法案時，贊成者有一五九票，反對者有一四八票而得到通過。在「大抗議」中，首先列舉王政的罪惡，次則指出應當除去此種的稗政，應當整飭吏治。凡政府官吏均須經過國會審查，得國會信任者始能委任。在經濟政策上，必須禁止金銀出口，規定英國與其他國家期票價格平衡，提高商品出口，發展手工工廠，做到貿易出超，改良沿海漁業「以利貧民生計」。實際上，這個議案正是當時要求發展工商業的資產階級政綱，也就是當時重商主義，即由國家來幫助提倡與保障工商業的發展。而反對這一法案的人，則認爲國王在政治上、經濟上應有無限的權力，國會無權來強迫國王執行這種要求。

下議院通過了這個法案之後，一如教會改革法案，却並沒有提交上議院討論，貴族們雖反對新的法案，現在不敢直接表示。

國王早在國會通過改革教會法案時，就建立了以大地主、貴族、臣僚爲基幹的「騎士黨」。國王對於這次「大抗議」的回答，便是立刻指定幾個騎士黨的代表去充當政府要職。接着上議院（貴族院）也用種種方法，阻止下議院所通過的法案執行。

這種情形引起了倫敦市民的憤怒，自一六四二年起倫敦市郊居民、小商人、失業工人的示威遊行時常發生，有時竟與鄉間貴族派到城市來的隊伍發生衝突。國王查理士第一以爲進攻國會的時機已到，於是即刻下令秘捕國會多數派的代表（即贊助「大抗議」案之多數代表）五人，但是事情沒有成功，國王惱羞成怒，不得已乃暗中逃到倫敦城外之溫德沙地方去組織反革命勢力以便向革命大舉進攻。

在國會方面，亦在組織自己的力量，此時國會的實力，已有四萬武裝的手工業者、小商人；此外還有十萬義勇軍，他們的武裝多是鐮刀、棍棒。倫敦近郊的農民，也跟一些馬隊自願軍來幫助國會。國會力量雖有這樣充足，就是國王也自覺難於對抗。可是國會態度仍有些猶豫不決，仍不能採取堅決行動來迅速的、澈底的消滅封建專制政體，甚至當查理士在英格蘭北郊召集貴族與紳士軍隊的時候，國會還在與國王進行談判，但毫無結果。國王雖逃，國王行政機關猶在倫敦，即擁護王權的人們，仍在國會中安然舉行會談。英國資產階級之動搖畏縮，缺乏堅決果斷的革命性，如此已見其梗概。

然而民衆中的革命情緒異常高漲，特別是倫敦市民。他們都要求國會採取積極行動，他們不但在言論上推動國會前進，而且在行動上壓迫國會，使他們不能不前進。卒之，迫於一萬五千碼頭工人的請求，國會始與國王決裂。一六四二年夏，國會向國王提出包括十九條的哀的美敦書，結果完全被國王拒絕，於是國內階級戰爭遂如火如荼的爆發起來了。

內戰第一個時期 內戰開始時，英國當時分爲兩大營壘。從地區上說來，擁護國王者爲經濟落後的西部與北部，那裏貴族甚多，正是國王勢力所在地。擁護國會者爲東部與南部那些先進的工業區，那裏富有工商業而爲多數國會勢力所在地。從階級成分上說來大多數貴族、地主、一部分落後的農民，有些與王權有關係的財政家、商業家則擁護國王；一般說來，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城市小商人、手工業者、工人是國會軍隊中的中堅分子，農村中的獨立農、僱工則是革命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一部分與商業資本家有關的貴族亦贊助國會。有些上層商業資產階級的分子維持中立，他們不願意幫助城市的民主運動，怕民衆起來有害於自己；但同時不敢公然擁護王權，怕保王黨勝利之後亦對於自己沒有好處。

國會既有這樣廣大民衆的擁護，本不難抵抗國王，可是戰爭開始一個時期，國會方面不但未得到勝利，而各地革命軍隊被國王軍隊所擊破，倫敦幾次被王軍所困。主要原因：一方面由於國王的軍隊武器比較優良，其指揮成分多出於擅有軍事專長的貴族，而革命軍既無馬隊，武器又差，隊伍均新由民衆組成；另一方面則由於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的堅決性不夠，行動上畏首畏尾，加以極力控制民衆運動，不能廣大發揚民力；次之，在軍事上軍隊組織不良，不能由下層培養新的指揮幹部，特別在作戰上不能乘機向忙亂的王軍進攻，甚至總指揮者自己慣於避免激烈的戰鬥，坐使國王不能受到大的損失，那時革命軍中有一部分所謂『鐵騎隊』，係克倫威爾所組成與指揮，其中成分多屬農民與手工業者，這個部隊的紀律嚴明，忠心革命，很能作戰，成爲當時革命主要部隊，可惜人數太少，不能給敵人以重大打擊。

革命一時與部分的失敗，並不能決定戰爭的命運。處於優勢的國王軍，其所以不能獲得決定勝利者，乃由於革命軍方面既有革命的政治號召，又有廣大羣衆的興起，又有持久作戰的精神，這是日後轉敗爲勝的基礎，並且在敵人佔領區域之內，經常有民衆武裝的游擊隊襲擊敵人，使國王軍雖在大的戰鬥方面得到某些勝利，然而在許多小的接觸之中，雙方互有勝敗，戰爭不能不延續下去。

內戰第二個時期　戰爭延長到四年，但勝負未決，革命軍民方面，深知欲戰勝國王，非首先改造自己軍隊不可。因此，國會在民衆力量的推動與幇助之下，始依克倫威爾的建議，着手改編軍隊。一六四五年一月，國會通過了『建立新模範軍』法案，決定凡身兼軍職的國會議員應負軍事全責，洗刷軍官中不稱職的分子，號召民衆大批參加軍隊。這樣，不到半年，就依『鐵騎隊』形式組成了新革命軍。新軍中的中堅成分，爲農村中手工業者、苦力工人、自耕農及小商人，軍官成分多屬有軍事知識與富於革命

精神的人。不僅如此，而且在新軍中確定了民主精神，同時又建立了鐵的紀律。革命軍的總司令爲費爾法克司（Fairfax），而實際指揮者爲克倫威爾（Cranwell），新幹部的提拔亦甚注意，有些從鬥爭中起來的工農分子，亦充當了軍事指揮員（如皮鞋匠約遜、車夫泊勞德、伙夫阿克、鐵匠法克斯）。這樣一來，革命軍的面目已大爲一新。

這個革命的新軍，不但在組織方面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從前所沒有見過的。就是它第一次建立了軍隊內的政治工作，兵士不但從事作戰，並且還有會議。照例，在開會之前，先唱讚美歌，然後討論各種政治軍事問題，並通過政治決議案，以後大家照這決議執行。他們有政治宣傳員在部隊內、在民衆中工作，宣傳員也有定期會議。這種軍隊，不但是一種軍事力量，而且是一種政治力量。它的政治工作，不但不妨礙軍事行動，而且用政治工作來保障軍事行動，這是當時英國革命軍隊致勝的前提以及爾後一切革命軍隊致勝的先決條件之一。

果然，新的革命軍隊建立之後，馬上就表現出偉大的成效。一六四五年六月塞部納之役，革命軍第一次大勝王軍，查理士第一幾乎被俘，國王許多祕密文件均被克倫威爾獲得，當時反革命的陰謀詭計亦從這些文件中公佈出來，而革命軍內部的王黨之反動活動亦得以阻止。以後革命軍屢戰必勝，收復的城池甚多。至一六四六年，革命軍一舉而佔領了國王的根據地——牛津，國王部隊幾乎全被消滅，查理士第一戰敗，隻身逃往蘇格蘭，爾後仍獻交國會。國內戰爭，從此告一結束，革命軍在軍事上的基本勝利卽在持久苦戰中而終於獲得，但是革命事業還遠未完成。

第三節　革命內部階級關係的變化

民衆對國會的不滿意　資產階級藉助民衆力量在解除了封建專制政體的武裝之後，本來專制政體可以即時推翻，而民主革命可以即時進入勝利。然而，在實際上，革命的最終勝利還差得遠。主要原因，是國家政權倘把持在國會之手，而國會中的大多數又是溫和派的資產階級與一部分貴族。他們既不願意廢除君主政體，又不願意實行大的政治改革，國會不注意到國王還在陰謀反對革命，也不顧及到受戰爭影響而破產的貧苦市民與農民，還在那裏耐心的等候國會救濟，恰恰相反地，在革命軍勝利後，國會第一件大事，却是頒佈煙酒的稅則與加重人民的負担，大多數的資產階級的國會代表，在內戰中發了大財，如百分之八的軍事借款利息，賤價收買被沒收的聖公會財產及國王貴族的土地，分受罰款以及軍事工業中的投機等等。因此，廣大革命羣衆對國會表示失望，特別是出身於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的革命兵士，大大不滿意於國會的設施，軍隊中已呈不安之象。當時許多部隊士兵，派遣代表向國會請願亦毫無結果。

長老會派與獨立派之分裂　此時在國會內部，顯出深刻的分裂。國會中的多數派，即長老會派（Presbyterians），其中包含溫和派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對外貿易的特權股東、經紀人、銀行家、經營農的土地家；此外也有行會的手工老闆與工匠，他們在宗教上要求以選舉出來的長老委員會代替聖公會，把教會最高領導權交與長老會派的教首；另一方面，在民衆影響之下，國會中發生了比較激進的反對派，即獨立派（Independents），他們是城市與鄉村中民主分子的代表，並包括有激進的資產階級。

他們主張教會與政府分立，主張共和政體，要求推翻君主政體，代之以民主政體。他們不滿意政府一切政策，要求解散現在國會，而代之以民主的新國會。民衆與大多數軍隊均擁護獨立派。

這兩派的鬥爭是向前發展，一六四七年，長老會派就開始同贊助獨立派的軍隊作鬥爭。當軍隊代表將上述獨立派要求提交國會之後，國會即決定解散軍隊，可是，國會又無法在解散前發給軍隊所要求的軍餉，就只好以威脅利誘及欺騙辦法來敷衍兵士，毫不念及兵士們爲議員們的利益流了不少的鮮血，兵士們對國會的憤恨更加擴大。

由蘇格蘭用四十萬金鎊引渡回來的國王，此時仍居在倫敦，陰謀作亂。而長老會派却瞞着獨立派的軍隊與國王密開談判。長老會派以國會允許國王復位爲交換條件，來換得國王承認國會議員在內戰中由教會貴族手中得來的財產，並且要求國王即刻到蘇格蘭去調動軍隊來解除革命武裝，以防軍隊破壞他們的密約。這種叛變行爲，卑鄙的勾當，當時也只有倫敦的大資產階級做得出來。但是，革命軍仍保持其故有力量，當軍隊一經發覺此種陰謀之後，立刻把倫敦佔據，禁捕國王，並給國會以哀的美敦書。國會不得已，開除了十一個長老會派的議員。國會中的獨立派佔了多數，革命軍總司令費爾法克司，被任爲倫敦衛戍司令及國庫保護者，結果獨立派得到勝利。

平均派及其活動　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羣衆的政治覺悟日益提高，自然，他們也希望在革命中實現一些自己的利益。因而民衆中更民主的分子——工人、手工業者特別是軍隊中的士兵，對於獨立派的政綱及設施，自然也不滿意。於是，在獨立派之內又分出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與下層民衆的左派，即平均派。軍隊中高級軍官屬於獨立派中之顯貴派，而廣大左翼士兵則屬於平均派，其首領爲約翰利爾本，

他是紳士出身爲民主羣衆所公認爲英國軍隊中的政治領袖。平均派及其首領利爾本是代表當時小資產階級與無產羣衆的利益，他們要求在革命勝利之時，使廣大民衆也能均受一點勝利的成果，而不致爲資產階級所獨吞，這些平均派並非主張一般「均產」更不是「共產」的擁護者。而那班政治仇敵們之所以這樣稱呼他們，正是想在資產階級面前來責難他們，以此恐嚇與動搖資產階級，轉移資產階級鬥爭的視線而已。其實，他們是出身於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只是「當時最澈底的民主主義者」，不過這種政派，也與德國宗敎改革及農民戰爭時代之壯年洗禮派與苗宰爾運動以至於後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巴貝夫派相差不遠。「無論如何在每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之中，成爲近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的先驅者之階級，也已爆發了他們自己階級的獨立運動。」（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平均派就是英國無產階級的先驅者之獨立運動的開始能了。

一六四七年四月，革命軍隊大會舉行於番堤利，參加者有十六個軍團的代表，按士兵羣衆的要求，大會產生了軍隊代表會議；在這中間，平均派有極大的影響，代表大會依據平均派的政綱，向國會提出「人民約法大綱」。在這大綱上，不獨要求普選權與全民投票的憲法，而且要求將長老會派所侵佔的敎會財產，爲地主所侵佔的公共土地，均收歸國有。規定大地主與資本家每年應得的最高收入，這是眞正革命民主的政綱，當時擁護這政綱的人名爲「平均派」。

克倫威爾的「現實主義」　這個「人民約法大綱」遞交國會之後，自然就被國會拒絕了。不但獨立派的右派分子佔多數的國會拒絕了這個民主政綱，即是克倫威爾及其全體高級軍官也是極端反對。當時情形是如此：如果軍隊不脫離平均派的思想，則軍隊將會被誣爲「叛逆者」。這使克倫威爾必然要走妥

協的「現實主義」的道路（實際上是犧牲士兵及廣大羣衆利益而去遷就國會）。當時由克倫威爾及另外代表地主階級的高級軍官——愛爾登，代表小地主的中級軍官——馬約及代表軍隊中半無產者與農民的士兵羣衆的萊茵斯德洛等在倫敦附近舉行一個會議，以來調和獨立派與平均派領袖們的意見。可是，妥協不成，會議毫無結果而散，而軍隊民主運動的力量，反愈加顯明的表露出來。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至此愈形驚惶失措。現在的獨立派也與從前的長老會派一樣，因爲害怕民衆力量，寧可與國王妥協，而不願使民衆滿足在平均派政綱上的要求，於是在幾千高級軍官的密謀之下，或者克倫威爾也與聞其事，國王得以二次逃走，可是結果又不成功，國王第二次又被軍隊士兵捉囘。

一六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士兵舉行遊行示威，反抗軍隊代表會議中開除士兵代表，並對國會縱容國王逃走事，表示抗議。爲了緩和士兵的民主運動，克倫威爾與費爾法克司出任調停。他們甜言密語的向士兵發誓，表示在政治問題上完全服從軍隊的意志，不過士兵應遵守紀律，解散舊國會與選舉新國會，是不可免的，不過應得到兵士與長官們的共同意見之後，才能實現。經過這一趟誥誡之後，馬上強調軍隊中要整頓紀律，並立刻提出幾個軍官及宣傳員誣爲「破壞分子」，說他們不應去訪問平均派的總部，並要求將這樣分子交出。士兵聽了這些話以後，果然受騙，將平均派的宣傳員交出，即時有三個平均派的領袖分子被殺了。

清洗國會與殺死國王　一六四八年，蘇格蘭發生了保王黨的暴動。因國王野心未死，勾結蘇格蘭的貴族，及各地的保王黨們起事叛亂。倫敦有許多長老派及紳士擁護國王，甚至倫敦行會店員也在「擁護上帝與國王」口號之下，舉行示威。不過反革命勢力並不大，且遠在京城之外。因此，革命軍也就迅速

的把殘餘的王黨勢力消滅。到一六四八年之末，英國革命軍最後消滅他的敵人。

正在這撲滅王黨暴動的時候，正是許多獨立派代表都上前線去了的時候，長老會派又在國會中佔據了多數。他們又來與國王聯合，並企圖暗中再放走國王。但是，叛徒們這次的妙計又失敗了，從前線回來的軍隊又在途中第三次把國王捉回。國會之如此倒行逆施，反動昭著，不但兵士民衆不能忍受，就是克倫威爾也看不入眼了。於是克倫威爾不得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實行清洗國會運動。兵士們促成他們所信任的軍官到國會中去，泊勞德佔據了國會的出入要道，將國會中所有的長老會派代表驅逐、逮捕、一網打盡。肅清長老會派「國會之後，國王以叛國罪被控於最高法院，至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判處死刑。

公審國王，判處死刑，這是歷史上一件空前的事情，但是要知道，如果沒有革命力量的勝利，沒有廣大民衆的民主勢力的發展，如果沒有這種民主勢力的代表者——平均派的推動，單靠那輩畏首畏尾善於妥協的資產階級，那末，英國革命就不能夠發展到這種程度；英國資產階級沒有民衆作後盾，也就不能達到這樣勝利的境地。國王被殺之後，封建專制政體被推翻，英國資產階級無疑問的就成爲正式的統治者了。

第四節 共和政體與克倫威爾專政

共和政體成立之後 清洗國會與國王伏誅之後，獨立派與平均派的國會（即歷史上所謂「殘存國會」），即宣佈英國爲共和國。當時國會如此議決：「經驗證明了國王之存在，對於國家是無益的，對

於自由是有害的，對於人民的安存與幸福是危險的。因此，應永遠廢除國王。』『共和國的最高權力，屬於國會中人民的代表，一切官吏由其委派，國王與貴族一併取消，並從國會中選舉一個政治委員會，以統理國政』。這時英國所宣佈成立的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可是，它不是眞正的民主共和國，而只是資產階級與新貴族聯合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共和國；這個民主共和國，只是表示英國資產階級第一次奪取了政權而已。在所謂『政治委員會』中，在新的國會中，都是資產階級與新的貴族組成的獨立派佔統治地位。他們取得政權之後，不但沒有眞正實現民主的政綱，沒有滿足民衆對於推翻了王權後的希望，剛剛相反的，這個新的統治階級，馬上就來效法長老會派的故態，利用其統治機關來壓迫民衆了。一個壓迫者代替了另一個壓迫者了。

事實是如此，共和國存在第一年，在許多受戰爭破壞的地方，發生了饑荒，城市失業者增多，商業陷於停頓，工業因缺乏原料而難於發展，廣大民衆生活非常惡化；而國會及政府不但不從事救濟，反而到各地徵收罰款，增加捐稅，讓投機商人高抬市價；改革選舉權的事也不理了，平均派的民主綱領，也不採納了，兵士數月無餉，他們的生活也無人顧及了。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議事日程上的第一項，却是剷除左派勢力，以利爾本爲首的左派分子，多半被捕入獄。可是這並不能消滅民主勢力，而平均派在軍隊中、民衆中的影響反而是愈加擴大，但他們還無力推翻獨立派。在國會方面害怕自己的軍隊左傾，深恐又受其控制，於是國會議決，調開這班革命軍隊。

一六四九年四月，愛爾蘭發生了民族的暴動，反對英格蘭的統治，政府立即調赴軍隊前往鎭壓，施行民族的壓迫與侵略。兵士們在平均派影響之下，已知國會之用意而舉行暴動以示反抗，倫敦的碼頭工

人、礦工、手工業者及附近的農民，均起而響應，其他城市也有暴動發生。可是，由於暴動者方面力量不夠，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而政府方面則採取種種軍事與政治的手段，終將暴動撲滅。同年五月，獨立派採取政治離間辦法，也如從前長老會派一樣，大肆宣傳，誣平均派的思想為『共產主義』，誣他們要『平分私有財產』。結果，不但是工商業資產階級，並甚至於小資產階級也被這『共產主義的巨影』嚇退了。甚至農民也離開暴動者，因為他們也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平均派在思想上已經孤立，自不免於失敗。我們知道，平均派並非共產主義者，而當權的英國資產階級為要從政治上來破壞他當前的敵人，以掩蓋其對革命民眾的恐怖與壓迫，不得不製造這種謠言，來加在當時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身上，分離民主派與民眾的關係，以實行各種擊破之策，如此，以鞏固其獨佔的統治。不過，這種民主主義者也起了自己在歷史上初步的獨立的作用。三百年前的英國資產階級，就善於耍這一套把戲欺騙民眾與瓦解革命，無怪乎它的後人更能發揚光大之啊！

短期國會及其政策 暴動壓服後，克倫威爾的國軍又向愛爾蘭、蘇格蘭實行遠征。一六五一年到一六五二年這些地方終於被征服了。只在愛爾蘭一地就殺死了五十萬居民。接着一六五二年春天，又因航海法★與荷蘭發生戰爭。資產階級欲藉對外侵略與戰爭來轉移國內民眾的革命視線，然而，相反地，這些戰爭更促成國內及倫敦居民的加劇破產，國內愈呈不安之象。資產階級為對付革命與鞏固自己權利計，乃擁戴克倫威爾為『護國者』，而以克倫威爾為首組成集中的資產階級的政府。一六五二年『殘存

★航海條例規定：（一）歐洲貨物輸入英國，必須由英國船隻或用產該物國的船隻裝運；（二）由亞、美、非洲輸入的貨物，只能由英國船隻裝載，藉此以抵抗荷蘭的海外貿易。

國會」解散，而資產階級專政的「短期國會」成立。由於平均派在羣衆中影響仍大，不管資產階級如何限制，但在短期國會中，除主要的是獨立派代表之外還有左派的代表，此次國會的宗教色彩，更爲濃厚，開會前必先唱讚美歌，閉會後必舉行祈禱儀式。資產階級了解宗教成爲他們戰勝國王與貴族的旗幟，他們又發現宗教可以利用來麻醉他們「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之服從主人的命令，使之相信主人是上帝位置於工人頭上的人。簡單說，英國資產階級從此時起，也會用宗教來壓迫「下屬階級」．——全國廣大的生產羣衆了。「其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恩格斯）

對於農民土地問題，在一六四五年長期國會時，長老會派曾在民衆壓迫之下决定了取消采邑制，取消農民對於土地所有者的封建義務，决定被沒收了的聖公會的土地實行出賣，結果使資產階級、富有農民變爲新的地主。對於貧苦農民，利益是很少的，短期國會仍加速這種土地私有制轉化的過程。其最重要的法案，則是禁止地主保留三分之一以上爲空地，凡以前的空地皆借予失業的農民耕種。不過這個法案是在本國會解散以後才公佈，其對於農民也有相當利益。以致數年後由外國輸入的麵包無處銷售。此外，國會取消了教會對農民的什一稅，無論如何，英國農民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得到了這一部分利益。這就是他們做了資產階級後備軍的代價。

另一方面，當時平均派者所主張的「重新分配土地」，「土地屬於耕者」，這無疑義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小資產階級的要求；但是在權的資產階級自然嫌它太左而不能接受，不過這仍是資產階級性最民主的土地政綱而已。至於當時平均派中出現的「眞平均派」或「掘根派」則主張離開政治鬥爭，直接來實現「自由使用一切土地」，「安然佔有自己所需要的土地並從而耕種之」，這不但是有產階級

所不允許的，而其本身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即在農民中亦無其同情者。

此外，國會還頒佈了確定婚姻制、信教自由、改良法庭等法案，這都是實現與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至於保護私有財產與定以財產為標準的選舉制，更是資產階級國會天經地義的法寶了。平均派所要求的普選法與全民憲法，始終不能施行。這種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實質更可一目了然了。

國會內部的鬥爭，仍在加緊進行着。這種鬥爭正反映着當時社會階級矛盾的深刻化。大多數的溫和派，希望組織一個像荷蘭那樣的商業共和國，希望將國家機關略加改變，在任何情形下，反對根本改變社會關係。而平均派的要求則比較澈底；因為平均派有後面廣大羣衆的擁護，所以國會中溫和派雖佔了多數，但有許多決議，仍不得不參照左派的提議，略有修改。國會所通過的決議多帶調和的性質。這些決議對於國會內的溫和派則嫌它太左，太革命了，而平均派則又認為它太右太不革命了。處在這情況之下，國會斷難支持下去。當權的資產階級並不容許這種形勢繼續下去。一六五三年，克倫威爾解散了這「短期國會」而以自己所指定的小國會代替之。

克倫威爾的專政　在小國會中間，仍然存在着溫和派與左派的鬥爭，而且這一種鬥爭反而愈趨尖銳化。今後英國政局的運動，究竟怎樣呢？或者，民主勢力在廣大民衆士兵的發動之下，取到決定的勝利，走上以平均派為首的小資產階級專政（如爾後一七九三——九四年的法國）把革命更推向前進，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或者，是民主勢力發展不夠，而以勢力強大的資產階級與新貴族結合的代表人物——克倫威爾實行獨裁，來最後結束革命，二者必擇其一。我們知道，自王權推翻之後，聰明狡猾的英國資產階級無日無時不在極力壓迫與剝削民主勢力，他們為了鞏固本階級的私有財產與保護這一私有財

產的政權，因而畏懼民衆比畏懼從前的國王還要厲害，他們離開民衆與平均派的關係，限制平均派的活動，特別是在鎭壓平均派的暴動中，其所採用的殘暴手段較之對付專制政體還要兇橫，還要殘暴得多，這樣使平均派的民主力量不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農民還在幻想政府對他們有所救濟，兵士們受到軍紀上的限制，在受到打擊之後亦難於單獨興起，城市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工匠，而政府正準備鎭壓他們。這樣，英國革命當時不可能走第一條道路，資產階級與新的貴族正渴望強固的政權以鞏固其在革命中的戰勝品，地主階級及王黨殘餘分子雖然還在幻想恢復王權，但亦感覺到與其讓民主得勢，不如讓資產階級獨裁。正因爲這一個社會原因，大權在握的克倫威爾卽在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地主的擁戴之下，走上了獨裁的道路。

一六五三年十二月『小國會』被解散，克倫威爾被選爲『護國者』。在政府領導之下，成立了新國會。按新憲法的規定，國會仍然恢復了兩院制，不過下院也得由政府指定。事實上上下兩院皆無實力，一切大權均操在克倫威爾手中。他有權指派任何人充當政府要職，卽無國會之同意，亦可向人民徵稅，所謂民意機關的國會，只是一個空名而已；然到五個月之後，連這種空招牌的民意機關亦取消了。英國資產階級紳士們的獨裁政治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不少的歷史家正在那兒辯護說：『克倫威爾沒有登上王位，沒有取消共和國，仍是保存了共和國，這也算不錯。』其實，資產階級與貴族們掌握了政權，不就是他們登上了剝削者的『王位』嗎？有皇帝的資產階級專政與沒有皇帝的資產階級專政，對於鞏固有產階級的利益、發展資本主義與加緊剝削被剝削者，在本質上兩者又有何區別呢？

克倫威爾專政之後，除平均派外，沒有任何人對取消民意機關的國會表示抗議。克倫威爾專政時期，正是大商業資本統治時期。在對外政策上，一六五四年最終戰勝了荷蘭，並且締結了許多有利的商約，英國海外貿易與殖民地的掠奪政策正是大踏步的發展，如在印度、美洲等處，均在積極的發展自己的力量。在對內政策上，因鼓勵耕種荒地，使麵包價格日漸低落，工商業已恢復常態。因為國內外貿易發達，海外財富流入，而更加促進了本國工商業向前發展，失業工人減少了，工資亦相當提高，資產階級與新貴族的政權亦隨之相當的鞏固起來。

然而英國還有居民四分之三的農民，克倫威爾對他們有何貢獻呢？教會的雜稅固然解除，但因糧食價格低落，所得不償所失。至於城市工人、手工匠、苦力的生活，一般說來，仍在惡化中。社會內部的矛盾並不因此減少，只不過是把有產者與無產者、富人與窮人的階級鬥爭更提到歷史上新的與主要的地位罷了。恩格斯說得很對：『這次暴動爆發於英國，城市資產階級首先發動，鄉村中的農民及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則使運動勝利。奇怪得很！卽在三次資產階級革命中，農民供給了戰鬥的軍隊，可是在戰勝之後，農民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趨於破產。』（『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序言』）克倫威爾的政權，一方面，主要同國內不滿於現存制度的民衆力量及民主派的殘餘分子作鬥爭，同時，對於殘餘的保王黨勢力亦加以限制，一六五三年到一六五八年的英國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體，它替英國的資產階級開闢了一個財富大道，同時也替另外許多小有資產者、無產者開闢了一個赤貧的前途。

克倫威爾死後的革命政府　一六五八年九月，克倫威爾病死，其子尼卡德·克倫威爾繼任，但無力掌握政權，不到一年半，軍官團就將國會解散，『護國者』的制度，亦從此被推翻了。長期國會末期的

殘餘分子又重新得到政權。但實際把持國事者，仍是軍隊勢力，因而民主勢力亦抬頭起來，傾向民主的人民，又要求直接選舉。英國資產階級又遇到民衆的革命運動而表示發慌，加之軍隊中又發生反抗長官的行動，於是一切資產階級與地主貴族們，過去的長老會派與獨立派們，都在保護私有財產、「維持社會安甯」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國外的野心家正企圖英國的王位，特別是荷蘭的共和派，正以金錢武裝來幫助他們。反動分子這時唯一出路，就是宣佈君主專制，恢復王朝政權。可是軍隊中的士兵羣衆又堅決反對他們而擁護革命，長期國會「殘餘」分子又被軍隊的民主力量打擊下去。以民主勢力佔優勢的新政府「保安委員會」組織起來。不過這個革命政府的壽命很短。因爲資產階級之完全反動，很多民衆因革命利益完全被有產階級佔去而表示消沉，加之資產階級拒絕幫助政府財力，拒絕納稅；而保王分子正在國內國外興起復辟運動，甚至有一部分軍隊受反革命貴族的指示而公然叛變，約克地方又發生反動的暴動，此時反革命運動的總指揮者，正是從前革命軍的總指揮費爾法克司，在這樣情況之下，自然革命政府就無法存在下去，而反動復辟就接踵而至了。

所謂一六四〇年——一六六〇年偉大時代的英國革命就從此結束了。

第五節　「光榮革命」

復辟時代　在封建貴族地主階級以至資產階級的全力支持之下，查理士第二卽於一六六〇年，復登王位，這就是繼「偉大時代」之後，反動復辟時代的開始。它又重新搜羅了那班封建反動分子到自己的周圍。對於羅馬天主教會表示熱烈擁護，仰仗天主教徒的紳士，資產階級，作爲君主政體的支持者。其

對民主派勢力，則施以殘暴的壓迫。特別在查理士二世身死詹姆士第二即位之後，反動勢力更是兇横無忌的增漲起來。詹姆士第二竟企圖把絕對的君主政體完全恢復，同時正式宣佈他是天主教徒，努力與清教徒的資產階級及其教會作鬥爭。君主專政政體即利用資產階級的幇助，達到了復辟，到了現在，似乎用不着那資產階級作工具了，這時君主政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竟大加侵犯，弄得資產階級不安起來，自然用不着說民衆所受的壓迫與痛苦了。

英國王權能於復辟，主要是由於英國資產階級反叛革命。資產階級眼光如豆，自私自利，爲了壓迫民衆的力量，爲了限制革命的發展，寧可叛賣自己多年的革命同盟，去捧起專制王朝上台，自以爲天下從此太平，資本的利益可以永垂不朽了。那知詹姆士第二的手段，並不亞於資產階級，他現在羽毛豐滿之後，也會來蹴去自己一時的同盟者了。

這個事實，應當警告英國資產階級，犧牲革命，犧牲民衆，犧牲民主勢力，去向舊的反動勢力妥協，雖然弄到別人吃了大虧，自己得到一時的便宜；然而歷史發展下去，歸結到底，自己也難逃將來之禍。斯託亞特王朝復辟，應該給當時英國資產階級以及今天他的後輩人一個大教訓。可惜，這個教訓因沒有教會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而至今還不能博得英國資產階級的領悟！

等到封建的壓力又壓到資產階級的身上，甚至英國資產階級最善於妥協也難於妥協的時候，這般娼妓式的資產階級方覺難於忍受，不得不另謀出路，不得不又走上反對派地位與王權對立的侈談「革命」了。結果究竟怎樣呢？

這時，英國資產階級果真起來革命嗎？未必！因爲

第一，復辟後的君主政體，無論它怎樣反動，怎樣使資產階級也感覺到不安，究竟它不能根本推翻革命中資產階級已得的成果。已經分售了的天主教會與封建貴族的土地既不能歸還原主。采邑制什一稅廢除之後，也難得恢復原狀，航海條例及其他有利商約，王權亦認爲它有效。換句話說，英國資產階級已得的實際利益仍是在基本上保存着。

第二，英國資產階級與英國貴族自農業改革以來，特別是亨利第八時代以來，已經有了經濟上、政治上的姻聯關係，許多從前舊的封建諸侯的後代，轉爲資產階級的貴族，有些資產階級又轉爲新的地主。英國的「貴族」與大地主所有者，不但不反對工業發展，反要設法從這中間獲得利益。復辟王朝的寡頭統治，明白知道自己的經濟幸福是與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繁榮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

第三，英國資產階級特別在受過這次革命大風暴的洗禮之後，嘗到了羣衆力量的味道，它的基本利益拿到了手，它怕民主力量比怕封建力量還要厲害，它的頭慣於向後望，它的腿總是戰戰兢兢的；要革命總不要革得太澈底；要反對王權，總要和平點才好；要民衆，總不要民衆佔便宜；要別人幫忙，總要自己保持主人翁的地位，隨時可以把別人一腳踢開。總之，革命要盡可能走和平的道路，不要走堅決澈底的道路，才有利於自己。

英國資產階級處在這樣客觀的情勢與主觀的願望之下，究竟對於復辟後的王朝，採取那一條道路呢？還是再來一個「斷頭台」呢？或是來一個妥協下地呢？自然，我們知道，這時英國資產階級沒有可能也決不會眞正去革詹姆士第二的命；但是，依然如故的，拜倒在皇冠之下求與國王相互妥協下去，也辦不到，聰明的英國資產階級，究竟還是生意上[illegible]，究竟會打算盤，究竟還是走上了第二條道路——

即妥協的道路，不過方式有些不同而已。這樣就來了一個『二次』的革命。

光榮革命　所謂『二次革命』就是英國資產階級歷來所讚揚的『光榮革命』。究竟光榮在那裏呢？我們不妨看一看。

詹姆士第二在位時代，確是大有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害於英國資產階級。當時國會中有兩個政黨：一爲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多利派（Toriers）（即英國保守黨的前身），一爲代表工商資產階級的灰蒂派（Whigs）（即英國自由黨的先輩）。首先由這兩派的妥協與議決，將能夠適合他們雙方口味的威廉由荷蘭迎入英國（一六八八年十一月）。詹姆士第二見勢不對，就棄位逃往法國去了。威廉第三即登上王位，並且爲了適合於資產階級及地主們的要求，批准了歷史上所謂『權利法典』（The Bill of Rights）。根據這個法典，國王權力大爲削弱，政府實權操在資產階級與地主聯合的國會手中，從此以後，英國實行了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保守黨與自由黨在國會中佔統治地位。

資產階級稱這次革命爲『光榮革命』，因爲他們認爲光榮就是妥協與和平，以之別於以前的流血革命。殊不知英國革命的眞正光榮，正是若干年流血鬥爭。不過過去所流的血，只是民衆的血，兵士的血罷了。恩格斯認爲這次事變『僅僅是比較微小的政變爲結局的鬥爭。而自由派的歷史家反稱之爲光榮革命』。按馬克斯的說法，『一六八八年的革命（英國二次革命）無非是地主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換言之即大業主的土地所有者與上層金融資本商業資本聯合取得統治而已』。

『英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在英國有過獨立統治』。這就是恩格斯一八九二年所給予的定論。大概是不會錯的。

簡短的結論

十七世紀英國革命，是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聯合，依據廣大城市與鄉村羣衆力量起來反對障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專制政體的革命。按恩格斯的話來說，它是繼資產階級第一次反封建大鬥爭（德國宗教大改革）之後的『資產階級第二次的大暴動』。這個大暴動從一六四〇年繼續到一六六〇年。姑無論它的最終結局是資產階級與地主妥協所造成的『比較微小的事件』；然而它在打破英國封建制度，奠下新的資本主義的統治基礎，展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燃起歐陸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火焰；從這點上說來，這次革命在歷史上是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使爾後以至到今天的革命者能在這次革命中認識到許多教訓來，而作爲革命者的借鑑，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表現了一些什麽規律。能夠成爲我們的經驗教訓呢？

第一，在封建主義的母胎裏，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高度的階段，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暴力革命將成爲不可避免。這種暴力革命正是新社會的產婆，繼封建主義舊社會而起的正是資本主義的新社會；繼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而起的正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剝削者仍然以另一剝削者起而代之，然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勝利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上仍是進一步的階段。

第二，由於當時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在反對封建政體的暴力中，只能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這一革命，而廣大市民小有產者、無產者及農民均被資產階級發動起來，從事於革命。這班民衆是民主革命中的基本力量。沒有他們的參加，任何革命都是不能勝利的。可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在資產

階級力量強大於民衆的力量底條件之下，自然勝利的果實最大部分落在資產階級手中。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之後，他不但不願意顧及民衆利益，而且由於資本主義勝利的經濟的政治的結果，反而使民衆趨向於貧困與破產；然在另一方面這種結果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趨向於成長與壯大另一個最先進的、最革命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正是新社會的創造者；只有在這個階級完成勝利之後，才能夠眞正解放人類社會，同時才能夠解放無產階級本身。

第三，資產階級在其與封建勢力的矛盾超過於其與民衆間的矛盾（主要是與無產階級）時，它是參加革命而且領導革命。不過他的目的，只是爲了自己取得統治。在這一目的達到了後，甚至在這一目的尙未達到之前，如果民衆爲了本身利益，鬥爭超過了資產階級所允許的範圍之外時，則資產階級寧可半途而廢去與反動勢力妥協而結束革命，甚至與反動勢力聯合來共同反對革命。可是到了反動勢力又壓到自己頭上不能忍受時，他又來談談革命，目的是爲了取得民衆的幫助，但總不願民衆提出自己的要求。民衆既然有所要求革命，那末，資產階級寧可走「妥協」「改良」的道路而不願走革命的道路，走澈底革命的道路，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而且特別是富於妥協性，這在英國革命中表現得格外十足，不過英國資產階級在一八四〇——四九年偉大時代中仍是表現了他的革命作用。

第四，正因爲資產階級背後跟來了民衆力量，跟來了無產羣衆的力量，使當時英國統治的階級先讓君主政體復辟，末了又仍不免於地主貴族平分政權而敢獨居統治。一六八九年妥協之後，政治的贓物（高官厚祿的位置）仍皆在大貴族手中，卽至爾後自己經濟勢力之巨大發展，到產業革命之後，牠們更成爲天之驕子，曾在十九世紀初期得到國會的主要統治地位，可是無產階級又眞的站起來了；這使英國

資產階級始終不能獨居統治地位；另一方面，正由於英國資產階級慣於妥協；這種特點，不僅在十七世紀革命以來已經表現出來，就到今天，仍脫不了祖傳下來的家規。英國張伯倫今天向侵略者妥協，而致禍於無產階級、被壓迫的民族與世界的和平事業。這不是偶然的，實在也有他的歷史原因的。

第五，英國當時，雖然還沒有現在的無產階級，但是已經有現代無產階級的前輩人，他們的代表平均派亦在跟隨資產階級鬥爭中，也曾提出了下層羣衆與無產階級的最初的、模糊的，但是帶有獨立性的要求，也就把資產階級嚇慌了。這證明無產者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大相矛盾。他們中間的階級鬥爭，就在反封建鬥爭中也就存在着，而到資產階級勝利之後，這一鬥爭就站到歷史的主要地位。經驗證明，只有在資產階級與無資產階級的鬥爭佔到歷史首位之後，則無產階級才能展開自己的鬥爭領域，才能更廣泛的組織與教育自己，才能發展與壯大自己，才能爲着自己的遠大使命而奮鬥前進。無產階級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參加反封建的鬥爭，正是爲了完成這一步，以便走上爲社會革命的第二步。

第六，英國革命又告訴了我們，推翻幾百年來的封建專制政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換句話說，革命是一個艱苦而長期的鬥爭。沒有這種長期的、艱苦的革命鬥爭，封建專制主義的政體是不能放棄他的統治權力的。查理士第一是不肯隨便走上斷頭台的。可是，這種民主革命要達到勝利，就必須發動民衆，必須建立與加強革命軍隊；必須有革命勝利的信心，必須與革命中的和平妥協分子作鬥爭，必須堅持持久的革命戰爭，不達到最後勝利是不能停止的。縱然英國資產階級終歸於走上妥協，但他亦曾與民衆一塊推翻查理士第一的專制政體，使資產階級革命進入勝利，這也是難能可貴的。然而革命歷史的證明，成爲民主革命的基幹力量、能夠矢忠矢義堅持到底的，還是勞苦民衆特別是無產階級。

第二章　法國大革命

本章研究提要　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法國大革命，是西歐一次最大的、而且是更澈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偉大特點，就是它將封建關係根本破壞，並把民族壓迫澈底剷除，而用革命方法將這任務解決。革命前法國舊的社會制度，顯然是障礙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危害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形成；這種舊的制度，不經過革命的戰鬥是不肯放棄自己的陣地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法國內在社會矛盾發展到登峯造極之不可避免的結果。同時，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例所在，以及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運動，也給予他一個很大的刺激。研究法國大革命，就必須認識：革命如何完成那『剷除、摒棄與破壞舊社會之一切障礙』（列寧）的任務？如何在反抗民族侵略中挽救了自己？如何肅清法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為何它使『第一次完全丟開宗教面具，而公開的站在政治上作戰；第一次實行鬥爭到底，直至交戰的一方（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完全勝利』。（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同時，還要特別注意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勞動者在這次革命中的作用，明瞭小資產階級（甲可賓派）專政的意義。研究『十八世紀甲可賓派所給於我們的偉大的不可磨滅的與難忘的東西』。（列寧）

研究本章時，須明瞭如下的基本問題：

一　引起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前提何在？

㈡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的特點？

㈢小資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怎樣？

㈣勞動階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爲何他們沒有握到政權？

㈤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成就如何？

㈥它給於了我們一些什麽經驗教訓？

第一節　革命前法國社會經濟政治狀況

中世紀以來的法國狀況　首先要簡略說說法國是怎樣起源的，紀元前六世紀時，法國地方還是凱爾特人一個支族，高盧人所統治。紀元前六十年代，羅馬凱撒大帝征服了高盧人之後，該地遂爲羅馬帝國之一省；爾後羅馬帝國統治了五百年之久，五世紀時，羅馬帝國衰落，日耳曼人中之一部法蘭克人繼高盧人之後雄踞於此。四八五年法蘭克酋長克羅維斯大敗羅馬軍，而爲法蘭克國王，五〇七年又大敗西哥德。至七六八年，查里曼大帝即位，版圖更加擴張，已包括今之法、德、荷、比、北意大利及西班牙之一部，成爲羅馬帝國以來歐洲最大的統一國家。法國封建主義從此開始形成。查里曼大帝死後，內則無經濟上、政治上之堅固聯繫，外則有諾爾曼人、撒克遜人、亞拉伯人之侵入，於是王權日衰，諸侯坐大，至九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復分爲西法蘭克（法）東法蘭克（德）及意大利三國。繼之，在西法蘭克內部又分爲墨羅林、卡羅林、卡佩三王朝。至九八七年由法蘭西公呼卡佩改西法蘭克爲法蘭西王國，而事實上，至九世紀末，法蘭西自身仍有七個國家。十二世紀，更分爲數十個封建國家。十三世紀時封

建諸侯的權力已大致為國王所剝奪。十五世紀中葉，路易十一與貴族聯合，克服了大諸侯，十五世紀末查理士第八時代削平了封建割據形勢，法國王權乃相當集中。但無論如何，中世紀時代法國卽為封建制度的中心。自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開始以後，法國則為純粹的等級的帝制底模範。這種帝制，在十七世紀初之法王路易十三時代，特別是路易十四時代（一六四二——一七一五年）表現得最為出色。

法國封建主義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經濟諸關係的優勢，農業的支配作用；大地主與小農經濟的結合，領地制度，封建領主之典型割據，政治權力之分散；這種封建主義形態，成熟於八世紀到十世紀的法國，而至十一世紀到十二世紀，則大加向前發展。

在法蘭克王國時代，因與隣國戰爭聚集了不少的土地，而分賜諸王、侯、公、伯及武士，至查理曼大帝時，更加發展。這班封主就是該封土上的大土地主與政權的統治者。這在爾後長期過程中，成為封建領主割據的社會基礎。這樣的封土，小部分成為主人的莊地，大部分被分割開租給農民耕種。此外還有地主自由的土地，但這些土地亦漸因戰爭受封主的保護，而在教會方面也握有很多的土地。這些大地主所有者，不但擁有大量土地，而且受到支配行政與司法的職務，及交納賦稅與教堂什一稅的權利。

在法國封建主義的初期，農奴制的關係就很普及，爾後，農民卻是束縛於地主土地之上，除繳納一定物品地租外，還有無償的工役勞動之義務。此外還要納什一稅及他種捐稅（人頭稅、裁判稅、通行稅、買賣稅），尤其是地主從農民那裏得到的特權（如『初夜權』、『死手權』★等），這使農民無可忍受。農民的田地被封建主自由遊獵，加之農業技術落後，生產率低，以致十一世紀法國在七十三年之

☆『死手權』是農民死後土地歸地主所有。

中，約有四十八年的飢荒發生，而農業恐慌亦長期發生。農民所受剝削日益加重，農民暴動不斷發生，十四世紀初，法國東南部農奴開始解放，但農民生活並未絲毫改善，同時由於英法百年戰爭的影響，黑瘟病之流行，加之地主剝削之加緊，於是一三五八年爆發了西歐第一次的法國農民戰爭，而與巴黎市民反封建諸侯的暴動呼應着，許多地方的農民起來進攻封主城堡，開庫分糧，波非基省的暴動較有組織，領導者爲略葉，聲勢浩大，震撼全國，但以領導不力，組織不嚴，又無軍事經驗而失敗了。

以法國爲中堅的十字軍東征（一〇九五——一二七一年），其結果特別給法國的商業發展以極大的推動，而英法百年戰爭（一三三七——一四五三年）亦給予法國在經濟上莫大利益。從法國封建社會內胎中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由於國內小生產者之脫離生產手段的過程以及海外商業發展的助力，特別是十六世紀開始法國對海外殖民地掠奪的參加，使法國資本主義新時期亦開始起來，這種新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成長，一方面加速自然經濟的崩潰，擴大商品經濟之發展，加速農民的分化與貧困，加強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另一方面而使法國在中世紀初成長起來的封建的行會的手工業生產方式，亦不能不陷入崩潰過程，而代之以家庭手工業與略見端倪的手工工廠。新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舊的封建經營方式自然一天天的走入不可調和的對抗中。

由中世紀城市市民中、商人中發展出來的新興資產階級，除了他們在經濟上以其生產力與貿易力不斷瓦解封建的經濟基礎之外，並且還以其經濟力量使專制王權亦不能不逐漸的在經濟上依靠資產階級，因而在政治上，也不能不逐漸的向這班經濟主開闢路徑而反映某些資產階級的利益。然而，法國專制王朝統治的森嚴，教會僧侶貴族特權之高超，對於新興資本主義——特別是十七世紀以後迅速發展的資產

階級之壓迫，這終於使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中的矛盾日益成熟起來。同時，更給受壓迫的廣大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及勞動者，也一天一天的感覺到自身的痛苦難受，就是城市市民、小有產者，農村的自由獨立農民亦在增大其不滿。十六、十七世紀以前之法國，就種下了發生革命的較遠的根源。

十八世紀法國社會經濟狀況　如果說，英國到了十八世紀特別是十八世紀七八十年代產業革命之後，英國已開始成為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產業國家。可是在法國一直到大革命的前夜，它還是一個農業國家。當時全法國人口共計二六、三七二、〇〇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居在農村，有十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只有兩個——巴黎與里昂，其他城市都是很小。

一、農業——當時法國農村經濟的特點，就是大地主經濟與小農經濟同時存在，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上，大地主的土地所有與農民的土地所有，兩者併存着，下面就是法國大革命前一部分省分的土地分配表：（以百分數計算）

省分	地主的土地	農民的土地	荒地與森林
西多斯	五七	三三	一六
畢加的	四七・九	三六・七	一五・四
勃民第	四六・七	三三・一	二〇・二
利木堅	一七・七	五九・二	二三・一
息分退	一三・一	五〇	二六・九
卡來斯	一七・五	五四	二八・五

多菲內	一四	四〇・八	五一・二
蘭德	二三・三	五二	二四・七
貝酋	二一・一	六〇	一八・九
吐魯斯	三一・七	三五	三二・九
諾西隆	三六	四〇	二四
平均	二九・七	四四・八	二二・五

根據上列十一省的統計看來，似乎農民的土地較之地主的土地爲多，可是荒地森林的土地最大部分是屬於地主所有，如果以全國土地分配情形說來，則地主階級的所有土地的數目是很大的。國王、貴族、教會就是最大的地主，國王土地約佔全部土地五分之一，貴族及僧侶則佔五分之二，這些土地都是分散在各處。大部分地主都是將土地分租給農民耕種，租金很重，最多的是「對分」，即百分之五十的收入作爲地租。這樣的情形也很普遍，即地主將土地租給承租者，承租者又將租來土地加高租金轉租於農民，甚至再由農民富裕者又來轉租給貧苦農民，這是法國農村經濟中很奇特的現象。當時法國農民中，雖已有佔地較多同時又經營商業及手工業的農村資產階級（富農），自業自耕的中農，及貧農僱農之化分，可是農民之大多數還是地少或無地的小農。這種小農（及佃農）家庭，在十八世紀末，還有四百萬戶。

法國農民之不幸狀況，可由當時農民所担負的高度租稅及他殘存的轉屬關係來說明。第一，農民除納物品地租之外，還有一定的工役，而耕種轉租的土地時地租更高，且多爲貨幣地租，轉租時還要納

稅，此種國稅在革命前就已達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第二，農民最大部分雖已解脫農奴的轉屬狀態，但是，仍有約計一百萬的附屬於不能轉賣土地上的農民，他們還要給一種贖金或盡幾種奴役才能贖回自由之代價。第三，一般租種土地的農民，對領主仍有種種隸屬關係，如借磨磨麵要租金，借爐燒麵包要租金，通行地主橋樑要通行稅，單獨使用土地時要償還一定之金額貨幣稅，甚至幾件破衣服傳給兒女要交遺產稅，農民討老婆，要洗禮，安葬節日要繳納錢給地主，賣穀賣酒也要給錢；不然不能先賣，此外夜間還要到水邊去驅打田雞，以免擾亂地主的安眠等等。第四，國家要向農民收二十分之一的國稅，省又收省稅，稅之外，還有隨意的捐款及罰金，教堂還要向農民收什一稅，而中間總管差役的人，又從中敲詐，魚肉貧民。這樣，封建勢力如像鐵網一般把農民網住，使農民終歲勤勞所得，不但難得一飽，甚至罄其所有亦難塡那般野獸們的貪壑。結果農民卽在半年中，飢餓而死者已非少數，何況一七〇〇年一七八〇年間，荒年凡二十次；於是，農民死者往往年輒以十餘萬計。這就驅使法國農民不能不熱烈的走上革命的道路。

此地還要說明，法國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大步的侵入農村，農村經濟商品化，已成爲顯著的現象。糧食價格的高漲，土地生產率提高，十八世紀中葉十分之一立方米突的麥子值十個半法郎，到十八世紀末增至十六法郎，同時，一海克脫（一萬平方米突）的糧食產量價格，由十五法郎增至二十七半法郎了。資本主義侵入農村，其結果使農民分化加速，公社土地絕跡，農民更大批失去土地而流爲無產者，封建貴族亦發生分化，債台高築不得不變賣自己土地給資產階級，這樣引起十八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中封建地主們更加反動的來恢復與增加其封建特權。由加重對農民剝削中以圖維持自己的

生存。因此農民生活固然是更不堪設想，而農村資本主義化的趨向，亦必然與那些障礙這種發展的封建障礙物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的增長就成爲革命不可避免的重大原因之一。

二、對外貿易——法國當時經濟部門中，最發達的是對外貿易，雖然在十八世紀中期，英國佔去了法國在北美洲之大塊的殖民地（如北美廣大地區及加拿大全部），而一七五七年普拉西之役，法國在印度的霸權又完全爲英奪去；可是，法國對外貿易仍在向前發展。一七一六——一七八九年間，對外貿易總額約增加五倍，下表可以看出法國輸出狀況：（以百萬金鎊計算）

輸出品	一七一六年	一七八九年
農業出產品	三六	九三
工業品	四五	一三三
美洲殖民地出品	一五	一五二
由印度轉運品	二·六	四二
轉運的工業品	六	四六
總計	一〇四·六	四二八·一

飲料呢絨及各種原料爲法國出口大宗，在這時期內，法國紡織品輸出只增加三倍，而其輸入則增加十倍。可見當時法國資本主義還發展得很緩，對外貿易還有一宗主要物品，就是黑奴。一七一五年由殖民地輸入黑奴價值一百五十萬利華，到一七八七年則增加到四倍以上。如馬賽、波爾多、蘭德等港市已成爲世界貿易中心，每年由馬賽出海的船有一萬五千艘，從事航海的海員工人有八萬，商品的流轉量每

年達三萬萬利華。

三、國內商業——法國國內商業情况很壞，因當時法國在經濟上還不是一個統一國家。國內關稅林立，各處有各處的關稅，使商品流轉上遭遇極大障礙，並且價格很高（例如從奧良運一桶酒到諾曼，價增二十倍，而從中國運來貨物比原價只增高三四倍而已），加之商業又帶着壟斷性質，特別是對穀物壟斷非常嚴格，不但輸出穀物受到禁止，而且一遇到歉收，則糧食全被操縱，這些封建關係的障礙遂引起人民大大不滿，並且給資本發展以莫大的阻塞。

四、工業——法國當時工業，一直到十八世紀末，還是以農村的家庭工業及城市上不超過十個工人以上的小生產佔優勢。僱用白人至百五十人的為大企業，五百工人的工廠，簡直少見。最大的企業則為巴黎皇家的手工工廠，凡羅比的製呢手工工廠及玻璃廠，其中有幾千工人。主要工業城市是生產絲織品的中心——里昂。在普通小生產中，多半是由商人或業主將原料發給手工主人或家庭主人，然後由他們分給手工業者製成物品。那時工業還都歸政府監督，政府定有各種法規，不僅規定布呢的質量，還且涉及長短寬窄染色等。

到十八世紀末期，法國還不知道英國的機器。一七七五年始從英國輸入織布機及哈格理佛士式的紡紗機。卽至十九世紀之初，法國的機器還非常之少。所以它的工業當時不是帶大工業性質，主要還是家庭工業性質。大部分工人是在家內工作，只有小部分在工場內作工。因此每年當農忙的時候，鄉村織機與城市織機一部分就要停工，平均每年織機工作日只是八個月。手工業者中間的行會組織仍是存在，場主有場主公會，工匠學徒有同業工會，而同業工會又是由場主極端壓迫工匠學徒的一定條約結合的。其

能俾免這種壓迫的保護者，只有家庭工業。家庭工業給多數農民以副收入。這種家庭工業，在土地貧瘠而破產者多的法國西北部，特別興盛。

這樣的矛盾現象是不能長久支持下去的。一方面，農業中農民大部亦貧化，向無產者隊伍中流去；另一方面，城市手工工場不發達加以國家干涉與行會限制又不能容納這些過剩的自由勞動力。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向前發展而且要求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的閉塞，種種封建關係的束縛，又不讓這般工商業自由向前發展，「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相當階段時，就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生產力在過去曾經是在這些關係中發展的，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枷鎖，那時就進到社會革命時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這就是大革命前法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內的矛盾所在，這種矛盾也就是革命不可避免的社會基本原因。

革命前法國的階級關係　由於上述之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就產生了法國各階級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可從以下各階級的狀況加以說明：

一、封建特權階級——首先是天主教會及其僧侶，他們佔有國內最肥美與廣大的土地，擁有大批的貨幣資本，自己不担負國家任何捐稅的義務，反而還從人民中收納所謂「什一稅」。教堂的財產很多，估價約四萬萬利華，每年收入約十萬萬利華。教會人數約在十五萬以上，教會上層人物為高等貴族出身的主教及大僧侶。教堂大部收入皆據為己有。主教羅干年俸即為一百萬利華。至於平常教士及鄉村牧師均為小資產階級出身，其生活與尋常人相差不遠，鄉村牧師每年不過三百利華。這班下級僧侶多有不滿意上層教主僧侶，在爾後三級會議選舉中，下級僧侶的代表，亦與第三等級聯合而來反對封建制度。其

乃是貴族，人數約一萬四千人，他們也是不負國家任何義務，而是坐享特權的寄生蟲。貴族中有高等貴族（約一千人），他們一面供職王朝，高官厚祿；一面擁有廣大封土，坐納租貢，同時，兼任重要軍職，操縱軍權。這種世襲的寶座，使他們安富尊榮、淫奢無極，消糜無數的民脂民膏，成爲專制王朝的柱石。再就是官僚貴族，亦名「外套貴族」。他們是出席國會及供職法院的最高官吏。他們常根據法律與國王的專制主義對抗，企圖限制王權，但屢試屢敗，而基本上他們仍是王朝的竭力擁護者。至於莊園貴族即中下級的貴族，他們住在鄉村，生活還是比較平淡的，有的因破產而過着貧苦的生活而與農民接近，但是總自認爲是高出農民的尊貴人物。他們也企望做宮廷的榮華貴族，可是對國王專制也懷着某些不滿，甚至某些省區的下級貴族還成爲現存專制政體的反對派。一般說來，貴族階級大多數還是國王擁護者。

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中，一部分是上層享有特權的金融資本家（財閥），他們佔有一切信用借貸機關，依靠現存政權，大發其財；除信用借貸事業外，國家許多重要財源（如鹽稅、關稅、煙酒稅）都由他們承包而獲得巨大的收入。他們中間，大部分都佔有很多的封建財產和貴族頭銜，其社會地位使他們成爲現存制度的擁護者。他們希望現存政體保存，也就像債權者不願債務者傾覆一樣。固然，他們有時也要求改革現政；因爲現政能夠改好一點，就使他們權利可以鞏固，並且可以發更多的財，此外並無其他根本不滿意現存政體的地方。與一部分特權資產階級並立的，就是工業資產階級，他們的經濟基礎，大都在中心城市——如馬賽、波爾多、里昂、蘭德等地，自然，政治中心的巴黎：也是他們活動的中心。十八世紀下半年的產業革命，機器生產開始代替手工生產，在法國工業史上亦開闢了一個新紀

元。然而國王的政體、封建的特權、國內關稅林立以及行會條例的限制等等都成為資本主義今後發展的障礙。特別一七八六年法國與英國締結的通商條約，最違反他們的利益。因為這一通商條約，使主要由手工勞動製出的法國商品，不能與廉價而免稅的英貨競爭，而法國企業多數破產。因此，法國工業資產階級，為着資本工業的自由發展，堅決要求取消國內關稅，節省國家不生產的消費，減低那些抑制人民購買力的重稅，改變英法商約，而不能不與現存政體處於敵對地位，不能不使他們在法國革命中佔着重要的而且是領導的地位。也得指出，有一部分經營奢侈品（如絲織品、絨織品、裝飾品……）的工商業家，都以保存現存制度為有利，革命開始即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至於法國的知識分子，他們表現出各種不同的階級利益。有些知識分子如教會的代表、法律家等，是擁護舊制度的，然而那班由新的生產方法產生出來的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不滿意於舊的官僚制度，要求新的集中的國家，用新的人材來管理國家，要求發展個人的天才。革命前的法國，許多經濟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充分表現出經濟發展的要求，即充分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其作用是很大的。

三、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當時居在城市及近郊的小有產者——如小商人、小店東、手工業主、店老闆及其他小市民等，他們在城市中佔很大的人口數目，在革命中亦起了很大的作用；雖然他們根本不贊成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贊成機器破壞了手工業，但是在舊制度之下，小資產階級又受到很重的負担日趨於破產。所以在反對王權中，他們是積極參加的。不過他們帶着政治上之不固定性，在革命高漲時非常熱心，而遇到不利時，易於灰心失望。

四、勞動工人——當時法國還沒有現代的無產階級，當時無產者中主要是手工工人及在企業中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工人中大多數還是在家庭工業中作工的，無論是城市工人或鄉村手工業者，他們的工資是很低的，生活甚苦。城市工人多在行會制度之下，受着不堪設想的壓迫。行會手工業的老闆是有全權的人物，其次是工匠，再就是毫無權利的學徒。按法律的規定，工匠如無特別關係是不能升爲老闆，學徒在三年到十年滿期後然後可升作工匠。因此工匠學徒也成爲當時制度積極的反對派，他們爲着自己利益常時反對老闆。此外還有僱傭工人及城市的苦力，他們工作時間很長，生活艱苦，如王室或私人工廠內的工人，每日工作時間，爲十一或十二小時，並有多至十五六小時者；這些工人是當時法國的無產階級，其在舊制度之下受着封建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雙重的壓迫。雖然由於歷史的限制，使他們還不能眞正形成爲強大的無產階級，更不能有單獨的政治主張或自己成爲統治階級的企圖，可是這些無產者的工人，確是現存制度之最堅決的反對者，其在革命中起了極偉大的歷史作用。

五、農民——在法國封建制度之下，也是主要的被剝削階級，一切封建的壓迫，稅務的重担，教堂的什一稅，幾乎都落在農民身上；另一方面，公共土地之被侵佔，天災人禍的威脅，特權階級所加予的恥辱，這都使廣大貧苦農民，無法生存下去，加以資本主義侵入農村，農民分化過程加速，而廣大的小農、貧農則愈益破產。農民對現存政權的不滿是普遍發生。他們要求取消一切封建特權，擺脫封建義務，取消什一稅，恢復被地主奪去的公社土地，這就使農民羣衆不能不成爲現存制度之激進反對者，而在革命中成爲巨大的革命力量。然而因爲農民的散漫與無組織性，使其只能在其他階級領導之下，必須與城市工人平民的鬥爭相結合，乃得有爾後毀滅封建殘餘的勝利。

總之，法國大革命前，充分表現出階級矛盾之急劇發展，主要矛盾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工人、苦力與封建國王、教會、貴族、大土地所有者中間的矛盾。資產階級以其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之優越地位，成爲反封建政體的領導者，並發動其他反對現存政體的階級參加。但是無產者與有產者中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取消，並且也正在社會內部增長着。

革命前法國的政治制度 直到大革命前，法國仍然是一個專制的等級的帝制國家。路易十五（一七一五——一七七四年）嘗說「最高權力在於朕躬，立法權唯朕操之」，至路易十六時代（一七七四——大革命時）這種專制政體仍在竭力維持。

專制政體的最高統治者爲國王，其行政機關則爲御前會議，巴黎有最高法院，教會成爲國王的有力助手。但是，必須指出法國當時政治制度上仍保持有歷史上傳來的特點：

第一，是國內在政治上仍極不統一，封建割據的殘餘形態仍然保存着。國王雖有集中的中央政權，但法國當時三十五個行省仍各有自己的獨立權。各省省長管理各省的經濟、政治及軍事上的一切事宜，雖然國王可以支配各省的軍隊、外交及官吏罷免，甚至財政稅收亦由國王監督，但實際上，各省是獨自爲政，各省行政極不一致，高度的官僚制度，不同的稅局林立，地方政府的混亂腐化，並不次於國王，不過各省在形式上仍是聽命國王，未敢公然抗命。

第二，就是政治上的等級制度。這種等級制度也就反映到法國內部各階級的關係，法國公民（「正式人民」）分爲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是教會僧侶，這是法國特權最高的等級；第二個等級是各種貴族，也屬於特權等級；第三個等級則是一切平民（無特權的普通人民），其中包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

級、律師、知識分子、手工業者、工人及農民，卽是說除了第一、第二等級的人之外，其餘法國人民都屬於第三等級，第三等級則專負納稅當兵及其他一切封建之義務，國家一切負担都壓在他們身上。

第三，就是法國在大革命之前根本沒有國會制度。由於法國專制主義之深厚與長期存在，亦由於法國資本主義發達之遲緩與資產階級力量的微弱，使法國資本力量不能如英國那樣早就能夠壓迫政府注意而早期就形成了國會制度。法國雖在中世紀曾一度發生過所謂三級會議，但自一六一四年以來就從來沒有召集過會議，民主權利在專制時代的法國根本上談不到。

雖然如此，法國的專制政體仍敵不住金錢財政的襲擊力量，仍不能根本阻住資本主義之瓦解封建主義的作用。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特別自十八世紀開始，法國專制政體是在不斷的瓦解中。

皇室之驕奢淫佚，國王之放辟邪侈，美麗的凡爾賽宮、窮奢的遊獵宴會，遂使國庫日益空虛，財政日愈紊亂，加之歷年不斷的戰爭（一七一五——一七二三年法西之戰，一七三三——一七三八年波蘭選舉之戰，一七四〇——一七四八年西班牙王位承繼之戰，特別是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之七年戰爭）均使法國財政頻於破產，入不敷出，債台高積。一七八八年不敷數爲一六〇、七三七、〇〇〇利華，等於全支出數百分之四十二，十八世紀末，法國對債務的支出，竟及總支出的一半。法國政府的財政是日益難於維持了。

專制王朝所賴以生存者，除領地收入外，大部分依靠苛暴無比的賦稅——所謂直接稅與間接稅。直接稅包括土地稅、人頭稅及二十取一的所得稅。間接稅則屬厘金關稅，一切日用品均須納稅。尤令人痛恨者，則爲鹽稅，民衆從政府方面買到的食鹽，每每高出原價十倍，此等間接稅通常「招人包攬」，包

者又從中大批取利，納稅者均爲當時所謂「第三等級」。

既然專制王朝在金融勢力之下，日愈陷於貧困，因而它對於金融資本家的依賴日益加大。十八世紀的法國，不管它如何企圖鞏固其專制政體，但是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的力量，亦顯明的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中。國王爲了擴大經濟來源不能不滿足某些工商業資本家定貨者的要求，因而大商人與財政家的權力亦增長起來，而專制法國亦多少開始轉化成爲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國家。

雖然如此，革命前的法國，仍是一個封建君主統治的官僚制度的國家，不過這種政治機構，顯然是隨着愈加發展的法國社會內在矛盾而不能不日益崩潰下去。

新興資產階級及其他的思想意識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早把資產階級引上歷史的舞台。不滿意於絕對君主政體的資產階級，不僅在物質生產上準備了打擊舊制度的經濟的武器，而且在思想上發生了對抗舊制度的政治的武器。在革命未發生之前，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早就想到一種準備建築在封建王國的廢墟之上的政治制度。只有這種政治制度，才合乎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使資產階級能夠集中的掌握政權，自由發展工商業，自由的剝削勞動者，鉅大無比的增加自己的財富。這種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在十八世紀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政論家的言論著作中表現出來了。

福耳特爾（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是法國的這種新思想的創始者。他發揮偉大的天才，作過對於社會國家組織的批評。其最大功績，就是以全力攻擊封建的教會偏見，認爲羅馬教會是一切壓迫的根源，是進步的障礙。他高呼打倒教會特權，提出要「踏死這個毒蟲」。對於社會國家問題上亦提出了比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肅清佃收殘餘，保證人格之神聖不可侵犯，思想、出版的自由，取消

階級的特權，全國統一的立法權及法庭陪審制等。雖然如此，但他仍逃不出是一個開明君主專制政體的思想體系。他尊重資產階級的文化道德，但他對於勞動大衆則抱憎惡蔑視的態度。他說：「民衆是需要扼制住的受駕駛的與粗秣的動物。」他開始狂熱的反對宗教，後來又公開承認宗教及其主宰，對於人民是必須的，他說『倘若沒有上帝，也得製造一個出來』。這正是代替墮落的封建貴族而起的資產階級紳士的思想家，也正是新興起來的一般資產階級的特性，一面希望改革舊制，一面又憎惡勞動大衆。

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七五年），他是痛恨君主政治的法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所著的「法制精神」，正是受到英國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要求以君主立憲來改革現時君主政體。他認爲，只有由握住立法權的國民會議來限制王權的，才有政治自由的可能。他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制，想將立法、司法兩權控制在『代表民衆』的資產階級手中，只給國王以行政權——即應用立法統率軍隊支配財政之權，而這種行政亦只有在國會嚴格監督之下乃得行使。這種理論自然很受資產階級歡迎，表現出資產階級反對專制的要求。

盧騷（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是當時法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民主主義的主張者。他和福耳特爾不同，關心社會上勞苦大衆的貧困。他認爲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一則是由於城市的奢侈與文明，他說「在大城市中沒有道德與誠實，因而那裏每個人都容易欺瞞社會，容易利用榮譽去發大財」；二則由於土地分配不平均，他說「人們如果忘記了這件事：就是土地的果實是屬於世人的，土地不屬於任何人的事，難道人類社會就從此滅亡不成罷?!」。他認爲原始社會的人類生活最爲圓滿，那時既無私有財產，又無因私有財產而生的不公平。但是盧騷本人並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只不過是幻想使私有者得到

均衡就足夠了。盧騷對於政治權利的主張，見於他所著的『民約論』中，大意說：『人權是天賦予的，人類應當利用社會契約創造社會組織，每個人把自己權利一部分交給社會，這個契約是一切公民的共同意見，最高政權只是人民意思的共同表彰而已。倘若政權錯用了所賦的權利，則人民應該推翻這個政權；另一方面，社會契約是保護私產人格及公民的安全而結締的。如果其中有被犧牲者，則此契約應行重訂，人民有起來革命及反對現存政權的權利。』盧騷這種學說，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可是這種理論顯然是帶有激進的民主成分，給當時反對君主政體的第三等級以莫大的思想武器。

至於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主要人物是狄德羅（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年）、達蘭貝爾（一七一七——一七八三年）、訶爾巴哈（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年）、赫爾維休（一七一五——一七七一年），他們都是無神論者與主張科學知識的機械唯物論者。他們出版百科全書，主張一切存在的基礎是物質運動，人性是由環境決定的。他們把物質運動都歸納爲物理的現象，否認自然及社會的發展過程，他們不重視生產力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而只在人類知識領域中尋求歷史的基本動力。但是他們這種反宗教反特權與講求科學根據的學說，成了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最有力的思想與組織的中心，其實他們在社會問題上離科學的眞理還很遠，但在當時對於舊制度是很有作用的。

資產階級各階層的見解已如上述，此外當時還有反映社會下層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思想發生。梅利頁（一六六〇——一七二九年）認爲社會萬惡的來源是私有制與階級制之不平等，希望由富者的恩惠來改善自己的境遇是毫無裨益的，只有貧者起來對富者實行叛亂，才能實現。另外在十八世紀有一個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莫爾利（ Morelly ），提出沒收私有財產，一切市民由社會給養，一切市民要盡力爲社會

服務；這樣來實現共產主義新社會，人類乃得平等。

以上這種思想意識，對於爾後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準備上是有很大意義的。他們給了革命階級理論上的武器，給了舊的封建制度以思想上的打擊。如果沒有這種理論上的、思想上的指導，法國大革命是不會有那樣偉大的結果的。

此地不能不附帶說到，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運動，對法國大革命是有很大影響。這次英國殖民地的獨立，北美合衆國的憲法很有力的激起法國反抗專制的強暴的革命精神，美國的人權宣言也可以說是法國革命的刺激物。

以上說明了法國革命前一般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這是發生革命的基本原因。其結果必然是「資產階級以前在封建制度內所取得的地位已經變成太過狹小不夠它內發展了。資產階級的發展與封建制度已成爲不能並立的形勢，封建制度必須毀滅」。（「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於是以推翻封建制度爲目的的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就臨近了。

第二節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

革命的前夕　在革命爆發的前夕，一位有名的學者在法國旅行的時候，聽到一個老太婆這樣說：「我們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麽事，但是一定要出一點什麽事，好！讓它快點發生啊！」

法國的舊制度是危急到萬分了，民衆的騷亂是普泛的發生起來了，革命已經快要臨產了，一七八九年的前夕，法國是處在這樣一個時候了：

首先是由舊政體之橫征暴斂，民衆已經再無法生存，又加之一七八八年的旱災，入冬飢饉待斃，路易十六在位以來不斷的發生農民暴動（最厲害的是一七八二年以後），至一七八八年農民暴動更加普遍發生，如布勒塔尼省的暴動中，倫勒城四鄉都成爲暴動區，在哥利諾伯勒暴動的農民直接繳衞隊的槍，到一七八九年開始，農民暴動幾乎普及全國，性質更加嚴重，不但許多地方公開不納稅、不繳租，甚至強迫領主放棄封建特權，不然以刀矛相見。當時有個省長報告「國稅已無出路，他們抗稅、抗捐、抗債」。沙散在他的『Genie de Revolution』書中說道：

「鄉村的暴動，法國再也不能回復到一七八九年一月以前的狀況了，假使恢復原狀，必須要征服一個一個的鄉村，從三月起，農民沒有人再繳付封建的租稅。」

城市的民衆怎樣呢？城市的騷動也相繼而作，一七八六年里昂工人罷工，由於軍隊鎮壓而激成暴動。一七八八年到一七八九年初，許多城市民衆都因食品缺乏發生大大小小的騷動，特別是巴黎及其近郊，飢民羅雀掘鼠、暴動搶糧，並且反對宮庭貴族。一七八九年四月，巴黎近郊勞動者反對場主，發生與軍警直接衝突，民衆死傷七百人。此後在鄉在城，民衆的革命運動是一發而不可遏止了。

政府的財政到一七八七年已陷入絕境，國債已到十六萬萬利華，一七八九年國債劇增至四十五萬萬利華。因爲人民貧極暴動，無法徵稅，雖然政府擬發行紙幣以圖維持，但竭澤而漁終無出路。路易十六之財政大臣屈哥計議召集人民推選的代表會議，宣佈商業自由，取銷行會，賠負封建賦稅，由人民各階級徵收捐稅，削減宮庭糜費等政策，以圖挽救君主政治的危局，但因封建朝臣的反對而無法施行，並且屈哥亦被免職，繼任的財政家爲芮克，他的計劃因較屈哥溫和，終亦被免職（一七八七年），至卡倫

(Caloune)爲財政大臣時，因財政危機無法挽救，不得不施行向特權階級徵稅，但因特權階級反對，不得不召集貴族會議（一七八八年十月），但亦毫無結果。一七八八年末芮克又重新入政，從此召集三級會議之風遂高唱入雲。而革命之到來亦如箭在弦矣。

政府爲謀解決財政及其他問題，決定召集三級會議，按三級會議的組織法是由僧侶、貴族、平民三級，分別投票表決，表決時不是看單個票數的多少，而是看贊成的身份等級的多少。自然，特權階級的僧侶、貴族一定是佔多數(三分之二)。一七八九年四月，三級會議開始選舉代表，結果選出僧侶代表三百人，其中多數是農村的教士，貴族代表三百人，大部分是宮庭貴族，有三十八人是「外套貴族」。不過政府爲求得資產階級之財政襄助起見，（芮克的主張）擴大平民等級的代表到六百人，其中以商人（二百六十人）、律師（二百十二人）爲多，此外還有公務人員、醫生、市會議員等。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國王駐地凡爾賽宮開始了莊嚴的三級會議，會議中強烈的表示出宮廷特權階級之侮蔑第三等級之態度，路易十六的演說充分對革新派示以壓迫（他說：『我們要堅決拒絕這種危險的革新』），三級會議遂無結果而散。第三等級的代表提議於六月十七日沿用國民會議（後爲憲法會議）之名自行開會，其他等級參加與否則聽其自便。政府則採用各種辦法阻止其開會。六月二十日，國民會議因無適當地點即在室內網球場開會，並宣誓非達到制定憲法決不解散。羣衆對此會議熱烈表示擁護，羣集街頭相候，願爲後盾。在有國王參加之特別會議上，國王乃直接命令解散國民會議，但第三等級代表仍不散會。當時第三等級中有一代表米拉波演說，痛詆專制主義。忽有一朝臣挺身說道：「你們聽到國王命令，何故仍不解散耶？」米拉波答道：「我們是順從國民公意在此開會，沒有刺刀驅逐，我們決不走。」這種充滿

了自信而強調的回答，就已說明了資產階級背靠着革命氣燄高熾的法國人民，已決心與舊制度作一最後的決死戰鬥了！

巴黎已成為革命的大本營。巴黎民衆在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天已經有大暴動之可能，在國王列席會議的前夕。人民幾乎殺死了敎士中一個議員，巴黎天主教為羣衆所侮辱，軍隊拒絕開槍，議會廳周圍站着三四千羣衆，人民態度太強硬，宮廷不敢訴之以武力。所以路易十六嘆息的說：「算了，讓着他們留着罷！」總之當時巴黎及其他城市中、農村中，革命的氣燄已高入雲霄，巴黎民衆已經公開準備暴動。沒有這種統治階級的充分混亂，沒有洶湧增長的、極堅決勇敢的羣衆革命行動，法國大革命是不可以想像的。這時正是列寧所說的「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時候了。到了霹靂一聲「七月」，光輝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就開始了。

攻佔巴士提大獄　自國王列席國民會議之後，政府一面下手免芮克的職，一面調集軍隊準備來鎮壓巴黎的革命運動。七月十二日巴黎知道了這個消息，民衆大批結隊遊行。第三等級的演說家——加米爾．度穆郎公開號召「拿起武器」。近郊區域響應這種主張，在三十六小時內造出了五萬件刀槍。到處是開會演說，巴黎整天整夜的哄嚷着，標語、傳單、小册子是滿街飛行，七月十二日，巴黎變亂突起，民衆從四郊湧入城市中心，將城內徵收稅的關卡焚燬，十三日晚帶武裝的民衆徹夜在街上巡行。七月十四日，巴黎羣衆在激昂的號召之下，遂大舉奔向巴士提大獄——那裏是監禁革命家的場所，又是作戰上的防禦要塞——進攻。「我們要巴士提」的殺聲衝天，民衆齊向砲台衝進，獄內許多政治犯一齊加入，巴士提獄即迅速被佔領。佔領之後，旋即將其搗毀。全巴黎及他地的羣衆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愈加興奮

行動起來，革命遂一發而不可抵禦。巴黎街頭成了革命武裝的陣地：民衆不顧一切的殺戮舊政權的代表及其爪牙。在這期間，巴黎資產階級一面爲了反對封建政體推動民衆去公開暴動；一面又極力武裝自己，這不但爲了自衛，而且好來約束民衆的暴動；他們遂毫不失去時機的迅速組織一種革命執行機關（即以資產階級爲首的「巴黎公民會社」）與一萬二千人的資產階級保衛團——國民自衛軍，這個保衛團在四天之內發展到四萬八千人。總指揮是拉斐德。

許多城市在佔領巴士提獄的影響之下，而繼續暴動起來。如托羅葉、斯特拉斯、雪爾堡、魯安、毛特格等城均相繼動作起來，而其餘地方亦在以後三四日內不斷發生暴動，無情的撲滅封建貴族的勢力，自動取消了一切封建特權與稅務。而資產階級仍是忙於擴充自己的實力，到處組織國民自衛軍與遍設各種新與勢力的機關，以常務委員會的名義來盡力維持各城市的秩序與安寧。

凡爾賽的國王又怎樣呢？進攻巴黎的計劃既被「巴士提獄」事變打得粉碎。當十四日晚國民會議派代表去要求國王調開軍隊撤換閣員時，國王態度依然強硬。可是在民衆武裝的警告之下，加之自己的軍隊亦有不穩之勢，專制政體已失去其可畏的威力。國王不得已，不能不親來巴黎議和，表示一時屈服，甚或可以取得資產階級的愛戴，作一個資產階級的國王，藉此對付民衆。然而國王這一行動並不能阻止民衆那種沉默與不信任的強硬態度，王室與民衆之間因已無和平可言，而資產階級尚不敢馬上公然敵視民衆，這使國王不得不掃興而返，另作他議，使王親貴族們不得不開始遷移，離開法國。可是革命的民衆，連逃走的貴族也大加攔阻逮捕，連皇親白悌爾也被農民捉住殺掉。這時國王的政府已再不能仰賴「忠義的臣相」、「善良的市民」了，甚至也找不到一個適當地盤來和革命鬥爭。

農民暴動的發展　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給了法國革命以極大的推動力。一七八八年冬天尤其是一七八九年三月以後，普遍的農民暴動已成爲法國革命的號砲，而現在巴黎的『七月』及其他城市的暴動，自然是火上加油的燃燒了全國各地的農民暴動了。農民的口號是『土地』、『糧食』、『取消封建捐稅』、『取消教堂什一稅』。任何農村的暴動一起，農民就是摧毀城市的關卡，擊破貴族領主的城寨，放火焚燒他們囤積的糧食，掠殺他們的家畜，毀滅田契的約紙，有時公開殺戮地主及收捐稅的委員，公開瓜分貴族地主的土地和森林。一七八九年七月下半月與八月間法國農民暴動更是普遍的發展起來，這種暴動由東部、東南部、東北部，而急速地蔓延到中部、西部、南部，發展到全法國的每一個農村角落。農民認爲推翻封建特權和收回土地的時候到了。暴動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響邇。據歷史的記載：法蘭斯，孔德的一切宮室都被焚燒了，多飛內的五個宮室中有三個被刼了，桑西、魯拉、比坦和摩南的宮堡被刼了，亞爾薩斯大部分宮堡、寺院都被搗毀了，農民不僅毀滅了一切田契與奴役的約紙，而且組織了數百以至數千的游擊隊，不顧一切的向封建、貴族、領主教堂進攻，有時連城市富商的住宅也被刼奪。這就是偉大的徹底的法國土地革命。

資產階級懂得，沒有農民暴動的幫助他們是不能戰勝國王的封建權力的。他們一開始鼓勵農民暴動，一開始就注意到拚命抓取暴動勝利的成果，自然他們是不允許農民暴動超過一定的範圍。所以正當着農民暴動進一步發展，它不僅無情地毀滅封建勢力而且侵犯到資產階級利益的時候，（許多資產階級的土地財產都有封建權利）資產階級的武裝就毫不猶豫的起來施行鎮壓，例如：七月十九日法蘭斯，孔德農民暴動開始，那裏資產階級，就立卽武裝他的保衛團以抵抗『遍佈國境之內的土匪侵入』。七月二

十八日，畢伽的首府佩倫發生暴動，響應農民的進攻，當時有三十萬的資產階級組織的武裝來抵禦這班用鐮刀、木棍、鋤頭武裝起來的兩千個『土匪』。有些資產階級在暴風雨的革命鬥爭中，就已經恐懼起來，唯一害怕是城市貧民與『土匪』聯合起來攻擊富人。

憲法會議上一個議員這樣說到：

『財產成了最無恥的暴徒及浪人的犧牲，到處的城池被焚刼，租稅和莊園稅也不繳納，法律無效，威權落地，裁判變成空物。』

這就說明當時法國民衆運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老實說假定當時沒有這樣的民衆運動，鄉村與城市鬥爭之配合，幾百年的法國封建統治勢力是不會剷除到那樣澈底的。

八月四日 八月四日之役，同樣是法國革命中大可注意的日子。革命運動的突飛猛進，農民暴動的普遍增長，迫使統治的封建地主階級不得不對農民作一時的必要的讓步，藉此以和緩羣衆的革命鬥爭。封建特權階級的代表們在本晚的集會，決定了放棄他們幾世紀來絕對行使的特權，貴族宣佈放棄租稅，教士宣佈放棄什一稅，甚至最貧的教士也願意放棄小費，大地主放棄他們的地主法庭，而一切人都放棄他們的狩獵權，禁止侵害農民的鴿室。表面上看來，似乎一切封建權利都取消了。第二天——八月五日，國民會議集會討論，並做出決議案，其第一條就是這樣說到『國民會議毀滅全部封建制度』；當這個消息傳到全國，各省的人民都以爲法國再沒有什一稅了，沒有捐，沒有稅了，沒有奴役，沒有狩獵權，再也沒有貴族，沒有任何特權了。一切人民在公共選舉的法官前面都是平等。於是各地的農民並沒有接到正式的指令，都洋洋得意的照辦起來了。這正如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新萊茵』報

上所說：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佔領巴士提三星期後，法國的民衆於一日之內把一切封建的負担都解除了。」

民衆的行動雖然是如此，但是國民會議並未能完全從法律上鞏固這一行動。國民會議無論是八月五日的決議，或八月十一日的佈告，都只是把廢除封建殘餘當着紙上空文，離實際行動還很遠。就是在空文上規定着個人的奴役是可以無代價的取消，而眞正的奴役（農奴附屬於土地，隨着土地之出租或出賣而轉換主人），必須以代價取贖，教堂什一稅也得由義務人贖買，田獵權只擴張於一切有產者。這樣農民的要求並未眞正圓滿的實現。農民問到『什一稅完納到何時爲止』。議員們囘答說：「到另想出供給教士辦法的時候爲止。」當國家增加稅收農民拒絕納稅時，國民會議如何嚴厲的通過法律規定罰款，對付拖欠與拒繳的農民。於是農民大失所望，騷動的風暴又在各地發動起來了，國民會議採取嚴厲的手段反對叛亂的農民，在多飛內、克隆尼、馬森市、里昂很多暴動的農民被殺被俘。

國王剛利用國民會議之動搖與斜助，實際上成爲反動的中心，於是也堅決表示「我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破壞我的教會與我的貴族，我不能批准破壞這兩個等級的決議」。雖然如此，農民還是認爲：這些封建權利旣已放棄，就不願用錢贖買，自己飢寒交迫也就無錢贖買，唯一辦法還是繼續革命，大有不完全廢除封建制度卽不停止之勢。

人權宣言　藉民衆力量而握得權力的資產階級，當其走上政治舞台時，就早已準備新社會的原則，想方法來改良現有國家制度，使其適合本身的利益，當八月四日晚上，國民會議就以一七七六年美國獨

立宣言作榜樣，便通過了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宣言，卽所謂「人權宣言」。宣言第一條說「一切人類在法律上平等」；第六條說「一切國民都有權親自參加或推舉代表參加制定法律」；第十條說「人民的意見或宗教信仰如果不危害由法律所造成之公共秩序時，不能侵害」，並宣言公共權力「是爲保障公共利益而成立，不是爲行使此權力的個人之利益而建立的」。至於如何解決民衆生活問題則一字不提，却急忙忙的規定出「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一般說來，這是資產階級性的權利宣言，不錯，講到民主、自由、平等對於打擊封建專制主義是革命的、是進步的；可是它並不是屬於「一切」的人的權利，而至多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權利而已。民衆利益不提，却大聲狂呼「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不僅是想用法律來保證資產階級已得的利益，而且明顯不過的，表示反對農民侵犯地主土地，指出民衆不應再向前進，不能觸犯由專制政體或者說也有資產階級參加所規定的財產權利。

毫不奇怪的，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大風暴中，得到很大的利益。他們積極的沒收爲國有的教會土地（約佔全國土地五分之一），及其他不動產，劃出很大部分出售，允許短期賒欠。自然，這筆財產，無條件的是落到城市與農村中有產的資產階級與投機者手中去了。貧苦農民自然無力享受，而這大批利益，已經增加到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之下，自然是「神聖不可侵犯了」。

因此，人權宣言主要是反映了爲剷除封建制度的革命資產階級之氣勢與思想。資產階級似乎以實現此宣言爲滿足，民衆則深以爲「差得太遠」。國王在革命勢力威脅之下亦不得不承認之，並且也不停止其反革命活動。

十月十五日的革命　革命運動向前發展，同時反動勢力亦極力活動。十月初，一方面是國王調佛蘭法斯軍隊到凡爾賽，正準備向革命進攻，高級軍官廷臣貴族發出宣言擁護國王，革命的三色旗也被他們踐踏了；另一方面，巴黎民衆不但在革命中沒有得到大的好處，而且生活愈加惡化，加之王黨又在密謀造反，遂使羣衆運動又蓬勃起來。十月十三日和十四兩日，巴黎廣大民衆遊行集會，被軍隊驅散，十五日晨，巴黎婦女因得不到麵包羣集街上，民衆向市政廳要求麵包與武器，一時『到凡爾賽去』的口號，在羣衆中大喊起來，羣衆即向凡爾賽進發，許多持着武器，即時進攻王宮，國王不得已，乃隨同民衆同赴巴黎，並居住推拉里宮中。十月十七日，國民會議亦遷往巴黎。這樣廣大民衆又造成了勝利的二次革命，實際上國王已成爲革命民衆的俘虜，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到這個時候爲止，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的第一時期中最英勇、最頑強的鬥爭時期。十五日的革命，正是表示巴黎民衆之不願與專制政體並存，堅持革命之向前發展，大有不推翻國王而不終止之勢。

黨派與俱樂部　要了解這個時期內法國的階級關係和革命的動向，就必須探討國民會議中的成分及其主張，了解其中的黨派與其活動。國民會議自六月十七日事實上成立之後，其中成分是貴族佔十四人，官吏佔一百十八人，律師及醫生二百二十八人，商人及小地主二百十二人。按其階級屬性與政治主張說來，可分爲四派：（依現在意思解釋的政黨，當時還沒有的）一，君主專制派（王黨），其分子是上層教會代表、高級貴族及各省貴族代表。這班人的政綱，就是竭力保持第一、第二等級的特權，擁護國王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是當時的右派反動派，二，自由君主派，屬於一部分自由主義的高等貴族、官吏、銀行家，承辦朝廷貨物的大工商業家及包管國稅者。他們是在『君主立憲黨之友』的俱樂部

之下結合起來，他們同情兩院制，主張維持革命以前的現狀，實際上，這班人也是與右派分不開的。革命開始很快就投入反革命方面去了；三，君主立憲派，其分子爲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及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的代表，以米拉波爲其首。其政綱就是以財產爲根據的憲法極力想限制王權，取得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優勢，他們反對王權，但亦懼怕革命發展下去。其政策原則總是緊緊握住在革命中所獲得的財產，不使受革命與反革命兩方面勢力的侵犯。米拉波及其黨人原屬於『一七八九年俱樂部』後來名爲斐揚派（斐揚——寺院名）。他們對於羣衆沒有什麼影響，革命開始時期，他們就是動搖者。這是當時國民會議中的中派；四，甲可賓派——即民主派，即由巴黎甲可賓寺院之『憲友社』俱樂部得名。這派是當時革命民主勢力的中心，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革命的指導者。他代表急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及農民，然而其中最左的還是山嶽派，此派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主要首領爲律師羅伯斯庇爾、馬拉。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及工人等均認爲此派是他們的利益代表者，他們在革命中、在羣衆運動中起積極的領導作用。他們要求堅持革命前進，根本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同時在『人民之友』報上，極力批評國民會議的妥協性，揭發其反革命的本質，爾後革命深入下去，甲可賓派內資產階級分子分化出去，但山嶽派仍堅持前進，成爲法國革命中民主勢力的柱石，法國各大城市都有他們的支部。

此外尚有由下層民衆中具有政治影響的組織，其中有一個就是科第尼爾俱樂部（一七九〇年春發生），這是由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及民主的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其目的亦是實現民主政體，不過暫時着重於以政治知識教育巴黎下層羣衆如手工業者工人等。其首領爲新聞記者阿貝耳、律師但頓。

在當時國民會議中，中派的人數較多，反動派的人也不少，至於左派的代表，那時還無多大力量，然而在民衆中的影響却非常大，從這樣成分中也就可以知道國民會議的活動方向了。

巴黎公民會社與區分部 法國革命之如此汹湧的爆發與進展，民衆運動之如此強烈的演進與擴大，如果沒有激進的民主派分子的領導革命，又如果沒有革命一開始就從鬥爭中新產生的革命組織來團結民衆，那末革命的發展是不會有如此迅速的，這個新的革命組織就是巴黎公民會社與當時巴黎選舉三級會議代表時所劃分的六十個選區的區分部。

果然革命開始，巴黎大資產階級就利用巴黎公民會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這並不能減弱這公社在革命中的偉大意義與作用，革命是以組織公社而開始，這個組織給了革命民衆以極大的力量。實在說來，在鄉村中，正是農民的公社團結農民，要求廢止封建權利，抗租抗稅，從領主中奪回公共土地，抵抗貴族，保護革命者，逮捕逃亡的貴族和阻止爾後國王的脫逃。

在城市中，正是城市的公社團結市民，進行鬥爭，按指定法官，變更稅收的分配，在爾後革命發展中成了反抗王權與保皇黨陰謀及國外敵人侵入的武器。

大家知道，爾後廢國王之位的巴黎公社下的羣衆，八月十日以後，它是革命的烘爐，公社存在一日，革命即保持一日的生氣。

巴黎的區分部則是巴黎的革命民主勢力的實際基礎。照法律的規定，這些區分在選出原來三級會議代表後即應取消，可是革命發動這些分部並未取消，事實上成爲一種對抗王權的地方革命自治政府。一七九〇年夏，巴黎改爲四十八個區，國民會議代表由區分部選出，革命愈向前發展，區分部權限亦愈形

擴大，它由警察和法庭公事機關的作用變爲積極干涉國家政治生活了。不管在今後革命進程中大資產階級如何由革命動搖而最後走到叛變革命，但以民衆力量所圍繞的區分部，實際上成爲推動革命前進直到最後澈底勝利的柱石。

★　★　★　★

總結這個時期的法國革命形勢來，由於封建專制政體之無法繼續統治，由於民衆之無法再生活下去，革命的洪爐是已經把整個法國都捲入了革命的漩渦中。雖然王權仍苟且存在，封建統治仍圖最後掙扎，但實際上，國王號令已難出宮門一步。封建特權是被革命勢力打得朝不保夕了。然而由於大資產階級之在革命開始就多少已經離開革命，國民會議在這時期內特別反映這班大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貴族的利益，而百般遷就王權，於是使可以澈底崩潰的封建特權仍在各方面得以盡可能保存，這就是造成八月十日以後特別是一七九〇年中革命相當停滯，到一七九一年仍成爲君主立憲政體的主要原因。一般說來，法國的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仍不失爲一個擁護整個現代社會而反對舊社會代表（帝制與貴族界）底革命的階級，而且是『眞正站在運動底領導地位的一個階級』。（馬克思：一八四八年末的論文：『資產階級與反革命』）縱然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上層分子——大資產階級已經在革命開始就反革命了、他們與王朝妥協而極力對付民衆運動，支持王政而謀全自己的統治地位，可是這並不能結束革命，甚至也不能阻止革命之前進，因爲現在的情勢，不但不能滿足民衆的要求，即對整個資產階級的要求，亦就以爲未足，這樣使革命的、激進的資產階級不能不偕同其他革命階級繼續前進。

至於激進的民主勢力與廣大民衆，他們是反封建專制的中堅力量。他們不但聽中了資產階級的號召

要起來反抗國王，而且根據革命的經驗與本身的要求，同樣想在革命中改善自己的地位，獲得眞正的利益，首先就要澈底推翻封建勢力。縱然在革命中也得到一點好處，可是在羣衆看來，它得到的利益總不如資產階級得到的多，而且差得太遠。因此，它們仍然是負起革命的使命繼續前進，似乎不達到得到一些眞實利益不願停止，那怕反動勢力再三鎮壓，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甚至將來資產階級整個離開了革命，又怎樣呢？

第三節　資產階級君主制度

一七九〇年的政治形勢　自從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以後，特別是一七九〇年到一七九一年期間，法國革命形勢較之革命第一個時期是表現出相當停滯，其特點在於：

一、反動勢力之正在抬頭。我們決不要以爲國王被羣衆擁入巴黎之後，就從此束手待斃了；其實國王仍在努力與團結逃亡了的及國內的貴族，作竭力保持封建勢力的活動，同時又盡力影響國民會議的政策，使之更加傾向於自己，封建權力雖被破壞，但並未掃除。

二、大資產階級急於奪取革命的勝利成果。他們極力擴大與鞏固自己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又與王權政體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同時爲了對付革命的民衆，又太需要國王與專制的幫助，「大資產階級在革命開始就是反革命的，他在人民之前，卽工人與民主的資產階級面前，就同反動勢力結成攻守的同盟。」（馬克思：一八四八年六月「新萊茵」報）

三、國民會議首先反映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國民會議通過了「沒收一切教會財產

歸國家分配」的決議之後，使許多城鄉資產階級變成了新地主了。同時又通過了教士法，教會組織公民化，僧侶服從政府，大資產階級在這政權中間的權力是日益擴大。

四、農民暴動表面上相當停滯。一七八九年冬，農民運動不可否認是相當減弱了，然而自一七九〇年一月以後『農民暴動繼續進行更復威武，從東部擴大到西部』（主教指爾·伐亞爾在封建委員會報告）。在西部之布勒諾在二月之內有三十七個宮殿被焚，可是由於封建貴族之竭力掙扎；國民會議之禁止與鎮壓，使農民運動受到一些慘酷的打擊。

國民會議到何處去 在這樣情勢之下，國民會議當然無力向前進步；反之，它還極力在反對農民『過火』之下，企圖保持封建特權。革命愈向前進，則國民會議愈加反動與退化。

在農村政策上，二月的法令，規定土地爲『實權』及『人權』二種。人權是將當時事實上已不存在的一切束縛農民身體自由的特權，國民會議宣佈將這種人權取消。『實權』是指土地權，則仍須付極大代價後才得贖回。二月的法令，是國民會議爲廢止封建制度所能做到的最高事情，往後則每況愈下了。

六月的法令對教會什一稅，規定自一七九一年起永不徵收，但是在本年內應照常例完納。

對於防範民衆暴動，國民會議則正言厲色的說：『凡有煽動城鄉人民作對於財產私有物及所圈土地的暴行者，均得視爲法律、國民會議以及國王的仇敵』國民會議不只在法令上說，而且在事實上眞正去鎮壓這種暴動。

究竟國民會議到何處去呢？因爲國王貴族大教主們，不僅要保持其特權，而且還要恢復其失去的一切特權；大資產階級不僅要鞏固其已得權利，而且還要擴大其已得權利；民衆不僅大以革命爲未足，還

要繼續作反封建制度的鬥爭；而且有時還要反對到富有者頭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爲了對付可怕可惡的革命運動，國王需要大資產階級救命，大資產階級也需要國王做招牌；狼狽相依之下，於是就正式發生了資產階級君主制。這個政權形式，雖在從前國民會議時期就發生了的，但其具體形式則表現在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上。

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大資產階級在國民會議期間內，他所要求的社會經濟的立法，以一七九一年的憲法爲最完全的表現。這個憲法，就使大資產階級從法律上得到自己權利的保障。不僅是經濟上的利益，特別在政治上的利益，至少也使大資產階級獲得了大半數的即基本上的統治。按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一、法國宣佈爲君主立憲國家，立法權利則屬於國民代表會議（立法會議）。即是說，國王以行政首領資格，只可以在行政上任用官吏，進行外交談判及管理全國海陸軍，如果國會的決議不爲國會接連二次所通過者，則國王可以拒絕這個決議。這樣，王權勢力，在大資產階級控制下，是大大受到限制。國王只有一種遷延的否決權，而且只在於行政上。無疑義的，國王是屈服於大資產階級。

二、建立地方統一全國行政。決定廢除封建時代的行省，將全國分爲十三個行政區；並把選舉地方官吏和法官的權利，交與有產者的公民手中。每個城市區鄉的公社均由各自治機關管理。這是大資產階級握攬政權與強固自己的政治中所必取的步驟。

三、憲法上確立行政與立法均根據私有財產的原則，因而在民權上嚴格採用以財產爲標準的選舉制。憲法上將法國公民分爲『自動的』與『被動的』兩種：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每年能直接繳納三日以

上工資的稅額者為自動的公民，只有自動公民才有選舉權。其餘均為無選舉權的、「被動的」公民。至於能夠選為議員者則僅限於有不動產而年納五十法郎以上之直接國稅的人。這樣，法國當時二千六百萬公民中，有選舉權者不過四百萬人，而有被選舉權者，則為數甚少。事實上，法國一切民主權利，均落在有產階級手中。當時一個憲法會議議員說道：「身無巨財的人，不能做憲法會議議員，行政與立法是財產上的義務，所以只有財產所有者，才與之休戚相關的。」這種原則，同樣適用於城區的選舉中。

四、憲法上沒有談到勞動問題，但憲法頒佈之後國民會議對於勞動政策則更表現其階級實質。一七八九年革命過程中，政府在工人要求與影響之下特為他們設立各種公共工作場，內有三萬人在此作工。一七九一年因為行市良好資本家需要工人，於是公共工作場取消，勞動力供給雖多，工人中起了競爭，結果巴黎發生許多罷工事件，資本家積極反對罷工，國民會議代表沙勃利爾反對工人尤烈。一七九一年夏國民會議通過了上面這人的提案，以殘酷的辦法禁止一切工人的集會、結社及罷工。資產階級可以得到那樣多的權利，而勞動者竟毫無權利可言。

由此可知，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實際上是大資產階級與君主制的反動妥協。國家政權最大部分落在大資產階級手中，然而還有一部分保存在國王、貴族、地主們手中。這種妥協是因為：（一）國王貴族，也是鉅大的財產所有者；（二）大資產階級，正是害怕民衆起來動搖自己的利益，權且利用國王而給國王以如此行政權；（三）大資產階級又害怕國王勢力過大，誠恐尾大不掉，又不能不以立法權來限制國王的行政權。大資產階級的算盤是打得很熟練的，現在不是七月十四以前，主要的敵人似乎不再是國王，而是民衆與民主的資產階級了。這也就說明為什麽一七九一年憲法較之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還要

退步些。

雖然如此，但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也有它實際的進步性。這種進步表現在用立法手段正式廢除了國王獨攬的專制主義；取消了等級制、特權、潛號；撤消了貴族院，建立了自治制度，廢止了僧侶的檢閱與實權；樹立了裁判陪審制與法庭組織的選舉制；取消了間接稅，擴大了納稅的基礎；推翻了商業上王政的壟斷，取消了行會制度，統一了全國的經濟生活與行政。這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是個歷史上的進步，而且也造成一個較好的條件，以便於今後革命運動的發展。

國王的反革命陰謀　自七月十四事變之後，貴族紛紛逃往外國，他們受到國王密令，在英、德諸國乞援救駕。深居巴黎的國王，又得到手下的貴族特別是一部分在權的大資產階級之助，極力暗圖反動，想在裏應外合之下，一舉而顛覆革命。可是，當時國外情形，雖不能應允國王要求。那些專制主義的鄰國，對於法國民衆的革命行動，固極端仇視，但其與法王中間的矛盾並未消失，而國與國中間也不能完全一致。奧國則想藉法國革命以削弱這個歷史的勁敵——法國；而普魯士王國亦覺打擊法國王朝暫時對己有利，並且普奧正忙於佔領波蘭；俄國又另有主意總想讓普奧來干涉法國，等待兩敗俱傷之後，坐收漁利，暫時還不表示態度；此外，英國則忙於監視俄國之侵佔黑海沿岸，對於法國專制政體亦是愛莫能助。這樣遂使路易十六之呼籲，一時成爲泡影。至於國內情況，不管大資產階級如何與國王妥協力謀鎮壓革命，然而廣大革命民衆終究不能與專制王朝併立而亟謀最終推翻之。因此，國王與逃亡的貴族間，不得不另謀他計，首先把國王救出法國，然後糾合已經集中在科布連茲（接近法國東境的德國城市，此地亡命者已達二萬人）及烏爾穆斯等地的亡命貴族組成軍隊，在德國軍隊一部幫助之下，再來大舉進攻

巴黎。這時反革命活動中心是首先把國王從巴黎救出。在他們看來，只要國王逃出之後，進攻巴黎是易如反掌；「只要把革命首領處以絞刑，殺死一切立憲君主派，把好幾百個革命家縛成一列殺死，便可恢復法國的舊觀」。當時反動派都這樣自鳴着。

宮庭自一七八九年九月就開始了這樣計劃。待計議最終決定之後，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夜，路易十六的王后就裝扮科爾富夫人（這是從俄大使方面替王后找到的一張護照上所開的名字），國王路易十六則裝扮科爾富夫人的僕役，二人私夜出奔，向瓦稜地方逃去，那裏已約有布葉所帶的騎兵迎候。不料事出意外，國王逃到瓦稜附近，即被一個老百姓魯葉（從前當過郵務局長）發覺，臨時集合廣大羣衆，想盡一切辦法，終於把國王及王后捉住；剛到天明，成千成萬的民衆，高呼着「解送到巴黎」。於是鼎鼎一世的國王，如同犯人一般的被羣衆拿囘到了巴黎。帝制是倒了，但是眞的倒在粗脚粗手的民衆手中。

人們或者以爲革命可以大踏步的前進了，廢除王位，推翻君主政體與建立民主共和的機會到了；然而，不然！

國王依舊囘到巴黎的推勒里宮，他不理會民衆如何憤激的跑到推勒里宮，明目張膽的攻擊帝制與廢除國王；他彷彿是有所恃而無恐的，一面彌補這次計劃的失敗，一面仍繼續進行反對的勾當，並且拒絕署名於那些反對貴族與教士特權的命令之上。

民衆呢？他們眞是又如潮水一般的沸騰起來了。六月二十一日以後，他們在巴黎毀壞路易十六的石像，拆去從前帝王的聯語，並闖進推勒里宮，公開喊出「廢除國王」「共和萬歲」！科德列爾派（即甲

可賓派中更左的分子——馬拉、阿貝爾、但頓等爲首）發出告國人書，公開要求共和國反對一切的君主政體，巴黎自治機關亦發出同樣通告。巴黎區分部宣告『巴黎的「區」從此永久存在』。戴羊毛小帽與拿長矛的人羣又重新湧到街上來了，幾萬的農民又急忙的跑到巴黎來了，他們都感覺到現在又是七月十四的前夕，幾乎又要暴動起來。

假如法國當時已經握着大權的大資產階級要眞是目光遠大、堅決不二的話，這是滿可以立即推翻專制政體，大胆的奪取全部政權。顯然，國民會議在民衆壓迫之下，也曾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像很堅決的反對過帝制，在兩週之內沒有國王似乎也前進了一步；實在在國王逃亡期間，不就等於國王退位了嗎？爲什麽國民會議終於離不開國王，終於不敢獨自掌握政權呢？原因仍舊是因爲民衆力量又強大起來了。資產階級只要一見到這件事自己就嚇退下去了。巴黎及各地的『戴羊毛帽拿長矛子』的人，其勢洶洶的起來之後，資產階級又悔過了，國民會議又胆戰心驚了。一切民衆團體都宣言『廢除王位成立共和』，但是，資產階級政治家們，拒絕了共和的思想，宣言『贊成君主立憲』。七月十五日，國民會議急忙的發表了一個命令，宣告『路易十六不是逃亡，而是受屈』。因而『國王是無過失的；廢王是不對的；共和國是該拒絕的』。命令上明文申告：『赦免國王，恢復王位』。

這班資產階級，寧可要叛國的國王，而不要革命的民衆，寧可種外寇侵入之禍，而不願民衆革命勝利。

七月十七日的屠殺與國民會議完結　這時羣衆的革命熱情急劇地高漲起來，憤怒到萬分了。他們又在巴黎街上手持武器準備暴動，他們要求無論如何要廢止叛國的國王，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要求共和

國，要求廢止封建法，要求平等。七月十七日，在巴黎馬爾斯廣場舉行了市民示威大會。大會上由幾千人簽名要求廢除國王，交付審判，而資產階級組織的國民自衛軍，却在拉斐德侯爵指揮下，挺入會場，當民衆拒絕解散時，馬上給羣衆以無數槍彈的報酬。

從這一天起，公開反動的時期又來臨了。大資產階級的指揮者是攔爾波、拉斐德、巴拉復等，這班君主立憲主義者竭力與君權妥協，竭力營救垂死的專制制度，竭力從狂暴的羣衆中救出王駕，在報紙上大肆鼓吹立憲君主制的思想，在行動上嚴厲鎮壓一切民衆運動。共和派的人們，那些在馬爾斯廣場上請願書的作者，受到極嚴厲的通緝，但頓逃往英國，馬拉等隱藏起來。

這班資產階級，在鎮壓革命勝利之後，不但是與國王、王后對坐，啣杯酒之餘歡，並乘着這一恐怖時期，限制人民的選舉權。他們以救王有功，鎮壓民衆有功，限制普選權有功，而終於博到了國王的顧盼。於是一七九一年九月十四日，國王在國民會議之前接受憲法，並莊嚴宣誓「遵守憲法」（但同日又背叛它）。半月之後，所謂立憲會議的國民會議，因權限終結而自動解散，而由新的選舉法產生出來的立法會議代替之。

從整個國民會議的行動看來，它一貫的是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不過大權是操在大資產階級手中而已。資產階級重在於取得政權，以之擴大與鞏固自己的階級利益。當國王言行不利於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得反對一下，但當民衆力量起來的時候，就得馬上與國王妥協。可是資產階級在掌握政權之後，到底對於君主主義的危險性，並不像害怕民衆那樣厲害。今天大資產階級是如此，將來一般的資產階級又何嘗不如此！資產階級原欲用立憲的方法，是使君權屈服於自己的支配之下，使民衆方面一無所得，或者

說盡可能的少得。馬拉說得好：『國民共二千五百萬人，我們無產者佔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國家對於我們却等於零。』憲法會議到底是資產階級性的會議，七月十七日的屠殺，就是用刀槍來表示國民會議的性質。如果說：國民會議是主要依從大資產階級的計劃，將資產階級制度予以基本上的確定，而今後的憲法會議，仍不過是：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制度進一步的發展而已。

立法會議　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根據一七九一年憲法召集了立法會議。立法會議議員是由自動的選民中選舉出來的。議員共七百六十七人，其中有二百六十四人為君主主義的溫和派，即議會中右派，有三百四十五人為富裕的財政家、投機商——大資產階級及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此派名為中派，實際上，它與右派接在一起，成為議會中大多數（五百九十九人），他們是現存的君主立憲制的擁護者，亦即勝利的資產階級所確定的政治制度的贊成者。左派只有一百三十個代表，代表激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派的總匯，這時仍然都是屬於甲可賓派，但後來革命一天天發展，他們又分為基倫特派（Ge.ondists）與山嶽派。基倫特派，（其指揮者的大多數出身於基倫特地方得名），是代表法國西部及西南部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其思想上的指導者為『百科全書』的助編及數學家兼自然科學家康道塞（一七四三——一七九四年），他主張資產階級的自由，男女平等，殖民地黑奴解放，義務教育等。其次為布里索與羅蘭，他們在這時左派代表中，佔絕大多數。山嶽派是代表當時法國小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分子。在這次會議中，除只有三個農民、四個手藝工人當選之外，可以說這班最左翼的分子，沒有自己的代表參加立法會議。此派首領羅伯斯庇爾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馬拉與但頓也沒有當選。然而他們在議會之外，在巴黎及民間作很有力量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他們堅決攻擊國王，反對反革命派

之投機家，批評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這些大胆行動，得到民衆非常大的信仰。

立法會議與國王的關係怎樣呢？當立法會議開會國王在進會場的時候，議員們還是用最奴隸式的尊重態度和最活潑的一致熱忱表示歡迎。路易十六的演說，認爲立法機關與國王之間，應當有恆久不變的融洽關係，他說『我願愛國的思想團結我們，公共的利益使我們不致分離』。正在這個時候，國王暗中努力安排外軍的侵入，以恐嚇立憲派——國王的朋友。

這時，立法會議右方的椅席是君主立憲制的主張者一七八九年俱樂部的分子佔據。正當大多數資產階級的代表還在夢想太平的時候，而進攻巴黎的亡命貴族以及同國王同時脫走了的王弟布羅緜斯，却正在國外大與討伐之師。普奧兩國間的皮可尼蘇協約已在實際上作進攻法國革命之準備；國王反革命保王黨們正在從事積極活動；拒絕誓約的僧侶，正在大肆作反動宣傳；巴黎及各地民衆間都在担心反革命侵入的戰爭來臨。加之在民衆方面，因經濟生活的惡化（紙票價落一半，日用品增價五六倍，工資只提高三倍），騷擾狀況又不斷發生。農民更因急於要求根據取消封建的賦稅；工人、手藝工人發生搗毀商店事。在這種危急情況之下，使立法會議爾後不能不採取許多比較堅決的政策，首先就有了『剿滅』那班貴族騷動者與不逞之徒的必要。立法會議宣佈那些集合於邊境的法國人實犯陰謀叛國的疑嫌，下令所有亡命貴族人士，若不於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以前遵命回國者，卽以叛國罪犯論，並沒收其財產，被逮捕者處以死刑。立法會議將被沒收的亡命者的土地賣給農民，並指出由這所收入的用途，又替亡命者擎建集中廠舍，開始嚴緝亡命者的黨羽與奸細。一七九一年十一月，立法會議按立法會議的規定，命令凡不願向革命宣誓的僧侶，一律停止其薪俸。一七九二年五月，並下令驅逐不遵奉新國法的僧侶於國外。

資產階級代表們目擊了自己政治地位危殆的時候，就不能像以前那樣再形同無視了。至於國王自然是誠意拒絕這些法案。

對奧宣戰　立法會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對奧宣戰的問題。奧地利準備驅軍侵入法境，恢復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前的一切特權。國王與王后馬麗，曾督促奧軍侵入，這種要求在逃走被截之後，更爲迫切。一七九二年二月十七日普奧聯盟，決定要進軍法境，撲滅法國革命。法國革命面前更增加了自己的任務了，國內君主政體，還未根本推翻，而這一禍根所招來的民族危機又同時降臨了。這時法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敵，二者不可偏廢了。

立法會議不待敵軍前進，便於三月十三日致最後通牒於奧國，同時代表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基倫特派成立了內閣（度穆休任外交，羅蘭夫人任內務，塞爾凡任軍事，克拉維爾任財政，……）。自四月二十日起，法國卽捲入民族戰爭漩渦中。戰爭開始，法國毫無準備，法軍第一次在尼德蘭與奧軍交鋒卽節節敗退。自然，法國自革命開始後，正規軍只有十三萬，軍隊中尙無大的改進，軍官多半是保皇黨貴族出身與一部資產階級分子；而士兵中僱傭的外國士兵不在少數，自然戰爭開始，不免受到一時失敗。當時各階級、各政派對這次戰爭的態度怎樣？

當戰爭還未宣佈之前，法國內部對於戰爭就表現有極不同的立場。

第一，國王貴族僧侶，君主主義者，自不待說，渴望着戰爭爆發。他們估計到當時法國難得抵抗奧軍，加之他們在國內之軍隊中的好作用，自信法軍是不堪一擊，王權的巴黎可以垂手恢復。他們深恐法國不立刻宣戰，因爲基倫特派堅持速戰，國王亦不惜授其組閣，予以大權，以便迅速實現戰爭，卽便利

趕快消滅革命。現在戰爭開始，法軍失利，當然使國王與王黨們高興起來，積極進行反動活動以加速法國革命之死亡。

第二，大資產階級也完全爲自己利益着想，想藉戰爭來取消一七五六年與奧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若是獲勝，還可奪取德國及比利時領土，擴大法國疆域。特別是在政治上，他們想藉戰爭來轉移國內民衆不滿意與政治鬥爭的視線。

第三，基倫特派他們之所以極力主張戰爭，乃是想寧願外敵的侵入，借此以激起愛國心，暴露國王與王黨之叛國，卽可以不經過民衆之暴力而推翻帝制，可以在戰爭中提高自己的權勢而坐攬大權。戰爭開始，基倫特派卽掌握政權，然而後因戰爭失利，恐有敗北之虞，這又使資產階級不得不號召民衆，繼續進行有利於自己的戰爭，可是仍不願意民衆起來推翻國王。

第四，有人以爲當時馬拉、羅伯斯庇爾是一般的反對保衞祖國的戰爭，這種估計是不對的。馬拉等認爲：（一）在內奸罪魁——路易十六——未被推翻之前，驟然對奧戰爭是不利的，是內外受敵的；（二）如果基倫特派認爲戰爭是給民族以自由（比利時脫離奧國），則須首先使國內人民很緊固的握住自由；（三）如有人藉擁護自由與憲法之名，而實行消滅一切自由之實，則倘若戰爭勝利，必然引起武人的專政。馬拉們的觀點，還認爲奧國進攻並不是如此其迅速的，他主張延緩戰爭之爆發，盡可能去迅速發動民衆起來堅決推翻國王，然後對外戰爭才有勝利把握。所以，最初不主張馬上戰爭。

「你們要求戰爭，因爲你們不願意號召人民起來堅決的打擊帝制。」——馬拉對主戰的基倫特派說。

「我們希望一種英雄的戰爭，要革命的民衆在自己的領導下，作生死存亡的戰爭，而不願作陰謀者所操縱的戰爭。」——羅伯斯庇爾。

各階級的利益不同，對於戰爭的態度各異。如果機械地來分出主戰主和之孰是孰非，那就錯了。但是，我們要說，當時馬拉等人的觀點是：要發動民衆，從速在根本上推翻帝制，以便順利進行民族戰爭，而反對藉對外戰爭來延長國王死命——這種立場，在當時是受到民衆歡迎的。

八月十日的二次革命　由於革命派的努力活動，戰爭暫時熄止。戰爭開始的失利，使國王黨分子加緊反革命活動起來。另一方面，舊有軍隊一部瓦解而去，而指揮將領大部不足信任，許多王黨貴族轉逃國外，使立法會議的代表不得不比從前要堅決一些。他們要求國王採取決定策略，令不願宣誓的僧侶於一月內出境，並在巴黎造兵營，容納各地集合來的二萬民衆義勇軍；並且決計改訂國民會議時對農民問題的決定，許多封建義務改爲無代價的作廢（但仍半途而廢）。而國王對這些要求一概拒絕，並罷免基倫特派的內閣，成立反動內閣。當時指揮軍隊的拉斐德將軍就是國王的忠實擁護者。

反革命派在國王支持之下，既如此猖獗起來，彷彿弄得立法會議的資產階級又難安身了。經驗教訓了他們，使他們不得不再前進一步。

基倫特派想依靠民衆的力量，給國王以惡貫滿盈的打擊，如果國王仍不屈服的話，則乘勢驅逐之。六月二十二日，示威的巴黎羣衆一舉衝進王宮，國王不得已，頭戴紅帽，站在桌上舉杯向民衆祝福。當時有人這樣描寫的說：「王座還不曾推倒，但民衆已坐上這王位來發號施令了。」

但是國王並不曾在實地上讓步，他仍不肯批准立法會議對反革命分子的處置決議，仍在祕密中促進

國外軍事進攻與國內反動事變。

一七九二年七月，普奧聯軍總司令不倫瑞克傳檄到巴黎，大意說：「普奧進兵，非欲得法國領土，乃欲平定法國內亂，恢復國王權力而已，如有抵抗聯軍及侵犯國王與后者，則巴黎應受屠城之罪」。

這時內憂外患如此迫臨，狂風暴雨的民衆革命運動又高漲起來，他們再不有任何留戀，大有不最後撲滅君主政體不止之概！八月五日，巴黎街上又發現了廣大的示威羣衆，工匠及一切革命市民，萬口同聲的要求「廢黜國王，建立共和政體」。雖然當時立法會議還免不了對國王的留戀，故意推延不決，然而革命的直接行動，再也難等待一分鐘了。

八月九日夜，當晚成立了新的革命公社，實際上是當時暴動委員會。領導者有阿貝爾、馬拉、但頓、羅伯斯庇爾及其他民衆代表。八月十日巴黎工人區及各區的民衆匯合了各地義勇軍，在警鐘亂鳴中立卽進攻推勒里王宮。國民自衞軍對國王是不忠實的，守衞的瑞士兵向暴動的民衆開槍之後，旋卽退走。路易十六及王后太子等逃避於立法會議的議場內，武裝民衆很快的佔領了市自治機關。革命的各市區代表衝進市政府，逐出資產階級的指導者，代之以革命的巴黎公社，於是暴動完全勝利。

立法會議看到這般情形再不能用空言叱退暴動民衆了，只好接受民衆意見，拘禁國王，宣佈召集國民公會，解決今後國事問題。同時宣佈無報酬的廢除一切封建的義務。（一切教會特權、什一稅、封建的義務都是無代價的取消了，但是土地上的封建捐稅仍須備價贖回）。一切亡命貴族的土地無論在國內國外一律沒收，分成小塊拍賣，臨時可用錢租，並隨時可以購買，這顯然對於貧農是有利益的。並取消那

種強分人民為自動的與被動的法律，規定人人在二十一歲時有選舉權，二十五歲時就有被選舉權。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的第二次革命，結束了法國革命三年來的君主立憲政體，也就眞正顛覆了幾世紀來的封建君主制度。不僅如此，它並且打破了那種維護封建國王的阻力，它是民主革命的又一次更大的勝利，只有在這勝利基礎上才誕生了一個法蘭西民主共和國。

沒有偉大的英勇的前仆後繼的民衆革命，法國老奸巨滑與悠久統治的專制主義是不能放棄陣地的；習慣於還就與勾結封建王權藉以苟安自利的大資產階級，是難得拋棄他的政治玩物的。

法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其在革命的過程中是如何的畏首畏尾，進一步退一步，走一節停一節，他們卡在國王與民衆之間，立足於革命與反革命兩船之上，使推翻君主制這樣的多費氣力，使共和政體這樣的難於下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何故又有這長一段的立憲時期呢？何故又有待於第二次的革命呢？

然而歷史不是虛造的。沒有這種相當長期的擺動不定，革命是不會這樣深入的。這個時期教訓了革命的民衆：愈益相信自己力量之偉大，相信不單是替人家打天下，並且還要爭取自己的勝利果實；眞正是自己的勝利果實，只有在徹底戰勝民主的敵人以後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還是靠自己去革命；革命愈深愈徹底則愈有利於自己。同時也教訓了資產階級：眞正推翻民主革命的敵人，不要民衆是不行的；縱然民衆起來使自己發生動搖，而甯願與敵人保持妥協，然而，這種妥協只能安於一時，反動勢力增大之後，歸根到底是有損於自己，而且還是自己上當；沒有民主政治之擴大，因而沒有民衆力量之勃起，國王不能打倒，資產階級的勝利也是不能得到實際保障的。最後還教訓了一切革命者：革命是一個長期的

艱苦的過程，應當抱定一定方針，善於適合情況，引導羣衆，勇往直前，不達到最後勝利是不能停止的；對於被推翻了的敵人，是不能容情的，不施以澈底的鎭壓，他是每日每時不放棄反動復辟的企圖的；對於同盟者的動搖妥協與障礙，是不能無條件讓步的，不打破這種障礙革命是難於勝利的。

資產階級到底還是資產階級，就是他一時願意民衆起來，到了民衆眞正暴動起來，他又如何手忙脚亂啊！民衆呢？他們到了非幹不可之時，就眞正幹出了一個共和國來，不管這個勝利的成果又是落在一般的資產階級手中，新的剝削者登上新的「王位」，然而民衆畢竟是歷史的前驅者。

第四節　資產階級共和政體

巴黎革命公社　我們在第二節已經說過，法國革命中心在區分部與巴黎公社，它們存在一日，革命卽保持一日的生氣。一七八九年八月以後，特別是一七九〇到一七九二年國民會議時期，公社的作用並不爲大，並且變成了資產階級御用的機關，但巴黎各區分部仍保持革命的活力。它們除了是自治生活的機關外，還負有重要的經濟任務。當一七九二年四月戰爭宣佈以後，各區在動員民衆與組織民衆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招募與挑選義勇隊、供獻前線服裝給養、政治號召、維持後方、對付反動分子等），它們一貫的堅持要廢黜國王，爲共和政體而鬥爭，它們準備了八月十日的暴動，並督促立法會議「給以拯救國家的機會」，宣言「假如你們拒絕，我們就來担負這一工作」。實際上偉大的八月十日的革命，是巴黎各區分部的聯合準備的結果。

八月十日暴動的前夜，由巴黎四十六區區分部的代表選舉，組成了巴黎革命公社；這個新的公社代

替了原來巴黎市自治政府，成爲整個暴動與爾後法國革命的實際領導機關。

在八月之後的兩旬中，當立法會議正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擺來擺去的時候，巴黎公社成爲全法國革命民衆的代表機關。沒有它們的堅持前進，法國革命難於大舉向前發展，自然難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當路易十六及其家屬藏匿在立法會議內面時，基倫特派是如何想極力營救國王，但以巴黎公社之堅持終不能不將國王及其家屬下獄。

免黜國王的王權，根據普通選舉法召集國民公會是巴黎公社提出來的，立法會議也無法拒絕這個提議。雖然在公會未召集之時成立了以基倫特派爲中心的臨時政府，並選但頓爲政府司法部長，可是這時革命實權却把握在巴黎公社的手中。

八月下旬，普魯士軍隊攻入法境，九月二日，凡爾登要塞陷落，敵人已擬定九月十日會師巴黎。這時巴黎危在旦夕，而國內的反革命勢力仍在國王與各地貴族的指使之下大肆活動。法國人民在王室未覆沒之前所宣佈的『祖國的危殆』的口號，斯時已具體成爲巴黎公社號召民衆『保衛祖國』的根據。在這樣緊急情況之下，沒有堅強的政權，沒有內部的團結，不嚴厲肅清內部王黨奸細，就無法去勝利的擊退外敵的進攻。然而立法會議不但不能負此責任，反而盡心竭力以謀傾覆巴黎公社（八月底立法會議已決定解散巴黎公社，但因凡爾登被圍未果）。於是，公社及各區一面組織大批義勇隊上前線，一面宣告民衆注視監獄內的殘暴敵人。

九月二日——星期日，巴黎的警鐘不斷的響着，號砲每刻鐘一響，義勇軍不斷向前線進發。城市的周圍掘滿戰壕，民衆備起武裝集滿街道。而反革命的陰謀密佈，反動的貴族僧侶所集中的監獄，時有越

走的危險。「剿滅獄內公敵」的呼聲，很容易激起民衆的怒潮。忽的怒潮一發，大批的民衆即時衝入獄內，把這禁在內面準備作爲德軍內應的反革命分子施以無情的斬殺，上千被捕的反革命犯，悉遭正義的殺戮，於是巴黎後方得平定起來。這次革命民衆爲了民族的與階級的自衛所表示出來的自發的恐怖手段，正是巴黎革命公社迅速與嚴厲的懲逆政策的反映。

由於巴黎公社及各區之努力，法國民衆不但在政治上更加提高了「保衛革命的法國」的熱情，而且在事實上成爲保衛革命、保衛祖國的革命核心。但頓被任爲法國護國軍的首領，軍隊也相當改進，民族健兒齊集前線，後方有民衆之盡力擁護，這樣，使開始軍力優勢狂暴進攻的普奧聯軍，面對此生氣勃勃與更有組織的法國革命軍隊與革命民衆，不能不吃敗仗了。瓦爾美之役，普軍大敗，戰局轉變之後，法軍則猛力前進，屢攻屢克，不但把失去的土地一律收回，使法國領土完全從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而且法國反侵略反專制的革命義旗震撼了歐陸之封建農奴制的社會基礎。

革命民衆與巴黎公社及區分部拯救了法國，這是法國革命所給予我們的重大的教訓。

國民公會　國民公會（La Comtention National）於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幕。它是八月十日革命的產物，是拋棄了君主的威嚴、撲滅了封建制度、鎮壓了內部反革命與初次擊退外敵侵略的勝利之結果。它是一個比立法會議時代更能吸收廣泛的「被動」市民，且能更接近於民衆的革命制度。它的選舉是由一切公民——「自動的」與「被動的」公民都參加的，但還是兩重選舉，一切公民推選出選舉人，再由這些選舉人推選議員到國民公會，這種選舉制顯然是有利於富有階級。然而由於革命勝利中羣情的激昂，反革命分子被九月二日事件所震駭，當時資產階級也得「順從」一下民意。因此，國民公會

的成分，較之從前國民會議與立法會議是大有變動。基倫特派及甲可賓派的最著名的代表均選爲國民公會的議員。羅伯斯庇爾及馬拉也是議員之一。國民公會上各級政治派別的旗幟異常顯明：現在的右派已經不是溫和的立憲派，而是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基倫特派，國民公會代表共計七百四十五人，其中一百六十五人是屬於基倫特派。他們認爲專制政體已被推翻，國民公會已經召集，革命事業已經結束，並且他們認爲人民利益亦已滿足，所以在他們旗幟上的口號就是「謹守秩序、尊重私有財產」。其著名代表爲布里索、衛立俄、康德賽等，他們均參加了會議

會議中的左派是山嶽派的八十個代表，內中含有從前的甲可賓派、民治派、科德列爾派。山嶽派的基幹大都屬於淸除了基倫特派之後的甲可賓俱樂部，代表城市與鄉村小資產階級及勞動者的利益。他們絕不以八月十日革命爲滿足，他們的政綱包含各種政治的與經濟的設施，其目的在促進革命的鞏固與發展，徹底消滅一切封建殘餘，奠定民主共和國，堅決同內外敵人作鬥爭，保障革命之圓滿的勝利。其著名領袖爲馬拉、羅伯斯庇爾、聖居斯特、庫通及但頓等。

介於左右兩派之間的代表是一羣沒有固定政綱的議員，他們爲公會的中派，共有代表五百多人。因爲他們不屬於任何黨派，故自名爲「平野派」（Plain），因爲他們在政治上搖擺不定，所以當時人們稱之爲藏蝦蟆的「沼澤派」。他們觀風逐勢，那邊勢力大，就向那邊倒，最初替基倫特派投票，末後又擁護甲可賓派。

國民公會的歷史包括着基倫特派與山嶽派兩派間鬥爭的主要內容，也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與民主派（小資產階級貧民無產者）利益間的主要衝突內容 。基倫特派的根據地是工商業資產階級統治的各

省，而山嶽派的根據地則在巴黎。因爲兩派的鬥爭遂演成爲溫和的各省與革命的巴黎間的鬥爭。在國民公會初期基倫特派得到平野派之助，佔着統治的地位。

政治上較有勢力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大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鬥爭，在八月十日以前卽已開始，現在愈益發展起來。山嶽派人在巴黎公社及各區的勢力，日益強大。

基倫特派却極力想削弱公社的勢力，並且，無論如何不願民主派的公社存在於巴黎；他們創立了地方資產階級組成的國民會議特別保安部（「基倫特派的工兵」）以與革命勢力對抗；他們利用平野派的幫助，把自己一派的人員任命爲國家指導地位，對於巴黎的特別是各省的甲可賓派加以殘酷的壓迫。

雖然，基倫特派已經統治了法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已經一般的獲得了政權，它們統治了國民公會，包辦了內閣；然其社會基礎却主要在巴黎之外。山嶽派人雖然說遭受很大的迫害；然而他們的威望日愈提高。公社仍爲巴黎及革命的中心，甲可賓俱樂部的宣傳愈益擴大了他們的政治影響，連國民公會的俱樂部也染上山嶽派的色彩。國民公會整個時期中都包括着這兩派的急劇衝突。

共和政體及基倫特派與山嶽派之激烈鬥爭　國民公會於開幕後第二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卽在基倫特派統治之下通過了以下的主要法案：（一）不由人民所決定的憲法不能成立；（二）個人及財產受國家之保護；（三）廢止君主，宣佈共和，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法國自由元年之第一日。

顯然的，這是已經取到了法國主要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政綱。這種政綱實際上都是以革命完結作出發點，以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爲依歸，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爲內容的。正因爲如此，也

就使法國階級鬥爭轉變到新的階段——卽統治的資產階級與被統治的民衆間的鬥爭佔着主要地位。這種階級鬥爭明白反映到基倫特派與山嶽派間的抗衡上。

第一，關於人民憲法的問題——資產階級在發動民衆起來反對封建王權的時候，口口聲聲離不掉「我是代表人民的」，憲法也成爲他們反對王權的一個工具，在「這樣整個的歷史運動集結在資產階級手中，而在這些條件下所得到的每個勝利，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共產黨宣言」）。自然，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的勝利之後，就要忙於制定憲法，強調法律，這種憲法，無疑問的不是全民的、平等的法律，而是強制人民大多數來尊敬已存威權和財產的工具，以「人民憲法」之名而行保證資產階級剝奪民衆之實而已。

執政的基倫特派首要分子說：

「我在進國民大會時，想着，因爲王權已被推翻，因爲一切權力都已集中於人民或人民代表手中，我想只有秩序才能產生安寧，秩序就是對法律、對官吏、對個人的安全，人民應當有宗教式的信仰……一切革命運動都應當停止。」（布里索：一七九二——九三年著的兩個小册子）

另外，我們看看山嶽派的首領馬拉又怎樣說？他說：

「在國家舞台之上，只是佈景換了。同樣的角色、同樣的陰謀、同樣的動機依然存在。……上層中有知識的人、富裕的和狡猾的人，最初反對專制君主，但是這不過是爲了達到反對人民的地步。他們先取得人民的信仰，利用人民的力量取得他們從前所攻擊的那種特殊地位……原來人民依着他們的直覺，克服了他們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現在，看他們爲法律的鎖鏈所繫住，爲法官所暴

虐，他們是憲法的奴隸。』（馬拉：『人民之友』第五、六、七期）

『革命是社會的下層階級人民做的和支持的，卽是那些工人、工匠、小商人、農民、那些平民、那些不幸者所支持的。但是，誰想到革命正是爲了這些小地主、法學家、狡詐的人做了的呢？』（同上）

第二，關於財產問題——基倫特的政府當然盡一切力量來宣佈它是『神聖不可侵犯』，集中政權力量來保護它，這是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後的唯一法寶。然而這種法寶，主要是爲了資產階級自己，對於民衆如何增進福利的問題不但不理，反而在各方面加重對民衆的剝削。基倫特政府法案曾經決定：（一）拒絕土地法，卽拒絕農民中間盛行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卽任何田莊不得超過約一百八十英畝的土地，每個公民有獲得一部分土地之權，沒收逃亡者、貴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民衆）；（二）宣誓遵重私有財產，卽遵重地主所奪去的公共土地的私有權，反對無報酬的廢除封建特權，袒護地主與新購土地的資產階級；（三）反對徵收富有的商業階級與股票業者的累進稅，而企圖把一切戰爭及革命的負担加在貧民身上。

至於山嶽派人則要求廢除封建主義的最後殘跡，毀滅大田莊，給一切人甚至最貧苦者以土地。同時想由國家組織那分配生活必要品的機關，定價公平，用正確徵稅的辦法，反對迅速擴充與積累財富的『商業主義』。他們的口號是『全體人民都有享受幸福的權利』。

基倫特派對山嶽派這種政綱亟力攻擊道：

『你們都是滿身染着九月血痕的人，你們不配統治法國，一個富裕而勤勉的法國立法者，必須

承認財產是社會秩序的最神聖的基礎之一。你們這些宣傳無政府、保護強盜行爲、恐嚇財產所有者的人，不能實踐爲法國立法的使命，你們號召一切僱傭的巴黎殺人犯，反對我們，我們則號召巴黎的誠實人民反對你們。」

山嶽派人立卽回答這種攻擊說：

「我們攻擊你們，因爲你們只爲自私自利而運用你們的才智，不是爲了擁護人類的平等。假使國王還讓你們統治國家，請你們爲他選擇閣員，則你們對他仍將繼續盡忠，你們從來不想提高法國到光榮的共和國地位。你們的隱祕願望，是想把法國放在國王的統治之下，你們做他宮庭以內的管事。」

第三，關於共和政體問題——當國民公會召集時，雖然它在九月二十一日命令法國廢止王位；但是「它還不敢說出共和國的堅決字樣」（見阿諾德：「法國革命史」）。巴黎的人民給了它這種鼓勵，在街上滿貼「共和國萬歲！」的標語，要求它接受這個命令。加特那雄區的公民走到國民公會去，堅決要求共和國的宣佈。結果，第二天才把「共和國」三字提出來了。這個共和國較之君主制度是前進的，但是在資產階級掌握大權之下，這個共和國，無非是以資產階級專政爲內容，以沒有皇帝爲形式的共和國而已。當國民公會宣佈爲「法國自由元年」的時候之前，巴黎公社的公文上却寫着「自由第四年和平等第一年」的字樣。資產階級利用「共和」二字來極力鞏固自己的經濟與政治的特權，不但限制與取消民衆的鬥爭，而且以新主人的資格加緊壓迫民衆與民主的勢力，在基倫特派看來，現在共和國下的敵人自然是再談革命的人了。

布里索嚴詞厲擊的說：

「我想人民和共和國的眞正敵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卽指革命的民主派——編者），是那些土地法的宣傳家和叛亂的唆使者……。他們傾向於解散共和國，他們是法國痛苦的萬惡之源，共和國只靠嚴厲取締這些分子，才能得救。」

這幾句話，就把取得政權了的資產階級的神色，發揮盡致了。

我們再看山嶽派的駁斥罷：

「你們只要自由，不要平等，我們則要平等，因爲我們不能設想沒有平等可以自由。你們自稱是政治家，你們要爲富人們組織共和國；但是我們不想冒充政治家，我們只要爲一種法律鬥爭，由此法律人民得以脫離貧困，普遍的獲得幸福，使共和國爲萬人所仰慕，一切人都變爲快樂的公民。」

第四，關於處置國王路易十六的問題——國民公會成立了兩個月，許多問題都討論到，但單單對於國王處置問題不提。固然今天國王的作用不大，但是民衆等的不耐煩了。全法國的民衆團體都提議要審訊國王，因爲國王在過去不斷與逃亡貴族及國外敵人勾結，組織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在國王逃出瓦稜時被獲得了。本年十一月二十日，一個替國王做祕密櫃子的銅匠——伽曼把祕密洩告之後，又把國王近來反革命的一切證據暴露無遺。從這些文件中，知道了國王如何收買米拉波及用一百五十萬法郎賄賂立法會議中十一個重要人物，繼續津貼逃亡作亂的貴族，與奥普諸國國王的信，以及國王與前兩次議會的關係，國王罪惡現已暴露無遺，現在是非公審國王不可了。

在基倫特派與山嶽派之間又發生了很大的爭執。山嶽派人代表法國民衆的要求，堅決主張處國王以

死刑，說『路易十六叛國，共和國有權殺他。』『對路易，只有兩條路：或者任其生存以擾害國家安寧與自由；或者將他處死以絕後患』。而基倫特派則不然。最初，他們提出『國王不可侵犯的憲法根據，人們答覆他『這不可侵犯權已不存在，因爲國王已背叛了憲法與國家』。以後，又要求組織八十三州的法庭之後再說，當他們感覺到此議難行的時候，又提出將判決書交給三萬六千公社與國民公會初選人的會議核准。及至此路又不通，於是轉移目標來攻擊這『九月屠殺的教唆者』的『三頭』——但頓、馬拉、羅伯斯庇爾，想把審判路易移爲審判山嶽派人。總之，執政的資產階級是盡一切力量來營救國王。山嶽派與民衆團體則極力攻擊基倫特派之可恥舉動，鬥爭又出現於街頭上。王黨在戲院開會示威，公社則召集露天大會，拿着棍棒的人民要求武器，各支部都藏着古砲，民衆大有不殺國王永不甘心之概。

這樣，就迫使國民公會再不敢猶豫了，國王的命運在一種如火如荼的緊急情勢下決定了。七百二十一票中，以五十三票之少數（贊成者三百八十一票）終於通過了國王的死刑，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路易十六伏誅於巴黎的斷頭台上。

英國查理士第一之後，法國又來一個路易十六。

經濟恐慌與瘋人派的活動　一七九二到一七九三年，法國是處在一個嚴重的經濟恐慌時期。法國反侵略的戰爭、敵國的封鎖，使法國的對外貿易幾乎完全停止，因而引起國內棉織工廠停業，失業工人驟形增加，加之農村中許多勞動者上了前線，生產力頓形減少，兩年收成不足，糧食缺乏，原料不夠，於是紙幣價格低落，物價飛漲，特別是麵包。下表就可以見到這種經濟恐慌的情形：

一、從一七九〇年到一七九五年物價增加指數．

麵粉	一一二·五倍
毛呢	一七倍
木炭	二九倍

二、紙幣市價低落指數：（一七八九年為一〇〇）

一七九〇年一月	九六
一七九二年一月	七二
一七九三年一月	五一
一七九四年一月	四〇
一七九五年一月	一八

三、工人每月工資：

一七九一年一月	三利華
一七九四年九月	五利華
一七九五年七月	九·七利華

縱然，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聚積了無數的財富，有些小資產階級也不能說沒有得到一點好處。可是，獨有工人、貧民及廣大無產者與半無產者，他們在革命中出了很大的氣力，然而結果，反使他們生活日益惡化起來，物價騰貴更使這般貧苦分子遭受極大的生活上的壓迫。馬拉在「民友報」上曾經這樣說道：

「人民爲恢復自由，已經鬥爭了三年。而我們現在距離自由還是同從前一樣的遠。革命現在轉變爲反對人民。……對於富者和貪吝之輩，它是販私貨、獨佔、欺詐和發財的機會，人民則破產，無數的貧民是進退兩難，一方面害怕因飢餓而死亡；一方面又不得不出賣自己。我們要重複的說，我們離自由還是同從前一樣的遠，因爲我們不僅是奴隸，而且是合法的奴隸。」

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三年發生飢荒的時候，人民就要求國民公會規定糧食的價格，因爲飢餓而又發生了民衆的騷動。一七九二年八月底，在巴黎發生飢民搶糧食店、麵包店。一七九三年三月，里昂亦發生同樣的事件。現在巴黎工人、貧民、手工業者要求在全國都規定必需品的最高價格，要求處罰藏匿糧食的投機商人。基倫特派與山嶽派中間又因爲這一問題，發生爭執。基倫特派站在資產階級與糧食投機者的立場，主張保留糧食貿易的自由，馬拉要求將所有大投機商人作爲叛逆罪交法庭審判。可是，一般的甲可賓派對於羣衆這一要求的態度，表示動搖，因爲規定糧食的最高價格，這損於小商店主、商人和農民的利益，最受物價騰貴的影響的人是工人與貧民，而不是小資產階級。因此甲可賓派最初也贊成了基倫特派的政策，於是自由貿易的主張仍然勝利。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國民公會頒佈了自由貿易的佈告，對妨害這個自由貿易的人民以重刑。

這一法令引起了廣大下層羣衆的不滿，富裕的小資產階級與貧苦羣衆中間發生了裂痕，那時代表各地工人窮苦的手工業者，城市貧民，貧農利益的人，被基倫特派稱之爲「瘋人派」或爲「過激派」，「無政府主義者」。這般人是原來山嶽派中最接近下層羣衆利益的分子，其活動中心是巴黎各區分部及羣衆俱樂部。他們在巴黎及各地煽動羣衆，反對投機，要求制定最高度價格，他們開始宣傳商業國有或

公有的思想以限制商人的剝削，並開始感覺不限制貧富的懸殊不能建立眞正民主共和國。他們以爲「一個階級既無法度壓迫他階級的人而使以飢斃，自由也不過是空虛的幻想而已」。這一派的首領是工人發勒與從前當過牧師的傑魯克。傑魯克在代表奴羅爾區的民衆團體致國民公會的請願書上，攻擊國民公會的議員爲「高利貸、貨幣交易者、反革命及投機事業的妥協份子」。請願書痛責「四年來由革命得到的利益只是歸了富豪」，「資產階級貪求利潤不知止境，較軍閥顯貴的官僚政治，尤爲可怕」。據傑氏看來，民衆的狀況比舊制度時代更加慘壞，他說：「惡漢的財產比人民的生命還貴重嗎？我們不怕財主，他就是惡漢，要救濟民衆，就不怕去殺盡那些惡漢，民衆是最高的法律」。

瘋人派固然堅決反抗基倫特派，要把基倫特派逐去國民會議，同時，也不滿意山嶽派，說他們在和那「壓迫他階級並使他階級餓死而不處罰的階級作鬥爭時，是毫無決斷的」。因此，羅伯斯庇爾在甲可賓俱樂部演說中稱過激派的行動是「自由之敵與民衆之敵」。當然，瘋人派就成爲當權的基倫特派攻擊的主要目標了。一七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國民會議頒佈命令，凡提倡破壞一切土地、農業、工業、商業上之財產制度的法律者，均處極刑。

但是隨着國內經濟狀況的愈加惡化，民衆的不滿愈加增大，卒使山嶽派於一七九三年春變更糧食政策，實行劃一糧食價格而與資產階級以有力的打擊。這種變更，在瘋人派的努力是有決定作用的。其實，瘋人派無非是下層小資產階級貧農與無產者羣衆的利益的代表。他們要求在革命中改善貧苦民衆的生活，他們不滿意因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結局，使民衆破產的現象，夢想以限制資本辦法來解除貧苦奴隸地位。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他們並不懂得什麼是資本主義，不過他們這種運動也顯示出法國下層

階級之特殊要求與發展的趨勢而已。然而爲了反對基倫特派，使山嶽派與瘋人派仍然堅持攜手進行。

馬克思關於這一點曾經這樣說道：

「關於把人民引上革命道路而利害發生衝突的瞬息間，內亂的警鐘齊鳴，人民希望兩階級互鬥，山嶽派和那滿手靑筋、精神奮發的民衆的黨共同前進。」

戰爭中基倫特派之轉入反革命方向 法國大革命的號砲，早已把封建統治的歐陸以及地主資產階級管轄的英島，震蕩得難於安寢了。一七九二年法國共和政體的成立，特別是九月瓦爾美戰役的大勝之後，法國革命軍打起「自由」「民主」「共和」的旗幟，不只很快佔領比利時，而且深入到普奧的邊境。當時比利時的人民認爲法軍是自己的民族壓迫的解放者，而普奧諸國被封建專制政體壓迫的民衆都依然同情於法蘭西共和國，這種情形自然要激起歐陸帝國的震怒，特別是路易十六之伏誅之後，歐陸諸國之更廣大聯軍而進攻法國革命，成爲迫不急待之事。至於英國，此時爲自由黨執政，雖然對於路易十六之死，固無謂復仇之必要，然而，英國自十七世紀尤其是整個十八世紀中，爲了海上貿易與殖民地問題，已經是不斷與法國交戰，此時法國又進攻比利時、荷蘭，更使英國的海外貿易備受打擊，於是英國乘機聯合歐洲各國——俄、奧、普、荷、西諸國，組織第二次大聯軍，猛向法國進攻。同時英國又以海軍封鎖法國海岸，並假造幾萬萬紙幣擾亂法國金融，其他各國亦四面八方封鎖法國以加緊法國內部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樣使法國不能保持舊年秋季所佔的優勢。一七九三年三月間，法軍不得已，乃自比利時退出，而敵軍亦跟蹤前進。數質不足、裝備供給缺乏的法軍，遂節節敗退下來。

當時國內又發生了最嚴重的問題：

第一，是芳底地方的反革命暴動。此地位於法國西部，經濟上最爲落後，農民與貴族地主間尙保持一種宗法關係，農民分化不甚顯明，天主教、貴族、保王黨在該處有很大的勢力。本來芳底在一七九二年八月普軍攻入法境時，就準備暴動，現在戰爭形勢對於反革命有利，而這般過去特權階級的份子乘機煽惑，到了三月，此地的暴動遂油燃起。他們擁有相當多的武裝號召了不少落後農民，在軍事上並屢獲勝利，佔領了許多城市，甚至把如蘭德這樣中心城市也和巴黎隔離起來。他們得着英國的幫助，聲勢浩大，凡所佔領地方，立刻恢復封建制度，直到五月才被鎭壓下去。這次暴動給了法國革命後方以很大的威脅。

第二，是高級軍官拉斐德叛變之後，又來一個更嚴重的度穆休的叛變，度氏是去年瓦爾美戰役及以後攻比利時的法軍北路軍總司令，是基倫特派的重要人物。本年一月，他回到駐比利時的軍隊中的時候，就已決心叛變，到聯軍開始進攻之時，他卽倒到與軍方面，並替他們打先鋒來進犯法國。此外三月間在里昂又組成富家子弟的反革命軍隊，響應外敵，同時在布勒塔尼以至在法國東部地方，也有反叛革命騷動的發生。

處在這種內憂外患層層逼來的緊急關頭，基倫特派不但不積極負責拯救法國，而且故意消極，幸災樂禍。他們對比利時法軍後退，對芳底及其他方面的暴動，度穆休的反叛都表示漠不關心。他們這時把身邊的重要敵人，唯一視爲巴黎公社與羣衆。因爲外省與芳底均是基倫特派所藉以反對巴黎及各地下層民衆的靠山，當然他不致去削弱他們，反以爲革命民衆比任何敵人都要可怕了。現時的基倫特派，無疑義的是開始公開倒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拯救法國於危殆的是巴黎革命公社，各區分部，革命的民衆，國民公會的山嶽派及資產階級所最仇視的瘋人派。

現在山嶽派人在國民公會的權力日大，馬拉、但頓、羅伯斯庇爾以及領導公社的阿貝爾、蕭美特都成爲這時的重要人物。

國民公會不顧基倫特派的阻礙與反對，毅然決然的採取了緊急的處理，以維護革命。

一、分派各委員到各地去，即時徵募三十萬新軍；

二、三月十日通過了巴黎民衆的要求，特設革命法院，審判一切反革命分子；

三、爲了獎勵人民從軍，不但允許給恩給金，而且允許用恩給金分年清償（每年償還十分之一）來購置國產，政府劃出值四萬萬法郎土地出售；

四、士兵選舉官長制；

五、組織立法、司法、行政合一的政府組織——公安委員會，直接對國民公會負責。但頓爲其中重要人物；

六、組織國防委員會（係保安性質），凡一切違法通敵作奸不軌者，均由其逮捕交法庭審訊。

這些處理是非常必要的，爲了保衞祖國，國民公會提出了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問題。可是，走入反革命的基倫特派，不但不願團結，反而竭力從中破壞，阻止這些法案的實地執行。這樣，就不能不引起把驅逐基倫特派的運動與徹底肅清王黨勢力及抵抗外敵侵略的戰爭結合起來，於是爆發了偉大的第三次革命。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二日的革命　現在要先來講講這次革命的根本原因何在？自基倫特派掌握政權，國民公會發端之日起，當時法國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與被統治的民衆中間的階級鬥爭是集中在下面幾個問題上。

第一，一切封建權利是無報酬的被徹底廢除呢？還是讓此殘餘保留，使農村經濟繼續破壞，使二千萬農民飢餓至死呢？

第二，農民早已從地主方面奪回的土地，讓農民保存呢？還是讓地主奪回去呢？就是說每一個農民應當實際上都得到土地呢？還是讓他們飢寒待斃呢？

第三，最高價格應當規定嗎？

第四，祖國危殆，還是讓民衆生活改善一點，放心去保衞祖國呢？還是讓民衆飢餓用鞭子驅上戰場而富有者却獨享安樂呢？

這是山嶽派特別是瘋人派與基倫特派爭執的根本問題。

資產階級地主們的回答是：

「敢做這種事情的人，是怎樣一種惡棍啊！現在，他們益發無忌憚了，他們或者要搶奪我們的財富，或者要把我們送到斷頭台上去罷！」

而窮苦民衆的呼聲則相反：

「誰想像得：革命正是爲了這些小地主、富人、狡詐的人做了的呢？」（馬拉）

「我們不怕財主，——他就是惡漢，要救濟民衆，就不怕去殺盡那些惡漢。」（傑魯克）

第三次革命的社會根源就是這些。

革命的近因：四月十五日，巴黎四十八區區分部要求將二十二個基倫特派的代表逐出國民公會；而基倫特派則誣「主張由勞動者、工匠、小商人、平民之手來革命」的馬拉爲搶刼麵包及粮食的領頭人，把他送交革命法庭以爲報復（結果仍被判無罪）。

反革命的基倫特派仍然握住國民公會大權，他們爲了防止民衆暴動起見，組織了「十二人委員會」來搜查巴黎各區分部，監視公社總局，逮捕羣衆領袖（阿貝爾），四月基倫特派發佈告巴黎市民書：

「你們的財產有被強奪的危險，有些暴動家、陰謀者要懲治你們，但你們無抵抗的勇氣，你們也看到巴黎要滅亡，但你們却安然無視。巴黎的市民們！醒起來吧！把這羣毒蟲趕到它的窠裏去！」

同時甲可賓派也對自己各地支部發出動員令：

「兄弟及同志們！國民公會內發生了反革命。起來，一切的人們起來！捉拿我們革命的一切仇敵和一些嫌疑的分子！」

巴黎的民衆又都是怒髮衝冠的怒吼起來了，武裝暴動是不可避免了，不趕走這班反革命，政權不落在民衆代表手中，法國是不能救藥了。

革命的前夜，國民公會主席——基倫特派的伊拿爾還威脅甲可賓派說：「國民公會如被解散，巴黎就會滅亡。」而羅伯斯庇爾則大聲疾呼的喊出「民衆緊急發動」。

巴黎市區的多數在巴黎公社指導下成立了行動委員會，民衆武裝起來。

五月三十一日，在馬拉領導下，國民公會上出現了民衆的武裝，要求開除與緝捕基倫特派的議員。

六月二日國民公會突爲武裝民衆所包圍，民衆在致國民公會的書中提出：（一）改革政府及國家組織；（二）強制向富有者借十萬法郎救濟貧民；（三）與巴黎以廉價的糧食；（四）振興公共事業；（五）褒賞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的革命者。結論中說：

「自由的炬火將熄，自由的石柱動搖，反革命者正在抬頭，殺盡他們，粉碎他們，民衆是疲斃了，快救民衆，不然民衆只有自救了。」

防衛國民公會的自衛軍，都轉到民衆中間。動搖畏縮的「沼澤派」也贊成甲可賓派開除基倫特派。二十九個著名的基倫特派議員，都被逮捕，移交法庭，旋處死刑。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第三次革命是把國民公會上資產階級勢力打倒而樹立了甲可賓派的小資產階級與貧苦勞動者的專政。

★　★　★

一七九三年八月十日第二次革命傾覆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換上了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完全新的剝削制度代替了新舊合璧的剝削制度。由於那時民衆力量之不足，使資產階級享受了那次革命勝利的成果，而坐登壓迫機器的寶殿。民衆所得到的痛苦與他們主觀所想像的福利的美夢適得其反。資產階級懂得那一套，一開始就把尊重財產、禁止革命視爲自己的鐵則，把革命民衆看做今後唯一的敵人。自然民衆也看得出君主推倒而且送到斷頭台上，究竟他們今後的敵人，應該明顯地是執政的資產階級了。革命的教訓，教訓了資產階級如何對付其「手下人」，同時也教訓了廣大民主派與民衆們，好像對於統治的資產階級沒有多大的幻想似的，好像要把繼續革命的任務勇敢的担在肩上，就非同時反對資產階級不可似的。在不久的國民公會期間，民衆並沒有停止與統治的資產階級作鬥爭，不論是爲了要改

善自己的經濟與政治地位，不論爲了要忠心耿耿地保衞祖國，都不能不走上堅決打倒基倫特派及其代表的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樣才能把封建殘餘最後消滅，才能把民族侵略完全打破，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任務澈底完成。爾後開闢的小資產階級專政時期，就無非是用反資產階級的方法去完成資產階級應完成的上述任務而已。

第五節 小資產階級與無產者的民主專政

內憂外患的緊急關頭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二日的第三次革命之後，「在這革命事業所表現的不澈底、不堅決，成爲機會主義的支柱」。（列寧：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五二頁）而終於背叛革命的基倫特派被推翻之後，當時法國革命的政權，落在「澈底代表十八世紀先進階級利益的甲可賓派」（列寧：同上）手中。這個時期正在法國革命的緊急關頭，內憂外患，愈加緊迫，大批的外國聯軍集中在法國東北邊境，北部既已喪失比利時，而東方普軍又擊退法軍出馬茵斯並向亞爾薩斯前進，法國海岸又完全被英西海軍封鎖，而南岸重要海港土倫又降於英國，北部邊境到巴黎之路無人防禦，而南部西班牙軍又越過比里牛斯山脈，法國國境四周，均在外敵包圍與虎視之中。雖然在外敵中間存在許多矛盾及弱點，使他們難於一致直向巴黎前進，這給法國內部尙有一線準備之機，可是法國民族危機之嚴重較之一七九二年八九月間大有過之。至於國內方面，更加嚴重，一切君主派保王黨正在外省許多地方大肆反動，加以基倫特派之叛變革命，使反革命勢力一時甚囂塵上。在法國西北部諾曼底及布勒塔尼州、在波亞圖。在得舍南耳、芳底等州，在波爾多、在里昂、在馬賽諸城以及法國東部、南部、

西部許多地方，都發生驚人的暴動。法國八十州中已有六十餘州都興起國內戰爭，反對巴黎革命政府及這時的國民公會。其中最嚴重的當推芳底的反動；該地反動軍隊達四五萬，他們佔領許多地方之後，曾於六月底直犯法國西部重要城市蘭德（旋被擊退）。里昂在五月底，遂爲保王黨與基倫特派之聯合力量所佔據，武裝在二萬以上，而馬賽亦一度爲反動派所佔有。

在這樣非常緊急的內憂外患的情況之下，法國革命是危如懸卵。擺在法國人民及革命黨派面前之急待選擇的道路：或者是內部稍不團結，對困難稍有屈服，對反革命稍有躊躇，對外敵侵略略存苟安，則法國革命立即崩潰，而法國人民將立遭殺身屠城之禍；或者是在「祖國的危殆」與「革命高於一切」的要求之下，全法國人民、黨派堅決團結起來，採取緊急的戰鬥的革命手段，忠誠不二的堅持革命的戰爭，堅決戰勝國內國外的敵人，這樣就可以鞏固革命事業並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

可敬可愛的法國革命領導者——甲可賓派（即山嶽派人）率領了全法國革命的民衆，堅決走上了第二條勝利的道路。他們首先團結了革命力量，排除任何困難，堅持革命旗幟。在推翻基倫特派之後，即樹立革命的民衆政權，不放鬆一分鐘一秒鐘的時機來改革政治機構，使之澈底的民主化；力求改善民衆生活，使革命的利益眞正落在民衆身上；特別注意動員一切力量來堅持對內對外的革命戰爭。如此，保障法國的革命，保衛人民的祖國，堅持革命到底，這中間的中心關鍵就是革命的民主政權問題。

列寧說：「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現在法國所需要的政權，是什麼政權呢？是革命的專政政權。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新萊茵」報上說：

「在革命之後一切勝利的國家建設，即需要專政，而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見中譯本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第三〇五頁）什麼是專政呢？列寧說：

「因爲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的政權和任何的法律，不承認任何人所定的任何範圍，不受限制的、超出法律之外的、依靠實力的政權——這就是專政。」（同上書第三一二頁）

什麼是法國這時候的專政呢？列寧說：

「不是舊的政權機關爲少數人統治民衆、統治工農羣衆的政權機關」，而是『新的政權爲民衆即工農民衆統治少數人統治一小部分警察式的壓迫者，統治一小部分的特權貴族與官僚的政治機關』。（同上書第三一三頁）又說：

「法國一七九三年國民公會是下層民衆的專政，就是鄉村與城市的政治機關，其中統治者既非小資產階級，亦非資產階級，而是普通的人民、貧民，也就是我們所稱爲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二版第九卷第二一七頁）

由此可知，法國這種專政不是旁的專政，而是一種革命的民主專政。這種民主專政就是「下層社會的無產者與小資產階級的專政」。（同上書第三七二頁）「沒有這種專政則民主不能維持，而且專政與民主是幾乎打成一片的」。（同上書第二十一卷第一八九頁）『我已經說過民主專政不是僅僅有秩序的組織而是一種戰爭的組織』。（同上書第七卷第二七〇頁）

明白了當時法國革命的緊急時期與夫當時法國革命政權性質之後，我們就來分別詳述當時在這個政權之下的一切設施以及革命爾後發展情況如何。法國在革命中之最偉大最精彩的地方就在這裏。

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一七九一年的帝制憲法，顯然是大資產階級與君主妥協而特別反映前者利益的憲法，廣大羣衆的政治權利是被剝奪的。革命事業之繼續發展，君主立憲政體之覆沒，自然這個憲法是不能存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國民公會開會時卽以制定共和政體的憲法爲非常重要的職責。十月十一日成立的制憲委員會，主要分子是基倫特派，其首領爲康多塞。他們想制定一個憲法，來妨害革命的發展，並企圖用資產階級官僚的縣政府並擴大州政府的權力，用來取消城鄉中眞正民衆的權力機關——公社。而山嶽派則極力反對，並提出自己的憲法草案，迫使基倫特派的憲法草案不能達到通過，在一七九三年三月閣員與巴黎公社的雙方會商中，馬拉就已經明白發表對於新憲法的見解，他說：「在這個危機下，人民的主權不是不可分的，各公社在各自的領土內有最高主權，人民有權採用擁護他們福利的步驟。」由於民衆革命運動的發展，迫使國民公會不能不於四月重新組織制憲委員會，並公開討論各種不同的憲法草案。羅伯斯庇爾在討論憲法草案的國民公會大會中說道：

「我們應當宣告，財產權和別種權利一樣，應在尊重別人的權利中受到限制，財產權不應妨害別人之安全或自由、自存或財產，凡違反這一原則者純然是違法與不道德。」

「社會應維持它的一切分子的生存，或者是爲他們找工作，或者是對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担保他們的生活品。」

在五月二十二日國民公會討論到取消公社自治機關的問題時，兩個黨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當時山嶽派的塞亞爾亞魯很直率的說：

「我們能取消人民的自治機關嗎？假使取消它，無異是對革命忘恩，對自由犯罪，而且是等於

完全摧毀人民的政府。」

顯然的，基倫特派與山嶽派中間的爭論，不獨限於憲法上的爭論，根本上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勞動者中間基本利益的分歧。這種分歧只有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的民衆暴動勝利才眞正得到解決。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國民會議通過了山嶽派人的新憲法草案。

按新憲法：（一）法國是民主共和國，凡是法國人民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上者都是權利相等的國民，享有一切政治權利，而絲毫不受財產的限制。較爲重要的立法，都要經全國國民總的投票來決定；（二）公社自治機關維持不動，五百以上居民的城市分成幾個自治機關；（三）選舉代表每區以五萬居民計算，另外政務會議（內閣）的二十四個委員，採用三級選舉，每年改選一次，政務會議的決議分法令法律兩種，法令是立卽執行的，法律則人民可以要求複決；（四）扶助貧民是社會所負的神聖義務，社會應使社會各員均受平等的教育。

這個憲法，就其本身說來，無疑的是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及勞動者的民主主義的政綱。他把政治上的平等給予人民，他把完全的政治自由給予民衆，這個憲法較之一七九一年的帝制憲法自有天壤之別，可是對於民衆的實際生活的保障未曾重視，而私有財產自然仍屬不可侵犯，不過有限制而已。雖然如此，可是，當時法國民衆都很擁護這一憲法，甚至於一七九五年反動時期中聖安託列的工人還在暴動中用粉筆在帽上大書特書「麵包與一七九三年憲法」。

憲法雖如此決議，可是在當日內憂外患的嚴重情形之下，自然是難於施行。決議之後馬上就有停止施行的提議。他們認爲在這種嚴重的鬥爭中，一種民主主義的憲法是不能夠統治，而客觀局勢也不允許

其施行。在這樣戰爭時期，爲防衛革命，需要採取緊急手段。然而這個憲法却具有他偉大的歷史意義；他是過去革命勝利的成果，是今後法國人民鬥爭的目標，給予法國人民不但是當時而且是百餘年來深刻的印象。當時的口號是「戰勝了敵人，才能順利實現這個憲法」。

一切爲了革命戰爭　在內外敵人的聯合夾擊之下，擺在民主專政政體面前的緊急任務就是首先要集中國家政權力量來領導被迫的自衞的革命戰爭。社會救濟委員會成立了最高的政府機關，具有非常的權力。由十二個「執行委員」組成革命政府，代替內閣而在社會救濟委員會之下活動，同時設立公安委員會，指導保衞革命的工作並授以逮捕反革命及緊急决策的權利。各地方革命政權的機關就是國民公會的全權代表及其所組成的地方「革命委員會」，他們一方面保證中央革命政府命令的執行；另一方面監督當地行政與軍事的施行。除了這些政權機關之外，各地還有甲可賓派的支部，它是統治的甲可賓派之下層基礎，其在革命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戰爭是在非常嚴重的局勢下開展着。一七九三年夏秋之交，前線形勢殊難樂觀，當時全法國革命人士，上自政府下至民衆，無不竭力盡瘁以保衞法國革命，一切步驟均爲着革命戰爭的勝利。其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

一、極力團結內部，堅持持久的自衞戰爭。這時山嶽派內部，一般說來是非常團結的；雖然其中已經存在着新興的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與貧民無產者中間某些階級矛盾，但是這種矛盾都在「爲了革命戰爭」的口號之下而力求減少。前線戰爭愈趨不利，而革命內部却愈加團結；特別在山嶽派最重要的領袖馬拉於七月間被保皇黨的一個女子暗殺之後，更加警惕了革命黨派，更加使他們中間團結攜手以對

付一切兇惡的敵人。八月十六日慶祝共和憲法的大會上，法國四萬四千公社代表，齊集巴黎，用七十三老人所持之杖及議員們所持嘉禾束在一處，表示法國人民的團結，人民對抗戰政府的政策完全擁護。國民公會特派員在各處工作無不竭力從事中央及地方政府間、軍隊及人民間的團結，而成爲鞏固內部的樞紐。法國全體革命民衆，在甲可賓派領導之下，一致認爲自己的戰爭是正義的、自衛的、革命的，都具有戰爭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他們並不以前線上之暫時與局部失利而表示灰心失望；相反的，他們都具有無尙高的革命熱情，犧牲一切，團結禦侮，克服任何困難以堅持持久的革命戰爭，在戰爭中來培養與壯大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中來爭取自由幸福的法國之實現，正如列寧所說：

「全法國的人民，特別是被壓迫階級的羣衆，都是有無止境的革命的熱情，他們認爲這次戰爭是自衛的、正義的戰爭，事實也是如此，革命的法國，從反動君主的歐洲，保衛了自己。」（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第一八九——一九〇頁）

二、極力發動民衆，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供給戰爭。爲了戰爭的緊急需要，國民公會曾下令緊急動員三十萬新志願軍上前線。國民公會於八月二十三日頒佈招募令：

「法蘭西人民由他們的代表宣佈：他們當全體起來擁護他們自由憲法，並將他們的敵人逐出境外，從此時起至敵人被逐出共和國爲止，一切法蘭西人都應當準備隨時入軍服務，凡青年人當在戰場上作戰，有妻室的人則製造軍器，輸送粮食，婦女縫紉營帳、軍服，並入醫院看護傷兵，小孩子則剪裹傷布，老年人則在公共場所遊行演講，藉以鼓舞戰士的勇氣。」（見布洛斯：「法國革命史」）

全法國人民及國民公會在各地工作的二百個特派員，迅速響應這一號召。他們首先將各地選民組織起來。由山嶽派人及選民的模範作用，與深入的羣衆工作，他們無條件的給民衆以民主權利，給農民以土地，給應募者以特殊優待，不久之後就實現了這數目，並且到戰爭末期做到一百萬以上的民衆參加軍隊。許多壯丁上前線作戰，但後方老弱仍是努力在生產，不管敵人如何封鎖、破壞，而農村生產較之前幾年特別緊張。不少的婦女被徵上前線，後方機關有很多的婦女服務。物質的困難雖然很大，特別是槍械、糧食、服裝及運輸工具。當時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呢？槍械不足，除製造以外，則用土槍土砲以至落後的刀矛補充。糧食向人民募捐並強迫徵發富有者及規定最高價格，這樣維持糧食，首先供給前線。後方糧食價格在五六月間漲到戰前三倍，而巴黎的蒙馬雷區和落姆阿美區全體人民情願節食六星期，省出糧食供給前線。一七九四年後，肉類價格高漲時，巴黎的全體愛國者規定罷食肉類，送肉給前線軍隊。在希勒特尼，在亞爾薩斯，特派員們向市民呼籲，要他們「脫下自己的靴鞋捐給士兵」，「捐出自己的床鋪供給傷兵」。一切凡能得到的皮革被繳發了，一切皮匠均聚集去替前線造皮鞋，一切廢銅爛鐵都弄去造軍用品，甚至克斯特拉斯堡許多私人的廚房用具鍋盤碗筷都捐出來了。一百四十餘年前，法國的這種偉大的抗戰動員工作，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如果當時沒有這樣的緊急動員工作，沒有這樣來克服一切困難，那末後來的勝利是難於逆料的。

三、新軍建設及其政治工作。在度穆休叛變與基倫特派被逐之後，為了保衛國家抵抗強敵，沒有極堅強的革命軍隊是不成功的。國民公會立刻在民主的原則之上，一面作戰一面改組原來軍隊，並大大充實之。首先，將自願軍制改為徵兵制，凡法蘭西人民均有當兵衛國之義務，這一次徵兵豈不容許

代替；被徵的富家也不容許用錢贖免，違者處以極刑；當時共成立十四個軍團，每個軍團有數萬人，每個軍團均參加前線作戰。其次，上級軍官必須由選舉產生，從前的基倫特派及保王黨貴族的軍官，凡動搖、破壞及對革命怠工者一律罷免，而代之以富有革命熱情、勇敢忠實的山嶽派的幹部，許多在革命戰爭中鍛鍊出來的工農貧民分子都提升起來。次之，在指揮系統方面完全趨於統一，全法國軍隊均在中央公安委員會的統一指揮之下，其指揮成分均系堅決革命與富有戰略天才的革命黨人，最高軍事指揮員爲擅有特殊軍事天才的卡洛特，他把不斷招募來的新兵很快編成爲整齊、嚴肅與武裝齊備的軍隊。他特別注意軍隊訓練，多半是利用接近戰場地方以及實際作戰中施以實驗的教育，收效甚大。次之在戰略戰術上着重集中使用兵力，並運用散兵戰術法對付遵守陳舊硬形戰術的聯軍，故能屢獲勝利。次之，在軍隊待遇上，施行餉項一律，軍餉相同制，軍官升級根據選舉與服務年限這兩個原則，士兵生活力求改善，對傷兵之愛護不遺餘力。

最後在政治工作方面，法國革命軍中是非常着重政治工作，並且在抗戰中獲得極大效果。國民公會特派員及大部山嶽派人均得入軍隊工作。他們親臨戰場，與士卒同甘同苦。公安委員會對這些軍隊中領導幹部及政治工作人員，有嚴格的軍令，有完全的信賴。在危急中，上級責成下級以死衛國，以身守土，而下級則執行不渝。如河施大將守蘭德時，公安委員會的命令是「保持蘭德，否則處死刑」。河施概然實現毫無難色。同時責成這些幹部、革命戰士與政府接近，與人民接近，要軍隊愛敬民衆，不准擾民害民，軍隊亦欣然聽命。這些成績完全是由於日常政治教育所造成。軍隊中經常在進行政治宣傳教育，經常召集會議，研究作戰經驗，戰後士兵可以批評不稱職的幹部，至於戰士生活，軍隊給養，他們

盡一切力量去繼續，軍隊紀律則嚴格遵守，這種政治工作做到了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軍政一致，這樣使法國革命軍中士氣異常旺盛，大家異常團結。因此這種革命軍的戰鬥力在改組之後立刻大大提高起來，這是保衛國土爭取勝利的緊要保證。

法國革命軍經過這樣的改造之後，就立刻轉敗為勝。九月七日阿學頓之役第一次打退英荷聯軍。十月中旬，法軍又在瓦亭墅經過兩天會戰之後，克洛特親臨戰場指揮，打敗了奧軍，收回了北方疆土。十一月下旬，法國少年將軍河施（二十五歲，衛兵出身）又大敗英奧聯軍於萊茵河畔。同時，在意大利方面的奧薩（薩多尼）聯軍亦受到挫折，里昂亦在十月被革命軍攻下，十月最後將芳底省底反動肅清，十二月少年將軍拿破崙又將英人佔去之土倫海港奪回。一七九三年末，除南方戰線上尚有西班牙軍盤踞外，其餘法國境內敵人，大致驅逐國境之外。一七九四年春，戰爭又重新開始，但是法國共和軍作戰情形較之去年更為順利，而終於撲滅了國內國外的敵人，拯救了法國革命，保持了領土完整，奠定了共和國的偉大基業，達到了最後的勝利。

列寧說：

「十八世紀末，法國人民與革命的農民，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君主政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受國王地主蹂躪的人反來用革命方法去蹂躪國王與地主。革命階級的這種政策，不能不動搖整個落後的專制的沙皇的王權的半封建的歐洲之基礎。戰爭就是法國勝利的革命階級的這種政策之不可避免的繼續。在這些戰爭中，一切歐洲君主制度下的人士，為了反對革命的法國，組織了他們的聯盟，用反革命的戰爭來反對法國。當時在法國國內革命的民衆第一次表現了百年來未曾見過的最高

度的革命毅力，同樣的在十八世紀末他們也表現了如此偉大的革命信心，改造了全部戰略制度，摧毀了戰爭中一切舊的原則與慣例，建立了嶄新的革命的人民的軍隊，代替舊的軍隊，即使戰爭上呈現一個新奇的異彩。」（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第三三四頁）

恐怖主義鎮壓反革命份子　山嶽派人取得政權之後，國王保王黨、封建貴族地主以及基倫特派與許多資產階級分子的聯合反動勢力，在法國各省燄熾起來。他們不但極力抵抗國民公會與革命政府的一切法令政策，不但在許多地方組織暴動，成立反動政權與軍隊向着革命勢力進攻，而且公開響應外國侵略者，甚至將土倫讓於英國，如此來內外夾擊法國革命。法國革命政府如果不同時採取堅決、迅速、澈底的革命手段來壓迫國內反革命勢力，是決不能擊退外敵，是不能保衞法國革命的。

國民公會爲要達到這一目的，曾經頒佈了許多命令嚴懲一切反革命分子，並授大權予公安委員會，可以即時逮捕與緊急處治一切反動分子，並組織了六千人的革命保安隊以爲肅反的武力。「革命恐怖」的第一時期首先就在公安委員會指導之下竭力勦平芳底及其他城市的反動勢力。在討伐芳底時，公安委員會曾訓令將士伐盡森林，搗毀巢穴，收取莊稼牧畜運至後方，遷其老弱婦女於內地，芳底打開之後，給反革命分子以「一個不留」的報復。同時在收復里昂之後，反動的富人的房屋一律焚燬，貧民的房屋毫不侵犯，並宣佈：「里昂既對自由宣過戰，里昂就不應存在。」

在和反革命派投機商人破壞糧食最高價格的鬥爭上，革命裁判所是起了極大的作用。凡有破壞革命與戰爭後方的安全及違法犯罪者均處以死刑。

九月十四日國民公會頒佈了「嫌疑犯罪法」，認爲凡從前被沒收過的貴族，凡表示過擁護「專制主

義與聯邦主義」的人，都可視爲嫌疑犯加以逮捕。

當時的口號是『打倒一切革命的敵人，無論他的尊卑』。

國民公會對於參加叛變的基倫特派人視爲法外人，可以不經審訊直接處決。隨後把下獄的基倫特派首要議員布里索等二十一人交法庭審叛後，即行槍決。該派重要分子之一——羅蘭夫人亦於十一日處死，羅蘭、康多塞自殺。同時，王后馬麗・安特涅娜也判了死罪。

這種恐怖政策，是革命政權對付企圖復辟的反革命分子所必需的政策；雖然其中有某些過左的地方，但是一般說來，對於保衛革命的法國，鞏固革命的成果、爭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缺乏不能拒絕的，不然，就可以葬送若干萬人的血肉換來的革命。

馬克思說道：

「一七九三年的恐怖主義，並非別的，就是在與專制主義及反革命派鬥爭中所採用的一種平民的手段。」（一八四八年『新萊茵』報）

也正因爲如此，法國革命才成爲偉大的革命。關於這點，列寧曾經很重視的說道：

「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偉大的革命家，他們曾採用了恐怖主義來反對一切壓迫者地主資產階級，使法國革命成爲偉大的革命」（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一卷第一八六頁）

列寧又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之『轉爲進攻的反革命』的反對普列哈諾夫一文中說道：

「米羅珂夫・普列哈諾夫先生：你們讀過歷史，難道可以否認到：一七九三年偉大的甲可賓派，不怕宣佈人民的仇敵，就是當時人民中居於少數的剝削者與反革命的代表，就是反動階級的代

表嗎？」（同上書第二十卷第四三五頁）

有些歷史家只簡單拿「殺人」「恐怖」的字句來曲解誣陷法國這般革命家，而忘却他們「殺」的是什麼人？這般人何以該「殺」？這種「殺」對於革命有何必要？這種觀點只不過是庸俗的與敵視革命的偏見而已。

最後消滅封建殘餘農民得到土地　農民的土地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浪潮之一。法國農民早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就掀動這一革命。爾後在四年來的極殘酷的革命鬥爭中，在對內對外的革命戰爭中，農民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他們「供給了戰爭的軍隊」（恩格斯）成爲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之一。農民所要求的是什麼呢？簡單說來，就是徹底推翻封建勢力，眞正獲得土地，換句話說，即變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爲農民的土地所有。不錯！在革命開始甚至早在以前不久，農民就在執行這一要求，不管憲政時期的封建主張，不怕那時大資產階級之竭力搶奪農民已得利益，也不管在基倫特派統治時期如何害怕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可是農民不但不願意放棄其血肉換來的既成事實，而且堅決在革命旗幟之下爲完全達到自己目的而鬥爭。不錯！一七八九年革命勝利之後，農民自動的奪回了一些公共土地，許多地方自動取消了封建特權，八月五日國民會議議決取消封建特權，並在爾後拍賣沒收的土地中，富裕農民也得到一部分土地，可是，這些事實並不能否認：廣大農民羣衆還是沒有眞正的完全的得到土地，只有在一七九三年山嶽派人取得政權之後，即只有在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者的革命勝利之後，才眞正達到了最後取消封建特權與農民得到土地之目的。

關於土地問題。一七九三年六月十日、十一日的法令上說：「一切公共土地及種種名稱的荒地曠

地，無論它分成若干小塊，它都屬於居民的全體或公社的全體。」

「每一個人口，不論其年齡性別，不論其在場或不在場，每一公民包含農村的勞動者及住公社一年的人，同樣有分受土地之權，十年之內分給每個農民的土地，不得因債而被沒收。」

關於取消封建特權問題：

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日的法令說：「凡一切舊日領主的徵收，一切經常的與額外的封建權利甚至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命令所用的保留的權利，都毫無代價的取消。」

「一切含有現已被廢除的義務的地契，應當銷毀。」

這樣，使法國九世紀以來的一切封建特權澈底消滅，土地落在農民手中。現在法國的農民，成爲土地的完全所有者。同時，因爲這一改革使農民有力量去收買國有財產中的土地，以擴大自己土地的範圍，而且土地之免稅，分成小塊出賣及國家允許公共土地加以分割，自然使貧苦農民亦得到利益。就是沒有土地及土地少的農民、士兵以致廢兵都能得到土地。遂使法國土地革命終於在這個民主專政時期得到澈底的解決。也正因爲土地革命的解決。遂使法國農民拚命革命，造成革命的澈底完成。

列寧論到法國農民土地問題時，說道：

「人們常引證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法國人民之英勇愛國與軍事奇蹟時，但常忘却了造成這種奇蹟的物質的歷史的經濟條件。事實上，革命之與殘存的封建制度分裂，依據革命的民主主義，用急速、堅決、果敢、無情的手段，把全國向着更高的生產方式轉移，向着自由的農民所有制轉移，這就是加速這些奇蹟的物質經濟條件，這種條件拯救了法國，改造與更新新法國的經濟基礎。」

（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一卷第一八九頁）

城市的社會經濟政策 爲了供應戰爭的需要，爲了救濟食糧之恐慌，爲了改良貧民及勞動者的生活，國民公會採取了許多緊急的政策。

第一，糧食政策——雖然農民在得到土地之後，在自己土地上，工作異常努力，一七九二年的收成很好。但因法國經過連續的荒年之後，食糧已是不敷，特別是國外敵人封鎖與進攻，國內反動勢力的擾亂，加之戰爭頻仍，農村巨大數量的壯丁調上前線，這就使法國糧食發生嚴重恐慌，糧價不但昂貴飛漲，而且許多城市找不到糧食及其他各種食品。政府決然採取了緊急辦法：（一）規定糧食最高價格，但以有糧者故意藏糧不賣，巴黎政府乃以每天補助一萬到七八萬利華的數量保證麵包四磅十二『蘇』的價格；（二）徵發富有者糧食；（三）嚴禁糧食出口與藏糧不報，違者處以死刑；（四）後方各機關一律節省糧食與其他食品；（五）規定每州每區每天應運若干糧食到巴黎；（六）成立倉庫。如此，糧食困難終能克服。

第二，規定最高價格——因爲戰爭緊急，反革命破壞及有資財者怠工，使紙幣跌價物價高漲。雖然政府曾以國產担保發行了鉅額有保證的紙幣，但以僞紙幣擾亂狀況險惡之後，政府不得已卽採取嚴厲恐怖手段規定最高價格，不僅糧食甚至一切日用品均規定其最高價格。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規定，以一年爲限，燃料、臘燭、燈油、鹽、肥皂、糖蜜、紙、金屬品、蔴、毛棉織品，都屬於此類。這些商品的價格是以一七九〇年價格爲標準，加上三分之一稅率在內。凡超過最高價格自行買賣者處罰，凡惡意與有意糟蹋糧食，藏匿一切必需品而不報者處死刑。這是一七九三年九月的法令，然斷在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形

成的國內與國外條件之下，這種禁止自由貿易的辦法，無論如何統治是不能收到永久的效果。無論主觀如何努力，客觀上反而使許多大商巨賈及投機者獲得很多便宜。雖然如此，革命政府終能採用緊急革命的辦法，革命民衆終於忍受了極大的痛苦，達到了在經濟上保證革命勝利之奇蹟，這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勞動政策——國民公會曾經決定：『薪水、工資、論件或論時工資之最高額按一七九〇年的額再加上原額之一半。』當然革命政府開始未始不想改善勞動者的生活地位，可是因爲物價之高漲使工人實際工資大大降低，反使這一法令成爲不利於貧民勞動者而利於場主的法令。

第四，社會救濟——國民公會亦曾決定發給貧民撫卹金，自食其力而有兩個子女者給以津貼，六十歲以上男女有養老金，里昂的特派員曾決定一切老年、殘廢、孤寡無依的公民『都應由各區的富人供給住所與衣食』，但是法律是法律，實行則甚少。

革命的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在革命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貫注民衆以思想意識，掃除舊社會的意識傳統，堅決民衆的革命精神，提高民衆的革命情緒，保證革命的戰鬥能力，因此革命與文化是不可分離的。法國大革命特別是甲可賓派指導政權的這個時期，它的偉大處，同樣也表現在革命的文化教育方面，這個時期是法國文化最光輝、最發達的時候。

首先在教育方面，政府確定了非宗教的義務的強迫的教育，學校數量非常之多，革命的書報盛極一時，圖書館、讀書室、博物館、陳列所成了擠滿讀者的地方。

國民公會通過了聖居斯特的教育計劃，五歲以下的兒童由母親養育，其後交國家教養。人們從幼年時代卽受嚴格的紀律，與過着有組織的生活，養成富有革命熱情及智力體力並相發展的生活習慣。五歲

到十歲的兒童即受小學教育。學校都設立在靜僻的地方。十歲到十六歲即教以務農學藝從事體力勞動，個別的參加軍隊受軍事教育。十六歲以上的人，都穿工人服裝，成年的壯丁都入伍當兵捍衛國家。女子則在家庭受教育。爾後學校復開始採用三級制——初級、中學、專門學校。

民衆的嶄新的生活代替了從前落後閉塞與不問政治的舊的傳統。重大的政治事件，都舉行羣衆大會，有專門政治工作人員進行演講。革命領袖亦時常參加報告。每一軍事上的大勝利，巴黎人民就瘋狂般的舉行慶祝大會，街頭上、農村中有不少宣傳隊出現。

在一般生活習慣上，極力講求勤苦樸素，一洗舊時代華麗委靡之風。工人服黑制服，及脛的短褲滿街皆是。彼此接談時，均用『你』『我』，一般人都名之爲『市民』，客套話幾乎都聽不到。九月，國民公會委託了專門委員會，編輯法蘭西共和主義名人英雄的傳記，一次行銷五十萬部。

一位軍官——魯提·德尼爾，根據馬賽大隊入巴黎城的行軍歌作成了雄壯活潑的馬賽曲，一時遍聞法國。

藝術家大衛提議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周年紀念日，在馬爾斯廣場上演戲，用啞劇來表現革命的重要歷史。

革命斷然和教會分手。一七九三年終，國民公會採用了革命新日曆，以共和國成立之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新年始點。每年分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以每旬第十日爲休息日，一年多餘之五六日當作紀念日。十二月分爲四季，每月名稱以該月特徵命名。秋——葡萄月（第一月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二十一日）、霧月、霜月；冬——雪月、雨月、風月；春——芽月、花月、草月；夏——穡月、熱

月、果月。

巴黎公社決定封閉一切天主教會，但羅伯斯庇爾、但頓等不同意無神論，他們認爲保證社會安寧使大衆服從，有保持宗教之必要。因此，國家採用公道禮拜，代替耶穌禮拜。然各國教士亦因此極力攻擊，指國民公會是一個欺神滅像和仇視一切宗教的團體；他們描寫法國革命爲一種無法無天的工作。自然，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對法國這個時期不能不如此仇視，然而法國革命也正是用這種革命手段來革新法國人民的思想意識。

甲可賓派之分裂派　從上述各點看來，法國大革命在這一時期，可以說是磁極一時的時候。革命的發展，軍事上的勝利，反革命的剷除，舊生活的絕跡，國內民主主義的勝利，國外人民對法國革命同情心的增漲，凡此一切都是革命民主專政下的不朽偉蹟，而且更加促進革命的發展。可是，我們還必須知道：目前放在革命面前的重大任務，即國內經濟的發展，民衆生活的眞正改善。國民公會並不能加以完全解決，恰恰因爲封建制度的消滅，抵抗內外敵人所採取的斷然政策之結果。替國內新興資本主義開闢了順利發展的道路。國內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之存在與發展，國外敵人在經濟上、軍事上之包圍，僅僅是規定最高價格而企圖限制資本主義發展，在生產手段私有與商品貨幣保存的條件之下，不但事實上不能完成其任務，而其結果，必然便利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而下層羣衆——貧民、貧農及工人們的生活難得眞正改善。並且，因物價高漲，工資規定，下層民衆生活惡化，反使新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與無產者中間的階級鬥爭，無論在城市在農村自然不可免的發展起來；使無產者貧農對革命政權的不滿也增加起來：而被鎭壓下去的一些反動勢力在他們還沒有完全消滅之前，必然也乘機活動，企圖

應嚮與分裂革命勢力。因爲這種社會矛盾反映到統治的黨派中間，遂使甲可賓派內部已經存在的鬥爭隨着激劇化，結果造成團結一致的甲可賓派內部之分裂。這時甲可賓派的分裂，可以從其內部階級之新的變化看出：

第一，但頓派，這是該派的右派，其首領爲但頓。他代表由種種投機事業及商業致富的城市新資產階級及農村中因購買土地及出賣糧食發財的富農利益。在這派的周圍，漸次有些法國反動分子集合。但頓派，不滿意於革命的恐怖，認爲現在是廢除獨裁制度與停止恐怖政策的時候了。他們對於國民公會處置富豪的政策，特別表示敵意。他們作了種種活動，破壞對付投機事業的法律，破壞最高價格法和徵收法。公然擁護自由貿易，擁護商家。他們聲稱『最高價格法破壞生產流通，喚起飢饉與反革命』。主張解散爲保障實施最高價格所組織的六千保安隊。總之，他們的綱領是要廢除因民衆的要求而製定的一切革命法案。同時但頓又是決然站在擁護私有財產擁護富有者利益方面，他向國民公會抗議，對破壞私有權者應治死罪。因此反革命分子日益屬望但頓派。但頓派原來是做過基倫特派的，現在他與基倫特派又團結起來，反對巴黎公社，反對左派。但頓提議召還革命軍隊及各地國民公會委員，廢除革命的獨裁制度，和外國媾和，主張大赦一切被捕的反革命分子。他曾幇助羅伯斯庇爾反對左派，待政權權力落到羅伯斯庇爾手中後，他又極力攻擊羅伯斯庇爾。

第二，羅伯斯庇爾派是該派的中派，其領袖爲革命領袖之一羅伯斯庇爾，他是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重要幇手爲聖居斯特、庫通。他們在原來反君主政體、反對基倫特派的鬥爭中，是站在堅決的立場上，特別在甲可賓派獨裁時期，懲治反革命是決不容情的。羅伯斯庇爾的經濟政策及農民政策都是帶

着妥協的性質，他是站在一切澈底的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同盟的前頭，努力避免極端政策，以求保存右派與左派的平衡，而自己在政治上都可以壓倒一切。

起初羅伯斯庇爾是站在革命的前線與民衆取共同行動而獲得勝利，及得到勝利後，他就離開革命開始右轉，他公然採取反對勞動者的行動，他是以富裕小資產階級利益爲基礎，傾向於實行資產階級的政策。

中派的綱領是與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制的綱領無大差異，特別是對外政策，財政問題，對左派的態度，中派主張繼續頑強的作戰，保持並加強恐怖主義，反對實施一七九三年憲法，堅決反對經濟的平等，反對左派「平分土地」的農業法，特別加強反對「過激派」。羅伯斯庇爾曾評蔑該派首領之一——傑克魯，說他要殺盡一切商人店主，並下傑於獄而自死。羅曾說：「革命政府不能在兩個暗礁間——即左派與右派之間——奮鬥。君輩不能志於財產之平等而志在權利之平等，站在政府前面的人，不是富豪，而是有某種程度財產的」。羅伯斯庇爾派的權力基礎即公安委員會。

第三，阿貝爾派，這是甲可賓派的左派，其首領爲阿貝爾、蕭美特、克洛玆等人。他是代表巴黎下層小資產階級及貧苦勞動者的利益，其勢力基礎爲巴黎及其他地方的公社。他們認爲「貧民在革命中，除了具有申訴他們的貧困的權利之外，是絲毫沒有得到什麽」。因此主張「必使勞動者達到這樣的境地即終有一日達到自己作小有產者的希望」（阿貝爾、蕭美特）。爲達到這一目的，蕭美特提出這樣的政綱：實行按財產與收入的累進稅，替失業者發起公共事業，實行社會救濟，以市自治機關的經費供給巴黎市民，以廉價的麵包，沒收富豪企業歸國有，徵發富農的糧食食品，考慮無產者的要求，實行免費的

國民教育。阿貝爾是小有產者經濟組織的主張者，是無情的恐怖主義與澈底的無神論者。蕭美特派和阿貝爾派都極力反對羅伯斯庇爾的獨裁，主張極端的恐怖，並不反對私有財產。

至於這派中更左的一羣卽原來的瘋人派，其首領爲工人勒克雷爾及當過教士的傑克魯，這時稱之爲過激派。他們是資本主義的反對者，但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只希望改變分配制度，並不主張更變生產制度，主張與大資本積累作鬥爭，並不知根本推翻資本主義；主張把國有田產分給貧農。他們帶着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主張很快消滅國界，「國界消滅之日卽和平與幸福來到之時」。顯然，他們是當時巴黎下層貧苦分子利益的代表。

一七九三年終，內憂外患漸告肅清，甲可賓派各派的意見更加深刻的劇烈起來。雖然羅伯斯庇爾派與但頓派之中存在着關於宗敎、經濟政策及恐怖主義等問題的矛盾，然而，由於但頓派已經不滿意革命而羅伯斯庇爾派亦欲停止革命的進展；因而他們雙方都把左派分子看得最爲危險，而在反對阿貝爾派的鬥爭中使右派與中派聯合起來，首先羅伯斯庇爾把公社的權力從民衆手中移到公安委員會，對不滿意與攻擊政府的阿貝爾派肆行政治上的打擊。羅伯斯庇爾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政府會議上的報告結論是「凡爲人民之敵者死」，他首先打擊「過激派」，將其領袖勒克雷爾、傑克魯下獄，然後集中力量撲滅右派。一七九四年三月初左派曾組織暴動反對羅伯斯庇爾，但終歸失敗，接着左派領導人——阿貝爾被捕旋卽處死，四月蕭美特亦上了斷頭台，科第尼爾俱樂部隨之瓦解，而公社的命運亦從此結束。

剷除了左派之後，羅伯斯庇爾並不自認是反對革命；相反的，他們不強調他是「山嶽派的柱石」，是「民意的代表」。他深恐民衆懷疑眞正革命領袖之死，又懼怕右派力量之強大，於是以迅雷不及掩耳

手段，於三月三十一日逮捕了這時特別帶反動性的但頓及其同派要人十餘，四月五日，一併處死。

民衆呢？他們對革命之成功失望，對政治之不滿而冷淡，終日用心於爭取一片麵包而忙碌而疲乏，因此，對甲可賓派之內爭亦不積極注意。

羅伯斯庇爾以爲左右派均倒，似乎再沒有什麼力量來震撼自己的政權了，於是與聖居斯特，庫通組織了三頭政治，總攬國民公會大權，分佈黨羽遍據要津，並多方以「道德恐怖」四個大字的原則訓示民衆，一面要民衆謙遜、公正、忠誠、知足；一面以血的恐怖對待任何反對與不滿意政府的人，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羅伯斯庇爾的專政。

羅伯斯庇爾專政的覆沒　在羅伯斯庇爾專政之下，一方面由於民衆所信任的左派打垮，革命政府的眞正柱石——公社及其他民衆組織破壞，因而民衆力量渙散，特別是民衆在革命勝利之下生活無法改善而對革命失望，使這個政府失掉民衆的擁護而無法對付反革命勢力的進攻；另一方面反革命勢力無論你如何鎭壓，但因新的資產階級力量之擴大，他們久已切齒於甲可賓派的恐怖，大不滿意於非常稅、最高價格及種種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特別懼怕革命再起；這樣使一切反動勢力——不僅資產階級而有過去被鎭壓下去的一切反革命勢力聯合起來直向政府進攻。因此羅伯斯庇爾的政權在打擊左右兩派之後，僅是更加處在革命與反革命兩方不滿的窄巷之中。當時擁護者只有那些富裕的小資產階級，這樣使政府的力量就難於支持下去。另外一切反對的人，就是在國民公會之中形成了羅伯斯庇爾的反對派，但頓派，沼澤派，基倫特派，阿貝爾派的同情者，都無形中聯合起來，反對羅伯斯庇爾。而羅伯斯庇爾也就決計處置這些人，首先就攻擊這些人爲參與謀逆及危害共和等罪。

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熱月八日），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作了一篇很長的演說，提議確定國民公會的獨裁，肅清革命的敵人，清除國民公會的委員，使公安委員會隸屬於社會經濟委員會，樹立國民公會的統一政府，此時，會議上就有反對的呼聲。第二天熱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開國民公會最後一次會議，羅伯斯庇爾到場準備再作演說，會場上竟不許他發言，會場上的人大鬧起來，接着通過了逮捕羅伯斯庇爾的決議，羅伯斯庇爾被捕。高呼「共和國死了，強盜們勝利了」。第二天，羅伯斯庇爾及其同黨二十一人均被殺，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遂從此結束，而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基本上亦至此完結。

總結來說：小資產階級的專政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不僅在法國革命中而且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有極偉大、極重要的歷史的意義。據馬克思、列寧的意見，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成爲偉大的革命者，就因爲有了國民公會，有了革命小資產階級的專政，有了「十八世紀最革命的階級——城市與鄉村的代表甲可賓派」，這班甲可賓派「其歷史的偉大處就在於與人民在一塊，與人民中革命的大多數在一塊，是與當時革命的先進階級在一塊的」，（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三五頁）「這般偉大的甲可賓派，不怕宣佈人民的仇敵，就是當時人民中少數的剝削者與反革命的代表。」（同上）

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專政，澈底推翻了封建制度，消滅了農奴制度的最後殘餘，將土地交給農民，實現了勝利的、正義的、自衛的革命戰爭，保全了法國領土與主權完整，震蕩了君主歐洲的封建基礎，達到了澈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然而，這個民主專政到底還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到底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範圍，這一專政的結果剛剛爲資本主義創設了順利發展的大道，不過它的特點却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卽是說，由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無產者用不同於資產階級的辦法來完成資產階級的事業。

馬克思說道：

「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中，資產階級曾經是眞正站在運動的領導地位的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和不屬於資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階層，或者還沒有任何與資產階級分離的利益，或者還不成爲獨立發展的階級或階級的一部分。因此，凡在他們實行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地方——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國就是這樣——他們僅僅爲實現資產階級底利益而鬥爭，雖然他們所採取的姿勢是和資產階級的姿勢不同。」（一八四八年馬克思的「資產階級與反革命」「普魯士革命總結」）

這般小資產階級與勞動者羣衆英勇驚人的鬥爭，完成了資產階級的事業，然而鬧到盡頭仍不免失敗。這竟究是什麽原因呢？

小資產階級能夠把資產階級所不能澈底解決的農民土地問題加以解決，能把國內外敵人的侵略戰爭轉變爲反侵略的勝利的革命戰爭，然其結果剛剛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資產階級利益之加大，而廣大民衆難得到實際的經濟利益而陷入貧困。恩格斯說：

「奇怪的，那在三次革命之中，農民供給了戰鬥的軍隊，可是在勝利之後，農民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歸於破產。」（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因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既然是以下層民衆爲基礎，以民衆力量爲依據，努力於實現民衆利益，可是在客觀上既然存在未變的私有制，不能不使農村土地主要轉入新興富農及中農手中，城市財富集於投機者商人與有產者手中。而這種經濟結果，就不能不使城鄉的貧苦大衆的生活日愈惡化，因而對革命不滿。小資產階級專政既不能在根本上眞正改善羣衆的經濟地位（這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下才有可能），自然就一天天失掉羣衆力量的基礎，加之當時法國又無獨立的無產階級足以推進革命更向前進，這一政權遂不能不沒落了。

另一方面，小資產階級專政剛剛替資本主義肅清了大道，不管它如何在主觀上加以限制，然而，客觀上是大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前的資本力量固未動搖，現在新起的資本力量亦無法遏止。他們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手中拿住很大的經濟力量，自然就不滿意於那種拿來對付他們的恐怖手段及一切限制自由貿易的政策了。在他們力量雄大之下，必然與現存制度發生衝突，甚至寧可與其他一切反對現存政府的勢力結成一氣，以求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此甲可賓派的革命小資產階級專政，一面要用革命方法剷除封建殘餘，準備了種種條件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一面又在這一經濟制度基礎上建立以簡樸節約之古代精神式的小有財者的國家；這就是它必然要失敗的原因。

馬克思關於此點曾經說道：

「羅伯斯庇爾，聖居斯特以及他們的派是沒落了，這是因爲他們把立於完全奴隸制上的實際的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體和立於解放了的奴隸制度及資產階級社會上之精神的民主主義近代議會制的國

家錯用的緣故，這是頂大的錯誤啊！旣要在『人的權利』中承認尊崇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工業的一般競爭，自私自利亂雜無章的自然精神的個人社會，同時又要個人廢除這個社會自身生活之現象而造出一個帶古風的社會的政治頭腦。』（『神聖家族』德文版『馬恩全集』第三卷）

第六節　資產階級的反動專政與拿破崙帝制之最終失敗

新七月以後的反動　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新七月九日），小資產階級專政最後失敗之日，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史上的一個大恥辱的日子。羅伯斯庇爾失敗之後，繼小資產階級專政而起的，就是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時，繼極端的革命而起的：就是極端的反動。法國大革命史上的革命『下落線』，代替了革命的『上昇線』。

國民公會中的『沼澤派』，在這次政變中，不僅是積極反動，而且還起了主謀作用，保王黨分子大出其頭，關在監牢內的都放出來了。被驅逐了的基倫特派議員，都洋洋得意的囘到國民公會中來了。反動勢力的大集合，自然就歸左翼的革命分子倒霉了。國民公會在『與保王黨及恐怖黨宣戰』的口號下，實際上是集中一切力量打擊一切革命勢力。國民公會中的左派議員，驅逐的驅逐，逮捕的逮捕；巴黎及各地公社均一齊加以解散，大多數的公社社員，都送到斷頭台上或鐵窗中去了。卽甲可賓俱樂部也全被取締了，各地區分部與甲可賓派的支部都被剷除了，凡被認爲『恐怖黨』的人都有該處死之罪。國民公會派往各地的特派員一律取消，許多特派員有的遭死，有的潛逃。一切是甲可賓派時代的法律政令均宣告無效，所有上下官員、公務人員均代之以反動有功的人物。

國民公會完全不顧民衆的已得利益，它在大商業主威脅之下，取消了規定最高價格的條例，並允許多鑄幣流通；因此，紙幣價格任其低落，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日高，影響貧民生計，亦無人過問。從前工人工資與待遇之規定以及其他社會救濟法律，一概宣佈無效，因此，在反動勢力之下，工人貧民生活是劇然惡化下去。一七九五年，巴黎工人每日平均工資爲一〇〇——一二〇利華，並且以低價紙幣付給，而當時最壞的麵包每磅已值五〇——五五利華，糖每磅值四〇利華，鹹肉每磅值一二〇——一五〇利華；由此可知工人生活的痛苦了。加上本年的飢荒與大批工人失業，工人生活之痛苦更是難以形容。如果工人迫而起來鬥爭，則立即有在「恐怖黨的分子」的名義之下遭受殺戮的可能。雖然如此，巴黎的勞動民衆終爲飢寒所驅使，亦曾於一七九五年三月及五月羣起包圍國民公會，但以杜步亞將軍（Dubois）之武力鎮壓而終歸失敗。白色恐怖遂愈加厲害的鎮壓在工人頭上，甚至連工人住的破宅小巷亦被完全焚燬。據說是要斷絕「恐怖黨」的禍根。

毫不奇怪的，反動勢力之來，就歸下層民衆大受其禍了。資產階級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維持自己的安富與尊榮，爲了誅絕革命的力量，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權力放在議事日程之下來對付革命民衆了。可是，這並不能杜絕民衆之革命性。縱然，民衆一時受到極嚴重的壓迫而無能大舉鬥爭，可是民衆看得清楚，他們把現在與過去一比，更加認識資產階級的面目，同時更不能忘懷於一七九三年的偉大時代了。所以，巴黎聖安託列區的工人在五月的鬥爭中，還以粉筆在自己的帽子上寫着「麵包與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這也就表示着工人將來的一天，他們將要幹出什麼事來?!

一七九五年憲法與執政府　資產階級在又一次用殘暴手段，鎮壓了五月的工人動亂之後，自信自己

的統治權位是有了保障了。一七九五年八月，國民公會頒佈了新憲法，這就是所謂「共和三年憲法」。新憲法的頭上仍冠有人權宣言，不過將其中的一切革命原則都删掉了。普選權、直接選舉及一院制國會都取消了。此次選舉法，規定初選與複選兩制，凡能付納人口稅或地產稅者，才有初選權，凡每年收入等於一百五十日到兩百日的工資者，才有複選權。此次選舉，被選人們三分之二已由國民公會議員佔據，只三分之一經過選舉。立法機關仍恢復爲兩院制：一爲五百人院，一爲元老院。五百人院的決議必須經過元老院核准，然後成爲法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爲執政府（或曰督政府），其產生是由五百人院選舉五十人，再由元老院從這五十人中圈定五人，以充執政官。執政府有委任政府各部總長及宣戰媾和之權。

顯然，執政府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特別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政府。在當時法國這班金融大資產階級手中，不僅握有鉅大的金融財政力量，可以壟斷政局，而且獲得有大量軍隊，以爲自己統治的工具。雖然如此，在執政府時代，仍然存在不同的黨派勢力。當時最大的黨派自然是這執政的共和黨（中派），他們主要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企圖鞏固新憲法與保持集中的政權，這樣來防範革命。右派爲保王黨，他們並不滿意資產階級統治，根本想恢復帝制，至少希望囘復到一七九一年的君主立憲。此外就是左派的民主黨，他們是城市小資產階級與工人們的代表，希望一七九三年的民主憲法，對於現存政權表示反對態度。

姑無論資產階級如何聯合保王黨勢力打擊了民主力量，但是民主勢力並不因此而絕跡。因爲旣然有着下層階級的存在，旣然有了階級鬥爭，則這種先進階級的民主勢力，絕非反動勢力所可撲滅，猶之它

無法撲滅下層階級一樣。在另一方面，民主派勢力的確是在受了打擊之後，表現其力量是削弱，可是，這種削弱並未能造福於執政的資產階級；恰恰相反的，資產階級民主勢力削弱的結果，不是資產階級政權之如何眞的鞏固，而是保王黨勢力之茁茁增長。這種日益增大的反動勢力，不但不想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權，並且要一舉而推翻之。新九月十三日（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保王黨藉新選舉之助而相信自己在國會力量強大之時，就公然以王黨將軍達尼坎為首，實行圍攻國民公會，欲乘此以根本推翻執政府而從事復辟。

這時當權的資產階級又感覺到民主派有用了。倉卒之際，不能不去求助於尚且存在的甲可賓派的軍官，來解救國民公會之圍困。當時有少年將軍拿破崙．邦那帕特之砲兵以及巴黎民主派勢力之幫助，終於把保王黨的進襲擊退，執政府始能轉危為安。從此，執政府愈益信賴軍隊之力，並由是而重視了拿破崙，不久以後，拿破崙竟一躍而為法軍總司令。無人知道的拿破崙將軍從此就大顯頭角了。

國民公會掃除了王黨勢力之後，巴黎又重新掀起了民主運動，甲可賓派的力量又重新增大起來。國民公會此次的改選，結果竟使民主派的議員佔到了多數。執政府又不安枕了，眼見革命之興起，不禁又頭痛起來，昨天的恩人，今天又視為仇敵了。他仍又是那一套看法，覺得民主派仍然是較之王黨為可畏了。於是國民公會又來一次淸除左派運動。他們藉着軍事力量，即將國民公會中民主派分子完全驅逐出去，三次軍事法庭，把許多民主派首要人物殺掉了。

從此以後，民主派勢力眞的是大受摧殘，特別在巴貝夫運動失敗之後，一個長時期內，表現出難於振作，而資產階級統治的原則也就相當「安穩」的站在法國社會之上了。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曾經這樣的描寫過執政府時代的法國，他說：

「從執政府時代起，資產階級社會的眞正生活，就作爲強有力的生命潮向外激怒的發展起來。工商業的熱潮，致富的慾火，資產階級生活的陶醉，初步的享樂，都充分厚薄的帶了酩醉的形態。法蘭西土地之眞正文明的利用（這土地的封建制度已被革命的鐵鎚所擊碎，現在無數的新的所有者，正將那發熱病盡情的散佈），被解放的產業之開始發展，這些都是初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各部生活上的徵象。資本主義社會在資產階級中找出自己積極的代表者，資產階級就是這樣走上了他的支配路上。」

巴貝夫的活動與主張　法國資本主義社會之奠定，資產階級之走上這一社會的支配地位，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矛盾進一步的暴露的說明。法國大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執政府時代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寶殿，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發展首先就使資產階級與無產大衆的鬥爭比較明白的提到歷史的面前。無產大衆數量的加多，生活的急劇惡化，剛剛與有產階級之安富尊榮對照着。民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政權被有錢人把持，打倒了前一個壓迫者之後，又來一個壓迫者的政體。無產大衆之如此的不幸，引起了法國當時最激進的民主派代表的注意，使他們模模糊糊的看出這個新社會的不合理，看到在這一社會制度之下，廣大貧苦羣衆無出路，他們不但簡單的反對現存社會制度，而且謀一舉推翻之。這樣理想的代表人物，就是巴貝夫。

巴貝夫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激進派人物，他參加過攻打巴士提獄。他與甲可賓派中的最左派接近他在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三年，堅決贊成過「平分土地」的農業法。他在一七九四年末，則辦過「護民

官」報，曾經熱烈的攻擊過新七月派，一七九五年被捕，年末又被釋放。一七九六年，他糾合當時民主派的左翼分子，達爾蒂、布奧那洛蒂等人組織「平等會」，企圖用暴動手段來推翻執政府，五月以事洩被捕。暴動未成，「平等會」的分子盡遭殺戮。

巴貝夫的最高理想是共產主義。他從爲「社會的萬惡之首是私有財產」出發，主張廢除資產階級之私有財產，樹立共產主義社會。他認爲在這一社會中：（一）勞動與消費對於社會上一切的人都是共同的；（二）任何人不能自行佔有土地及產業上的財產；（三）眞正的社會上不能有貧富之分；（四）革命的目的在廢除不平等，恢復全體的幸福。

巴貝夫分析過人類社會歷史，並最先指出有階級對立的社會，就存在着社會鬥爭。他說：

「平民與貴族、貧人與富人的鬥爭，並不是公開宣佈時才開始的。這種鬥爭是當這種制度開始成立時就開始的。這種制度是要奪取一切他人的財富，給予一人享受。在這種制度下，鬥爭是永無止境。」

巴貝夫看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黑幕，當着資產階級極力謳歌這個社會時，他却毫無隱蔽的說到：

「人們說，萬事漸入佳境，這在貴族與自由的敵人看來，確是如此，可是每日賺不到四利福的貧窮的勞動者，因爲物價飛漲無已，號寒啼飢，悲痛至死。公共工場停止工作的威脅，愈令人想到將來交近困難季節後的可怕。」

巴貝夫毫不懼怕，他勇敢的提出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他堅決的號召貧苦民衆起來革命。他認爲只有

窮苦人打倒發財人的武力革命才能變資本主義制度爲共產主義社會。他說：

「民衆是不是非革命不可呢？無疑義地，民衆若不欲失去自己的自由，就非這樣革命不可。」

「法蘭西革命，不過是更大的更偉大的革命——這是最後的革命——的前驅。」

當他被捕受審時，仍然堅如鐵石的說道：

「我深信現時的政府是壓迫者，我將盡力之所及把它推翻。我已與共和國內一切民主主義者聯盟一致，但我決不願說出那些民主主義者的一個名字來。」

巴貝夫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把民衆的武力革命與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聯繫起來；在於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實際行動作爲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之必須採取的手段；並且在於把民主主義的澈底勝利看成爲無產階級革命與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至於他的堅決奮鬥至死不向反動勢力投降的精神，尤足令人欣佩。

然而巴貝夫仍然不是科學的共產主義者，仍然是帶着近於空想的、不成熟的共產主義的色彩。這由於法國當時還未發展大工業，無產階級還未形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還不十分發展；使巴貝夫的理想與行動充分顯示出他自己的弱點：其弱點主要是他不可能依據於最先進階級，以爲實現自己共產主義理想的眞實社會力量；他不懂得資本主義社會還遠未進到急劇崩潰的程度，而謀過早的推翻它；最後，就是他還是未能重視民衆力量，而過分估計了先進革命家的陰謀作用。因此當巴貝夫運動喧動一時的時候，既無城市獨立的工人階級以爲前驅，又有廣大農民對他表示冷淡，而資產階級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紛紛加在這一運動的頭上，自然巴貝夫的成功就沒有希望，而其失敗就成爲必然了。

雖然如此，巴貝夫運動仍不失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它是「成爲近代無產階級多少發展的先驅者之階級底獨立運動」，（恩格斯）是要實際去實現共產主義思想的最初的嘗試，並且成爲十九世紀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端倪，無怪乎馬克思在回憶到巴貝夫之名時，說他是法國最初的「眞正能動的共產黨」。

軍事勝利與霧月十八日政變　一七九五到一七九七年，法國對外的戰爭，已由戰略的防禦轉爲戰略的進攻。除英國外，其他國家均爲法國擊破。執政府認爲要擊破英國，必先在英國主要殖民地——印度、埃及激成暴動來反對英國，使英國首尾不顧，然後一舉擊破之。一七九八年七月，拿破崙親率精兵三萬五千及海軍一萬，進駐埃及，然終爲英兵所阻，不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使開去的法軍陷入危境，進退都不可能。斯時歐洲敵人俄、英、奧三國又新結聯盟反攻法國，倒使法國首尾難顧，各線均告不利。法國既處在這種危境之中，遂使執政府又不能不號召民衆起來捍衞國家，於是民主勢力又能恢復起來。政府得民主派與民衆之助，厲行普遍徵兵，鎭壓保王黨與向富豪徵收累進稅，結果民氣大盛，軍力一振，方能穩定陣線轉危爲安。迨英、俄、奧聯軍又爲法軍擊敗之後，資產階級的政權方告穩定，若干法國的民族危機乃得解除。

現在，法國的政治形勢大有變化：

第一，法國軍隊的力量與威風已經是震動一時，大有壓倒一切之勢。這個軍隊在拿破崙統率之下，不僅壓倒了普奧諸國，而且征服了意大利半個國土。埃及失利之後，又終能在歐陸擊退普、奧、英、俄的聯軍，同時這些軍隊自己在戰爭中發了大財不算，還掠奪了國外許多財富，用來發展法國的經濟，改善法國的財政狀況，這又得到國內有產階級的無限欣佩。法國軍隊與拿破崙從此威風凜凜，無論在國外

國內，都成了天之驕子，而可以為所欲為。

第二，法國經過了這多年的革命與戰爭，貧者固然愈貧，但富者却日益致富，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加上戰時經濟的投機事業，使法國的資產階級大步迅速的發展起來。特別是那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做投機事業的分子，他們靠軍事戰爭而致奇富，現在大家都安於太平，渴望一個有權力的集中政府，使他們的財富既不致受革命的威脅，亦不至受事變的擾亂，他們特別希望於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

第三，資產階級在實地掌握政權之後，但仍不免於左右兩派之威脅，在執政府時代中，有時保王黨企圖復辟，有時民主派過於強大，使當政的資產階級總覺有些寢不安席，恐慌發抖。雖然他們曾經利用右派打倒了左派，接着又利用左派打倒了右派，可是再打得好也終不能把兩者都打個乾乾淨淨。現在資產階級要真的鞏固自己的王座，只有來一個「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要做到這一步，就只有依靠強大的社會力量，這種社會力量就非藉重於軍隊武人不可。只要社會安寧，財產得到保障，就是把政權交給強有力者亦在所不惜。

第四，農民仍佔當時法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在法國政局中，幾乎有舉足輕重之勢。他們政治落後，富於保守性，特別是較富有的農民。如果說在一七八九年前後農民是迫於不得已而不能不起來奮鬥；現在革命給了他們以莫大的好處，在家的農民都多少有點土地，出征的農民也在戰爭中發了一些小財，特別是拿破崙的軍事勝利，在精神上固然與奮了農民，而在物質上也使農民得到某些好處（如外國財富流入，財政充裕，國家稅款不如從前那樣急迫）。農民特別愛崇拜偶像，他們錯把自己的救星加在拿破崙一個人的身上，彷彿他們的幸福都是拿破崙一人所給予的。農民也安於小康，幸樂太平，希望有

一個萬能的政府，從此可以太平無事：這個政府在農民看來是非拿破崙莫屬。

第五，國內民主力量遭受了幾次摧殘之後，一時難於恢復元氣，下層民衆固然大不以現勢爲然，總想從事掙扎，然而時局如斯，使他們想念一七九三年憲法，暫時亦難到手。白色恐怖之厲害，生活困難之苦惱，使他們一時消沉無聲，對政治表示沉默態度，何况民主派領導人物死的死，關的關，民衆失去首腦，亦難能大肆行動。

第六，國際形勢之險惡未除，強隣之虎視猶在，在有產階級與農民看來，法國欲圖生存，亦大有賴於有權力者當政。何况資產階級還以現狀不足，而力謀從事侵略，擴張疆土，以增殖自己的財富；這就非依重於軍權在握的人不可，除拿破崙之外並無二人。士兵們慣於作戰，他們不以革命爲榮，不以任何人爲敬，而以與拿破崙一塊遠征人國爲快。這樣，法國自衞戰爭結束之後，侵略戰爭就不可避免。於是拿破崙其人，軍隊其力，成爲當時法國的寵兒了。

法國當時的內外政局既如此，這種政局正是拿破崙爲所欲爲的社會基礎。

共和七年新九月（即一七九九年十月），拿破崙征埃及回到巴黎，拿破崙受社會之專寵，握軍事之大權，在大資產階級的矚目之下，稍一藉助於幾個執政，幾十個軍官，幾千兵士的力量，就來一個突然的政變。不多的槍桿子就把五百人院解散。元老院迫於情勢，馬上決議廢除執政府，指令拿破崙、西耶士、杜科三人爲臨時執政，實際上是拿破崙一人獨攬國柄。

巴黎民衆對此政變毫無反抗，那些對革命失望的工人亦猶如一般民衆一樣，並不以執政府有何保衞的價值。小資產階級覺得這次政變無表示態度之必要，農民並不滿意於執政府，倒以爲拿破崙政變爲

然。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滿認爲應當如此，正在歡迎這給他們以和平與秩序的常勝將軍。從此，法國政局走上了一個資產階級軍事反動專政的階段。

恩格斯說道：

「法國大革命，使富有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而這個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更加迅速的發展起來。一方面由於他們對當時被沒收和以後被拍賣的貴族與教會的地產實行投機取利；他方面由於他們承辦軍用品，向國家敲竹槓。正是這種投機者的統治，使得法國與革命在執政府時代陷入破產，並使拿破崙得以藉口實行政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邦那帕特主義（即拿破崙主義）是由於這兩種社會傾向出現的：一是由衆望的軍事領袖的獨裁，來淸算革命以均衡各階級的不穩定性；一是由於資產階級欲樹立穩固政權以保衛自己新興財富的傾向。拿破崙個人的獨裁，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不過要冠以軍事武力的帽子而已。邦那帕特主義是以廢止了封建制度爲前提，是以統治的資產階級與保守的農民爲社會基礎，而在教士和官僚機構的扶持之下行使其職權。

馬克思說：

「在資產階級和農民看來，軍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服裝，軍隊是他們的詩歌，蘊藏着無窮幻境的土地是祖國的權威，他們的愛國主義是對財產的感情之理想化的形態。」

拿破崙帝國及其失敗　霧月十八日政變之後，拿破崙已經成爲法國獨裁的統治者了。拿破崙在名義上好像是把法國從反革命的復辟運動中挽救出來，實際上，他是依賴軍隊資產階級與保守農民建立一個

集中的政權以圖根本清除革命運動而已。拿破崙獨攬政柄之後，卽進一步鞏固資產階級與富裕農民已得的利益，在他們的擁護之下，使自己的地位愈加有了保障了。於是拿破崙立卽重訂憲法（『共和八年憲法』），根據這一憲法，一八〇二年拿破崙被推爲終身執政，並有選擇後任者的權利 然他仍以爲未足，而又可以爲所欲爲，一八〇四年拿破崙在假冒民意之下公然稱帝，號拿破崙第一，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之名就從此完結。

拿破崙自爲執政之日起，首先就是破壞一切革命組織壓迫任何革命運動，稱帝之後，自然更變本加厲。甚至連稍一不如己意的報紙，都加以封閉，（巴黎七十三家報紙中被封者已六十六家）。剩餘的報紙均完全控制在自己的警察機關之下。人民消息，完全由警察機關供給，人民對帝政不許有任何的批評，民主權利已經是取消得乾乾淨淨，就是資產階級民權也加以剝奪。可是，他們非常願意，只要革命不發生，民權之有無，並無關重要。

拿破崙把過去政權機構，完全加以改組，使之便利於自己的掌握。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均派自己的親信去充任官吏，甚至各級警察吏員都由自己委任。法國大革命以來及執政府時代已經發展起來的集中政權均由拿破崙一手充實與光大之，使之變爲更強有力的階級統治的工具。

正如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上所說：

『法國第一次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時却擴大了國家政權的容量、屬性和補助機關的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機關。』

軍隊是拿破崙統治的強有力的武器。拿破崙不僅規劃了自己獨見的戰略戰術原則，而且確定了軍隊

的組織與制度。他把軍役延長到七年，把軍隊與民衆隔離起來，成爲高居人民之上，與保護資產階級財產不受內外侵害的專門職業，養成了軍隊替統治階級服役的一副武裝的工具，使軍隊成爲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宗教也是統治階級精神上不可缺乏的統治工具。拿破崙專政後，卽從事恢復教會的權力。一八〇一年，他與羅馬教皇締結宗教條約，宣佈羅馬舊教爲法國國教，主教均由自己委任，教餉均由國家發給。在宗教的有力幫助之下，使拿破崙一切事業均可得到「上帝」的承認，人民不敢有所違抗。

拿破崙又把過去逃亡的貴族一齊搜羅囘來，恢復貴族爵位，並以爵士分封親屬與軍官，過去失掉土地的貴族，現在均加以追賜。

拿破崙對於工人問題，特別注意。但不是注意別的問題，而是注意於把工人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用嚴密的警察制度防範工人，不使其有任何罷工、鬥爭，以至革命的可能與傾向。拿破崙對工人的政策，就是盡情壓迫與最低限度改良——二者兼施。他也建立過很大的國家工廠，收容失業工人，設立仲裁委員會以裁判勞資糾紛，甚至也相當增加工人工資，但是絕不允許工人鬥爭。一八〇三年頒佈了禁止罷工的法令，如果工人稍有不服從資本家的味道的事，就要受到嚴厲的處辦。表面上似乎拿破崙是站在資本家與工人的共同利益之上。實際上，拿破崙是完全站在資本家方面，幫助資本家加厲剝削工人而已。

拿破崙對農民的政策，是完全着重於富農及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爲了防範土地財產的分散，爲了擴充富農的土地，於是取消了過去自由分購國家土地及產業的法律；這種法律是對小農有利的。從前

革命時代，國民公會決定農民可以平分農村公社的土地，這便決定，現在被取消了。中小農民對國家的賦稅不能延期繳納，不然，土地即被沒收。其對富農及農村資產階級則採取許多辦法，使他們能集中土地與比較大規模的經營土地。我們說，拿破崙是代表富裕與保守性的農民的利益，事實亦在於此。

拿破崙從各方面做了他的工作之後，並於一八〇四年頒佈「國民法典」（即「拿破崙法典」）；從法律上將資產階級及一切有產者的財產利益加以確定、鞏固與保障。

至於拿破崙的對外政策，顯然地，現在是要積極向外侵略了。如果說，法國大革命以來直到拿破崙專政之前，法國對外戰爭，還不失爲革命的自衛戰爭；那末，自法國拿破崙政變開始，法國革命的自衛戰爭就變爲反動的侵略戰爭了。拿破崙稱帝之後，其戰爭侵略性更加明顯。因爲他的對外政策就是爲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力謀藉武裝力量在國外擴拓疆土，囊括財富，增殖市場，不但要打倒當時法國工商業的競爭著——英國，並且還要獨霸歐洲。爲了這一政策的驅使，亦即是這一侵略政策的繼續，拿破崙稱帝之後，遂大舉對外作侵略戰爭。

一八〇三年，法軍在荷蘭、意大利及德意志諸國大獲勝利。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拿破崙大破普奧聯軍於奧斯德里齊，迫使奧大利割讓大半個意大利與法國。一八〇六年到一八〇七年，以普俄爲首又組成對法聯軍，結果仍爲拿破崙所敗。普魯士的軍隊在耶拿全敗。一八〇六年末，法軍乘勝佔領了普魯士首都——柏林。佛利德蘭之役，普俄聯軍大敗之後，拿破崙與俄訂立了爾西特條約，規定俄國必須助法攻英，脫離普國之盟，擁護法國在歐洲的統治地位。此後，拿破崙又垂手而得西班牙，封其兄約瑟爲西班牙王。自一八〇七年到一八一二年，可以說是拿破崙武功鼎盛時代。

現在拿破崙在歐洲的唯一敵人，就是英國了。拿破崙知道自己沒有強大的海軍斷難一舉降服英國，於是又有採取封鎖英國以圍困的辦法。一八〇六年末，拿破崙發出封鎖英國的「柏林命令」，宣佈凡被法國征服過的國家均得與英國斷絕通商關係，違者重懲。同時英國亦採取封鎖法國的政策。結果，因爲法國無強大海軍與商船，自己的工業尚弱，封鎖英國的結果不但不能致禍英國，反而使英國的廉價商品秘密在歐陸行銷，反而英國把法國封鎖住了。英國封鎖法國的結果，却令法國商業遭受莫大危害。一八一〇年，法國紡織工業因缺乏原料之故，大起經濟危機，一切與法國貿易的國家均頻於破產。

拿破崙侵略戰爭的結果，不但把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弄得破產，而且極力在被征服國家施行橫暴與殖民地政策。這樣，就迫使這些國家不能不燃起反拿破崙侵略的烽火，與發動了各國的民族自衞戰爭。一八〇八年首先在西班牙爆發了反法的民族暴動，拿破崙駐在拜稜的軍隊竟被迫投降。接着，普魯士的民族運動亦望風而起。一八一〇年，英奧諸國組成第五次的對法同盟，這時法國封鎖英國的政策，已毫無效力。一八一一年俄國地主苦於不能把原料運輸到歐洲，迫使俄政府自動背棄爾西特條約，這就引起拿破崙的大怒。一八一二年拿破崙親率六十一萬大軍，大舉侵俄，並深入到俄都——莫斯科。當時俄國以誘敵深入乘懺殲滅的戰略，使拿破崙軍在飢寒交迫之下，不能不放棄莫斯科而走。正在他退走之際，俄軍乘勢追擊，民衆游擊隊沿途截擊，結果六十一萬大軍只剩下幾千人逃出俄境。拿破崙大敗之後，軍力銳減，而許多被征服國家羣起反法。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已成強弩之末，無力與歐陸爲敵矣。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聯軍攻陷巴黎。四月一日，上院罷免拿破崙職，五月三日路易十八帶着同盟軍凱旋巴黎，他在同盟國幫助之下卽法國皇帝位，這就開始了所謂法國「合法帝制」時代。嚇嚇一世的拿破崙及

其第一帝國從此完結。

★　★　★

總結這個時期說來：

法國資產階級，藉助於一切反動勢力，推翻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專政之後，而重新獲得了自己的統治——實際上只是大資產階級與投機家的統治。它們恐懼革命，恐懼民衆的結果，縱使拿破崙取得政權，靠武力來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拿破崙在資產階級的寵幸與農民的崇拜之下，就不惜假乎武力坐登皇位，對內則施行階級的壓迫，對外則轉變爲民族侵略，然終不免於一敗。拿破崙的失敗，不僅是拿破崙主義的破產，而且是資產階級的希望與政策的失敗。拿破崙可以愚弄農民，彷彿他是農民的救星，然而農民則因戰爭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大部破產，結果農民離異拿破崙。拿破崙欺騙工人，彷彿他是代表勞資雙方的利益，然而，工人則因資本家的剝削日益貧困，結果，工人也怨恨拿破崙。拿破崙得到資產階級的擁護，彷彿他可以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永垂不朽，然而，事實上，國內階級對抗並未消除，工人正在醒覺與發展中；而對付侵略反而引起了國內經濟的大破壞，結果，資產階級也不如從前那樣的擁戴拿破崙。拿破崙崇拜侵略，彷彿大砲可以壓倒一切，弱小民族都可以成爲他俎上之肉，然而，事實上，侵略戰爭招致了一切被侵略民族的反對，並大舉聯合，而終於使侵略者一敗塗地。拿破崙既已完成他的歷史使命，鞏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確定了資產階級統治原則，事到結局：資產階級不要他，廣大農民怨恨他，工人嫉視他，許多國家也要反抗他，最後，除了少數的老兵油子之外，國內失掉了任何階級的擁護，國外招致了四方八面的仇敵，於是拿破崙不能不失敗了。拿破崙的失敗，是法國資產階級希

望的最終擋璧，是他們的侵略政策的破產。另一方面，拿破崙的失敗又是歐洲反動勢力的勝利，正在這一反動歐洲的高壓之下孕育起十九世紀歐陸革命的高潮。

簡短的結論

法國大革命，在近代世界革命史上，是具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由於法國社會經濟政治的特點（卽國內的封建制度統治之森嚴，農民與廣大民衆所受壓迫之奇重，又加上封建反動歐洲之干涉），使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樣雄偉，那樣尖銳，那樣廣泛與深刻。正如恩格斯所說「第一次實行鬥爭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完全勝利」。法國大革命的意義就是：

第一，澈底肅淸了封建制度廓淸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途徑。無論是十七世紀英國革命，或無論是十九世紀德國革命，都沒有像法國這樣痛快淋漓的把封建制度打得粉碎，也正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說：

「……但貴族的與地方的特權，城市的與行會的壟斷以及各省的法規——一切這些中世紀的廢物，阻止了它（指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陳舊的骯髒的東西一掃而盡，並爲現代的國家建築廓淸了社會的基礎。」

第二，動搖與破壞了當時封建歐陸的社會基礎，自法國大革命的號砲發響之後，尤其是路易十六被殺之時，就已經把反動的歐洲震撼得難於站脚，加之法國的自衞戰爭更直接把革命的義旗，傳播到封建國家的屋頂之上，弄得反動歐洲，不能大舉聯盟反對法國並竭力防範國內的革命，雖然爾後的拿破崙，

把戰爭變爲侵略戰已失革命的意義，然而法國革命給了歐洲國家革命以強力的推動，使十九世紀以來歐陸均捲入革命的漩渦中，封建制度不但不能在法國存在，而且在歐陸各國也不得不加速崩潰下去。

列寧說道：

「整個十九世紀人類文明的全部發展都是肇源於法國大革命，而且它是要負其責任的。」（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八九頁）

第三，把反封建壓迫與反民族壓迫合流的鬥爭都幹到了盡頭。法國大革命把這一物兩面的事業，都用革命與戰爭給以解決。只有這樣，才能使法國一方面從封建泥坑中跳起來；另一方面又從反動的歐洲中保衞了自己，不如此，則不能完成當時處在內憂外患交至沓來中的革命。

因此，馬克思、列寧都認爲法國大革命是完成了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之最澈底最偉大的革命。

法國大革命不是一次勝利的，而是經過長期的迂迴道路，是把「向上線」推到盡頭而歸於完成的勝利。所謂向上線的盡頭就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時期。沒有這個時期，法國大革命無論如何不會有這大的勝利，至多亦不過是英國革命的重演而已。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專政，就是法國革命最重大的特點。

它之所以能夠發展到這種程度，我們可以從當時法國大革命中的階級關係的特點上來了解它。這個特點，就是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序文中所說的：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中歷史上的階級鬥爭較之其他各國都要澈底些，每一次鬥爭都達到了決絕的終點。這個階級鬥爭所由進展以及它的結果所由表現以變化不居的政治形式，也是法國表

現得最爲特色。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以後，它是一個純粹的等級的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的時候，法國撲滅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的統治，此種統治所具有的標本式的明顯性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及。」

現在來說一說法國大革命中決絕的階級鬥爭吧：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一般說來，是革命的，而且是站在運動前面領導的階級，直到基倫特派離開革命前爲止。英國資產階級雖然在共和國成立之前也是如法國資產階級相彷，但鬥爭之堅強還不及法國資產階級。至於十九世紀的德國資產階級，剛在革命開始就退縮了。而二十世紀的俄國資產階級還在革命未爆發之前就動搖了。法國資產階級之有如此特點，正由於當時法國還沒有無產階級眞正威脅它，而反動勢力之可惡至極，迫使法國資產階級不能不如此幹去。然而到資產階級一般的取得政權之後，自然它的革命性就完全結束了。法國當時雖無獨立的無產階級，但是已經有着富於革命性的城市工人與勞苦羣衆。他們要從壓迫中找出路，又在革命中長大了自己的力量；所以，雖然在資產階級叛離革命之後，革命並不因之流產（如同十七世紀復辟的英國一樣），恰恰相反，這般民衆在甲可賓派領導之下，不但能承繼革命，深入革命，而且還把革命放在同時反資產階級的旗幟之下 當時法國革命，外有反動歐洲之環攻，內有封建貴族之搗亂，又加上資產階級之叛賣；處在這樣局勢之下，自然要革命就非澈底下去不可，而且非有革命的民主專政不可，只有這種革命的專政才能把法國革命堅持到盡頭。雖然它是失敗了，但它担負着全部法國大革命的光榮，用工農民主大衆的力量，用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政權，用反資產階級的手段去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所不能完成的事業；這是法國階級關係的

重大特點，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特點。

農民在法國革命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把解除封建壓迫與解決土地問題作爲自己鬥爭的目標，一直到完全達到目的爲止。但是農民在資產階級社會原則之下，達到這一目的之後，就不能不趨入保守（主要是比較富裕的農民），這使他原先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結果又走到去擁護拿破崙，爲拿破崙專政的後備軍，一直到自己認淸了拿破崙使他們破產之後，又終於離開了拿破崙，成爲拿破崙帝制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小資產階級專政被內外敵人打敗之後，接着而來的是反動的大資產階級統治。爲了完全鞏固資產階級的利益與發展資產階級的社會原則，在鎭壓了民衆與民主勢力之後，資產階級自然一致擁戴拿破崙的軍事獨裁，而拿破崙却在資產階級、保守農民與其武力的憑藉之下，索性登上王位。可是，拿破崙的作用用盡之後，不但資產階級不需要他，而且拿破崙的結局反而致資產階級蒙受不利時，自然資產階級也難得要這個寶貝了。而外國敵人也非剷除他不可，國內民衆，更不必說是怨聲載道了，這就使拿破崙不得不失敗，職革身擒，只好作孤島之囚了。

法國大革命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

一，它告訴我們：資產階級革命愈進行得徹底，則愈是替資本主義開闢自由發展的道路，則資產階級的統治愈是成爲可能，但同時也替無產階級開闢一個自由發展的大道。無產階級的發展與強大只有在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之中，這一革命愈徹底愈深入，亦即封建的民族的障礙掃淸得愈完善，愈乾淨，則對於無產階級的發展、強大及其爲社會主義而鬥爭愈加有利。

二，它告訴我們：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革命。資產階級可以開始來領導革命，亦可以來爲自己利益而鬥爭。但是，資產階級至多能夠走到自己取得統治，過了這個限度，就不能再進了。換句話說，資產階級不能爲澈底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而鬥爭。反之，無產階級勞動民衆，可以在這革命開始，被資產階級發動，受資產階級領導，但是，鬥爭的過程迅速的醒覺與組織了下層民衆，使他們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奮鬥時，必然更深入這個革命。換句話說，他們能夠澈底去進行這個革命，無產階級勞動民衆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堅力量，沒有他們參加，革命不可能發展，沒有他們的堅持，甚至走到統治地位，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澈底勝利。

三，它告訴我們：農民——特別是佔人口大多數國家的農民，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有着重大的革命作用，而且有舉足輕重之勢。固然由於他們社會經濟地位使他不可能去領導其他階級，反之，還須要其他先進階級去領導他。農民是其他成爲領導階級的後備軍，法國農民是當時法國資產階級的後備軍，他幫助了資產階級勝利。以後農民成了拿破崙的後備軍，他又幫助了拿破崙勝利。如果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也就必須要聯合農民，如果民族革命要取得勝利，更得要發動農民，這是法國革命所給予我們的真理。

四，它告訴我們：革命中對於反動敵人決不可寬容，必須澈底肅清之。無論他如何潰敗，但在他們的勢力尚未完全消滅之前，它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戰鬥陣地與復辟企圖的。如果路易十六不送到斷頭台上，特別是如果甲可賓派不堅決採取對反革命的恐怖手段，法國革命無論如何是不能順利進行，對內對外的革命戰爭也是難於勝利的。

五，最後它告訴我們：法國革命的成功是成功於長期的艱苦鬥爭，成功於持久的革命戰爭，當時法國革命所處的困難困苦眞非言語所能形容：內有貴族地主以至反動資產階級之勾敵作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州縣被他們盤據），外有一切歐洲列強之四方八面的搖旗進攻，物質、糧食、武器、彈藥之困難到了萬分，然而終能克服一切困難轉敗而爲勝。其致勝之道無他：革命人民的精誠團結，政黨之正確領導，政權之澈底進化，民主權利之普遍施行，民衆力量之竭力運用，民衆生活之亟求維持，軍隊之澈底革新。總之，在一切服從革命戰爭的最高原則之下，全國上下抱抗戰必勝革命必成之決志，而勇往前進，百折不回；這樣就能夠達到反封建壓迫與反民族壓迫之最後勝利。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教訓了我們。

第三章　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的勞動運動

本章研究提要　自從十八世紀末期英國產業革命之後，新興的工業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末特別在十九世紀初期，不僅在最先進的英國已經大踏步的發展起來，並且，在經過了大革命之後的法國，由於封建殘餘之被掃除，自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年代，亦繼而走上了工業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大道。英法資本主義的發展，接着又刺激到當時尚稱落後的封建統治的德國，使德國內部正在成長的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起，亦繼英法之後，而要求向前發展。因此，十九世紀的開端，也就是西歐大工業發展時代的開始。

大工業發達的結果，不僅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地位愈益加強起來；同樣，無產階級亦隨大工業的發展而獨立的形成起來。無產階級從無產羣衆中分化出來，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獨立的階級。隨着產業的發展，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日益增大起來，而且他們被集合爲許多較大的人羣，在力量上也增大起來。同時，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工人的生活狀況之愈益惡化，使工人們反對直接剝削他們的資產階級的鬥爭，由個別的部分的零星的鬥爭而進到階級的比較有組織的鬥爭，不僅反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反對資本主義生產工具本身，不僅作經濟的鬥爭，並且進到作政治的鬥爭。「無產階級經過了各個發展的階段，他的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他的生存同時開始的。」（「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在政治鬥爭中，不僅追隨資產階級去反對「敵人的敵人」，而且從一八三一年起，無產階級開始學會了用

資產階級傳授給他的武器，來獨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甚至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開始佔取這些國家——指英國、法國——的歷史首位」。

恩格斯說：「一八三一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的暴動，在一八三八——一八四二年間，第一次全國的勞動運動，英國的憲章運動達到了它的頂點。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裏，一方面隨着大工業發展的程度，他方面隨着資產階級發展其不久以前所獲得的政治統治權之程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開始佔取這些國家的歷史首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正由於無產階級的形成，無產階級獨立運動的開始，這種特徵，就構成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西歐革命運動中的階級關係，發生新的變化，無產階級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中一個獨立參加的階級力量，而且是眞正推動歷史前進的並負着解放全社會使命的眞正革命的階級。並且法國工人自一八三〇年起，英國工人自一八三八年起，德國工人自一八四四年起，「已經得到了遠比那些有產者，甚至比那些共和黨所設想爲多的政治獨立性。」（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序言）。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在當時及以後民主革命運動中，不但使資產階級畏首畏尾，顧前顧後；而且特別在革命一時勝利之後，使資產階級就很迅速的來對付無產階級。昨天的敵人成爲今天的朋友，「最初是他的同盟者不久就成爲他的敵人了。」（同上書）

雖然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紀開始一個時期，資本主義還表現出一種不成熟的狀態，因而階級情況還不十分明朗，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還不曾十分尖銳，由是反映到當時先進國家中（英國法國）出現了許多不成熟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空想的社會主義）。同時由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資產階級

經濟地位日趨惡化之反映而產生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種舊的社會主義，直到四十、五十年代，基於大工業進一步發展，階級鬥爭更加銳利與無產階級力量更加強大的時候，然後才能夠發展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從此以後，社會主義就成爲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的目標，而表現出自己的力量。無產階級只有得到了這種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後，而且意識到去爲這社會主義而鬥爭，他才眞正獲得了解放自身的武器與道路。

研究本章時，應特別注意到十九世紀上半期工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的相互關係，所應了解之問題爲：

㈠工人階級狀況及其構成如何反映到十九世紀前期的勞動運動上？

㈡這時期中，先進國內勞動運動失敗原因何在？

㈢什麼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什麼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㈣空想社會主義如何發展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㈤什麼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

第一節　英國憲章運動

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工人運動　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生產方式，在英國發生最早，所以工人階級的形成及工人運動在英國也比在任何一個國家發生的早。

遠在英國產業革命之前，英國工人已經開始爲改良生活而從事鬥爭，不過那時的鬥爭還帶着原始的

等星的無組織的形態。十八世紀下半期，特別是十八世紀末期，英國的瓦特、亞克萊以特、卡特萊以特及其他諸人，給了產業革命以最初的發動。到十九世紀初葉，技術上又大加前進，瓦特的改良蒸汽機之運用於交通方面，完成了汽船（一八一二）與鐵道（一八二五）的建設，這樣替資本主義開闢了一個巨大發展的時代。從下面材料中，就可以看出英國大工業自十九世紀開始，特別是三十四十年代以後巨大發展的狀況。

煤產量（千噸）：

年份	產量
一七七〇年	二、六一二
一八〇〇年	一一、六〇〇
一八二六年	二一、六〇〇
一八三六年	三〇、〇〇〇
一八四六年	四四、〇〇〇

棉花產量（噸）：

年份	產量
一七八五年	一八、四〇〇、三八四
一八〇〇年	五六、〇一〇、七三二
一八二五年	二二八、〇〇五、一二九
一八三五年	三六三、七〇二、九六三
一八四五年	七二一、九七九、九五三

銑鐵產量（噸）：

年份	產量
一七八八年	六一、三〇〇
一八〇六年	二五八、二〇六
一八二五年	七〇三、一八四
一八三九年	一、三四七、三九〇

英國工人階級究竟怎樣產生的呢？他的狀況如何呢？

「英國的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從前世紀（十八世紀）的後半期中，因蒸汽機的發明與機器的應用於棉

織業而開始的」。（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機器引起了產業革命，機器組成了無產階級；並且『機器變成了資本家對於工人階級作戰的最有利的武器』。（馬克思）機器技術的發達，資本家財富的激劇增加，這是與無產階級生活的激劇惡化成正比例的。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英國參加反法蘭西的戰爭，更加促成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十九世紀初葉起，英國農民已極大部分化為無產階級，家庭工業為機器所壓倒，幾百萬的手工工人流為無產者，他們在飢餓線上掙扎，唯一出路是到工廠去作工。可是，工廠的機器生產之日益簡單化，大批在業的成年工人被排斥到街頭，而引進許多女工、童工來代替。這樣，使失業的工人增加，在工場中充滿了在極惡劣條件下作工的婦孺與工人，兒童自六歲起就被工廠僱用，工作日一般為十二到十六小時，成年人工作時間更長，夜工制是流行着。不僅如此，英國工廠中還盛行所謂工廠法，『工廠主人在工廠中是絕對的立法者』。（恩格斯）此外還有罰金，以貨酬工制，工人監牢等。由此，可知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怎樣的惡化，資本家中間日益增漲的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危機，更加加速這一過程，使無產階級的生活愈加沒有保證。因為這種勞動條件，以致勞動力不是大批拋棄，就是早期喪失，工人死亡率，特別是兒童死亡率日益增大，無產階級精力上的頹廢，大批乞丐流民的出現，犯罪人數也與日俱增，一八一五到一八二五年這十年中間竟增加四倍。

恩格斯在敍述『英國工人狀況』一文中說道：

『無論如何，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實上，是資產階級的奴隸。……現代奴隸制與古代奴隸制完全不同之點，只是：現在的工人好像是自由的，因為他不是一次出賣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出賣的，每週、每月、每年出賣的。……因為他不是單個的奴隸，而是全資產階級的奴隸，這在根本上對他是一

樣的、這種僞自由，雖則在一方面也還給他（指工人）以幾分真正自由，然在另一方面，他也有不利之處，就是沒有人保險他的生活費用。當資產階級對於他的工作，對於他的生存不復獲利的時候，他便可以時時刻刻被他的主人——資產階級——拋棄以至於飢餓而死。」

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既然如此，工人們的利益與資本家的利益既處於如此對立的地位，工人們爲了改善自己不堪設想的惡劣生活，他們的眼睛就一天天的看清自己直接的敵人而與之鬥爭。「最初各個工人，然後一個工廠的工人們，然後一個地方同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們，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各個有產者作鬥爭」。（「共產黨宣言」）然而這種工人鬥爭的原始形態，首先是「行竊」，恩格斯講：「這種反抗，起初最粗笨的和最無結果的形態爲犯罪。工人生活於艱難困苦之中，他眼見別人比他自己的境況好些，他在社會上又比那些富有財產的懶惰的人做得多些，他的理解力不能使他們明白：爲什麼他活活要在這樣狀況之下受苦，此外窮困致勝了那傳襲下來的對財產的尊重心——於是他們行竊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其次，是「打機器」，所謂「反對生產工具本身」，工人反對機器的事，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就相當盛行，甚至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有所謂「破壞機器的運動」。破壞機器的人並組成一種秘密團體，名爲「拉德底黨」，政府曾嚴行緝拿，但這種舉動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停止。恩格斯繼續講道：

「可是，工人們旋即看出，這種舉動是不濟於事的（指行竊而言），行竊尤爲抗議中最不高明和最無覺悟的形態。因此工人們的公意，雖或對這種行竊加以默認，然這種行爲決不能成爲他們輿論一般的表現。工人階級以暴力抵制機器引入工業中，這是他們第一次反抗資產階級，像工業運動

方開始出現的一樣。……就是這種反抗，也是零星的，限於一定地方的，並且只是對於現狀中一個單獨方面發生的。即使這種眼前的目的達到了，然而社會勢力以全力加諸那些手無寸鐵的犯法者，並隨意加以鞭笞，同時機器仍然是被引入了，於是大家必須找出另一種鬥爭的新形態，以便從事反抗。」

什麼是工人鬥爭的新形態呢？這就是較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開始。本來英國的職工組合早就出現於十七世紀末年，但是那時只是一部分很少數的熟練工人，尤其是毛織業工人，主要還是帶地方性質。可是這也就威脅到資產階級與政府，使政府不能不於一七九九——一八〇〇年頒佈禁止工人組織的法律。然而，大工業的發展，工人數量之增加，並且工人日益聚集起來，於是，他們在鬥爭中愈加感覺有互相聯合與組織起來之必要。「各個工人與各個有產者中間的衝突越發帶上兩個階級間衝突底性質，工人們就開始形成聯合來和有產者作鬥爭。他們團結起來，來維持他們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較長時期的團體，保證在發生可能的抗爭之際可以有所支持」。（「共產黨宣言」）並且由於階級鬥爭的發展，工人們更加感覺到保護自己的聯合與組織甚至比保護工資更加必要。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著作的「哲學之貧困」上說道：

「大工業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競爭把他們的利益分裂起來；可是，保護工資這一點，這一個共同對付僱主的共同觀點，把他們統一起來。……這種聯合，起初是孤立的，後來却形成許多團體。於是工人們保護自己的聯合而反對經常聯合着的資本，在他們看來，比保護工資更加必要了。……在這個鬥爭——眞正的國內戰爭——當中，各種分子都聯合起來和發展起來。

以準備將來的戰鬥，一到這種程度，這種聯合就帶有政治性質了。」

由於工人階級鬥爭之趨於有組織化而愈益變爲有力，就迫使英國國會不能不於一八二四年廢除禁止工人結社之法令，從此工人運動亦比較進於合法。一八二九年工業勃興之際，那時工人們在歐文等人的影響之下，已極力鼓吹組織全國總工會以代替從前地方的狹隘的工會形式，首先全英國紡織工人聯合組成了『全國紡織總工會』，這就是大規模的職工組合的先聲。其後各業工人亦羣起效尤。有二十多種職業工人團體都成爲全國的組織，一八三四年，開各種工會的代表大會於倫敦，創立了『全英總工會』，這是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英國職工聯合組織的最初嘗試。雖然在一八三四年末，這一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可是它在工人運動史上具有偉大意義。

一八二五——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改革運動　工人的階級鬥爭，不但不是與國內的一般民主政治運動脫離，而且是一般民主政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與推動者，這在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始時就可以證明之。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年代英國選舉改革運動，固然是英國自由資產階級發動的，可是，英國工人階級積極的參加了這次的民主運動，成爲其中一種巨大的社會階級力量。英國工人階級（以至於全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以一個階級的獨立面目參加到本國的民主的政治改革運動，這是第一次。

一八二五年——一八三二年（或者說還早自一八一五年起）的選舉改革運動怎樣發生的呢？

我們從本節開始的敍述中，就可以知道：英國自產業革命之後，英國社會經濟狀況已經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大工業的發展特別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至爲顯著，因而在國內階級關係上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是說『產業革命的最初發動，使經濟力量的重心完全轉移。資產階級的財富，比貴族的財富

無比的增加得更快；在資產階級內部，金融貴族銀行家等也被工廠製造家推於次要地位上去了」。（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序言）

這個時期，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地位上的力量既如此增加，可是，當時英國政治權力還主要握在地主貴族與極少數的大資產階級貴族手中。他們把持國會，以自己的私見及利益去管理國家；一般的工業資產階級在國會中幾乎沒有自己的代表。舊日標準極嚴的選舉法，使這般資產階級失掉了自己的選舉權，例如許多新發展的工業城市，居民數目達十萬以至數十萬，但沒有權去選派代表到國會中去（如曼徹斯特、伯明罕、里茲……），一八二一年倫敦有居民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人，但在國會中僅有四個代表。在另一方面，幾個舊的農業區，其在國會的代表却非常之多，例如三十個老的「腐爛城區」，總共居民不過三百七十五人，竟有六十個代表，差不多每六個人選舉一個代表。此外國會在經濟政策上亦施行不利於資產階級的法令，一八一五年因對法戰爭終結所施行之「穀物條例」（規定穀物極高的價格，在國內農產價格漲到這一規定價格之上時，才能由國外輸入穀物），不但因操縱穀物之地主大獲其利，而且，因穀價高漲，工資須增，而大不利於資產階級。

因此，英國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不管他們中間如何善於妥協，這時，又提升到緊張階段上來了。資產階級反地主貴族的鬥爭又燃燒起來了。「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即在以後根據資產階級利益而作了部分的修正，也已不能適合雙方力量的對比了。參加妥協的雙方的性質，也已改變：一八三〇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世紀（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有巨大的差別，政治權力還在貴族手中，貴族使用這種權力，來抵抗工業資產階級之新的意圖，這種權力情況，已經與新的經濟利益不能並存了，因之反對貴

族的鬥爭，不得不恢復起來。」（同上書）

資產階級反對當權貴族的鬥爭，是只在改良選舉的口號之下進行的。因爲英國十七世紀革命的經驗，特別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苦味」，加之這時本國工人運動之進展，使這時的英國資產階級不可能再來一次「一六六二——一六六九年」的革命鬥爭；羣衆力量的威脅 至多只能使他做到這樣一個和平的改革而已，多一點的本事，他不可能的做出來。可是，歷史證明，雖然是一個改革選舉運動，但是沒有羣衆參加，政治上軟弱的資產階級，也就沒有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又迫使後者不能不在全國大肆鼓吹，而求助於民衆。當時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固然爲之奔走，即工人羣衆，也積極的參加了這一運動，他們希望政治改良的結果，或者可以改良一點自己的經濟地位，這樣，資產階級所發動的選舉改革運動就爆發了。

當時國會中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反對代表地主階級的保守黨，而激進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所組織的急進黨，成爲改革運動的前衛。至於工人階級「則在要求『國會的改革』的鼓動中，工人就已成爲改革黨中激進的一翼」。（「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運動的中心則在工業區之曼徹斯特。

過去曾在一八一九年夏季，曼徹斯特的八萬人的國民大會上，爲要求改革國會，引起民衆與軍警的衝突，死傷六百餘人，在其他工業區域也陸續有這樣的集會，雖然沒有結果，但至少也看出，在這些集會中，活動最積極的，是跟隨資產階級作改革國會運動的無產階級。

鬥爭繼續數年，資產階級提出的改革國會案不知多少，但每次提案都被上院或下院否決。

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發生革命，這次鬥爭特別厲害，影響到當時爲保守黨和地主貴族所操縱的英國政府，不得不很聰明的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然，或者也難免一次大的流血的革命。

一八三二年，鬥爭終歸工業資產階級勝利。國會卒不得不採取資產階級代表所提出的議案，實行國會的改革。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撤廢了五十六處「腐爛的選舉區」，在新工業中心及農業地帶，增關選舉區六十六處。愛爾蘭及蘇格蘭亦得到少數之選舉區。城市中規定了同等納稅資格，凡有產業或租有房屋年須十鎊以上者，均有選舉權。資產階級是勝利了，但是成爲政治鬥爭中重大力量的無產階級呢？依然是沒有選舉權。

不僅如此，新國會還把從前反對工人階級的不公正的法律宣佈爲神聖不可侵犯，並否認一切改善工人生活的提議（如規定工作時間，禁止童工女工……）。這還不夠，一八三四年國會還通過了有名的「貧民律」，將以前對於貧民的補助一律取消，在教堂前建立一間工作所，把有勞動力而需要補助的貧民，放在極苛刻的條件下作工，當時工人們均稱之爲「窮人的巴士提獄」。

恩格斯說：

「這種鬥爭的結果，只有使新的經濟力量獲得勝利，「國會的改革」，就不顧一切反對而被通過了，這使資產階級能在國會中取得公認的強大的地位。」

憲章運動的發生發展與結局　選舉改革的結果，雖然是資產階級勝利，工人階級一時失敗，但是，工人們在鬥爭中的政治覺悟與組織力量是更加提高了，他們在一八二五——一八三二年的鬥爭中，開始感覺到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無論在經濟的與政治的地位上都有一條不能通過的鴻溝，全部議會

的政治鬥爭，只是使自己失望。一八三二——一八三五年，工人中造成一種反議會的與工團主義的傾向，放棄政治鬥爭，專事經濟活動。這時雖曾發生很多的經濟鬥爭，尤其是成立了許多工人組織以至全國性的工會等，但其結果，這種純經濟鬥爭，還是失敗。

一八三六年的經濟恐慌，更加惡化了工人的生活地位，於是工人運動又高漲起來。這時，他們體會了過去的經驗，以為專做議會的政治行動，固然達不到自己的目的，而從事純粹經濟的鬥爭也是無濟於事，於是工人們逐漸感覺到，要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必須從事政治鬥爭；而從事政治鬥爭，亦必須有工人們獨立的要求與發動。這樣就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是工人階級第一個獨立的政治運動。」（恩格斯）

一八三六年六月在倫敦建立了一個工人組織——倫敦工人協會，協會的首領為歐文的門徒洛威特。一八三七年初，協會決定開始為選舉運動並致請願書於國會。此請願書即所謂「特許憲章」，其根本內容共六點：（一）凡成年男子，皆有普選權；（二）廢除以財產為根據之選舉制；（三）國會以一年為期；（四）議員皆有薪俸；（五）祕密投票；（六）選舉區域平均分派。

這一憲章發佈之後，得到全英工人以至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熱烈贊助，為實現這一憲章而鬥爭的運動，普及全英。運動的中心在英國中部則為工業中心之北明翰，該地組織了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同盟」，以銀行家阿特屋（Atwood）為首領；而主要的大本營在英國北部工業區域則為朗卡瑟，約克，該地組織有「北部大同盟」，其領袖為鄂康諾（O'counor）。自一八三八年起開始了各地的簽名運動：為要使憲章成為全國人民的請願書，在曼徹斯特附近參加擁護憲章的民衆大會者約三十萬人，在

里茲一帶，約二十五萬人。許多地方，白天開大會，晚上火炬遊行。遊行者的旗幟上寫道『勿忘彼德羅流血慘案』（即一八一九年曼徹斯特慘殺案），『為妻女老幼，我們應當奮鬥到底』，『賣衣服買刀劍』，在英國北部，工人們與軍警時起武裝衝突；可是工人們勇往向前仍在各地舉行會議，並在這些集會中，選出了『勞動階級之國民會議』的臨時議員，以備憲章提交國會而被否決時採取適當政策。

憲章運動第一時期——雖然主要分子是工人，但亦包含有其他的階級參加，即在工人階級中亦包含有不同的成分，因而在政治上表現其中的不一致性。一八三九年二月四日，在倫敦舉行的『國民議會』上，就可以看出憲章派內部的各種不同的派別與政治傾向：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溫和派，即北明罕派，他們與倫敦協會的貴族工人接近，他們只希望站在資產階級法律範圍之內，施以和平的小小的改革，勸服統治階級相信社會主義勝於資本主義之後，就可以和平的漸進的走向社會主義（在歐文主義影響下的）。至於代表無產階級的政派中，一種是鄂康諾派，主張用堅決的革命鬥爭，不過他的理想只是工人分受土地變為小有產者；另一派為奧得頓恩派，他主張『土地公有』，『同工同酬』；至於這派中間最左的一派為哈尼派，內中多半為主張堅決鬥爭的工人，他們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禁止兒童勞動，廢除貧民律，制定工會法，出版自由，達到消滅不平等，建立共同幸福。此外，還有深表同情的個人，如牧師斯提芬茲等，他說：『普選問題就是刀與叉的問題，如果有人問我普選權表示什麼？我的回答是：普選權表示每個工人有權可以穿好衣服，住好房子，桌上有好飯菜，做工不妨害健康，工資可以安穩度日，這都是每個人有權去要的』；但是他又提出保守的政綱，要對教會及國王忠誠，復興『舊英吉利』。此外，在選出的『國民會議』中，還有少數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屬於溫和派，因會議中革命派佔優勢，於是這般

資產階級代表不得不在運動的開始時期就退出去了。

憲章運動就在這時已遭到資產階級之大肆反對，「國民會議」由倫敦遷住北明罕，政府的壓迫、禁止與逮捕，日有所聞，於是勞動羣衆即在北明罕及威爾士舉行暴動，暴動者搗毀資產階級住宅，並擬刼憲章派出獄。但暴動很快失敗，其首領福洛特斯、威廉、蔣司均被處絞刑。一八三九年六月，請願書送交國會，其中簽名勞動者達一百五十萬人，這個請願書，亦遭國會拒絕，政府的恐怖手段，使憲章運動遭受了失敗，「國民會議」亦被解散，這樣結束了憲章運動第一時期。

憲章運動第二期——是隨着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二年之激烈經濟恐慌而起的。自一八四〇年末起，數萬勞動者失去工作，在業者的工資減到百分之五十五；適年遭歉收，飢荒逼到，於是又引起憲章運動之復活。這時四分五裂的憲章派諸團體，復聯合成爲「全國憲章黨協會」。協會規定有章程：有中央及地方統一的委員會，有經常的大會，與會員必須繳納會費，以鄂康諾爲其指導者。協會仍堅持第一次運動中之六大原則，發出一篇詞調更強的請願書，其中把資產階級的豪富與無產階級的赤貧相對立，並具體提出十小時工作日，廢止貧民律，改善工廠法等要求。這次運動達到極高點，工業的北部及農業的南部，均聞風響應。一八四二年五月二日，署名者達三百萬人之請願書，又如第一次一樣，遭國會大多數之反對而歸於失敗。

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六年爲第二次運動低潮時期。這時英國工業開始復興，罷工運動漸次低落，工人生活稍有改善，，而對憲章運動冷淡。現在他們的希望又趨於經濟鬥爭方面，英國資產階級正善於乘此來軟化工人羣衆，使之脫離政治革命，於是這時帶改良主義的合作運動發展起來。同時，國會又在工人

羣衆運動威逼之下，並企圖緩和今後工人的鬥爭，於是規定了紡織工業的女工、童工之十小時工作日制，實際上這一法令也用到成年男工身上。

憲章運動第三時期——即最後的一個時期，它是從一八四七年的新經濟恐慌而再起。是年冬季勞動者已有動亂發生，及至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消息傳來，騷亂益烈。一八四八年四月四日舉行於倫敦之憲章黨的全國會議，決定四月十四日舉行大示威運動，同時，向國會呈遞第三次請願書。但是政府立刻出以雄厚軍隊，使示威運動並未成功，一百七十萬人署名之請願書，由鄂康諾遞呈上去，而這次請願書竟爲陰謀者所利用，大部署名者均爲陰謀破壞憲章黨的敵人，他們的目的在利用這請願書來推翻國民議會。所以一八四九年國會討論時，幾乎大部議員投票反對，這樣憲章運動遂最後歸於失敗。

對憲章運動的正確認識 憲章運動經過了十餘年的鬥爭而終於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一）爲參加運動的派別過於複雜，並缺乏明確的經濟政綱與健全的組織力量，他們對於急求改造物質生活而熱烈參加運動的勞動羣衆的要求，不會滿足，而他們提出的，幾乎完全是期望國會的政治要求，他們以爲一登國會，便可解決一切，他們所採取的鬥爭方法是唯一和平的鬥爭方法；在資產階級坐攬大權之下，他們只是希望國會中的財翁們大發慈悲，來滿足工人階級的經濟與政治要求，這自然是徒勞無益的啊！（二）主要的，還是在客觀上，由於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尚不充分，資本主義正在向上發展，使資產階級去與地主聯合，有其充分力量，可以撲滅這一運動；反之，無產階級的政治與組織力量，尚不足以保障這一運動在適當的政綱策略下進於勝利。（三）「英國資產階級究竟不失爲生意上的人，他們比德國教授看得更遠，他們只是在環境壓迫之下，才分若干權利給工人階級。」（同上書第三九頁），這樣來

軟化與分裂鬥爭的羣衆。英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對於統治者本身說來，到底也收到了他的一時的某些效果。

雖然如此，英國憲章運動在無產階級運動史上，是『具有它偉大的全世界的歷史意義』。（列寧在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

第一，『它是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多少發展的形式，現在這些運動（指法國人、德國人中間的共產主義與英國人中間的憲章主義）代表現代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反對統治階級——資產階級——之下不可免的歷史鬥爭中或多或少發展的鬥爭形式，可是這種鬥爭形式是有別於一切從前階級鬥爭的，就是說，現在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把全社會從階級的分野中，亦即階級鬥爭中解放出來，則無產階級本身的解放是不可能達到的。』（俄文版『馬克思選集』）

第二，它不僅是無產階級第一次獨立政治運動，而且組成了近代第一個工人的政黨，『當一八三二年，國會改革，仍不許工人有選舉權時，工人就提出他們的要求於「人民憲章」之中，並且自己組織起來成爲獨立的政黨——憲章黨，以與反穀物條例的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同盟相對抗，這是近代第一個工人的政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第三，它迫使爾後英國資產階級不能不向工人階級作必要的讓步，『英國的資產者……他們在憲章運動幾個年頭中，認識了「壯健而頑強的小傢伙」（即平民）能夠做出什麼來，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就被迫不得不接受「人民憲章」中極大部分的要求，而使之成爲法律。』（同上書）

第四，它規定了英國資產階級最後勝利的界限，『國會的改革，……穀物條例的廢除，這是資產階

級最大的勝利，但這一次勝利，又是專爲資產階級本身利益的最後一次勝利；以後各次的勝利，資產階級就不得不與新的社會力量分佔利益，這社會力量，最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即成爲它的敵人了。』（同上書）

然而必須指出，正因爲英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誘惑，與夫英國當時不成熟社會主義之浸淘，使憲章運動時代的英國工人階級當其以獨立政治面目第一次出現於政治舞台時，就『受着資產階級傳統的束縛』，把和平的議會鬥爭當成唯一的鬥爭方法，『工人階級向前運動是用緩和而受節制的步伐前進着』，（同上書）這也就很深遠的種下了英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的流毒，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在六七十年代許多通訊中說道：『英國無產階級如何消失「革命毅力」』。（『馬恩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二四頁）『英國工人運動如何缺乏憲章運動參加人的熱情』，（第三卷第三〇五頁），就到後來，甚至今天，都可看出他們這種病結所在。然而恩氏最後也說得很正確：

『但讓他們不要忘記：英國工人階級是保存着英國民族性的最好的方面，在英國所爭取的每一個進步，普通是永遠不會白白失掉的，如果憲章黨工人的兒子，因爲上述原因，還不能表現得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那末，他們的子孫是一定不會沒辱他們的祖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第二節　法國七月革命

一八一四——一八三〇年法國的復辟時代　一八一四年，叱咤一世的拿破崙失敗與退職後，歐洲遂轉入專制主義的反動時期。一八一四年，在戰勝國英、俄、普、奧參加之下舉行的維也納會議，其目的

在於：（一）極力掃除法國革命的成果，並使法國孤立而衰弱；（二）重立歐洲均勢，即重新分割歐洲，建立諸列強對歐洲之統治；（三）主要在於保證法國及他國不再發生革命。會議對法國問題之解決，即是：使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恢復法國舊波旁王朝的帝位，交還法國所佔領的他國土地，國境應恢復一七九二年原狀，交出邊防各要塞，賠款七萬萬法郎，留駐法境的十五萬同盟軍在最近七年內，法國應供給軍費。這些條件，都經波旁王朝接受了；此外，會議特別鞏固了英國在戰爭中所獲得的戰利品，承認了它在歐陸的勢力。同時，會議又擴張了奧大利及普魯士的領土，而俄國在歐洲的勢力亦大大增強起來。會議根本違背了民族主義的原則，讓俄、普、奧三國瓜分波蘭，強使比利時屬於荷蘭，德意志則以三十八小國組成德意志聯邦，意大利仍分為若干小國。

當維也納會議將結束之際，歐洲各君主國（主要是俄、普、奧）為俄皇亞力山大第一所發起，而在奧相梅特涅指導之下，締結了所謂「神聖同盟」，同盟之目的，在於以維持專制政體為原則，互相援助，抵抗革命運動與維護歐洲的和平。

這就說明了：歐洲的反動統治，如何對革命心驚胆裂；勝利之後，又如何互相團結以求鎮壓革命。然而，事實證明，不但革命運動難能消滅，就是勝利的列強間的矛盾亦無法緩和下去。所謂維也納會議與神聖同盟，並不能眞正實現自己的目的；可是，這種反動結合，從一八一四年起到一八四八年止，做了歐洲三十多年的反動憲兵，也是事實。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復辟之後，法國內部社會狀况如何呢？

復辟之後，被革命趕走了的王室及貴族都紛紛回國，他們要求恢復舊制，取消革命時的一切改革，

並向新的所有者要求無代價償還自己被沒收的領地，依然回到自己的特權地位。但是，法國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使法國不但不可去恢復舊的制度，並且，由於封建殘餘之剷除，更加增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順利條件，使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已大大提高。因此，路易十八對於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所得到的成果（如大資產階級的民權，轉入新主人的財產……），不得不加以承認，帶着資產階級的拿破崙法典，亦被採用，而君主立憲制度亦於一八一四年八月開始施行。

根據一八一四年憲法，法國設立兩院，上院貴族由國王任命，下院則由有產階級選舉。可是，選舉的財產標準非常之高：凡年齡在三十歲以上，每年納三百法郎以上的直接稅者，然後有選舉權；年齡在四十歲以上，每年納稅過一千法郎者，然後有被選舉權；這樣一來，法國人民能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只能是最少數的大貴族與上層資產階級。總計全國人民中（三千餘萬），有選舉權者不過十萬到十一萬人；而有被選舉權者，不出一萬五千人。這不但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民衆完全被剝奪了民主權利，就是資產階級中的最大部分也摒棄在此民權之外。這就是反動復辟勝利的結果，也就是戰勝諸國懼怕法國再起革命，強迫波旁王朝預先對法國人民所施行的讓步。

這種讓步能否滿足法國人民的要求呢：不能！慢說對下層民衆，就是對一般資產階級也難得滿足了。正是法國政治反動復辟時代，法國資本主義經濟也較前大大發展起來。法蘭西貿易總額，一八一五年為六億二千一百萬法郎，到一八二九年增至十二億二千四百萬法郎，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生鐵產額：一八一一年為九萬九千噸，到一八三〇年增至二十六萬七千噸，即增高了百分之二百七十。煤炭產額：在同期間內，由六十萬噸增到一百七十萬噸。蒸汽機的採用，只是在一八一五年才開始，到了一八

三〇年，法國已有六百二十五家，其中用於紡織業者爲最多。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既如此迅速的發展起來，可是復辟王朝在經濟上的政策，反而是：（一）重行免除土地所有者之直接稅，規定如英國一樣的穀物條例．大有利於地主階級；（二）對鋼鐵及工業原料等徵收高度的關稅，阻止外國製造的金屬品機器輸入法國，而不利於工業資本家。在政治上，雖然政府給與了上層的少數大資產階級參加國會的權利，而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則被摒棄於政權之外。一八三〇年的法國資產階級與一八一四年的資產階亦有着顯著的差別，政治權力主要在皇室貴族手中，他們利用這種權力來抵抗工業資產階級，而這種權力剛剛與新起的經濟利益不能並存；因此，法國資產階級又不能不燃起反對復辟王朝的鬥爭。

同時，由於機器之侵入工業，對勞動者與工匠們亦如英國大工業出現時一樣，造成極痛苦的生活狀態，而復辟王朝的經濟政策，稅務的增加（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間接稅增加了四倍以上），更加加重這一痛苦生活。這樣，全無權利的法國工人階級與勞苦羣衆，亦首先對現時的政權表示不滿。至於小資產階級亦因生活惡化而對政府憤怒，於是在廣大民衆間，組織祕密團體，發生個人的恐怖手段，甚至醞釀着暴動。

政府爲應付這種不滿與革命危機起見，極力取締民衆運動，禁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對唆使暴動者嚴厲懲治。

資產階級迅速利用民衆的發動，作要求改革政權的活動，革命又成爲不可避免了。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 復辟時代法國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在國會中有了它的明顯反映。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基佐爲首），與極端保王黨的鬥爭是向前發展着，這種鬥爭自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身死，査

理士第十繼位後，愈益緊張起來。查理士第十會以十萬萬法郎去賠償喪失土地的亡命貴族，雷厲風行的鎮壓一切不滿意政府的言論與活動，這樣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而資產階級也難於忍耐了。一八二七年國會改選，自由黨與君主立憲黨聯合，佔取了國會中的多數。一八二九年。查理士第十任命亡命貴族波黎納為首相，下院堅持投不信任的票以示反抗。一八三〇年，國會與王權的衝突愈益激烈，查理士第十在極端保王黨的慫恿之下，決意實行一個自上而下的政變，七月，下令解散國會，頒佈新的選舉法，惟繳納一定土地稅者，乃有選舉權，並規定絕對統治出版制。令下之後，全國鼎沸。十一家資產階級的報紙，對王室提出抗議，說道：「現在，新聞記者，須給市民以革命的榜樣」，但大胆印出這種抗議的，只有兩家報紙。法國資產階級，現已失去一七八九年那樣雄壯的氣魄，到這革命臨頭時，已經是表示畏首畏尾了。

但是，巴黎的民衆，却無所顧忌的出現於街頭了。廣大的青年學生們，印刷工人，工廠勞動者，工匠們，都蜂湧而出，羣衆與軍警發生衝突，工人區及其他街衢上，築起了巷戰工事，小店主以至部分的工廠主人也參加，他們對工人宣稱，「對王室作戰，就不作工也發給工資」，有部分的軍隊也投入到民衆方面。經過了三天的巷戰之後，暴動者終於佔領了推勒里王宮，暴動終於勝利，查理士第十逃走，波旁王朝顛覆，民衆死傷者達六千人以上。

然而，革命的勝利成果，又一次的落到資產階級——主要是大資產階級手中。還在巷戰正酣之際，資產階級貴族們及其附庸的知識份子——律師、記者與教授們，就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從事斡旋，企圖捉取革命成果，暴動一經勝利，他們馬上組織「治安委員會」以為臨時政府，很快就擁戴法國大革命時

代之奧爾良公之子路易腓立浦（Louis Phillippe）入繼王位，這是開始了所謂「七月王政」時期。資產階級害怕民衆——特別是害怕這時已經組成的法國工人階級，不敢大胆爲共和政體而鬥爭，只安於局部的政體改革，至多是要求給王權加以限制的君主立憲制。而創造勝利的民衆旣無組織，缺乏領導，其大部分又輕信勝利，很快的放棄了自己的武器，因而對資產階級的團結，不能採取什麽對抗的手段。這樣，使法國政治制度並無根本的改變，只是在君主立憲制度之下將政權統治由地主貴族移轉到資產階級貴族銀行家及財政家等手中。

馬克思說：

「七月革命之後，自由主義的銀行家拉腓特引導其共謀人奧爾良公（卽路易腓立浦）出辦公廳時，他說出這樣的話：『此後是銀行家的勢力了』。（『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七月革命並非別的，就是剝奪法國國民財富的股份公司……路易腓立浦則是這個股份公司的總管事。」（『法蘭西階級鬥爭』）

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的里昂暴動　法國工人階級也是從大工業發起之後——大體上是從一八一五年以後，才形成起來的。復辟時代特別是「七月王政」開始以後，法國資本主義的成長，雖遠不及英國，但前者發展的速度確是相當的快，法國大工業的發展亦如英國一樣，很確實的征服舊有的家庭手工業，促使鄉村小農的破產，造成廣大的無產者。他們爲衣飯所迫不得不爭入工場以求棲身之地。可是，在工場中，亦由於機器的採用，對勞動力的需要又日漸減少。法國工場亦仿效英國，採用大批低廉的婦孺勞動。襤褸不堪的失業者，成羣結隊的彷徨於街頭與廣場上，詛咒着奪去他們工作的機器。一八三〇

年七月革命的結果，只是使財政貴族、大工業資本家大發其財，施行對工人階級更厲害的剝削。這時，工人的生活是愈益惡化，工作時間幾無限制。大企業中工人一日一夜作十五小時的工，小企業中的工作日甚至達十七八小時，工資則異常低廉。例如：里昂的工人，每天作十八小時的工，而工資只有十一蘇。女工及童工日多一日（一八三〇年達百分之五十），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毫無權利可言。

工人階級就在歷次的革命鬥爭中，也日益明瞭到：他們與資產階級中間是有相反的階級利益，他們爲了追求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在法國許多大城市（巴黎、里昂……）中舉行罷工運動。罷工者的要求，大部分帶經濟性質，限於提高工資減少勞動時間到十小時。

這時法蘭西的勞動者，已組成了互助組織的「職工組合」，這種職工組合逐漸轉變爲勞動組合（工團），這是法國工人組織的開始，它不僅實行團結工人互助，而且有時指導工人罷工。一八三一年以後，法國罷工之風，蔓延全國（一八三一年共五十次，一八三二年已有九十次）。

然而，在七月事件中被欺騙了的工人羣衆，不只是從事經濟鬥爭，而且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並且，直接舉行暴動。他們聯合小資產階級，組織祕密政治團體，聲言：「打倒銀行王腓立浦」，「共和國萬歲」。

其中最大的暴動，爲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的里昂暴動。

里昂是法國絲織業的中心，而且是當時法國工業的典型，其大半數的生產仍爲家庭工業。九十個大資本家，他們從外國輸入生絲，再將其分予各有五六部織機的作坊主。三萬織工在這些作坊內工作，其生活痛苦，實已不堪言狀。三十年代之初，里昂發生極嚴重的經濟恐慌，里昂有五千部織機停工，工資

銳減。一八三一年，資本家與勞動者組織委員會，實行工資共同決定的通則。起初工人是很歡喜，但資本家立刻以與外貨競爭為理由，並不遵守這一通則。勞動者被欺，異常憤怒，於是三萬職工，宣佈罷工，並高舉黑旗，湧出街頭。旗上大書：「作工而死呢？還是作戰而生呢？」當軍隊奉起彈壓之時，工人們就立卽築起工事，實行自衞，全城捲入暴動的空氣之下。三天血戰，終於使暴動勝利。國民自衞軍不得不將城市交與勞動者管理。可是，在工人們看來，這次勝利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自然也不注意來管理，同時也缺乏組織力量來管理。佔據里昂十天之後，這個暴動終於被鎮壓下去。

里昂工人第二次暴動，發生於一八三四年。一八三三年末一八三四年初，里昂絲織業又發生了新的恐慌，資本家又打算減低工人工資，工人又以能工相抗。這時工人中已經組織有工人的「互相扶助會」的團體，政府則頒佈命令，嚴禁此種組織，並逮捕這一組織的會員。四月初，當政府第一審次判互助會會員的時候，工人立卽揭起暴動旗幟，暴動一起，巷戰大作，赤手空拳的工人男女，竟與一萬多的武裝齊備的軍隊相持達六日之久。結果，政府軍的優勢與勞動者方面的力量不足，使暴動受到極慘酷的鎮壓。一千二百個勞動者被殺，而響應里昂暴動的巴黎工人、馬賽工人均同歸於失敗。

恩格斯認為里昂的暴動是「第一次的工人暴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開始佔取這國家的歷史的首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二節）並且「這些工人從一八三〇年起，已經得到了遠比那些有產者甚至比那些共和黨所設想的為多的政治獨立性了」。（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引言）雖然，工人在暴動中所提出的要求，多少是不清楚的與模糊的；雖然，暴動是終歸於工人失敗，但這些暴動在近代革命史上，在工人階級鬥爭史上是有莫大意義的。

祕密結社與巴黎工人暴動　一八三一年里昂暴動，同樣對於推動法國其他城市工人運動上亦有重大意義，巴黎工人區域早在一八三〇年之前，已成爲一切祕密的政治組織之中心。如『人權社』、『民友社』、『家族社』等均相繼成立，加入此種組織者多屬激進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其唯一希望是實現基於普選權之共和國，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但在三十年代之後工人紛紛加入其中，並漸佔這些團體的多數；因而這些組織的政綱亦形改變。除經濟要求外，更提出社會政治問題：反對社會上的不平等，反對人對人的剝削等等。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在『民友社』及其他革命團體的組織之下，發生了巴黎的暴動。暴動者的旗幟是：『自由呢？還是死呢？』巷戰的結果，暴動者仍歸於失敗。

爾後，這些祕密團體，仍不斷活動，他們不斷宣傳反抗政府，並企圖推翻王政，奪取政權。一八三四年，又在巴黎發生很大的暴動，領導者爲民主共和派。當時有四千多革命者，在工人區的堡寨之內，很勇敢的與四萬軍隊鏖戰，結果復歸失敗。

一八三六年在勃朗基及巴貝領導之下，成立了『四季社』，加入其中者，以工人爲最多。這個組織，具有不成熟的社會主義政綱。其目的是想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然後實現社會主義。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在『四季社』領導之下，又發生了巴黎的第三次暴動。當時，『四季社』的會員只發展到一千多人，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以奪取政權；五月十二日，他們乘巴黎警戒疏忽，突起少數人的暴動，刼奪市中兵器、佔據幾處政府機關。畢竟因參加的工人數量不大，結果亦遭失敗。事後許多參加者被捕，勃朗基及巴貝二人亦被捕判成死罪；以後改爲無期徒刑，祕密會社多被破壞，工人運動亦趨於低落。

關於這個時期，法國的革命與工人運動，馬克思曾經作了一個簡要的敍述，他說：

「直到一八三〇年，自由派的資產階級，領導着一切叛亂以反抗王政之復辟，這是衆目昭彰之事。但在七月革命之後，他們的地位已爲共和派資產階級所代替。至於無產階級，則在王政復辟之下，已經學會了結黨謀亂之行爲。當共和派的資產階級在不重要的市街巷戰而恐懼逃亡之時，無產者便走到前線去。巴貝與勃朗基所領導之「四季社」於一八三九年之暴動，已經是完全的無產階級的事業了。（『馬恩文存』卷三第四二八——四三三頁）

★ ★ ★

總之，我們從法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看到一些什麼呢？這次革命與一七八九年時代的法國大革命有何特異的地方呢？

最特異之點，就是階級關係的新變動：

第一，由於大工業在法國開始發展，不僅相當強大了法國資產階級，而且形成了法國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固然要進一步發展自己社會利益而與統治的地主貴族鬥爭，但同時他們看到自己背後的無產階級，也在不甘落後的爲自己階級的社會利益與資產階級鬥爭；資產階級固然要急於取得與恢復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去求助下層民衆，來反對地主貴族，但同時又鑒於大革命時代的教訓，深恐這般下層民衆「過火」，而終於不敢放胆起來革地主貴族的命。結果，使七月革命不能成爲澈底的革命，只能做到由少數大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不可能向前再多走一步。因爲，這時「解除工人的武裝成爲佔有國家統治權的資產階級之第一等任務了」。（恩格斯）其他任務都比較次要。從這次革命中，我們可以看出法國資產階級，再不可能發揮他們先輩人在法國大革命時代那種雄壯的精神了，雖然他們還不願只是少數

的大資產階級統治法國。

第二，法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台之後卽充分表示了他的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的徹底性與決絕性。法國無產階級的前輩人，曾在法國大革命中表現過的這種特性，現在他們是責無旁貸的承繼與發揚起來。他們積極的勇敢的與其他階級的民主派一塊，反對共同的敵人，可是他們也很快地開始覺悟與組織起來，反對自己的直接的敵人。當資產階級用武力來彈壓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毫不猶豫的用暴動來回答他們。工人階級之第一次的暴動（里昂、巴黎），雖然「鬥爭的結局是工人失敗」，但亦足以表示：工人階級並非永久的被統治的階級，而是要把自己變爲統治階級；而自己要能成爲統治階級，就不是靠和平的國會鬥爭，就不是靠資產階級來施恩給福，而是要靠工人階級自己的力量，用武力革命的事業，用推翻統治的資產階級的鬥爭手段，來實現這一任務。這次法國工人階級在世界工人鬥爭史上，只做了這「第一次的嘗試」，可是，這第一次的嘗試，亦足以昭示將來法國的以至世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到底他們的共同事業是什麽？到底他們在今後的人類史上要幹出一些什麽事業來？答覆就是，他們就是要爲組成自己爲統治階級。

第三節　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空想的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初葉，發生於英、法諸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是當時社會的歷史的一定產物。它的歷史根源，是承繼着十六世紀以來還未成熟的無產階級先驅者之革命行動的理論（如英國革命者之平均派，法國大革命中之巴貝夫、摩來里、馬勃里的學說）；同時除了無產階級的傾向之外，其中

部分的還有資產階級傾向的某些影響；十八世紀法國機械唯物論，在這般社會主義學說中也有其直接聯繫。它的社會根源是：（一）這個時期英、法工業資本主義生產狀態發展起來，但是發展得不成熟；（二）因而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已經暴露出來，但是還不甚明顯；（三）因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已經日益擴大，但是一般說來，還擴大得不甚明朗，不夠尖銳。這種空想的社會主義，正如恩格斯所說：

「此種歷史的情況，也支配了這些社會主義的創造者，不成熟的理論，正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發展形態，不明朗的階級情況相適宜，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既然還在不發達的經濟狀態之中隱藏着，所以他們就不能不從腦子裏造出這種方法來，社會所表現的只是不幸狀態，明達的理性任務，即在消除這種不幸狀態，應用宣傳方法，在可能的時候，更用經驗的模範的例子，從外方把這種制度推行到新社會中去，這樣新社會制度，自然一開頭就不得不陷於空想，它們愈是被規定得詳細精密，它們愈是墮於純粹的空想。」（『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這種空想社會主義創始者代表人物，在法國爲聖西門、傅利葉，在英國爲歐文，「這三位烏託邦主義者（空想家）的共同特點，即在於他們都不是提出自己爲當時順着歷史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之代表。」（同上書第四九頁）

現在，我們分述這類空想家的學說：

第一，聖西門（St. Simon 1760——1825），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始祖。在他的學說中，「除了無產階級的傾向之外，還有資產階級傾向的某些影響」。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

是全國大多數的從事生產與貿易的人們對於以前之享有特權的游惰等級（貴族、僧侶）之勝利，而這個勝利，只是這大多數人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並且他（資產階級）很迅速的發展起來，這般投機者的統治，致令法國與革命在執政府時代陷於破產，使拿破崙得以藉口而實行政變。因此，在聖西門看來，法國革命是『勞動者』與『游惰者』的鬥爭（『勞動者』不但指僱傭工人，而且指廠主、商人、銀行家；『游惰者』不但指舊時特權等級，凡不參加生產貿易與依賴利息爲生的人都包括在內），恐怖時代的經驗還證明貧苦階級沒有能力統治，於是他認爲在新原則上改造社會制度，必須依賴『科學與工業』，必須『結成握於支配力的產業階級』。他曾經在他的著作中（一八〇二年出版的『日內瓦書信集』）寫過：『法蘭西雖失去一切的君主、顯貴官僚、高僧以及懶惰成性的貴族等，那將毫無損於法國；但是，如果失去了那最優秀的學者、詩人、藝術家、工匠、工人及熱心企業的產業家時，法蘭西才是精神上的死滅，卽其生命亦將壽終正寢，對社會上毫無施與的人榨取全國民衆』。由是可知，聖西門不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勞資利害的對立，他把勞動者與企業家當作一個生產階級，以爲在他們共同反對統治的貴族特權階級時彼此間的利害關係是完全共同的，自然，聖西門只能承認工業家在實際上統治全社會，反對工人則還是保存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地位。

然而，在另一方面，聖西門又看出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雖然是很粗淺的），看出生產的無政府性，生產力的浪費，分工的不平衡，並給以否定的批判。他提議廢除生產的無政府性，剷除社會上的寄生分子，有計劃的、集中的建設共同的、統一的國內生產力，不過建設之責，不是期望於無產階級而是期望於所謂勞動者與企業家的共同生產階級。他提議在保存生產手段的私有之下，來變更私有

財產，而並不是取消私有制度。他主張去期待於覺悟的國王或銀行家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反對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超人理想。

聖西門最大的功績在於：他認識在人類社會發展裏頭的過程中有各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存在，他第一次指出（一八〇二年）法國革命是階級鬥爭，並理解到：不但是資產階級與貴族中間的階級鬥爭，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間的階級鬥爭，並指出：法國恐怖時代的統治就是貧苦階級的統治。其次，聖西門指出在現時社會中是一種新的榨取形態代替他種榨取形態，他在無論何時何地首先關心到「人數最多而且最貧窮的階級」之命運，他提出這樣的原則，就是：「一切人都應當勞動」，「百善之源的勞動不但無人尊重，而且常被富人所侮蔑」。但是，他不承認只在資本主義社會上才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他不明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眞實關係；因而，他不懂、而且不相信無產階級的任何歷史的獨立性及固有的政治運動；自然也不明白，依據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及其力量的發展，用革命的手段去達到消滅階級，解放全社會才能夠解放無產階級本身的這個歷史發展道路。

聖西門在一八一六年，又聲言道：政治學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預言政治學將要被經濟學所完全包括。固然，也只是很粗淺的看出經濟是政治結構的基礎；但是，他却明顯指出「統治人的政權，應當轉變爲對於事務的管理以及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就是說是向「國家的消除」；（同上書第五五頁）可是，怎樣去達到這個目的，聖西門又不能不陷於空想了。

聖西門學說的幼稚性、模糊性與矛盾性是從何解釋呢？恩格斯告訴我們：

「這樣的見解是完全適合於那一時代的，那時在法國，大工業以及連帶而來的資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間的對立，剛剛才開始發展。」（同上書第五五頁）這樣，就恰恰反映到聖西門的學說上。

聖西門死後，他的弟子恩芳庭（Elnfantin 1796——1864）、巴查得（Bazurd 1791——1834）更發展了他的學說，在他倆合著的「聖西門學說釋註」一書上，力說這樣的思想，即「生產須從支配人類的事改造爲支配一般幸福卽物質的事」，並指出：「萬物聯合——這是我們的未來，一切的人，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就是將來要代替壟斷與門閥權利的新權利」；同時，擬由「愛之崇拜」的新宣言和組織特別的宗教團體，來實現這種走向共同生產社會的轉變。

「聖西門主義，發生於和工業銀行家之發展有密切關係的知識分子之間，這個主義給予將來的社會主義以很多的新鮮材料；但是，出乎這類知識層的視線之外，將無產階級不視爲歷史的積極力量，而只視爲痛苦的被榨取的大衆，所以這一學說是帶着和平的性質，而其觀念論與神秘主義（神權通過僧侶的上帝來支配人類）也無大的號召能力。」

第二，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他在一八〇八年，出版了他第一部的著作，他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作過比較聖西門更加深刻與透澈的批評。「如果從聖西門那裏，我們可以找到一種眞正天才的遠大的眼光，凡以後社會主義的差不多一切的思想，除去嚴格的經濟思想之外，都可以在那裏找到萌芽的話；那末，從傅立葉，我們就可以找到一種對於現存制度之深刻動人的批判。」（恩格斯：同上書第五六頁）他毫不客氣的暴露資產階級世界的物質的精神的貧困，他盡情的揭破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美麗詞句的空虛、可憐與破產，據傅立葉的意見：「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根源，在於缺乏勞動的統一的組織，生產的無政府性，無計劃性，經濟上的紛亂，產生政治上的紛亂，引起資產階級社會的道

德腐敗與破產，引起一部分人乘危致富的不經常的狀態，多數的社會力量爲生產的無政府性與無組織性狀態所浪費，寄生之輩充斥於社會之中，家庭的寄食者爲大部分的婦孺，社會的寄食者爲軍人、官吏、大部分的商人、僕婢與失業者」。

傅立葉最特色的地方，還在他的社會歷史觀。他把社會發展分爲四個時期：蒙昧、野蠻、宗法與文明；他所謂文明時期，就是指現存的始於十六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文明社會怎樣將野蠻時代所有的每一個簡單形式的罪惡轉變爲複雜的、雙重意義的、兩面的、虛僞的形式；他指出，文明社會是運行於一個不能克服的永遠復生的矛盾之罪惡的循環之中，而時常達到與它原來所誠意希望的或假意希望的相反的結果；他指出：「在文明社會中，貧困是富裕本身產生出來的」，指出現代社會是建築在階級衝突和個人衝突的基礎之上，階級剝削階級，人剝削人，互相侵壓，互相敵視。尤其成功的，是他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中兩性關係和婦女地位之諷刺的詳述，他第一個宣言道：「在每個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可以作爲一般的解放之尺度。」

因此，傅立葉提出了自己的改造現代社會的計劃：他以爲只有根據自己設想的、發明的嶄新制度，纔能使社會從厄運與墮落中拯救出來。他的計劃是：把社會上的人羣組成爲許多獨立的經濟單位；每個經濟單位（即他所主張的勞動公社），由五百人到二千人組成，內面再組織許多小的經濟單位，有各種各類的勞動者加入；公社的主要基礎，是農業，次爲手工業，正與歐文的「新村」相像；公社內有公共寄宿舍，有類似大合作社或同業組合的組織，加入公社的人個個應當勞動，一切強迫都應取消，各人按其嗜好，選擇職業，可自由更換自己的勞動形式，各人應當充分供獻自己的知識、技能或投資；勞動的

生產品的分配，除了生產費及滿足社會需要與支出外，作成三股分配：給資本者（公社股東）以十二分之四，給技能者以十二分之三，給勞動者以十二分之五。所有的勞動公社，根據自願的原則聯合起來，彼此也可以交換其勞動生產品。他以為這樣，勞動者工作時間縮短，生產品數量加多，故勞動能成為享樂與幸福的來源。

然而，傅立葉也只是主張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以實現其理想的社會主義。他反對任何的革命手段，更看不見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他的道理是限於希望與說服資產階級變為慈善家拿，出錢來建設勞動公社，再使世人看出其中好處之後，大家仿效去做，這樣就可以逐漸實現自己之新社會制度的目的。傅立葉看出階級鬥爭，但是反對階級鬥爭，自然反對工人運動；看出資產階級社會制度不合理，但是反對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他想不經過階級鬥爭，不觸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及其政權，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用求助於資產階級之心靈的錢袋的施與來建立這樣的「社會主義」的空中樓閣；自然，也就不能不是空想家了。

第三，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2）。當一八〇〇年，英國正經過了一次產業革命，蒸汽和機器，把手工業工場轉變為近代大工業，並因此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都發生了革命；同時，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也就多多少少的暴露出來了。歐文正在這時候，充當了新拉納克工廠的場主，時年二十九歲，正如恩格斯所說：「這人具有孩子似的純潔的天真爛漫的性質，同時又是一個世上少有的天生的首領，他領悟了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的學說，即認為人的性質，一方面是遺傳機構的作用之產物，他方面是在人的一生特別是在其發展時期人的周圍的環境之產物。與歐文同階級的人們，大多數在產業革

命中，只看到混沌與紛亂便於他們用來渾水捉魚，大發其財，可是歐文則在產業革命中，看到實行他的得意理想，以便在這混亂中建立一個秩序的良機。」（同上書第五八——五九頁）

他自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九年管理自己的工場，工廠工人由開始五百人擴大到以後二千五百人。他在這工廠中如何實現他的理想呢？如果說，別的工廠大批採用童工，歐文則廢止童工，首先創造幼稚園，來教育童工，並與成年工人設立夜校與圖書館；別的工廠實行十二小時到十四小時的工作日，歐文則減少工作日到十小時半；別的工廠工資額低，停工免發工資，歐文則增加工資，雖中間停工四月，工資照發；別的工廠工人生活極壞，歐文還替工人建立公共食堂與寄宿舍，並且工人還分紅利。結果別的工廠只能得到平均的利潤，而歐文的工廠產業的價值却增加到一倍以上，一直到結束爲止，總是經常分給各股東以優厚的利潤。「他之所以會發達到自己這樣目的，唯一的只是他使得工人能夠受到較合於人的地位之條件，特別是他注意了對於逐漸成長起來的一輩工人的教育。」（同上書第五九頁）

從這個試驗中，歐文還引以爲不滿，認爲自己所給予工人的生活，還遠不是合於人的地位的生活。他肯直的說：「這些人是我的奴隸」。他從此發現了這樣的眞理：資本家的利潤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是工人階級所創造。歐文曾經這樣說過：「這二千五百人勞動的一部分人替社會生產的眞實財富的數量，等於半世紀前六十萬人所生產的數量。我自問：這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物品量和以前六十萬人所消費的物品量間的差數，究竟往那地去了呢？」這個差數就是落在資本家股東腰包內去的三十萬金鎊的利潤。歐文的工廠如此，其他一切資本家的工廠亦如此。並且歐文又說道：「沒有這種機器所造成的財富的新源泉。就不可能推翻拿破崙的戰爭，而這個新的力量乃是工人階級所創造。」（歐文：一八四八

年之『心靈上和實際上的革命』）他認爲這種新而雄偉的生產力，應該變爲改造社會的基礎，並且成爲一切人的公共財產，來爲一切人謀公共的幸福。

由於這種純粹營業的觀點，也可以說，就是商業計算的結果，產生了歐文的共產主義。歐文認爲阻止現代社會改革的三大障礙，就是私有財產、宗敎和現代的婚姻形式，他直接向這三種障礙作鬥爭，意在於廢除之，這是歐文主義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他所不同於聖西門以至傅立葉的地方。一八二三年。歐文提出了他的以共產主義『新村』來救濟愛爾蘭貧困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建築在廢除土地及生產手段之私有制度的上面。共產主義新村按友誼的原則，組成爲不很大的農業共同體，在這中間，工業只有演着較之農業身爲次要的作用。他又說：『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存在於流通過程中，即生產者與消費者之被中間人剝削，而造成這種剝削的是貨幣制度。於是他一方面組織了合作社（消費的與生產的），另一方面組織勞動市場，這個市場是依照勞動者的勞動價値所規定的證劵，來購買商品。一般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內，來實現他這種空想的計劃，結果不能不失敗，他的全部財產，也因在美洲試驗他的共產主義失敗而完全喪失了，自己變成貧者。雖然如此，但是，歐文所計劃的合作社與勞動市場，至少也在實際上證明着，沒有商人與廠主，社會是可以存在下去的。

當歐文純粹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現時，他獲得了財富讚揚與成爲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但是，當他走向共產主義之後，他很快的被逐出上流社會之外，於是他不能不直接求助於工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他積極在英國工人中活動。恩格斯說：『當時英國一切社會的運動以及英國工人階級所達到的一切眞實進步，都是與歐文的名字相聯繫的。例如在一八一九年由他五年的努力，通過了第一個限制工廠中女工

和童工勞動的法律，當全英國工會聯合成為一個總的大的職工會之時，他是這個第一次大會的主席。英國憲章運動是受了歐文很大的影響的。

歐文主義的意義，在於他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為工人所創造，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生產手段公有，以及他那教育工人與實際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行動等等。然而，歐文的最大錯誤也就是一般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錯誤，就是，他們不知道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想在資本主義大海中，用和平的手段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孤島。

★ ★ ★

我們現在來引用共產黨宣言上的話來總結上述的空想社會主義吧！

「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的學說，便是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發展的最初時期裏出現的。……

這些學說的發明者固然是看見了階級間底對立以及現存社會本身內解體因素底作用，但是他對於無產階級却沒有看見他的任何歷史的獨立性及他所固有的政治運動。……

他們固然也覺得，在他們的計劃裏主要是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因為工人階級是最受苦的階級，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只是當作最受苦的階級存在而已。

階級鬥爭不發展的形態，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活狀況，使得他們認為自己是遠遠超過這些階級矛盾之上；他們要想改善一切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況，就是對於生活最優裕的也是一樣。因此，他們不斷的毫無區別的向着整個社會申訴，甚至特別向着統治階級申訴。只要人們一了解他們的學說，怎

得會不承認它是最好社會狀況的最好計劃呢？

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的特別是革命的行動，他們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達到他們的目的，並且企圖以小的（自然是失敗的）實驗，以實例的力量去為新的社會福音開闢道路。

這種關於未來社會的幻想的描寫正是無產階級還是處在很不發展的狀態中，他對於自己的地位還是模糊不清，以及在無產階級要求社會一般改造的最初本能的渴望中產生出來的。

然而這些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著作裏也有批判的成分。它們攻擊現代社會底整個基礎。因此，它們教育工人供給了最有價值的材料。他們關於未來社會所提出的一些積極的辦法、步驟，如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揚棄家庭，消滅私有經營與僱傭勞動，宣告社會的和協，轉變國家為單純生產管理機關——所有這些主張，都只是表示要消滅階級的矛盾，可是在他們那時，這種階級矛盾，是剛在開始發展。他們所知道的，還只是這種矛盾之最初期的，不明顯的、不確定的形式。因此，這些主張本身還只是純粹空想的性質。」（以上見『共產黨宣言』）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十九世紀開始大工業發展起來之後，在近代文明已經發展了的國家中，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外，還形成了一種新的小資產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由於他的經濟地位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日益成為不穩固，使他經常的搖擺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經常地作為資產階級社會底補充而重新形成起來；可是這些分子又由於競爭的原故，不斷地被投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去。他們眼見這個時期的來臨，他們將因大工業的發展而完全失去作為近代獨立部分的那種地位；因而在農民小資

產階級佔人口多數的國家（如法國），正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就出現這樣一種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文人。他們不滿意、甚至反對資本主義社會，有的，還贊助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他們，以小資產階級的與小農的尺度來實行他們對於資產階級制度的批判，並且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來贊助工人，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告訴我們：「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或多或少的都與空想的社會主義有着聯繫。」

當時，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最顯著的人物是：

第一，蒲魯東（Proudhon 1809——1865）。他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始祖。一八四〇年出版了他所著的「財產是什麽」一書，極尖刻的攻擊私有財產。正如馬克思所說：「那是對經濟最神聖的東西採取攻勢的挑戰，革命的熱情充滿了「財產是什麽」一書。」（「馬恩文匯」第一卷第二七八頁）但是，他並不主張私有財產的取消，只是主張私有財產的普遍化。他認爲在當時向前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解脫一切痛苦的方法，不是在於往前走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不是在於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是在於倒退到小財主的獨立生產者的制度上去。這種制度是以小的私有財產爲基礎，並且不要有僱傭勞動的剝削，要求保護小有產者能夠收回由其勞動所產生的全部的物品。他提出的「交換銀行」及發行不要利息的信用劵的辦法，就是想使小生產者按其在生產品上所化的勞動來實行他的生產品的交換。他以爲用這一辦法，就可以使小生產者能夠免除破壞、貧困與毀滅。

蒲魯東認爲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必須先於政治解放，認爲工人階級要從資本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應當首先用交換銀行辦法，在經濟上求得自身變爲獨立小有產者，等待經濟上獲得「解放」之後，才談

得上政治解放。

因此，他極力反對階級鬥爭，反對革命，反對工人運動，反對共產主義，而與當時馬克思爲敵。蒲氏於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曾說：

「……我相信，我們要達到目的，用不着這一着（指革命）。我們不要以革命的行動，作爲社會改革的方法；因爲這方法，當訴諸武力，訴之專斷，總之是一種矛盾。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藉一種經濟的聯合力量，將財富收回來，這種財富是被另一種經濟聯合之力，曾從社會中取去了的，我願以小火來薰燒這種財產，不願作聖伯退爾特的舉動（即暴力舉動）……我們的無產者具有一種很大的求知渴望，倘若我們不與以何種飲料，惟使之飲血，則必爲他們所惡絕。」（「見蒲魯東通訊集」一八七五年巴黎版第二卷）

很明顯地，蒲氏縱然對資本主義有些批評，但他整個的學說絲毫不能侵犯資本主義制度；縱然他替工人階級說了一些「解放」的漂亮話，但他全般的理論，絲毫不能解放工人階級。因爲在根本上蒲氏不了解也不願去了解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規律，不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小生產者在基本上是走向破產而不能保持獨立，工人脫離了生產手段，只能替資本家生產財富。蒲氏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用侵犯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辦法，去設想小生產者工人們能夠收回由自己的勞動所生產的全部物品，那完全是空談，是夢想。要做到這一步，只有依靠於工人階級，假手於革命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社會主義。然而這種眞實的道路，又正是蒲氏所極力反對的。所以，蒲魯東的學說，在實際上，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對於眞正的社會主義完全是站在敵視的立場上。

至於他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貧困的哲學』一書中除了他的玄學的政治經濟學與貧困的哲學之外，在社會學上，不但公開的反對階級的革命運動，並且反對工人的同盟罷工，甚至連工人的組織、連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都不贊成。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的『哲學的貧困』上，已經把他的歪曲學說揭破得體無完膚了。

此外，蒲魯東反對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一切干預，他一般地反對政府這種組織，認爲國家是萬惡之源，主張無政府（Anarchy）。事實上，他並未眞正反對資產階級的政府，他不主張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去走向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他實質上還是擁護了資產階級的政府，而眞正地拒絕了無產階級達到解放所必需的過渡的政府。因此，蒲魯東主義不能不是烏託邦的小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學說。

第二，路易勃朗（Louis Blacne．1811——1881）。這派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小資產階級運動與工人運動中流行最廣。一八三九年巴黎暴動發生後不久，路易勃朗的著作『勞動的組織』一書出版，他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同樣，不過是以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來批判資本主義與同情工人階級。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之不幸根源，是由於自由競爭、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以及人類互相侵壓所致。他認爲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經濟體制的競爭，引起了資本家的鬥爭，使勞動大衆遭受最嚴重的剝削，因而造成他們的貧困、墮落；犯罪以及文化的破滅等。他認爲，社會上要脫離這種不幸狀況，只有一途，就是有組織的把勞動組織起來，組織的責任則歸之於國家。他說：『我們所要求的國家是「民衆」經過自己代表來支配的一種民主主義的國家。「民衆」必須取得國家權力，即取得這個「有組織的權力」，這種國家，是「生產的最高管理者」，在勞動制的原則上組織「社會工廠」，即工業或農業的

組合，誰要做工誰就有勞動權利」，誰參加生產，誰就可以分受利潤。」他以爲這樣的公共經營，既有國家力量爲後盾，又有平等勞動的原則，則『資本家的個人經營，就無能與之競爭』。『競爭既被打破』，社會工場逐漸代替私人工場，則有組織的合理的社會，卽可實現。路易勃朗認爲目前的辦法，應將鐵路礦山收爲國有，實行統一累進稅，工人工作日不得超過十小時。

路易勃朗認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可以用說服資本家以至國家政權的方法，實現他的社會主義；認爲走向社會主義只有用和平的方法，用勞動與資本間互相妥協的方法。至於依據工人階級用革命的手段奪取政權這個辦法，他是堅決反對的。他曾經這樣寫道：『社會革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實現，因爲和平的方法，反較容易。這個方法就是勞資和平妥協的道路。』

因此，路易勃朗的社會主義，不能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的、而且是改良主義的。雖然他在四十年代直在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對於在勞動大衆間普及社會主義思想上，盡了許多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却在工人運動中深深的種下了改良主義的毒害，禁錮了工人階級獨立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大有利於資產階級去統治無產階級，這一點是値得指出的。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日『眞理報』上曾經這樣說過：

『小資產階級的路易勃朗們的任務，就是：消除階級利益的分歧，與期望資產階級的有名人物（如有產的知識分子、國會議員）與工人「妥協」，期望工人與資本家「妥協」，期望農民與地主「妥協」。』（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卷第三一九——三二〇頁）

加貝與勃朗基　加貝（Etienne Cobet，1778——1856）在普及社會主義思想於工人階級大衆中、特

別是期望工人自身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上，有更重大的意義。在他們所著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一書中，用極生動的筆調描寫自己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他認爲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是現代社會中最主要的罪惡，是工人階級飢餓與貧困的來源。他極力主張取消私有財產，在財產公有之後則可以建設一切人的幸福。在他理想的「伊加利亞」社會中，那裏沒有私有財產；經濟是建築在集中的與有計劃的原則之上；政府以國民的大多數爲基礎；公民共同勞動，而向公共團體領取一切衣食住的生活資料。他以爲達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是民主主義共和國，在這中間實行許多過渡的步驟，如廢除承繼權，組織勞動，規定工資，普及社會教育，並且他還提出他「移民」的計劃。加貝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革命運動中，以至一八四八年革命中，都很熱烈的參加過，廣大的羣衆讀了他的這篇小說後許多成爲他的信徒。

但是，加貝始終是一個空想的共產主義者，他同樣是主張用和平的方法達到共產主義。不過他期望勞動者自身來實現共產主義，這是與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以至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馬克思、恩格斯也承認加貝對「工人階級作了不可限量的估計」，但同時，又認爲「他所計劃的「移民」政策對共產主義的原理是有莫大的障礙」。他們寫道：「無論何國，若民衆被最可恥的方法所壓榨，則任何爲眞理而戰的戰士，爲樹立新社會組織的基礎起見，也不能留在那樣的國家內。」這就是說：不用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不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能單獨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內來建立共產主義的孤島的。所以加貝的理想同樣是一番空想而已。至於他說要經過民主主義的過渡再走上共產主義，頗受馬、恩的贊許：「不經過民主主義的過渡期而實行財產的公有，是不可能的。」

勃朗基（August Blanque,1805——1881）是十九世紀上半期以來的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家，是當

時法國勞動者與小資產階級英勇鬥爭中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他生平七十五年中，有三十年是在監獄中過生活，兩次被判處死刑，但未死。他在里昂暴動的影響之下，就認識了貧困階級與有產階級間的鬥爭。那時他就主張：「貧民與吮吸貧民血液的富人作鬥爭」。一八三七年，他在工場及作坊的工人中，組織了「四季社」的祕密團體，而以革命來澈底改革社會爲己任，參加者約千餘人。但因與羣衆的聯絡不好與失去廣大羣衆的力量，以致一八三九年五月巴黎暴動失敗，勃氏亦被捕入獄，到一八四八年三月出獄，又來積極領導巴黎工人與民衆作革命鬥爭。

勃朗基受到巴貝夫的影響，尤愛讀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他憤恨資本主義制度，他的社會主義學說的特點，就是堅決主張用革命的手段來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以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與以上所述的各種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並且他還具體提出：用無產階級自衛軍來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之後，革命政府應屬於無產勞動大衆；組織革命軍隊來代替常備軍，壓迫在鬥爭中尙未消滅的敵人；封閉所有資產階級的報紙，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普及；肅清僧侶，沒收教會及宗教團體的財產；罷免一切高級中級的官吏；實行直接的累進稅；爲了產業統治，組織特別委員會，監督生產。

然而勃朗基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他輕視廣大羣衆的力量，輕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他不把革命事業建築在廣大勞動羣衆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基礎之上，而建築在少數先進的陰謀活動上面。

根據勃朗基的意見，社會革命不是勞動大衆運動發展的結果，而是在那擁有權力的最積極的革命家團體活動下展開的；這種團體首先是因爲現存反動勢力的陰謀，其次由於壓迫，才來拉攏勞動大衆到自己的戰線上來，而以軍人、學生、知識分子爲活動的中心。他不知道，社會革命是要建築在無產階級與

廣大羣衆的力量之上的；他不知道，革命客觀形勢沒有達到革命的沸點，廣大羣衆還不能被引入革命陣線、而且願爲革命事業堅決奮鬥之前，單靠少數人的英勇鬥爭是無濟於事的。因此，勃朗基主義者始終不能眞正去領導這個革命運動，並且終歸於失敗，就到最後，它仍然不是廣泛羣衆運動，只不過是少數人的零碎的團體；並且，這種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德國工人運動中與在一般革命運動中，都成爲眞正革命事業的障礙。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引言中說道：

『勃朗基主義者……向來就受教於陰謀派的學校，慣於服從陰謀的嚴厲紀律的他們，以爲用比較少數的、勇敢的、很有組織的人，在某種順利的條件之下，就不但可以奪取政權，並且用極大的努力來幹，還能夠保持政權。』（見『法蘭西內戰』）

雖然如此，但勃朗基主義的許多命題：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之歷史的必然性與任務，無產階級及革命的先鋒隊的作用，祕密工作的必要性等等，這却爲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所擇用。馬克思論及一八四八年革命時，稱勃朗基爲『勞動階級唯一眞實指導者』，自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說勃朗基主義是工人階級的代表，他不過是比較多傾向於無產階級一點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

★　★　★

總結起來，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未形成與將形成之前，出現於英法諸國這些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簡直是一種龐雜的混合物，包含最爲大家所承認的批判的論調，經濟的原理以

及各學派創始者對於未來社會的描畫。」（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般舊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特點是：『雖然也批判了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結果，但總不夠把它說明，因之也就不能加以克服。舊的社會主義，只是簡單地把它看為惡事，而加以否認。舊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包含的剝削工人階級的這一點，非常厲害的加以攻擊，可是，它對於這種剝削的內容如何，由何產生的這一點，却很少能夠加以明白的解釋。』（同上書）列寧也論到這些舊的社會主義，他說：『……他們看不到資產階級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之對立，甚至連「工人應作為一獨立的社會力量而行動」這個觀點也不承認。在另一方面有許多的空想家以為只要使統治者與統治階級相信近代社會制度不合正義，就很容易在世上建立和平與普遍福利。他們夢想着沒有鬥爭的社會主義。最後，那時的社會主義者以及一般的工人階級的朋友，他們幾乎全體都把無產階級當成一個潰瘍，懷着恐怖地看到這個潰瘍隨工業發展而長大。所以，他們都專心於如何阻止工業與無產階級底發展，如何阻止「歷史的車輪」的前進』。（列寧：『紀念恩格斯』）

因此，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底意義，是與歷史的發展背道而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也不是真正去實現社會主義的，並且多少都是帶上空想的。總之，它們都不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在它們發展的過程中都是或早或遲的成為鞏固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變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敵人。然而，這並不磨滅它們在一定歷史階段中，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攻擊，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與工人羣衆的教育，對於後來馬克思主義的好的方面的供獻。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任務已經不是在於構思一種愈完善愈美好的社會制度，而是在於考察那種

必然地產生上述階級鬥爭及其相互鬥爭的歷史經濟過程，並在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情況中，找出解決這一鬥爭的手段。」（同上書）

以這種爲任務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有到馬克思、恩格斯手中才創造出來。以下我們就要講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第四節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

一八四八年前的馬克思、恩格斯　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在普魯士萊茵省居利地方一個猶太人的家庭，父親是一個律師，家境相當富裕，他十七歲在居利中學畢業，當年考入邦恩大學，第二年又轉入柏林大學學法律，但很愛研究歷史與哲學。一八四一年畢業；那時他還是一個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者，爾後不久，在柏林加入了「少年黑格爾派」，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三年，馬克思逐漸轉變爲大體上是唯物論的「費爾巴哈派」，一八四二年十月，馬克思當了「萊茵報」的主筆（這是萊茵省急進資產階級的報紙）並寫了幾篇重要論文（如「評普魯士新近檢查令」，「萊茵省議會記錄中對於出版自由的爭論」，「穆塞爾河釀酒農民狀況」等）攻擊專制的政府與宣傳民主的革命的主張，政府嚴厲壓迫這個報紙。一八四三年一月決定封閉它，於是馬克思就辭去了這一職務。在辦報的時候，馬克思感覺到自己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知識不夠，以後就努力去研究政治經濟學。一八四三年秋天，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與一個黑格爾左派的魯格共同辦一種急進派的雜誌。這個雜誌即「德法年鑑」。於一八四四年二月在巴黎出版。馬克思在這上面所做的論文已經表示自己是一個革命家。他的第一篇論文爲「黑格爾

法律哲學的批判」。他宣佈「對一切現存制度給以無情的批評」，提出「批評的武器，決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這種「武器的批評」是依靠羣衆與無產階級。他說「無產階級如不將自己從社會一切其他部分中解放出來，如不因此解放社會中其他部分，他便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第二篇論文爲「論猶太人問題」。這個雜誌只出了一期，四月卽遭封閉。八月馬克思又在柏萊斯主筆的「進生報」上面投稿，重要者有批評魯格作的「普魯士王與社會改良」，「西西利亞職工變亂」等文：這時，馬克思已經開始形成他的唯物哲學與科學的社會主義了。

恩格斯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於普魯士萊茵省巴門（Barmen）的一個企業家的家庭，十四歲卒業於巴門小學，旋入中學。一八三八年，恩格斯還沒有讀完中學，就被迫到布勒門一個商號去當店員，但是他仍不斷學習，特別愛好當時支配德國的黑格爾的哲學，一八四〇年他成爲黑格爾的信徒。一八四一年春恩格斯離開布勒門，因不能繼續學習，十月遂入柏林炮兵營服務，並在柏林大學旁聽神學與哲學。一八四二年加入了少年黑格爾派，九月離開柏林，就到英國曼徹斯特一個工場去服務；他在這個地方經常去接近工人，親見工人們的生活狀況與痛苦，看出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他在十一月給「萊茵報」的投稿中，就指出「工業創造了一個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因人數衆多，已經變爲英國最有力量的階級，當他一經覺悟他是最有力量的階級的時候，英國富人就遭殃了」。並着重指出：「只有武力革命，無產者的物質地位才能改善。」一八四三年以後，恩格斯亦如馬克思一樣，中間經費爾巴哈派而成爲完全的唯物論者。一八四四年，恩格斯向「德法年鑑」投了兩篇稿子：卽「國民經濟學批評大綱」與「馮爾撒斯人口論」，在他第一篇論文中，他就指出「競爭產生壟斷，壟斷並且產生競爭……商業危機之不可

避免…小資本家流爲貧困…無產階級人數增多…結局造成社會革命』。這樣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觀念是已經形成起來了。

列寧說：

『恩格斯是到了英國之後才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受了法國社會主義與法國生活底影響，也在巴黎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了。』（『紀念恩格斯』）

一八四四年八月，恩格斯離英返德，經過巴黎與馬克思見面（事前早已互相通訊了），以後兩人合衷共濟，努力於科學的著作，首先他倆就合著了一本『神聖家族』，其中大部分是馬克思寫的。這本書是批評哲學家鮑爾兄弟之超現實、超黨派、超政治、否認實踐的批判主義。特別指責鮑爾兄弟之蔑視無產階級爲一『非批判的』羣衆，在這本書『就包含了革命的唯物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列寧）

一八四五年，馬克思被逐出巴黎，逃往布魯塞爾，恩格斯則居住於布魯塞爾與巴黎。他們一面從事科學的研究，一面又在該地工人中從事實際活動。

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在一八四五年出版。『這本書是控告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最可怕的訴狀』，『這是恩格斯底所有的主要貢獻』。（列寧：『紀念恩格斯』）其最重要之點，就是『恩格斯是第一個人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蒙受痛苦的階級，而且是事實上，他的極窮苦的經濟狀況迫使他不得不前進，不得不爲爭取最後的解放而鬥爭。戰鬥的無產階級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工人階級底政治運動，一定要使工人認識他們只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得到解放。反之，社會主義也只有在它變成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之目標時，才能成爲一個力量。』（列寧：同上文）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出版，這是爲了駁斥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一書而作的；在這書中，馬克思嚴斥蒲氏在經濟學、哲學上的錯誤，反對蒲氏敵視工人階級鬥爭的錯誤，並且指出工人階級鬥爭的重要策略——即聯合與發展工人階級準備將來的戰鬥。（參見列寧：『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一八四七年春，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加入了一個極秘密的宣傳團體『共產主義者聯合會』，積極的參加民主鬥爭與工人運動。在該聯合會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同年十一月舉行於倫敦）上，馬恩二人受到大會的委託，擬就了絕頂著名的『共產黨宣言』，而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出版了。恩格斯說：

『貫澈整個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的生產以及必然從它發生的社會結構，形成這時代底政治的和文化的歷史的基礎；因此，與之相適應的（自從原始的土地公有瓦解以來）整個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鬥爭是社會的發展底各種階段上發生於被剝削的與剝削的、被統治的與統治的各階層之間的；但是，這種鬥爭現在到達了一個階段，這時候，被剝削與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把整個社會永遠從剝削、壓迫與階級鬥爭中解放出來，那末，也就不能把自己從剝削他與壓迫他的階級（資產階級）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是完全屬於馬克思一個人的。』（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

列寧說：

『在這篇著作中，絕頂明確的說明了新的世界觀，包括社會生活的澈底的唯物主義，最完備、最深刻的發展說的辯證法，階級鬥爭底理論以及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之全世界歷史革命作用底理論。』（列寧：『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這篇「共產黨宣言」，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形成之後底第一篇完備的著作，它包含着全部的馬克思主義，它是革命的、批判的、統一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理論與綱領。它是全世界勞動羣衆與被壓迫民族謀解放的以至全人類社會謀解放的革命的學說。這一著作剛剛發表之後，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德國三月革命，意大利的革命就爆發了；在這些革命中以至爾後各國的革命中，都完全證明它的正確，直到現在都保存它的歷史意義。現在我們就講到馬克思主義本身。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　馬克思在他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到：「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生存，相反的，是人們社會的生存決定他們的意識」那末，馬克思主義——這個馬克思的觀點與學說底系統，也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與綱領——自然也不是憑空而降的，也不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中偶然發現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定的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更確切的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之必然的產物。恩格斯說：

「共產主義是大工業的產物與它的結果，世界市場的建立及隨之發生無可減縮的競爭，愈加厲害與普遍化的商業危機（現在已經全然成爲世界市場的危機），無產階級的產生與資本的集中以及接踵而來的無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理論，它是無產階級在這鬥爭中的地位的說明，它是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理論的總結。」（「共產主義者與卡爾・格村」——見俄文版「馬恩選集」第二卷緒言引證）

由此可知，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是：

第一，是十八世紀末期以來大工業的發展以及隨之俱來的階級矛盾之發展。在本章開始時已經說

過，大工業產生了無產階級，產生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劇烈的階級鬥爭；同時大工業的發展又減殺了與資產階級對抗的一切其他階級，却單單壯大了而且組織了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在這日益強烈的階級鬥爭中不僅成爲一個唯一的、眞正的革命階級，而且因爲人數越多，他們作爲一個革命階級的力量越大；因此，他們要求解放自己之苦難的生活地位——也就是要求解放本階級的思想意識亦因之生長起來。

第二，是西歐先進國家（英、法、德）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又來一次七月革命，英國也有所謂「國會改革」，但無論如何，這些革命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勝利的戰勝封建階級的階級鬥爭，是愈走愈深的掃淸了封建勢力（法）或削弱封建勢力（英）。其結果，不僅愈加開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道，而且正在資產階級號召無產階級反對舊的勢力時，團結了無產階級，並且，資產階級把反對自己的武器傳授給了無產階級。這樣，使無產階級的組織與覺悟程度易於發展，其爲着解放自己的要求亦愈益增大。

第三，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工人運動之興起。正由於上述原因，歐洲先進國家工人運動也發展起來。英國在國會改革之後有巨大的憲章運動，法國在七月革命之後有里昂巴黎工人暴動。因爲工人在受資產階級領導而共同革命時，「勝利之後，要提出他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的目的是在於消滅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恩格斯）至於德國，因其工業發展得比英、法爲遲，工人運動發展得也較遲，但是它却出現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而具有比較雄厚的力量。不管英、法、德那一個國家，這個時候的工人運動都遭受了或前或後的失敗。但是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却證明了無產階級的獨立運動是開始了。

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開始自覺，他的最先進的階級地位與獨立的歷史作用，已經表現出來。無產階級以至全社會人類解放的道路，是日漸明顯的暴露出來了。

第四，自法國大革命前後，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過程是與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歷史過程相輔而行的。民族矛盾也是提供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地位上，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大革命中反對民族侵略的勝利，以及在拿破崙第一侵略時代與俄國沙皇的民族壓迫中，歐洲出現了許多民族的解放鬥爭。維也納會議之後，在波蘭，在匈牙利，在意大利，在愛爾蘭等國都呈現着民族獨立的要求。在德國，國家統一問題亦成爲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之一；這種民族矛盾，也成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之一。革命的民族解放是與階級解放不可分離，而且前者還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形成起來，它的形成正是由於上述的社會歷史矛盾發展的客觀存在之反映。恩格斯說：

「現在一般的都承認到：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制度，而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以前的手工工廠因蒸汽機及機器的發明而轉成大工業之後，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所形成的生產力，以向來所未見的速度與從所未有的範圍往前發展……大工業在其更高發展的階段上就不得不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壓榨着的範圍發生衝突。現在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資產階級的剝削方式，這種生產力與生產方式間的衝突……客觀地、在我們之外，不管造成它的人們本身的意志和希望如何，總是存在於現實的事實之中，近代的社會主義正是這種事實的矛盾在思想上之反映，正是

它在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首先是它在直接受苦的工人階級頭腦中的反映。」（「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還有它的歷史的思想的來源，馬克思主義，正是十九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裏三個主要思潮底承繼者和天才的集大成者」。這三個主要思潮，就是：德國的古典派的哲學，英國的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與法國一般革命學說有聯繫的社會主義。

列寧在論馬克思的學說時，說道：

「但是這還不夠，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歷史，完全明白的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決不像那些離開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而生長起來的、閉關自守的、狹窄的宗派主義學說；相反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天才，正在於他把人類先進思想家已經提出的問題給了回答。他的學說是直接繼續着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主義偉大代表者們的學說而產生出來的。」（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一，德國古典派的哲學，是與十八世紀法國哲學並立，並且是繼之而起的。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不僅是反對一切現存政治制度以及反對宗教神學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一切玄學……的鬥爭。」（神聖家族）不過這種唯物主義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它認爲事物及其在人腦中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變的、固定的、永久不變的對象。而新的德意志哲學到了黑格爾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黑格爾最大的功績，是在於他的辯證法，即是在於他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精神的世界都看作一個過程——即求恆的運動、變化、改造及發展的過程，他企圖發現這些運動與發展中的內在的相互聯繫。但是，黑格

爾是一個唯心論者，他認爲人腦中的思想並不是實際事物過程底比較抽象的反映；相反的，他認爲事物及其發展，是世界產生以前，存在於什麼地方的一種理念的反映。因此，黑格爾就不能夠去解決發現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任務。費爾巴哈的偉大歷史意義，在於他堅決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分手，宣揚了自己的唯物主義，然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仍然是不充分、不周到與不澈底。只有到了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堅決主張唯物論，把十八世紀唯物主義推向前進，而與辯證法接合起來。他們把德國古典哲學的發現（主要是辯證法），特別是把從黑格爾哲學中引伸出來的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豐富起來，從自然的認識推廣到人類社會的認識；這樣，就形成了馬克思的唯物論哲學，而歷史唯物論則是馬克思的偉大發現之一。

二，英國古典派政治經濟學，最早在馬克思之前，已經是在英國——資本主義最先發達的國家建立起來的經濟學說；勞動價值論的原理，已經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說中奠立起來，「李嘉圖以資產階級生產的實在運動——此運動構成價值——告訴我們——李嘉圖從現社會做出發點，指明這種社會如何構成價值……李嘉圖以爲勞動時間規定價值，這是交換價值的定律」。（馬恩合著「神聖家族」）然而這般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在這裏只見到物與物的關係——即商品與商品的關係，看不見也不可能看見由是而發生的人與人的關係；只看到個別的現象，看不見大衆的現象；只看到社會經濟的零碎事物，看不出全部社會經濟的總和。因此，他們也就不能夠去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運動的規律。馬克思揚棄的發展了這一學說，認爲經濟制度是社會政治上層建築的基礎。他是第一個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及由之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的特別規律，發現了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秘密的剩餘價值論，這一剩餘價值論正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奠基石。

三，法國的及與法國有關係的社會主義，就是在第三節所講過的那些舊的、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它們反映着在已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對於壓迫者與剝削者的反對與抗議，「它們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審判與咒罵資本主義社會，夢想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幻想良好的制度，想以剝削的不道德來說服富有者。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能指出實際的出路，它不懂得闡明在資本主義中僱傭奴役制度的本質，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也找不出能夠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列寧）馬克思揚棄了這種社會主義，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發現了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特殊規律，他把社會主義看成爲兩個歷史發展的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實行鬥爭的必然結果。成爲依據無產階級力量的發展，由階級鬥爭引伸到無產階級專政所具體達到的解放目標。階級鬥爭的學說，就是全世界歷史所教訓的出路。

這樣，就使馬克思主義成爲有這樣的一貫澈底性與完整性，它集人類思想發展之大成，而成爲全世界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族以至全人類的解放的旗幟。

末了，還要說到，爲什麽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產生在當時的德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國身上，因爲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爲德國將在一般的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多發展的無產階級去完成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這就是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革命運動的中心，移到了德國，所以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故鄉，

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

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　講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以至思想的來源之後，現在來簡略的說一說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卽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中的重要之點；這些重要之點都是環繞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卽闡明無產階級作爲新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全世界歷史的使命，並教育組織與發展無產階級去爲完成這一全世界歷史的使命而鬥爭。分開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

第一，近代唯物論哲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給予人類特別是工人階級之偉大的認識的武器。唯物論告訴了我們，「自然界是根本的起源」，「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恩格斯）「思想無非是反映於人腦中的，在人腦中改造過的物質」。（馬克思）然而，這種物質的運動及其反映到人腦中成爲思想上的運動，不是機械式的運動，而是辯證的發展的運動。一切自然界的、人類社會的、思想的過程，都有它們產生、發展與消滅的符號。但是這發展不是還原式的重複，而是「在更高的基礎上發生的（「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的發展，而不是直線式的發展；——是突變式的、大變化式的、革命式的發展；——「漸進的間斷」；——數量變爲質量；——在某個物體上或在某個現象範圍內或某個社會內起作用的各種力量和趨勢底矛盾與衝突，造成趨於發展的內在脈搏；每個現象的各方面（而歷史却日益發現新而又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賴，有最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繫；這種聯繫，造成統一的、規律性的、世界的運動過程。」（列寧：「什麽是馬克思主義」）

把辯證唯物論運用來認識人類社會生活及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這就是歷史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是

馬克思的偉大發現。他告訴我們：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適應一定的物質生產力，而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意志力爲轉移的關係，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便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就是社會的實在基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都是在這基礎上建築起來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卽哲學、宗教、政治等等各種觀念與學說）都是適應這個基礎，都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反映。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相當階段時，就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過去曾經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現在反而變爲該生產力發展的枷鎖。這時就必然引起社會的革命。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整個上層建築與社會意識也要多少發生變革。這樣，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就完全被揭發出來了。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眞實的、科學的認識武器，不僅使我們認識到封建社會如何來的，它又如何必然轉變爲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同樣的認識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變革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應該特別指出，馬恩的哲學不僅在於解釋世界，而其主要任務却在於改造世界，卽革命的實際活動。這就是告訴我們依靠無產階級用革命的實際鬥爭，在具體條件下來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爲社會主義社會。馬恩這種學說，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明確的指明出來了。雖然馬克思在爾後「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與「反杜林」中有更詳盡的敍述。

第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與「馬克思理論底最深刻的、最周到的和最詳細的證實與應用」。（列寧）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就是考察這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關係的產生、發展與滅亡，找出這個社會生產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性。發現這一社會走到滅亡的必然規律。馬克思從這個社會統治着的商品經濟分析開始，指出：商品是能夠滿足人類某種的需

要與能夠與別種物品交換的物品，因爲商品對人家有用（共本身含有使用價值）才能夠與人家的物品交換，同時又因爲商品中含有能夠作爲互相交換的價值（卽交換價值）然後才能夠交換；這種交換價值（或簡稱價值）的大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或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時所化費的社會必需勞動量（卽凝結在這商品中間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交換——由單個的、偶然的交換，發展到以幾種東西交換一種東西的價值共同形式，進而至於以一種貨幣交換若干商品價值貨幣形式，而商品生產發展到某個階段時，貨幣在「爲賣而買」的過程中造成了多於原有貨幣的增殖額（馬克思名之爲「剩餘價值」）；正是這種「增殖」使貨幣變成爲資本。現在要問這種「增殖」的剩餘價值是從何而來的呢？它不是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出來的，因爲流通只是等量的交換。它也不是從另加價格或行市好的中間產生出來，因爲買者賣者相互得失在全社會範圍說來可以彼此抵消。剩餘價值的產生，是由於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沒有償足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產生出來的。因爲工人的勞動力也是這個社會中的一種商品，貨幣的佔有者按勞動力的價值（卽生產勞動力時所需要的工人及其家庭生活品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購買之後就有權來強迫使用這勞動力整天作工。如果說，工人做了六小時的工（必要勞動時間），就已經創造了足以抵償其生活品的價值（工資），那末，以後的六小時（剩餘勞動時間）則創造了資本家所不曾償付的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資本家所投在生產中的資本有兩種：一種是化在生產資料（機器、工具、原料）上面的不變資本（它的價值毫不變更的轉移到製成的生產品上）；另一種則是化在購買勞動力上面的可變資本（工資）。只有這種可變資本，才創造增殖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的比例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率——剩餘價值率。資本家增加剩餘價值的基本方法：一是延長工作日（絕對剩餘價值）；二是縮

小必需工作日（相對剩餘價值）。因爲絕對剩餘價值的增加是有限的，不然就會引起而且在歷史上引起了工人的反抗，於是資本家特別努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由單純協作進至分工與手工工場再進至機器與大工業——來增加相對剩餘價值。

其次，非常重要的就是馬克思對於資本積累的分析。資本積累與原始資本積累不同，後者是用暴力，使工人與生產手段脫離，從土地上趕走農民，盜竊村社土地，殖民政策，國債制度，關稅保護制度等等。資本積累就是資本家把一部分的剩餘價值不用在個人需要上面，而作爲資本用到新的生產中去，有的是作爲不變資本，有的是作爲可變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全部資本中不變資本部分比可變資本部分增殖得更快。這在變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有重大意義的。資本的積累，加速機器對工人的排擠，加速了大生產對小生產的吞併，在一個極端上創造財富；在另一個極端上創造貧困，這便在工業中以及在農業中產生了所謂「勞動後備軍」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這種人口過剩，使資本家有非常迅速的來擴大生產的可能。而這種生產是建築在全社會無政府狀態生產與個別工廠中有組織的生產底矛盾之上。這樣，生產過剩便產生危機。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從一八一五年開始，是定期爆發，以至後來比較延長與比較無定期的爆發起來。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對整個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的分析。他從全部經濟的總和出發，在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品的生產之社會兩大部分，考察到按照舊規模而生產與在有積累的不同情形下全部社會資本的流通形態。解決了根據價值律而構成的平均利潤率的問題。說明剩餘價值之分爲利潤、利息與地租。利潤即是剩餘價值對投入企業之全部資本關係。「高等有機構成」資本（不變資本超過可變資本到一般

社會平均的超過之上）所給予的利潤率低於平均利潤，『低等有機構成』所給予的利潤率則高於平均利潤率，資本家競爭的結果，資本由這一部門自由轉入別的部門；這樣就使利潤率平均化。社會上全部商品的價値總量等於其價格總量，然而在單個方面，在競爭影響下，商品不是按其價値而是按其生產價格出賣，這種生產價格等於所費資本加平均利潤。勞動生產率底提高，就是表示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更快的增加，因此，利潤率就有下降趨勢。

資本家爲了挽救經濟危機與這種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一面提高技術特別是加緊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以圖減少生產成本費；一面大資本家排擠小資本家，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由集中而趨向於壟斷，並形成爲資本主義的世界系統。然而，正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之發展，其結果，不但不能消滅危機，反使危機愈走愈擴大；不但不能拯救資本主義制度，反因勞動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集中化日愈加強，造成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物質基礎。同時，又使工人階級人數日增，並因所受的壓迫、剝削、頹廢、貧困之白熱化，而憤怒、掙扎、團結與組織起來，成爲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智力上與精神上的推動者，以及體力上的執行者。『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已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就是我們已經不能夠和他們資本主義的外殼相容了，於是資本主義的外殼就要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喪鐘就要擂起來了。剝削者的財產就要被人剝奪』。（『資本論』第一卷）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就必然滅亡，社會主義社會將取而代之。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雖然在『資本論』中得到完備的發展，可是，這一學說的基本內容已經在一八四七年所著的『僱傭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與利潤』以及在『共產黨宣言』中形成起來了。

第三，近代社會主義。馬克思從人類歷史的研究中，首先得出了正確的全世界歷史所教訓的出路，卽階級鬥爭的學說。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在一定社會中，成爲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階級矛盾的發展，成爲這一社會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道：

『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原始社會除外——恩格斯補充說）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幇工，簡單說來，就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總是處在彼此經常衝突的地位上，進行不斷的明爭暗鬥。每次鬥爭的結果，不是整個社會制度底革命改造，便是各個鬥爭階級底共同滅亡。……從已死的封建社會母胎內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的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舊的，但是我們這個時代，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就在於它把階級矛盾弄簡單了，社會逐漸分成爲兩大敵對的營壘，兩大彼此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如果說，馬克思已經完全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結論，而且他的階級鬥爭的學說，還特別講到『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那末，在這個社會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就是這一社會的發動機，並且帶有各種不同的而其內容日益豐富的形式），就必然要成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鬥爭。換句話說，卽必然要成爲無產階級革命與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然後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要點是：

第一，資本主義大工業在其更高度發展的階段上，造成了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經濟基礎。這就是

說，資本主義更厲害的趨於集中，壟斷的私人佔有，但同時却更厲害的推動大規模的生產手段變爲社會化的生產手段，資本主義把農業與工業的聯繫澈底破壞，但同時却用自己高度的發展準備了工業與農業的這個聯繫的新要素。因此，生產的社會性不能不打破佔有的私人性，變私有的生產手段爲社會所有。

第二，資本主義大工業在其更高度的發展階段上，造成了推動與執行這一轉變的社會與實力量。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愈是厲害的剝削工人階級與破壞小生產者，同時就愈是擴大、團結與訓練了無產階級，使之在被毀滅的威脅之下不得不起來担當這個轉變（即革命）的歷史任務。

第三，無產階級怎樣得到團結、教育與組織起來，足以來担當這個歷史任務呢？資產階級在他不斷的同他的敵人鬥爭中，被迫的要求無產階級援助，而把無產階級捲到政治運動中來，並把工人開始團結起來，工人間的競爭本使無產階級分裂，然而「資產階級所造成的產業進步，使得因聯合而造成工人們的革命。團結代替了因競爭而起的他們的分裂」。（「共產黨宣言」）並且大工業的發展，交通的發達，生產的集中，又不能不把工人們組織起來。同時，當階級鬥爭非常激烈與資產階級統治內部瓦解的過程中，使一部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隊伍中，使無產階級得到了一些教育的成分與理論上的認識。因此，團結、組織與教育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得愈意識到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即是使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能夠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這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必要條件。

第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與無產階級專政聯繫起來。到「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共產黨宣言」）「而現代代議制的國家就是資本家剝削僱

傭工人的工具」。（「家族私有制與國家之起源」）「無產階級、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把上層社會成分所構造的全部上層建築物拋出九霄雲外，那末就不能抬起頭來，不能夠站起來」。（「共產黨宣言」）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必須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把自己成爲統治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政權形式。

第五，工人階級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參加並努力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爲後者是實現前者的先決條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指出：

「共產黨人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於德國，因爲德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的前奏。」

可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革命不能抱旁觀態度，應當努力參加，使之澈底實現。實現這第一步，以便走向第二步，擁護運動的現在，爲的是實現運動的將來。

第六，關於民族問題。馬克思主義不但不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相反地，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就包括有民族主義。革命的民族主義正是總的民主主義之一部分。列寧論馬克思主義時說道：

「民族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時代的產物和必然的形式　。工人階級如果不在民族範圍中造就起來，不成爲「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像資產階級所了解的那樣），工人階級就不能鞏固、強健與組成了。（列寧：「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這就是說。在被壓迫民族中，在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國家中，這裏的工人階級必須首先爲自己的民族解放與國家統一而鬥爭，民族解放是社會解放的先決條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所說的

「工人無祖國」是指「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內」。（列寧：同上書），而在被壓迫民族中，工人必須「保衛祖國」這都是正確的。但是，必須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却逐漸破壞民族的界限，各國工人的「同心協力」「是解放無產階級的重要條件之一」。（「共產黨宣言」）

第七，經過這樣階級的、民族的革命鬥爭，經過許多必要的革命階段，然後走到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而至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如果說，階級的產生，階級鬥爭的發展，是由於過去生產發達得不夠的必然結果；那末，社會到了這個時候，社會生產率無比的提高，近代生產力充分發展之後，「在這階段上，某一種特殊社會階級對於生產手段與生產品的佔有，政治統治權的佔有，教育及精神上指導的獨佔等等，不但成爲無用，而且成爲經濟上、政治上及知識上發展的障礙」。（恩格斯：「反杜林」）這時，階級必然要消滅，階級鬥爭也消滅，因而國家也就有消滅的必然前提。社會到了這個時候，無產階級的社會解放也就是全人類社會的解放，沒有這樣全人類社會的解放，則無產階級單獨的社會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八，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全部鬥爭底勝利，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實現。科學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結合起來，才能變爲實際。共產黨（爲馬克思主義所武裝的共產黨）的建立、發展、鞏固與加強是無產階級全部鬥爭勝利的中心關鍵。

第九，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還特別告訴了我們，關於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無產階級鬥爭的亦即共產黨人的策略問題。首先，決定策略的基礎是：第一，以客觀的態度，具體的估計鬥爭環境及其各階

級的關係；第二，根據變動的發展的形式，不是根據靜止的機械的形式；第三，觀察運動的時候，不僅是從過去出發，而且是從將來出發。總之是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問題，無產階級的策略的總的方針，就是在隨時隨地要爲着準備無產階級力量「去作行將到來的戰鬥」。（「哲學的貧困」）以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共產黨員爲着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及利益而鬥爭，但同時，他們也擁護運動的將來。」「共產黨人到處都在努力於一切國家民主政綱的聯盟與團結，共產黨人鄙棄把他們的立場與意見隱蔽起來」（「共產黨宣言」）等等。我們知道，沒有這種正確的鬥爭策略，特別沒有實現這種策略的共產黨來領導無產階級鬥爭，則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實現的。

★　★　★

總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它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證明了人類社會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是必然的、不可免的；它發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從中揭穿了剝削的實質——剩餘價值律，並昭示了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方法和道路；它發現了各種社會、國家、民族的一切解放運動的特殊規律，而把這一規律與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規律聯繫起來。

這種科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已經主要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形成起來了。雖然馬恩在爾後著作中還有它的發展。馬恩這種思想，「是在它的實現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的時候，方才成爲可能，方才成爲一種歷史的必然」。（恩格斯：「反杜林」）

第四章 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

本章研究提要 自「共產黨宣言」公佈之後，法國的二月革命就爆發了。這次革命是全國大多數人民——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貴族統治的革命。這次革命的爆發，仍然是工業資產階級領導，亦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但由是於法國無產階級之形成與發展，他不僅出現於歷史舞台與資產階級一塊共同担負革命的使命，而且還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來負担這一革命的事業。不僅如此，這次革命還有它最主要的特點，卽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發展，使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的進程中，走上與資產階級作第一次互爭統治的偉大鬥爭，開闢了無產階級鬥爭史上一個新的時代。同時，這次革命不只是震蕩了法國，而且異常急速的波動到全歐陸，特別是奧、普、意諸國，緊接二月革命之後，奧、普、意諸國的革命就爆發了。由此，可知法國二月革命的重要性。

研究本章時，應注意以下的問題：

㈠ 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特點何在？它與法國十八世紀大革命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革命有何不同？

㈡ 在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起了什麽作用？兩方的立場如何不同，各方追求如何不同的目的？

㈢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如何轉成爲公開的鬥爭，這種公開大鬥爭的意義何在？無產階級失敗的

原因如何？

㈣ 小資產階級在這樣的鬥爭中，處在怎樣的立場？

㈤ 這次革命的結局如何？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何在？

㈥ 這次革命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第一節 革命前法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

路易腓立浦的統治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後，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前，這就是法國的路易腓立浦的統治時代，或者說是「七月王政」時期。路易腓立浦統治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呢？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上面說道：

「路易腓立浦時代，統治法國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之一部分，即所謂金融貴族：如銀行家，交易所鉅子，鐵路大王，煤礦大王，鐵礦主人，森林主人及一些與他們聯合的大地主等。這一部分資產階級，欽定一切國會中的法令，所有國家官職，上自內閣，下至烟草局，無一不由他們支配。」（此後引文均見俄文本「馬克思選集」第二卷）

在這個代表金融資本家與大工業資本家利益的路易腓立浦統治時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在政治方面，王權是稍稍加有限制。選舉法稍稍有所改變，選舉資格由三百法郎減到二百法郎，被選舉者的年齡，由四十歲減到三十歲，因此，選民由十一萬增至二十五萬。第二，在經濟政策方面，這個「專爲剝削法國人民的股份公司」，爲了銀行家與大工業家的利益，厲行極端的保護政策，施行極高的關稅。因

此，法國資本主義在七月革命後，發展很快。例如，工業品的出口，在一八三〇年不過值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而在一八四七年已增至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對外貿易總數，在同時間內，也從一、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增至二、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鐵的出產，從七一四、〇〇〇噸增至一、六五八、〇〇〇噸；工業消費的煤，也由一、七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五、一五三、〇〇〇噸；國內蒸汽機在一八三〇年還很少，而到一八四七年已有四八五三部，約六二〇〇〇匹馬力；鐵道線長度在一八二五年只有二三公里，而到一八四八年已達一八三七公里，在建設中者約二八七〇公里。至於國債之擴充，正是銀行家交易所主之所期望的，一八四七年終，法國國債已增至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至於對於法國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復施行許多新的捐稅；對於工人，則施行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此外政府亦如英國一樣，施行「穀物條例」，而尤利於地主，不利於一般工業資產階級。

總之，路易腓立浦的統治，只是為了極少數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宰制全法國的人民，就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也因為大資產階級之壟斷金融、貿易、生產以至政權，也弄得無可忍受。這樣，就不能不引起法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新變化，造成革命不可免的社會因素。

階級關係的新變化　一，工業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一則對於金融資產階級之獨佔權利與擴充財富表示吃醋，二則由於自己的經濟勢力相當脹大，亦要求更順利的更普遍的發展資本主義，因而，對於現存制度表示不滿。因為「這制度的本身，是有害於工商業、農業、海運業的利益，及產業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至於在政治上，由於金融貴族的把持，吏資產階級中之最大部分，因高額選舉資

格的限制，被拒絕於政治權利之外，而更加憤怒，這種政治權利是資產階級本身利益之發展上所必需的。馬克思說道：

「眞正工業資產階級構成公認的反對派的一部分，就是說，它在國會中所代表的地位僅僅是少數派的地位。當財政貴族獨霸的趨勢愈加明朗，當它已經血肉橫飛的鎭壓了：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以及一八三九年的暴動之後，它自己愈加覺得對於工人階級的統治是鞏固起來的時候，那末，它（對於財政貴族）的反對派的地位是愈形堅決。」（「法蘭西階級鬥爭」）

然而，在這般資產階級的反對派中，一部分只是要求減低選舉資格，藉以握得權力，並謀與王政妥協。但另外還有一大部分的共和派民主主義者，則要求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國，甚至還有下層一點的份子，還擁護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二，小資產階級。各種各樣的小資產階級連農民也在內，自然是完全摒出政治權力之外。特別在經濟地位上，農民因新的賦稅之壓榨及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使廣大破產農民之流入無產階級與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一八三〇年農村人口佔全法國人口百分之九十，而到一八四七年則只佔百分之六十）而對現存政權表示不滿，就是中農亦多因借債而失去自己的土地。城市小資產階級亦感覺其生活地位之日益惡化，這樣就使他們普遍的對現存政權不滿與表示反對。

三，工人階級。一八三九年運動失敗後，許多勞動運動的首領（如勃朗基等）被捕，工業無產階級與手工業勞動者的力量都受到很大摧殘，且失去了他們許多的領導成分。一八四四年，居在法國的德國詩人海湼曾這樣寫道：「支配法國的，是極平穩的、陰沉的、冷酷的、朦朧的世界。」但是正在這「朦

朗基的思想，又在工人中醞釀起來，不滿意於現在政體的怒火，是在日益昇漲着。

當時金融貴族獨攬大權，暴戾恣睢，橫行無忌之際，於是在法國人民之中，無論是大部分的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無不怒目相視，表示與現存政權不相容。他們在一邊，統治者在一邊，這中間的矛盾，在革命前兩三年間就開始提昇到第一位。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來向民衆呼號與求助民衆，不過他的要求與民衆的要求又大異其趣而已。這是革命爆發的一般社會原因。

革命的激動　一八四七年是歐洲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多事之年。這時法國情形怎樣呢？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上這樣說道：

「因爲兩大經濟的變端，加深了國內已存的普遍的不滿，促動了暴動的風潮；一八四五與一八四六年的馬鈴薯的腐爛與歉收，因而加強了人民中一般的騷動，一八四八年「物價的」騰貴，在法國以至全歐洲，引起了流血的衝突。人民爲着必需生活資料的鬥爭，正與財政貴族們的狂宴，遙相對照。在卜參瑟，有參加飢民騷亂的人，橫遭殺戮；在巴黎，則有皇家的惡棍，逃出法網。促成革命爆發的第二種經濟的變端，是英國的工商業的總危機……到了一八四七年秋季，這種危機，畢竟在倫敦做殖民地生意的破產商人中，爆發起來了。於是各農業銀行的破產，與英國許多工業區的工場倒閉，接踵而至。當二月革命爆發時，對於這種危機的善後辦法，還沒有收到效果。」

這種國內國外經濟上的大變亂，固然予勞動者、農民、小生產者以非常不幸的打擊，而對於資產階級不良影響亦大；因此他們對於財政貴族的專制主義，是忍無可忍了。於是資產階級極力號召民衆，鼓

資政府。資產階級喊出的口號只是咒罵政府「混蛋已極」，然而民衆口中喊出的口號，則是「打倒惡棍」，「打倒殺人犯」。於是巴黎及各地民衆起來了，他們大有不推翻王政不止之勢。可是，這時法國工業資產階級，大不同於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是在他們看清這時的民衆力量，使他們顧慮特別大了。法國資產階級所首先注意的是改革選舉，以擴充他們在國會的權力。誰知當「革新宴會」舉行之時，政府毫不對他們讓步。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國會開會，國王親臨演說，堅決反對關於選舉權的任何改革。資產階級的選舉人，就定於一八四八年一月召集宴會，隨後改到二月二十二日。政府則預先從事阻止這個宴會的舉行，並擬以武力干涉之。那時，資產階級中不但自由派，甚至共和派，也自信沒有抵抗政府的能力，本已拋棄自己的計劃。然而，巴黎的無產階級却毫無顧慮的走上前鋒，跳上革命的政治舞台。這時在政治上影響工人羣衆最大者是路易勃朗。從此，法國革命的大風暴又是一觸卽發了。

第二節　二月革命與臨時政府

法國革命的第一時期（從二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四日）——卽革命的開幕時期。

革命爆發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巴黎宣佈翌日舉行宴會，政府果然加以禁止。是日（二十二日）巴黎的工人、學生、市民，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並高呼「打倒基佐，改革萬歲！」的口號，一直向巴黎中心區衝進。當政府軍隊出來開槍彈壓時，民衆卽迅速進入附近房屋內，施以抵抗。到傍晚時，郊外工人區域已築成巷戰工事，翌晨（二十三日）卽與軍警大規模衝突。政府決心爲鎮壓這次暴動起見，卽召集由大中等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國民自衛；但民軍竟拒絕參加彈壓，其中一部分竟響應叛亂；他們認

爲打倒基佐與改革選舉，正是有利於自己的。政府見勢不利，爲了緩和民衆戰鬥情緒，乃下令罷基佐大臣職。消息傳至全城之後，資產階級對於這一消息，都與高釆烈，羣相慶幸。而一般羣衆都大以爲不足，戰鬥雖暫時停止，然而工人區羣衆仍守着堡壘不動。當時，政府正準備進攻，並命令一個最殘暴的武夫步岩（Bugeand）爲軍隊總司令，於是暴動民衆的怒火，又重新燃燒起來。同時，在基佐官署前面又發生了所謂鳴槍的『誤會』，軍隊與民衆的衝突，致民衆死者十五人。羣衆到處喊叫，奔入各街道中。而激進的共和派，民主派的領袖們則作激烈的演說，要求復仇。於是工人示威遊行又起，無數的示威隊伍，高唱『採用共和，懲辦元凶』的口號，通宵不停。翌晨（二十四日）巴黎全城築起了巷戰堡壘，民衆毫不以新組成的『自由內閣』爲滿足，仍是繼續戰爭，暴動方面的勢力益大，而國民自衛軍，在政府看來，又幾乎全不可靠。當着羣衆一步一步的進逼到推勒里王宮的時候，路易菲立浦見大勢已去，來不及整裝，就越牆逃走了，巴黎革命市民遂佔領了王宮。『七月王政』從此推翻。二月革命就這樣勝利了。

『二月革命是一個美麗的革命，是一個普遍同情的革命。因爲反抗王政的革命中所暴露的種種矛盾，還未發展，它們還在一個牀上伴睡着。而構成這些矛盾的內在的社會鬥爭，也還只是憑空的存在在詞句上，存在在口頭上。』（『法蘭西階級鬥爭』）

在這次革命中，資產階級極力慫恿民衆：『民衆們：路易菲立浦屠殺你們，不亞於查理士第十，現在要把他送到查理士第十那裏去。』他們渴望民衆造成自己的勝利。民衆——特別是工人——則堅決要求實現『博愛』的樂園，卽，『社會』的共和國。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革命勝利的成果毫不隱瞞的，

又落在資產階級手中。打倒金融貴族統治之後，接踵而至的就是一般資產階級的統治。

臨時政府與第二共和國的宣佈 在二月巷戰中所組成的臨時政府，按它的成分說去，彷彿是參加革命的各階級的同盟。政府要員共十一人，然而，其中大多數代表是工業資產階級，如亞拉哥、莫洛、拉馬丁等均是。律德魯．羅林、佛羅孔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至於無產階級，則只有兩個代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和一個工人亞爾伯特（Albert）。顯然地，在這臨時政府中，是存在着彼此敵對的階級。從政府組成之日起，從前還是隱蔽着的社會鬥爭，就開始顯然的暴露出來。資產階級則極求獨佔這一統治地位，不容他的同盟者——特別是無產階級分佔其利益，甚至連共和國也遲延而不宣佈，自然更談不上實現什麼工人夢想的「社會共和國」了。當着巷戰的戰士們向着政府首要分子拉馬丁要求頒佈共和國的時候，他的答覆是：「共和國應當經過法國人民選舉，巴黎無產階級不應該用篡奪手段來汚奪自己的勝利。」

而在另一方面，所有的政府要職，已經在政府資產階級分子與軍官、銀行家、「國民報派」律師們中間分配就緒了。

然而，在工人方面又怎樣呢？他們在「博愛」「友誼」的煽動之下，在前仆後繼的肉搏之中，就一眼望着勝利之後就立刻會來一個「博愛」的共和國。何況當時全國政治中心的巴黎，在國內變亂的俄傾間，是在工人勢力的統治之下。工人們急於選派自己的代表到政府中去，那知二十五日午間，臨時政府組成之後，還不宣佈爲共和國，於是問題就發生了。

馬克思這樣敍述道：

「這次工人們決定再不要像一八三〇年那樣受騙了。他們準備用武力來爲實現共和國而堅決鬥爭。拉斯配龍受着這一委託，前往「臨時政府」辦公廳，他代表巴黎的無產者，命令臨時政府宣佈共和國，假令這個人民的要求不能在兩小時之內實現的話，他就率領二十萬人退轉去。死難者屍身未冷，堡壘還未撤去，工人的武裝還沒有解除，而能夠和他們對抗的武力，只是國防軍。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局智慧上的疑難與臨時政府法律上的顧慮，頓然消失了。兩點鐘的時間還未過去，而巴黎的一切牆壁上，就已經出現了這樣偉大的歷史詞句了：「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法蘭西階級鬥爭」）

法蘭西共和國在工人階級的威迫之下，表面上宣佈了。雖然它是基於普選權的共和國。可是，事實上，只是表示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或者說，是一切有產階級與金融貴族們共同取得了統治。即佔選民大多數的農民，亦無非是普通的私有財產者，至於工人呢？馬克思說得好：

「在七月革命中，工人們奪來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在二月革命中，他們奪來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政體。同樣地，七月君主政體被迫的宣佈它是「共和立憲的君主政體」；二月共和政體被迫的宣佈它是「社會立憲的共和政體」。巴黎的無產階級達到的就是這樣的讓步。」（同上書）

巴黎無產階級打出來的實際江山，老是屬於資產階級，而自己所得到的只是表面上的「讓步」。自然，他們就一天一天的明白起來；總想爲着實現自己的實際利益而鬥爭，他們想實現的，是這樣的「社會」共和國，即改變現時的社會制度，工人也得到社會平等地位的那樣共和國。

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兩大階級利益的懸殊，要求的歧異。二月革命勝利後，他們中間的暗鬥，

是顯然的發展起來。無產階級正在以獨立的立場踏在歷史的先頭；同時，也就招徠了全部資產階級的法國起來反對它（無產階級）。

盧森堡委員會 無論工人們正在那裏爭取實現所謂「社會」共和國，而資產階級却在極力加強與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即使工人從政府方面，一時得到了若干諾言，但是資產階級不使之見於實現。即使工人選派了自己代表到政府中去，但是資產階級還極力排除工人在政府中的附庸地位。總之，使這一革命的勝利成果，完全落在資產階級手中。

工人所急切要求於共和國的什麽呢？就是「勞動權」，他們在路易勃朗主義影響之下，以爲政府能夠保障勞動的權利，則工人生活地位就可以改善，在政府內部只要有勞動機關，則勞動權利然後才有保障。這大概就是「社會」共和國吧！

這在二月二十五日的時候，巴黎勞動也就在政府辦公廳前面舉行示威。工人馬士（Marcbe）跑進辦公廳內喊道：「人民不信任臨時政府的意思，人民如果不得到一道命令，宣佈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存的時候，他們是不會散的。」政府要人——拉馬丁從各方來避免對馬氏問題的答覆。於是馬氏氣冲冲的說道：「不要說空話啊！這種政治的把戲也要夠了！人民是主人翁，他們命令這些公僕以命令宣佈勞動權，不要遲延吧！（見李卜克內西的「三月十八及其相同事件」）不錯，政府曾經被迫的接受了路易勃朗的提議：公佈過這樣的法令，即「法蘭西共和國當以工作保障工人的生活；它當爲一切國民找到工作；它承認工人有聯合之權；臨時政府關於工人的，它從平民所得的百萬法郎轉給工人」。可是，法令還是法令，法令公佈之後，政府毫無動作。馬克思關於這點，曾經說道：

『幾天之後，它已經將它所允許的事件忘却了，他的心目中是沒有無產階級了。於是二萬工人們列隊到辦公廳，大呼：勞動的組織！成立勞動的特別內閣；臨時政府爲了反對這種熱潮，經過長時間討論之後，就任命了一個特別的經常的委員會，並委託它去『研究』改善勞動狀況的方法。這個委員會是由巴黎的各手工業組合的代表組織成的，而以路易勃朗、亞爾伯特爲主席，盧森堡宮爲其辦公地方。這樣，工人階級的代表，就從臨時政府的會址中被驅逐出來，而臨時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就把這個實際的國家政權完全的拿在自己手中了。』（『法蘭西階級鬥爭』）

由此，可見二月二十八日成立的『盧森堡委員會』無非是政府中資產階級耍的一套妙把戲，目的在於把工人階級的代表從政府中驅逐出去，藉以完成自己清一色的統治地位而已。同時，還在工人中可以散佈這樣的煙幕，彷彿政府是代表工人的，藉此以緩和工人的鬥爭。工人階級之受到這樣的欺騙，也就剛剛證明路易勃朗主義——所謂『勞動組織』學說的破產。馬克思接着說：

『工人們大體上同資產階級一塊共同幹出了一個二月革命，現在工人們想與資產階級併列起來貫澈自己的利益，彷彿在臨時政府中，他們也在資產階級大多數的旁邊安置了一個工人。「勞動的組織呀」！但是，僱傭勞動，這就是已經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勞動組織。沒有僱傭勞動就沒有資本。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勞動的特別內閣呀」！但是，難道財政的商業的公共事業的內閣，不就是勞動底資產階級內閣嗎？在它們的內閣旁邊來一個勞動的無產階級內閣，這個內閣一定是沒有力量的內閣，一個白白開心的內閣，一個盧森堡的委員會。工人們既相信能夠與資產階級連在一塊去達到「自己的」解放，因而他們也相信在法國國境之內，能夠與其他資產階級國家連在

一塊去實現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同上書）

國營工場　資產階級對工人耍的把戲，還不止於一個「盧森堡委員會」。二月二十七日，政府又下令組織國營工場（National Work shop）（這是路易勃朗在盧森堡委員會所極力主張的）。政府的目的，在於向勞動者證明路易勃朗思想之愚妄，使勞動者親身去試驗自己所相信的「社會主義」（即路易勃朗的社會主義）之無出路，藉此以撲殺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同時，又增加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負担，激起他們對工人們的不滿，分裂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關係，藉此以奪取小資產階級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共同來反對無產階級。

妙極了！國營工場於三月一日成立於巴黎。一八四七年的經濟恐慌，到一八四八年因受革命影響愈形嚴重。法國全境失業者日增，單在巴黎一處，三月已有五萬人，四五月間已達十萬人。失業者成羣結隊的湧到國營工場來，除巴黎之外，在里昂、馬賽、蘭德、魯安等地也組織起來。失業者在這工場內作工，所作者並非生產工作，多半是挖土築城。這種工作，並非人人做得來的。所以每人每週只做兩日，每日給工資二法郎（以後減至一法郎半與半法郎）。至於主持工場的人就是工務大臣託馬斯，這人正是路易勃朗的主要政敵，也是敵視工人的健將。資產階級任命這樣一個極端反對路易勃朗的人來實行路易勃朗的理想，這真是太聰明太滑稽了。工場內面，厲行嚴格的管理與粗暴的待遇，生活的惡化更不待言了。自然工人們就不滿意啊，於是聰明狡猾的資產階級及託馬斯就馬上回答工人們說：「這就是你們所「希望」的社會主義呀！這就是勞動權呀！」

政府供給在國營工場的這批錢又是從那地來的呢？資產階級在這一點更是聰明得很，不但是弄錢的

好機會到了，同時破壞工人與農民聯合的機會也來了。他們藉維持國營工場的經費之故（主要的是好大肆剝削法國人民，自己從中漁利）就立刻在國稅上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的附加稅（即每一法郎上增加四十五個生丁），用這一般人民的稅收，來代替對銀行家工業家及投機者的稅收。這種稅收就成爲農民的主要負担，於是馬上引起廣大農民及小手工業主的不滿，甚至引起農民的叛亂。這時，政府就有詞可借了，政府對工人說：「這種稅收，主要是從地主與大發財人那地來的」；但是，對農民說來又不同了，它不但告訴農民：「這是爲了要養活工人，是工人要你們加稅呀！」同時還大肆造謠說：「工人不但要使你們加稅，他們還要奪取你們的土地，實行社會主義咧！」因此，農民對附加稅的憤怒，就立刻轉爲對國營工場以至對一般工人的憤怒。農民說：「國家的勞動年金——這就是社會主義呀！」，「要我們增稅去維持寄生者呀！」於是，農民就視勞動者爲仇敵，謂國營工場爲懶惰者的避難所。這不但使工人階級陷於孤立，同時還使資產階級抓住農民來反對無產階級。

「農民担負了二月革命的費用——並且，他們組織了反革命的主要軍隊……從此以後，在法國農民看來，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稅繳給國家，而巴黎的工人則是他的浪費者。」（「法蘭西階級鬥爭」）

資產階級分裂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接合，但不以此爲滿足，同時還進一步的去分裂無產階級本身，而使工人階級中這一部分與別一部分對立起來。資產階級在國營工場內抽出一部分工人成立軍事組織的「第二勞動軍」，並且在巴黎及各地召募十五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多半是流氓無賴之徒）組織二萬四千人的「動員隊」（每人每日領受一個半法郎），使之成爲自己的武裝力量之一部，增強反對無產階級的武力。然而，「這次資產階級在國營工場中却做錯了，也如工人在青年動員隊中做錯了一樣，資產

階級建立了騷亂的軍隊，但另一個目的是達到了。」（同上書）這就是說：勞動者在國立工場中自己被組織起來，與一部分被武裝起來了。這就替爾後的鬥爭中，特別是六月暴動中培養了一部分工人暴動的力量。在這一點上，資產階級是上了當。可是，破裂勞動者的關係，組織青年動員隊，資產階級是收到他的效果，達到了他的目的。

三月十七日與四月十六日的運動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暗鬥是在一天天的向前發展着，由於這些種種的欺騙，臨時政府卒使勞動階級日益陷於孤立。但是農民對於政府的賦稅政策不滿，不管政府如何嫁禍於工人，而農民小資產階級與政府中間的矛盾還是存在的。政府為了緩和農民的不滿，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工人階級起見，於是頒佈了四月九日進行立憲會議選舉的公示，同時極力準備資產階級完全當選。照這樣下去，資產階級的勝利，已是手到前拿的事。此時勃朗基已從終身禁錮的監獄中釋放出來，他看透政府的陰謀；他準備了在三月十七日舉行巴黎羣衆大示威，目的在於：（一）挽回政府走上革命的道路，迫使政府在可能條件下清除其中資產階級的成員；（二）要求延緩國民會議與國民軍的選舉日期，使羣衆方面可以從事準備。但是事實上國民軍中間的資產階級，却在三月十六日舉行了一個反對臨時政府的示威，這般資產階級者們跑到政府辦公廳去，高喊：「打倒律德魯．羅林」的口號，要求政府趕出左翼分子。因此，左派所預定的三月十七日示威，其質性，就不能不完全改變，原為向臨時政府示威的運動，就一變而為擁護臨時政府的運動。這天羣衆示威者的口號是「律德魯．羅林萬歲，臨時政府萬歲！」這自然就更加鞏固了資產階級在臨時政府中的地位。

四月十六日，民主派又組織新的示威。大批工人們集合於馬爾斯及意皮德魯姆廣場，準備國民軍總

司令部選擧。馬上，資產階級大造其謠言，說『工人武裝隊伍在路易勃朗、勃朗基、加貝等領導之下，企圖暴動，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共產政府』。同時他們在一小時之後，召集了上十萬有武裝的人，政府辦公廳都由國民軍把守，並高呼『打倒共產主義者，打倒路易勃朗、勃朗基、加貝！』而廣大示威的武裝的工人及民衆，則打起許多旗幟，上面寫道：『勞動的權利、勞動的組織』，『廢除人對人的剝削』。結果示威遊行是被驅散了。資產階級正以此藉口調遣外面的國民軍，囘駐巴黎。

馬克思說：

『所以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迫在眉睫的鬥爭中，一切優勢，一切險惡的地位，社會中一切中間階層，都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十六日，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內醞釀起來的兩大階級鬥爭的前哨衝突。』（同上書）

國民會議與眞正資產階級共和國成立　資產階級（金融貴族也在內）在臨時政府中的勢力愈益鞏固，他們爲了對付無產階級與廣大民衆，不能不極力拉攏小資產階級、農民、地主以至保王黨分子與牧師，目的在於包辦國民會議的選擧。他們事先在各地竭力煽動，在農村中利用教會牧師的宣傳，造成許多關於『均產』與『共產』的謠言，城市中的小店主甚至手工業者，也同樣驚懼『共產』之說，許多人來擁護資產階級。國民會議共九百五十個議員中，資產階級共和派佔大多數，其中還有不少的來自鄉村的保王黨與牧師。路易勃朗之當選是所得票數最少的一個。

在五月四日的國民立憲會議中，無疑義的，是資產階級佔絕對優勢。臨時政府宣佈解散，法蘭西正式共和國成立，由國民會議選擧了執行委員五人，組織政府最高機關。這是資產階級清一色的政府，這

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

如果說在二月革命以後五月四日以前，法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還是多多少少帶着一種暗鬥的形式；那末，從五月四日以後，這兩個主要階級的鬥爭，就進到公開的鬥爭，同時這兩個主要階級的鬥爭也就眞正走上法國歷史的首位。

如果說，二月革命後所宣佈的共和國，是被迫宣佈的，是工人還有一小分的，是資產階級統治至少受些威脅的共和國；那末，現在五月四日以後的共和國，則是「正式」產生的，「國民」承認的，沒有工人參加，而且是在鎮壓工人之後實現的。這個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完全統治的共和國了。

「是從五月四日起而不是從二月二十五日起，才算是共和國的開始。就是說，爲法國人民所公認的共和國的開始；這個共和國，不是巴黎工人向臨時政府所要挾的共和國，不是實行社會立法的共和國，不是堡壘中的戰士們所夢想的共和國。國民會議宣佈的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共和國。決不是反對資產階級建築物的革命武器，而是相反的，它是重新鞏固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復辟——一言以蔽之，它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同上書）

正是如此，國民會議就立刻把工人階級代表，路易勃朗、亞爾伯特，從原來政府的行政委員會中開除出去。建立勞動特別內閣的提案也否決了。新閣員退勒爾說得很明確，他說：「現在只有一句話：勞動仍舊。」

第三節　六月暴動與資產階級專政

這是法國革命的「第二時期」（從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即六月暴動失敗，共和國製憲和國民立憲會議時期。

巴黎六月暴動　從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五日，這個段落就是：一切階級對無產階級作戰。無產階級於六月間失敗。國民會議選舉的結果，打破了許多工人中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迷夢，使工人逐漸了解到自己被欺騙了！由是工人對新政府更表示不滿。工人們不滿意於政府的，不僅是在政府的對內政策，而且是政府的對外政策，因為政府不去援助德、奧的革命，特別是波蘭的革命運動，反而去支持反動的俄、奧當局，壓迫波蘭，壓迫奧國的革命運動。五月十五日，十五萬工人結隊遊行，逕赴國民會議地址。勃朗基及巴貝代表工人，要求給失業者以工作，對富豪施行重稅，援助波蘭等事。工人們並企圖以「國民」的名義解散國民會議，而以路易勃朗、勃朗基、律德魯·羅林、亞爾伯特諸人組織革命政府，結果又遭失敗。動員隊及國民軍開到，驅散了羣衆。亞爾伯特、巴貝、拉佩龍以及爾後勃朗基亦被捕。革命總會被封，盧森堡委員會被解散。對勞動者所做的一切讓步均至此作廢。羣衆受到這種打擊以後，首領大部被捕，亦紛紛散去。

這樣工人們已處於受盡摧殘無路可走的境地。然而，資產階級政府當局還不以自己的勝利為滿足，還要故意挑釁，逼得工人去走絕路，好再給以嚴重的打擊。資產階級早已才[illegible]國營工場中這般有組織的工人遣散，以絕「禍根」。果然。六月二十一日，政府即下令廢止國營工場，工人一律解散歸田，或另去墾地，健壯者被迫入伍，於是工人們大為憤怒，堅決表示不願離開巴黎。二月二十二日無數的勞動者失業者被趕到街頭。這時工人已走上絕路，就是，「讓工人去選擇一下：或是飢餓而死，或是開始鬥爭。」

（馬克思）傍晚巴黎街都是勞動大衆，他們高呼：『麵包呢？餓死呢？』『自由呢？戰死呢？』憤激之情已是無法制止。可是資產階級的一位將軍則很得意的說：『我們叫他們集合在他們的巢窠裏，然後我們再開隊伍去剿滅他們。』（見洛卡洛夫：『唯物史觀世界史』）這時資產階級不是嚴陣以待，而是首先用鞭棒與槍彈加以彈壓。二十三日，工人們連同家小均在郊外市街，築起自衛巷戰工事。到二十四日晚，政府軍事部長——卡芬雅克（Cavaignac），即率領其調動妥當之國防軍、『動員隊』等等，滿副武裝，齊向工人障礙物進攻。工人不得已，即從事英勇的、決死的抵抗，並堅決提出『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的口號。『慘不忍睹與喪盡天良』（Herzen的話）的屠殺，從此開始。一連三個晝夜，差不多把政府所能用的武裝力量都拿出來了，這是法國三次革命中所未有過的屠殺。並且，巴黎郊外以至相距百里之外的農民亦紛至沓來，加入到反革命方面。自然在暴動者方面，因武裝缺乏，力量太弱，旣無正當組織，又無好的指揮，雖經三晝夜的英勇抵抗，卒以衆寡強弱懸殊，乃向後退却，並節節抵抗。到二月二十六日午後二時，暴動者的最後根據地——聖安特那的街市陷落，暴動遂完全失敗。俘虜均被殺死，有的活埋地下，參加暴動者捉去即格殺無論。是役也，戰死在戰壕的工人，有一萬五千，被捕者一萬五千人。據英國當時報紙所載，死傷人數達七萬以上。路易勃朗曾經說道：『慘極了！就是死難者的親友，眼見死者的慘狀，連嘆息一聲都不敢！』

實在得很，巴黎六月暴動（這是資產階級所逼成的）是完全失敗了。它不是小小的失敗。而是全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它不只是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而且很有力的影響到當時德國同其他國家的革命進於不利；它不僅招致了法國資產階級聯合一切反動勢力來盡情壓迫法國無產階級，並且是影響西歐國家

資產階級，很快去聯合一切封建君主勢力，來對付整個的無產階級。它使爾後西歐工人運動低落了若干年；特別在法國，無產階級驟然失去大量力量之後，整整地二十年脫離了政治舞台；直到七十年代，才恢復氣力，更來了一個偉大的奪取政權的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

實在得很，六月暴動是失敗了。然而它在革命史上，在工人階級謀解放的運動史上，却具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它是現代資本社會中，無產階級爲着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爲着企圖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之第一次大流血的戰爭。

馬克思說：

『六月暴動是現存社會分裂出來的兩大階級間底第一次大流血，這是爲着保存現存資產階級制度，還是推翻現存資產階級制度的鬥爭。』（『法蘭西階級鬥爭』）

第二，它打破了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以來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迷夢與幻想，使勞動者眞正去了解到：要解放工人階級，只有靠工人階級自身的鬥爭。

馬克思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新萊茵報』上寫道：

『巴黎的勞動者是被他們敵人的優勢武力所壓倒了。但他們沒有降服在武力之下；他們是受到摧殘了，但他們的敵人亦被克服。橫暴武力之暫時的勝利，却換來了：二月革命的一切蠱惑與幻想都消滅了。全部舊共和黨都瓦解了，法國國民分爲有產者與勞動者兩種了。……同胞的情誼，對抗階級的博愛（在這對抗階級中，是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這種博愛是二月間在巴黎面前，在各

個監牢各個營房前面，用大字所大書特書的；現在，它在什麼地方呢？這種博愛的眞正的實在的乾脆的表現，只是國內戰爭，只是形態最兇猛的國內戰爭——勞動與資本的戰爭。」如果說二月革命是美麗的普遍同情的革命；那末，「六月革命，剛剛相反，是憤怒的衝擊的革命；因爲，事實代替了空話，因爲共和國揭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把怪物的眞面目現露出來了」。

第三，它又暴露了當時路易勃朗及其他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之破產；或者說，即使它還未完全破產；那末，這種破產也是不可避免的。想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國旁邊，靠和平的法實去樹立一個勞動內閣，靠資產階級給予勞動權去實現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必然是空想，實質上，是反動的。六月革命剛剛證明了這種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行不通；而這次革命所走的道路，剛剛是遵循着科學的社會主義所指出來的道路，雖然當時法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不知道科學的社會主義。

「這次勞動大衆的失敗，才對勞動大衆顯示出這樣的眞理：即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勞動大衆欲作些許的改善，亦不過是一個空想，只有自己去鬥爭，才能夠實現。」（馬克思）

第四，六月暴動的失敗，正是樹下法國的以至歐洲的無產階級將來勝利的基礎。

「只有六月暴動的失敗。才能夠把歐洲革命的發難權抓到自己方面來。只有浸染在六月暴動的血泊中，三色旗才能夠轉變爲歐洲革命的旗幟——才能夠轉變爲紅旗。」（「法蘭西階級鬥爭」）

清一色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專政與路易拿破崙當選總統　從六月二十五日到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這個段落就是：清一色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製訂憲法，巴黎宣佈戒嚴。十二月十日資產階級專政覆沒，拿破崙被選爲大總統。

六月暴動失敗之後，這是無產階級的失敗，自然就是資產階級一時的勝利，特別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勝利。溫和的共和黨已成爲當時法國的主人翁，他們在國民會議中佔大多數，政府也在他們手內。國民會議爲了報酬這位「六月英雄」——卡芬雅克起見，特任命他爲法國執政的臨時元首。在他執政之後，就首先消除空想社會主義的「勞動權利」，撤銷國立工場，並且封閉許多民主的俱樂部及三十多家報館，取消臨時政府所規定的十小時工作制，代以十二小時工作制，恢復對城市糧食的關稅，否認以前延期還債的規定，否決累進稅的法令。總之，凡二月革命以後，下層民衆所爭得的少許利益，都被當局剝奪得乾乾淨淨。這就是燦然出現的清一色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專政。這個專政，不獨加重了工人羣衆的痛苦，把他們打到十八層地獄中去，而小資產階級也大受起痛苦來。

共和派資產階級爲了從法律上鞏固自己的利益，並強迫人民承認自己的統治地位起見，形式上並不放棄所謂「全民」的共和國，並不拋棄所謂「普選」權。一八四八年九月四日起到十月二十三日止製定了共和國的憲法：規定立法權屬於國民立憲會議，而行政權則屬於總統，總統由普選選出，每四年一任。因爲對「赤色巨影」的恐怖，國民立憲會議特加強大總統的作用與權限，大總統可以不得國會同意而任免各部長，並有統率軍隊支配行政之大權。這就無形種下了日後共和國倒台的禍根。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全法國人民按照憲法規定正式選舉大總統。共和派資產階級很洋洋得意的；滿以爲這次選舉，大總統一職定是屬於自己政派的人物——卡芬雅克的。就是卡芬雅克本人，也是胸有成竹地覺得這次總統一職是「舍我其誰」？然而，事實上，選舉的結果，剛剛相反，卡芬雅克只是得了一百四十多萬票，而拿破崙第一之姪——路易·邦拿帕特（即路易拿破崙）竟突然以五百四十多萬

票的絕大多數而當選爲法國大總統了。（再其次是小資產階級的律德魯·羅林得三十七萬票，無產階級的拉佩龍得三萬六千多票）

表面上看來，很是奇怪！爲什麽此時忽然來了一個路易拿破崙當選呢？其實，路易拿破崙當選是有其最順利的社會歷史基礎，自然，「舍我其誰」的不是卡芬雅克，而是路易拿破崙。關於這一問題，只有馬克思才明確的加以說明了。

他說：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是農民暴動的日子，法國農民的二月，僅僅是從這一天開始。……在農民看來，拿破崙不是一個單個的人，而是一個政綱。他們舉起旗幟，奏着音樂，走上選舉台，高呼着：取消賦稅，打倒富翁，推翻共和國，皇帝萬歲！在皇帝背後隱藏着一個農民戰爭。農民投票反對的共和國是富人的共和國。」（「法蘭西階級鬥爭」）

這就是說，爲什麽法國農民都選舉路易拿破崙，而成爲他當選的票數中之大多數。因爲農民不滿意於現在共和國剝奪他們的利益，却毫沒忘記，前一個拿破崙「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因而也希望這一個拿破崙，彷彿他也一定會與前一個拿破崙一樣，一樣地成爲他們的保護者。於是他們死心塌地的擁護拿破崙，不管這個拿破崙是不是從前那個拿破崙。

然則其他階級又爲何選舉路易拿破崙呢？馬克思又接着說：

「其他階級也幫助成農民選舉的勝利。無產階級選舉拿破崙，首先認爲是推翻卡芬雅克與立憲派，是推翻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總之，是破壞六月的勝利。小資產階級認爲拿破崙當選是債務

者對債權者的勝利。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認爲選舉拿破崙與這樣政派（卽共和派）底公開的破裂，這種政派曾經在一個時候，成爲他們（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工具，而現在却想用立憲來鞏固自己臨時的地位。從這時起就爲他們（大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所不能忍受。拿破崙代替卡芬雅克，對於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就是君主制代替共和制。最後，軍隊選舉拿破崙，就是舉手反對「動員隊」，反對和平理想，主張戰爭。」（同上書）

這樣，路易拿破崙就在這種階級關係的新變化下，剛好利用這些階級間的新矛盾，從一個普通軍官一躍而爲全國大總統了。究竟拿破崙將來要做出一些什麼事跡來，於此可想見其大概。

共和派資產階級與拿破崙鬥爭，共和國瓦解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這就是：國民立憲會議同邦納帕特及與邦納帕特聯合的秩序黨作鬥爭。國民立憲會議滅亡，共和派資產階級失敗。

十二月二十日卡芬雅克去職，國民立憲會議宣佈路易拿破崙爲法蘭西大總統。拿破崙就職後，首先就任命路易腓立浦末屆首相巴洛爲自己第一屆首相。並且招徠了許多舊的反動人物爲各部部長及其他重要官職。這樣國家大權很快就獨攬在拿破崙及其巴洛內閣的手中了。他又重新徵收以前臨時政府曾經取消了的雜稅，並施行很多極反動的方法來削弱與消滅國民立憲會議的力量。邦納帕特拿破崙是代表據有小塊土地的保守農民（實際上就是較富裕的農民），而其統治則是依賴資產階級君主派與保王黨所組織的「秩序黨」爲靠山的。自從他統治之日起，秩序黨的內閣，自然就與以前執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不相容，於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勢力就一天一天的垮台下去。這種鬥爭，在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表示

得特別明顯。國家的實際行政權，既完全操在拿破崙及秩序黨內閣手中，所謂國民立憲會議的立法權，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而已。這時共和派資產階級眼見自己的共和國之崩潰，亦無如之何。它現在來求助於資產階級的羣衆嗎？而資產階級的羣衆現在是屬於君主派的。求助於小資產階級嗎？小資產階級也無若何獨立力量，何況農民還是拿破崙的支持者。求助於工人階級嗎？工人階級的力量已經在六月事件中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了。卽令共和派的資產階級感覺到自己大難當前，除了利用立法機關空口空話的招牌以示掙扎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假如說，法國工人階級在六月革命才感覺到自己是上了當；那末，法國共和派資產階級到了這個時候又何嘗不有點懊悔呢？

何況資產階級的共和黨還始終不能脫離對秩序黨的附庸地位，猶之民主黨不能脫離資產階級共和黨附庸地位；無產階級政黨當時也不能脫離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的附庸地位一樣。

結果，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民立憲會議被解散，而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亦完全失敗。關於這個時期，馬克思會這樣說道：

「從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民立憲會議被解散的這個時期，充滿了資產階級共和派失敗的歷史。這些資產階級共和派，爲着資產階級奠立了共和國，從流血場合中驅逐了無產階級，在一個時候，又箝住民主小資產階級的口，他們自己還拋棄了資產階級的羣衆，這種資產階級羣衆就是共和國的全權主人（亦如自己私有財產的全權主人一樣）。但是這些資產階級羣衆是屬於君主派的。一部分是大地主，一部分是財政『巨頭與大工業家』。（「霧月十八政變記」）

這樣，資產階級共和派就不能不失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是路易拿破崙及其秩序黨的專政。

第四節 資產階級立憲共和國及其瓦解——路易拿破崙的政變

這是法國革命的「第三時期」（從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卽立憲共和國與國民立法會議時期。

立法會議與小資產階級失敗 從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十三日，這個段落，就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及邦納帕特鬥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失敗。

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民立法會議開會，進行新的選舉，秩序黨（從前保王黨及資產階級君主派）在這共和國的議會上佔着極大多數，總共七百五十席中卽佔了五百席。那些不久以前還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受了極可恥的失敗，他們只佔五十席。代表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新山嶽派」（亦稱社會民主黨，又稱「紅黨」），反而佔一百八十席。這樣，整個國家的政權，顯然就落到秩序黨的手中了。秩序黨在立法會議之前，多少用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辦法，而集中力量把它當時最主要的對手——資產階級共和派打下去，使後者在這次立法會議中受到了可恥的慘敗；但是，從這時起，秩序黨的拳頭，自然就要轉過來，打它的這個對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新山嶽派」了。

在秩序黨內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爲它是資產階級及君主派與地主階級的結合。因此，在秩序黨中有所謂「正統君主派」（Legitimists）、「奧爾良君主派」（Orlanists），另外還有「邦納帕特派」（拿破崙派），但是它們都是極痛恨共和制，現在爲了與在立法會議中擁有相當勢力的小資產階級民主

黨作鬥爭，大家仍然是結成一氣。總之，他們的目的是要達到把民主共和的勢力完全從政權中驅逐出去，不然他們是不會罷休的。

以律德魯·羅林爲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它以「新山嶽派」自居，儼然如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派，想在立法會議中來與大權在握的秩序黨作鬥爭。可是，這個「新山嶽派」不但沒有「老山嶽派」（一七九三年）的眞實社會基礎與政治力量，就是革命勇氣也是很缺乏的。其中所含的社會主義者很少，大部分是由小資產階級的議員組織而成，何況當他們在立法會議中與秩序黨作鬥爭中的時候，因爲「紅黨」的招牌甚至連殘破不堪的資產階級共和分子，也不敢接近他們，有時這些共和派還與秩序黨一塊來反對他們。所以，小資產階級民主黨的失敗，已是不可避免了。

六月十一日，律德魯·羅林以山嶽派的名義，對於總統與內閣違背憲法，舉兵幇助羅馬敎皇、干涉意大利革命、並砲擊羅馬一事，提出彈劾。六月十二日立法會以三百七十七票對八票的絕對多數，否决了這一彈劾案。六月十三日山嶽派發表宣言，宣佈「總統、總長和立法會議大多數代表，不在憲法保護之列」，並號召國防軍陸軍和人民起來「反抗」。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是「憲法萬歲」。是日，小有產者舉行所謂「和平的示威」，人約三萬，其中大半是沒有武裝的國防軍人，並雜有祕密工會的分子，一路很冷靜的喊出「憲法萬歲」的口號。遊行不久，大多數參加者與山嶽派人，就很快的被武裝軍隊驅散，就是律德魯·羅林所率的小小代表團，也因等不到國防軍第五、六兩軍來參加，而亦被驅散。結果，一部分代表被捕，一部分被逐，六月十三日的結局就是如此。

小資產階級這種失敗，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曾經在昨年六月暴動前後，完全站在資產階級共和派方

面，集中力量，打敗了無產階級，自以為天下大事從此定局，這些民主黨分子亦可依附資產階級共和派去『坐分一杯羹』了。殊不知更大的敵人一來，不但不讓共和黨存在，就是連民主派也站不住脚了。當小資產階級孤軍挨打的時候，就再想求助於無產階級也不能了。因為巴黎無產階級已經被六月事件彈壓下去，沒有大的氣力了。這時已『噤若寒蟬，愛莫能助』了。結果，自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從立法會議中滾出去，一部分逃出國外，一部分去過鐵窗生涯，勝利的是執政的秩序黨。

馬克思論及此點，說道：

『立法會議於六月十二日否决這種彈劾案，恰和立憲會議五月十一日否决它一樣。然而資產階級這一次驅逐山嶽派跑到街上去，不是去從事街市鬥爭而是去遊行示威；這就十足的說明：山嶽派是站在這一運動的頂點上，正好去領略這個運動的失敗，並知道一八四九年六月恰恰是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一種可笑的無價值的諷刺畫。

十二月二十日湊合起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只沒一半存在——只有一個總統，五月二十九日又補充起另一半——補一個立法會議。一八四八年六月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假手於一種不可形容的傢伙去對付無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假手於一種無以名狀的滑稽劇，去對付小資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失敗的不是工人而是站在工人與反革命之間的小資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發生於僱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流血慘劇，而是發生於債務者與債權者之間的一種牢獄的悲歌。秩序黨已經勝利了，他成了無上的威權者，現在它就應當顯示它的本領了。

六月十三日完結立憲共和國第一個在世的生命時期，……在這開幕的全期中，充滿了秩序黨與山嶽

派，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中間喧嚷的鬥爭。這個小資產階級徒勞無功的反抗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然在臨時政府與行政委員會中，他不斷的暗中贊成共和國。當六月之後，他又為着共和國像發狂一樣的攻打無產階級。六月十三日他就失去了抵抗力量，致使聯合的君主派完成其立法獨裁的事業。從此以後，國會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公安委員會罷了。」（「法蘭西階級鬥爭」）

秩序黨在國會的專政　從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到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個段落，就是：秩序黨的國會專政，秩序黨以取消普選權完成自己的統治，但是，失去國會內閣。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繼資產階級共和派之後，遭受了失敗。自然，秩序黨在政權中，就大權獨攬，目空一切了。國會在此後六、七、八月中，全部的活動，專於在鎮壓任何對政府的反抗與不滿上面。任何言論、出版，都由政府統治，任何民主活動，都要受到禁止。至八月中旬，一班君主主義者議定國會停會兩月，而以二十五人委員會代行它的職權。事實上，這時國會已無用了。立法會議的停會，結束了立憲共和國之第二生命時期——即它的君政主義之青年時期。

此地應當說明，路易拿破崙與秩序黨的「正統君主派」及「奧爾良君主派」中間的矛盾，是增大起來。拿破崙利用這個休會時期，親往各地巡遊，藉此試探風色，以謀發展與加強自己的地位。十月初旬，立法會議復行開會；拿破崙對於立法會議及內閣表示極不滿意，雙方因公債問題及其他紛歧而發生衝突。十一月一日，拿破崙通告立法會議，撤換巴洛內閣，另組新閣，而以佛爾德為財政總長，以前的財政貴族，更因佛氏登台而得勢了。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拿破崙恢復酒稅，一八五〇年一、二月，又頒佈許多不利於民衆的法令，

這樣就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特別是貧苦農民），就造成了國內一種普遍的攻擊政府的空氣。這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共和派，小有產者民主派與無產階級接近起來，對抗政府與秩序黨。

三月十日的巴黎選舉中，站在工人影響之下的巴黎選舉委員會，提出了三個候選人，這三個候選人，在選舉中得到勝利。一個是參加過六月暴動的工人代表梯佛洛特，一個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威特爾，另一個是資產階級共和派代表葛爾洛。『這是一種反抗大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普遍的聯盟，如同在二月革命中一樣。不過這次是無產階級作革命聯盟的主腦。』（『法蘭西階級鬥爭』）

政府當局，鑒於民衆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大為驚懼。他們知道這種勝利，是普選權作怪。一八五〇年五月，經國會大多數表決，遂將普選權取消，僅僅承認在一個地方居住三年以上而具有一定財產資格者始有選舉權，凡侮辱政府參加祕密組織均治罪，並剝奪選舉權。自然勞動大衆以至許多小資產者，革命的指導者，均無選舉權。從此，秩序黨的獨裁統治遂完成了。

路易拿破崙政變立憲共和國滅亡　這是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最後一個時期的最後一段。其內容就是：國會的資產階級和路易拿破崙鬥爭。路易拿破崙實行政變。其中經過：首先從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到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這時，因為秩序黨的專政，又激起了國會的資產階級與拿破崙的秩序黨鬥爭。可是，路易拿破崙不但掌握行政大權，而且在這時間內，把法國軍隊統率權完全拿到手內。軍隊與官場要職滿佈了自己的黨羽和心腹，而國會則失去了這一軍隊的統率權。呈現着空手無力的慘景。其次，從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到四月十一日。這時，國會則力圖恢復對行政的權力，終於沒有成功，而秩序黨又被拿破崙派排擠，失去其在國會中獨立的大多數地位，使得秩序

黨又去與共和黨、山嶽派，然時已晚矣！再其次，從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到十月九日，拿破崙企圖審查憲法，爲了收買人心提議要恢復普選權，延伸拿破崙的政權時日。這時，一方面是秩序黨分裂爲許多單個部分；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國會派報紙又與資產階級羣衆最後分裂了。最後，從一八五一年十月九日到十二月二日。這時，國會既與行政權力最後分離，又爲自己階級、軍隊以及其他一切階級所共棄，而歸於孤立。因此，拿破崙政變一切準備工作，都弄好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卽依靠自己的軍隊與黨羽爪牙的力量，實行政變。巴黎宣佈戒嚴，解散國會，逮捕一切不利於自己的國會代表。十二月四日，一部分國會代表組織示威運動表示反抗，但爲時已晚，不但示威毫無結果，而且赤手空拳的人物又遭受了軍隊一飽頓彈壓。

路易拿破崙既獲全勝之後，於是大權獨攬，而與皇帝無異。但是，爲了欺惑羣衆，又來恢復普選權，舉行新選舉。

一八五二年一月拿破崙稱帝，名爲拿破崙第三，於是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從此完結，『第二帝國』，從此開始了。

『第二帝國』，是什麼性質的政權形式呢？

它是拿破崙第三在保護資產階級不受工人的侵犯與保護工人不受資產階級的侵犯爲藉口之下，取消了資本家的政權。而實際上，是爲了保護一切有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進攻底特別目的而直接發明的國家形式——卽拿破崙式的君主制度。第二帝國並非別的，『就是少數政治的與財政的冒險家對於法蘭西的剝削』。（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引言）『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這政權曾經被它用

來作爲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工具，並且在它完全發展時，轉爲替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之最娼妓化的最後的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就是說：爲什麼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結局是路易拿破崙政變與拿破崙「帝國」的成立呢？換句話說，造成路易拿破崙勝利的原因安在呢？

第一，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一切有產階級聯合起來向無產階級進攻的結果。

自從法國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以二月革命的名義，奪取了國家政權之後，這時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權，已經顯然的直接的成爲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而當無產階級起來，要爲着所謂「社會」共和國而鬥爭的時候，簡單說來，就是爲着本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馬上就利用這一政權，實行六月的屠殺。資產階級眼見自己的奴隸竟敢如此與主人爭奪國家統治權，而其他一切有產階級均在自己的私有財產面前，對着無產階級的行動表示驚惶失措——在這時候，姑無論他們中間有如何深刻矛盾與衝突，可是對於無產階級主義的威脅，使一切有產階級不能不在對於無產階級這一點上，大家聯合起來，利用國家的政權，作爲全國資本壓迫勞動的武器。然而，問題中心，就在於要使全國資本壓迫勞動愈壓得有力，要使一切有產者的資本、財產，愈覺有着保障，就不能不更加強化這個政權武器，就不能不把這更強大的政權權力，交給強有力的當局，就不能不使當局能於盡情剝奪一切削弱行政權力的任何工具與任何障礙，而使這一行政當局能夠一手承担那保護一切有產階級進攻工人階級的使命。因此，路易拿破崙不但剛好乘機奪取政權，而且代表行政當局，剛好爲所欲爲了。政變之不足，還來他一個「第二帝國」又有何不可呢？

馬克思說：

「如果在從前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執使國家政權受到相當限制；那末，現在（指拿破崙當選爲總統之後）因爲有產階級的聯合，這種限制已經沒有了。由於無產階級起義的威脅，聯合起來的有產階級，便狂暴的、無情的、利用國家政權作爲全國內資本壓迫勞動的武器。但是反對生產者羣衆的十字軍的征伐，一方面不能不以更大鎮壓抵抗的權力給予行政當局；另一方面，又從國會的堡壘（「國民會議」）逐漸剝奪它反對行政當局的一切工具，結果代表這行政當局的拿破崙第三，驅散了這有產階級的代表。所以第二帝國實是「秩序黨」共和國的必然結果。」（「法蘭西內戰」）

第二，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法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管理法國，至少在那個時候不能管理法國的結果。

法國資產階級利用無產階級與廣大民衆的力量，在二月革命中竊取了法國的政權，自以爲天下大事已定，今後唯一任務，就是剝削、壓迫、宰割與鎮壓無產階級了。他們不但在勝利之後，用分化、欺騙、防止的辦法，來排斥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動與少許的利益，並且聯合一切有產階級，來向那敢於以單獨的階級資格與要求起來反對它的無產階級，施以瘋狂的殘暴的六月鎮壓，一方面使自己昨天的恩人與同盟者受到了極慘痛的失敗，而另一方面，又使一切非共和派的以至保王黨的分子大抬其頭。共和派的資產階級沒有力量來統治法國，他們爲了鎮壓無產階級，不得不以高度的報酬去聯合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即至無產階級被壓迫下去之後，他們又沒有力量來統治法國，因而就不能不把政權的首列讓

給「秩序黨」，而自己却退到最後之一列。並且，那時法國資產階級大多數都是保王黨的，資產階級內部是互相鬥爭的。然而爲了對付無產階級，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不僅與保王黨的資產階級分佔政權，自己甘居末位；並且還寧可共同擁戴拿破崙爲總統，在國會主義共和國的形式之下，大家聯合起來以與無產階級對抗。正因爲資產階級一方面主要對抗無產階級，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內部又爭執不息，結果，就使冒險家拿破崙有機可乘，使他能夠奪得一切主要的政權機關，能夠推倒資產階級的最後堡壘——國會，最後能夠組成第二帝國。

恩格斯講到：

「資產階級第一次做給人家看：當無產階級敢於以單獨的階級資格，以自己的要求起來反對他的時候，它將如何以瘋狂般的手段來對無產階級復仇……可是，資產階級不必很多的等待它所應得的處罰。如若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蘭西，那末，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至少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管理法蘭西了。那時資產階級的大多數都是保王黨的，其中分成三個皇朝的政黨（卽舊的「合法王朝派」，「奧爾良派」，「拿破崙派」），第四個才是共和黨。它的內部的自相殘殺，使冒險家拿破崙第三奪得了一切主要的政權機關：軍隊、警察與行政機關。並且，使他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推倒了資產階級的最後柱石——國民會議，第二帝國成立了。」（「法蘭西內戰」引言）

第三，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資產階級固然已經失去了統治權力，而無產階級亦尙未能得到這種統治能力的結果。

上面已經說到法國資產階級在當時已經沒有統治法國的能力；現在來說，究竟當時法國無產階級有

沒有統治法國的能力呢？也是沒有。因爲法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用在二月革命中，只是去造成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勝利。所謂『社會的』共和國究竟還是一場空想！卽至他的力量用到六月革命中，又被一切有產階級打得落花流水，所謂『社會的』共和國到底只是共和國對於他們社會的奴役。無產階級的力量，是備受摧殘了，愈往後走，愈是有產階級對他們強有力的壓迫、對抗與進攻。一切國家的政權力量都愈加明顯、愈加有力的，成爲資產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就是到了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的選舉，雖然巴黎的無產階級佔到了領導的地位，但其結果『是將他排斥得不能參加任何政權，甚至使他失去決鬥的場所。這個法律使工人們亦如二月革命以前一樣，站在旁觀地位。……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失敗，使它們在許多年中不適宜於鬥爭。』（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政變記』）

因此，法國無產階級由於本身力量發展之不夠，由於大多數還浸染着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特別由於六月失敗之命運，使他們在當時的法國還沒有得到統治的能力，甚至當拿破崙爲所欲爲的時候，就是那時與拿破崙鬥爭的共和派資產階級，想再來求助於無產階級的幫助，而這時的無產階級，就是想去幫助他，都不可能了。資產階級統治法國既不可能，無產階級統治也不可能；結果就只好讓拿破崙勝利。

馬克思又說道：

『事實上，在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統治能力，而無產階級尙未得到這種能力的時候，帝國是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法蘭西內戰』）

第四，路易拿破崙的勝利也與拿破崙第一相彷，是法國保守的農民支持他的結果。

法國農民在大革命的勝利中間，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土地。這班據有小塊土地的保守農民（主要是以富有農民爲首的一般小康的農民）一方面，把大革命勝利的功績錯在『拿破崙』三個字的人的上面，歷史傳統使他們迷信了路易拿破崙；另一方面，又爲路易拿破崙的號召所蠱惑，再加上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以及共和派資產階級政府對他們徵稅的結果，使他們把皇帝看成了他們的救星。因而這班農民就成了路易拿破崙的強固社會基礎與強有力的擁護者與支持者。

馬克思解釋這個問題時，曾經這樣說到：

『邦納帕特是一個階級的代表，是法國社會一個人數最多的階級的代表，即小農的代表；……小農組成很大的羣衆，他們生活在一樣的條件之下，但缺乏各式各樣的相互關係。他們的生產方法不使他們聯繫起來，而使他們彼此孤立起來，法國交通道路的惡劣與農民的貧困，更加助長了這種孤立。他們耕種的小塊土地，不能有勞動分工，不能應用科學，自然也沒有複雜的發展，沒有各樣的本能，沒有帶社會性的財富，每個農家差不多是完全自給自足的，他們最大部分的消費品都是自己生產出來的。所以，他們的生活資料仰給於與自然交換的，較之與社會交換的爲多。這裏是一小塊土地，農民及其家庭；那裏又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農民，另一家庭。六十塊這樣小塊的土地，成爲一個村，又差不多是這樣多的村，成爲一個鄉。法國國民主要的羣衆，就是這種數目簡單加起來的，就好像一袋子馬鈴薯是由裝進到馬鈴薯袋的個數加起來的一樣。因爲上百萬農家都在這樣經濟條件之下，這樣與其他階級利益的教育不同的而且是敵對的生活方式之下生活着，他們成爲一個階級。因爲在這些小農中間只有一種地方的聯繫，一種相同的利益，在他們中間沒有任何社會性，

沒有任何民族聯繫，沒有任何政治組織，他們又不成爲一個階級。因此，他們就不能去用自己特別的名義，彷彿經過國會或國民會議來保護自己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必須要別的階級來代表他。他們的代表必須同時是他們的主人，卽站在他們上面的威權者，無限的政府權力，靠這種權力來保護他們，使之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且還得到雨露與陽光的養育。小農的政治影響，其最後表現，就是說，行政權宰制社會。

……拿破崙的專制主義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想解脫現時社會環境的農民，而是想鞏固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想用自己力量聯合城市打破舊制度的鄉村民衆，而是相反的這樣的鄉村民衆，他們想關閉在這種舊制度之內，保全自己的財產，自己的小土地，以免帝國的怪物之侵犯……拿破崙專制主義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將來，而是農民的過去。

……歷史的傳統還產生了法國的農民信仰拿破崙這個人，這個拿破崙把他們全體變爲小康。」

（「霧月十八日政變記」）

第五，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他那國家統治權力強大於革命勢力的結果。

路易拿破崙充實與發展了拿破崙第一所完成的資產階級國家權力機關。這個壓迫階級的工具，在軍隊、警察、官僚主義、宗教的支持之下，是具有很大的權力，特別拿破崙依靠流氓無產階級所組成的軍隊，是可以一時鞏固他的政權的。他這個統治力量，在當時說來，是無比的超過一切反抗的力量的。縱然當時有着革命力量起來實行局部的反抗，亦難免於失敗。路易拿破崙的統治，雖是以帝制代替了共和，以有皇帝的政體代替了無皇帝的共和，但它仍然不失爲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仍然是不失爲資產階

級的王政。它為了「資產階級之秩序」，為了除去「赤色危險」，這還是資產階級及一切有產者所樂意的。在這樣情形之下，自然他——路易拿破崙能於勝利。何況，法國無產階級既已退出政治鬥爭的舞台，小資產階級相繼失敗，最後只剩下沒有民衆力量幫助的資產階級去與挾着巨大實力的拿破崙較量長短，這難道拿破崙的勝利還沒有把握嗎？

第六，路易拿破崙的勝利，也是由於一八四九年，特別是一八五〇年法國工業繁榮的結果。

總之路易拿破崙帝制是勝利了。「這一以國家政權為誕生證書，以普選為聖旨，以寶劍為王笏的第二帝國，聲稱要依靠於農民，即依靠於那沒有直接參加資本與勞動間的鬥爭之廣大生產羣衆之上。帝國自稱為工人階級的救主，其根據是說它破壞了國會主義以及與之一起的政府，對於有產階級公開的服從；同時，它又自稱為有產階級的救主，其根據是說它擁護有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經濟的統治。最後它聲稱要聯合一切階級於國家之光榮的、重新復活的怪物的周圍。……全世界歡迎這個帝國，把它看作是社會的救主，在它的統治之下，資產階級社會解除了政治的顧慮，達到了他所夢想不到的這樣高度的發展，工商業大大擴張起來，交易所的投機，慶祝着自己縱橫世界的歡樂；民衆的貧困同無比的奢侈（用欺騙與犯罪得來的）尖銳的互相對峙着。表面上，高高立在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一社會的最大的恥辱與一切可鄙東西的養成所。……帝國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之最娼妓化的最後的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簡短的結論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把法國政權從土地所有者手中轉到大資產階級手中；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又把法國政權由少數資產階級手中轉到一般共和派的資產階級手中。出力的是工人階級與一般民衆，享樂的是資產階級與一般有產者。不過七月革命特別是二月革命，都是把政權從工人階級較遠的敵人手裏奪來，交給他的較近與直接的敵人手中。用自己的鮮血作代價換來了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並且在勝利之後，要提出他自己的要求；無論這些要求多少是不清楚的與模糊的，但歸根究底，這些要求的目的，總是在於消滅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的對抗。提出這般要求的工人是武裝起來了，這些要求與武裝總是對現存制度莫大的危險。『所以佔有國家統治權的資產階級的第一個任務，便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恩格斯）在六月暴動中，『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的要求與行動，出來與當政的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時候，就必然使資產階級與一切有產者大聯合起來，殘暴的向工人階級進攻，『這鬥爭的結局是工人階級的失敗』。（恩格斯）

但是，在六月的大事件中，資產階級共和派既不能不求助於其他保王黨的資產階級，加之，本身力量亦在六月勝利中受到打擊；因而在六月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共和派在政權中的地位，反是大爲削弱，就不能不讓其主位於資產階級保王黨了。既然是爲了聯合對付無產階級，因而無論資產階級那一政派，也都願意在以拿破崙爲總統的國會主義共和國之下，團結起來。雖說其中大權，主要握在『秩序黨』手中，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也滿不在乎。正是爲了這一聯合的強固與更爲有力，就不能不使政權當局享受更高度的與更順手的權力；就不能不把障礙當局權力強化的國會廢除。因此，也就不能不把資本家的政權形式及其最後支柱國民會議消滅；歸根到底走上了拿破崙的稱帝。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全部過程裏及其內部階級關係的變動情况，簡單說來就是如此。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結局，雖然如此，但這次革命也具有它重大的歷史意義與特點：

第一，法國二月革命，由於無產階級的勢力造成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時由於無產階級獨立力量之興起，又造成了法國資產階級不適於統治與無能力統治。在這種情况之下，法國資產階級想維持他在經濟上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就不能不把政權乾脆的交給有權勢的陰謀家，就讓人家消除自己在權的國會堡壘，成立帝國亦在所甘心。法國無產階級不僅在二月革命中，以其尖銳的鬥爭造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並且他還替自己階級將來的勝利打下了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使他能於很快走上「以獨立的階級出現」，「第一次與資產階級爭奪統治」，而其反對正在統治的資產階級之鬥爭形式的尖銳實爲當時歐洲各國所不及。雖然，法國無產階級還未獲得統治法國的能力，但這一能力是在歷史程序上一般地向上升漲着。六月事件指出了這樣一個特點：「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已經過去，未來的革命應該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

第二，法國這次革命在歐洲範圍說來，是有决定的作用。二月革命之首先爆發，就如雷鳴電閃的刺激了歐陸諸國的革命，特別是刺激到奥、普、意諸國的革命，可以說法國革命幾乎是操着歐洲革命的發難權。而六月暴動的失敗，又强有力的影響到奥、普諸國革命的命運。法國二月革命之又一次達到鬥爭的决絕點，不僅是嚇壞了法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把德國資產階級都嚇得臨陣畏縮了；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之公開的直接的與資產階級互爭統治，更是把歐洲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以至君主勢力，都震動得手足無措，而極於聯合起來以反對無產階級了。所以，法國革命在當時說來大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之概。

從這次法國革命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什麼歷史教訓呢？

第一個教訓，就是『法國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了；因此，對於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因此，在每一次工人得到勝利之後，就有新的鬥爭，其結果是工人失敗。』（恩格斯）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認為『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驗之總結』。這也就是這次法國革命的重大教訓。

第二個教訓，就是：『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為「資本進攻勞動的戰爭底全國武器」，而第二帝國鞏固了這一武器。』（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有的政變都使「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臻於完善，而並沒有破壞它。這就昭示在資本主義統治國家內的無產階級以如是的任務：『那些相互更替為着取得統治權而鬥爭的政黨，都要把這個巨大的國家建築物底奪取，視為自己主要的勝利品。』（『霧月十八日政變記』）換句話說：在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　資產階級已經獲得統治政權，這個政權已經成為資本進攻勞動的全國武器時，在這樣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其任務，應當破壞與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地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個教訓，就是：無產階級無論為着最近的將來的鬥爭，都必須要有獨立的為馬克思主義所武裝的政黨（共產黨），只有在這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全部鬥爭的勝利才有保障。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為當時法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還在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籠罩

之下，還未能接受馬克思主義，自然還談不上有眞正獨立的羣衆的戰鬥的共產黨。所以，法國無產階級無論他表現了如何偉大英勇的鬥爭，但結果終歸失敗。無產階級之首先失敗，也就決定了資產階級之失敗；結局，也就決定了整個革命之失敗。可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之建立、發展、鞏固與加強是無產階級今天應努力的資產階級革命及將來應努力的無產階級革命之最必需的勝利條件。

第四個教訓，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但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達到勝利；相反地，這種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尖銳的鬥爭中，只能使無產階級屈服於資產階級，只能阻礙毒害無產階級的發展，只能造成無產階級的失敗。列寧曾經專門講到這時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指出這個在當時法國盛極一時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對於工人階級運動莫大的危險性，他說：

「法國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其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因爲他從階級爭鬥的立場轉化到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博得聲譽。他這立場，是在假「社會主義」之名，而實際上只能加強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和路易勃朗截然分離而不復再返的事，這是必須的。……假使大家不理解這種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危害，則路易勃朗主義會影響到今後革命的勝利。」（列寧：「論路易勃朗主義」一九一七年四月眞理報，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九一頁）

「一八四八年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慫恿路易勃朗入閣，並使它從素來勞動者的社會主義指導人變成資產階級之附庸，而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使資產階級從其陣營中遣出卡芬雅克以與無產階級作決死的戰鬥，無產階級因此屈服。」（列寧：「卡芬雅克派是從什麼階級基礎上來的？」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六日眞理報）

至於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中的勃朗基主義，雖與路易勃朗主義有些不同，但亦不失爲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這次法國革命暴露了這般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實質，並且替他們掘開了坟墓。雖然無產階級是失敗了，但另一方面却使無產階級日愈脫離這般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泥坑，而愈益團結到眞正的無產階級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方面來。這次法國革命，充分的證明，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所指示的道路之上，無產階級才能眞正達到解放，才能眞正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第五個教訓，就是在拿破崙統治之下，即在農村封建殘餘掃除與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之下，法國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是不可免的由負債、納稅、經濟上屈服於大土地所有者，而生活惡化，而失去土地，而走向破產。這不但是使當時法國農民，日益認識自己的命運與必然脫離拿破崙；並且告訴了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廣大的農民是沒有出路的，這時，農民大衆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城市無產階級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領導者，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農民羣衆才能眞正得到自己的解放。

正如馬克思所說：

「農民的利益不是去與資產階級的合唱，不是在與資產階級的合唱中間（這在拿破崙統治下正是如此）去獲得，而是在反對他們中間去獲得。因此，農民在城市無產階級中間，才找得到他天然的同盟者與領導者，這裏的無產階級是以消滅資產階級爲職責的。」（「霧月十八日政變記」）

在另一方面，馬克思根據當時法國情況所得出的教訓，又着重指出：在資產階級統治或資本統治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爭取農民的合唱。馬克思說到：「對拿破崙的王政絕望的法國農民，將失去自

己對土地的信仰……無產大衆革命將得到合唱，沒有這種合唱，則一切農民國內的無產大衆革命就會成爲葬歌。』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以至於整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也就是因爲法國農民，都是做了統治的資產階級的同盟軍。他始而同資產階級一塊，共同反對了無產階級，旣而成爲拿破崙當選的最大多數的選舉人，終而成了第二帝國上台的支柱，來推翻了共和國。因此無產階級鬥爭必須同農民結成合唱，然後勝利才有保障，同時也可以說明：在任何民主鬥爭與民主革命中，亦必須發展農民，奪取農民，使之眞正發揮他的革命力量，勿使農民爲敵人所利用，這是萬分必要的。

最後，拿破崙的勝利還教訓了法國資產階級。

馬克思說：

「法國資產階級爲了反抗勞動無產階級的統治，却把政權交給於以「十二月十日社」爲首的流氓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想使法國對於赤色無政府主義驚悸失色——拿破崙則在十二月四日命令他那爲酒所鼓舞的秩序軍，在槍殺蒙馬斯路，意大利路那些站在自己窗戶下的體面的國民時，就把這種將來，兌現給它們看了。資產階級崇拜武力——武力統治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推翻了革命的報紙——他自己的報紙也被推翻了。資產階級用警察監督人民開會，他自己的會場也受到警察監督。資產階級解散了民主的國防軍——他自己的國防軍也被解散了。資產階級宣佈戒嚴——人家也對他戒嚴了。資產階級用軍事委員會去代替預審法庭——他的預審法庭也被軍事委員會代替了。資產階級把民衆學校交給牧師統治——牧師也來統治他自己的學校了。資產階級不經過審判卽放逐人民——他也不經過審判而被放逐了。資產階級用國家權力壓制社會運動——國家權力也來壓制他的一切運動

了。資產階級珍愛自己的錢袋，不惜反對自己專力的政治家著作家——現在，他的政治家著作家固然剷除了，但在他緘口屈舌之後，他的錢袋也被搶刼了。資產階級對革命（亦如阿仙林斯對於基督教一樣）叫喊：「滾蛋！停息！肅靜！」——拿破崙也對資產階級喊叫：「滾蛋！停息！肅靜！」（『霧月十八日政變記』第七節，見俄文本『馬克思選集』第二卷）

這就是法國資產階級在無情壓迫了無產階級之後所應得的處罰。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政變記』中，總結到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法國革命時，他的基本結論是：

『……然而革命是澈底的，它還在經歷艱苦的道路。它正在有條理的執行它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的一半，現在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的後一半。它首先完成立法權以獲得推翻它的可能。現在它已達到了這個目的，它便來完成「行政權」；使這個權力變成爲最純粹的形式，並使之孤立，使之與自己對立，成爲唯一受攻擊的中心，以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它……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的後半部的時候，歐洲便會站起來歡呼：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就是說，當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了，未來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所有政變使國家機關臻於完善而並沒有破壞它』，今後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把奪取這巨大的家庭建築物』作爲自己的主要任務。

第五章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

本章研究提要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以來成爲歐洲反動中心的奧大利與普魯士的革命。這次革命，是德國第一次資產階級的革命（雖然德國在十六世紀就最先發生過中等階級的暴動）。重要任務就是要推翻德國若干年來的封建專制政體與統一德國從來沒有眞正統一的國家。因爲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英法爲遲，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發展，也比英法爲晚，所以德國革命只能比英法爆發得遲。到十九世紀上半期之末，才爆發起來。這次革命是德國社會內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舊的封建關係的矛盾，發展到極高階段之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德國革命進展與結局與英法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經過不少過程，而逐步完成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用平民的手段比較澈底完成的革命；可是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事先也是資產階級發動，但至革命一開始，資產階級就因畏懼工人與民衆，很快的由動搖而妥協而或早或遲的離開革命。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起了很大的積極的作用，但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尙不能有獨立的政治行動，其中大多數，只能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站在一起鬥爭，而這般民主派又缺乏政治的堅定性與澈底性；結果，使德國革命無論在奧大利在普魯士，都是半途而廢：致使德國革命沒有完成它的任務。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德國革命，從它的歷史社會的根源中，從它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到它的結局，都出現了許多重要的

經驗與教訓，值得每個革命者去理解的。恩格斯專門爲着這次德國革命著了一本書：「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值得我們詳細研究。

研究本章時，應注意以下各點：

㈠德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及這次革命爆發的原因何在？

㈡德國的階級關係，在革命前與革命後有何變化？在與大利與在普魯士，有何大同小異之處？

㈢德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安在？

㈣馬、恩關於這次革命得出了些什麼經驗與教訓，並指示給無產階級一些什麼鬥爭的策略？

第一節 德意志是怎樣沿革來的

古代的德意志 研究德國革命，不能不把德意志過去的歷史沿革略略的講到一下，首先講到古代的德意志。

古代德意志人，主要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這個字是「好戰」及「鄰人」之意）。它是印度日耳曼人的分枝。在紀元前數世紀時，即遷住在多腦河，維斯杜拉河及北海一帶。紀元前一世紀，羅馬凱撒征服了日耳曼人。紀元初年，日耳曼人一部，擊敗過羅馬軍隊，並開始向羅馬帝國侵入。三世紀末，匈奴人向西進犯，侵入窩瓦河與日耳曼人接觸，引起歐洲日耳曼人大遷移。從這時起，日耳曼人乘羅馬帝國衰弱，大舉向羅馬侵入，中間經過許多戰爭，到第五世紀初，日耳曼人的力量幾乎籠罩了全羅馬帝國的領土。其中西歌德人於紀元四七六年趕走羅馬皇帝，四七八年西羅馬帝國沒落，到五世紀末，日耳

曼人中最強之法蘭克人克洛維希，又大敗羅馬人，建立謀洛維基王朝，於是在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日耳曼人統治時代。

日耳曼人直到大遷移之前，還是氏族社會。其經濟生活首先是遊牧，以後轉到經營農業；到居地固定時，農業才逐漸發達起來。當時『差不多都是由氏族內及以後又由共產主義的共同團體共同耕作的——這是凱撒在蘇埃比人中所見到的習慣，這種習慣的結果，土地要定期的重新分配……。日耳曼人當羅馬時代所佔領的領土，及後來從羅馬人手裏所奪來的領土上之移居，當不是由村落構成，而是由包括許多世代的大家族共同體構成。……因爲人口稀少，所以留有的曠地尙甚多，卽不必爲土地佔有而發生爭論。然至數世紀之後，因家屬同團體的人口增多，以致共同耕地不能與當時生產狀態相容，於是家屬共同體就崩壞，以前共同的耕地及草地，就用一般知道的方法，分配給如今業已成就的各別的家族，這種耕地的分配當初是定期的，後來是永久的，而森林草原及沼地，依然是共有的財產。……』（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在凱撒時代的日耳曼人，雖然一部分剛得到確定的住所，一部分尙在探尋，但在塔西佗時代（卽紀元九十年代前後）。他們已住定有百年之久了。其結果，在必需品的生產上自有顯然的進步。他們住在木屋中：衣服還是森林時代的原始式樣，用粗笨的羊毛外套、獸皮，女子及貴人則用麻的下衣，食則乳肉，野生果實及燕麥。貨幣只有羅馬通貨不便使用，與羅馬人直接接觸的諸部落因爲便於輸入羅馬的工業生產品，所以妨礙了他們自己的金屬及紡織業之發達。但在東北部巴爾海岸諸部落，却是確有此類產業之發達……青銅的金屬物是起源於日耳曼。』（同上書）

「……據塔西佗說，領袖的協議會，一般是決定輕微的事件，但是大的事件，須先審議然後交民會去決定……因此各氏族中漸漸產生了「高貴的」家族，這些世襲的貴族，大多數在民族大遷移中或不久之後卽趨於沒落。軍事的領袖是全視他們的能力競選的，他們的權力非常小，且必須依靠先例以行動，軍隊的眞正統率權，有如塔西佗所明說，是由僧侶把持的。民會是現實的權力機關。部落的聯盟自從凱撒時代以來就存在了。有幾個已經有王。最高的軍長，如在希臘及羅馬人中間一樣，已開始謀做篡竊者。有時也能達到目的。這種成功的篡竊者，決不是絕對的統治者。但他們已開始破壞氏族的約束。被解放的奴隸因不能作氏族的成員，故大體僅居低微地位，惟新王的寵幸者，常能獲得地位財富與榮譽。在法蘭克人中，王之奴隸及被解放者，起初在宮庭，以後在國家皆是重要的角色，大部分的新貴族是由他們出身的。」（同上書）

「……有一種制度特別促成王政出現的是傭兵。……他們是古氏族崩潰的先兆，當氏族遷徙中及以後的事，又證明他們是害惡的先驅。因爲第一，他們促進王權的生長；第二，如塔西佗所確證，他們僅能由不確的戰爭及掠奪才得以維持。刼奪成爲他們終身的目的。當征服羅馬帝國之後，此等諸王之傭兵與非自由的羅馬之宮庭使臣，都成爲日後貴族之另一部分。」（同上書）

「……於是就全體看來，聯合爲民族的日耳曼的部落中，有與在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及所謂王政時代的羅馬人所已發達的相同制度存在：卽民會、氏族長協議會及企圖獲得現實王權的軍長。這是氏族所能產生的最高制度。是野蠻上期的模範制度，倘使社會越過了爲這一制度所能滿足的界限時，那麼氏族的秩序就告終結。國家則代之而起」。（同上書）

紀元一世紀時，日耳曼人大概有六百萬人。在羅馬帝國奴隸制度時代，農業均由奴隸經營。即至日耳曼人侵入羅馬領土之後，另一部分人也變為奴隸，同時他們又不斷破壞羅馬奴隸制度。因為戰爭的頻仍，土地所有者的窮乏及都市的滅亡，使以奴隸勞動為基礎之田莊及園圃的耕作，在經濟上不能獲利，反使小農生產復成為唯一有利的形態。當時田莊依次區分為小的地塊，租給繳納一定租金的佃農，或者是把許多小塊土地分配給移民。在這戰爭中，掠奪的首領、上司、強者就成為領主所有者，而貧苦移民或弱的戰士就成為定居的農奴。這些農奴是可以與其租種的土地一齊出賣的。但同時也還有自由農存在。然而，這般自由農民，又因避免官吏高利貸及其他強暴者之掠奪，常求助於有力者之保護，不僅個人甚至全團體，都把土地所有權讓給保護者，得到自己終身『自由』的享用其土地，這在四世紀時即出現，而到五、六、七世紀時更加普遍化。這種土地所有權為少數有武力有特權的人所私有。他們又將這種基於農業上的生產手段分給隸屬於土地所有者的農民耕種，而從中榨取地租與勞役。這種封建主義，就在這個時代中成長起來，到八世紀略墨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時代，可以說在基本上已形成起來，雖然這時日耳曼人從氏族社會中遺留下來的馬克共同體還在很長時期內保存着。

到八世紀時，日耳曼人內部主要還有這樣幾種人：法蘭克人，屠林根人，士瓦本人，巴威人，弗里新人，撒克遜人。

八四三年凡爾登條約之後，直到八八七年墨森條約訂立，原來法蘭克王國，最後分為東西法蘭克及意大利王國共三個國家。所謂東法蘭克王國，就是德意志。古代德意志的簡單歷史，就是如此。

封建時代的德國　德國封建制度的形成，雖然有它內在的許多原因，但是它是與不斷的戰爭有密切

聯繫的。在戰爭時，國王把土地封給臣下，武士作爲封土。封土的所有者——即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又把這些土地分封與自己的臣下，然後佃予或招徠農民耕種。臣下對領主則負以種種臣屬的義務。領主對自己領有的土地，不僅有土地所有權。而且有行政上一切支配權。封建的政治結構，最上者爲皇帝（或王），其次爲大貴族的領主，再其次爲小貴族的領主，再下有武士；而其最下層的基礎，則是隸屬於領主土地的農奴。領主的土地構成爲莊園，莊園中有領主直轄的土地與租佃出去的土地，而直轄的土地中又有直轄佃租地與賦役地。此外，教堂又擁有大批土地成爲教堂的大土地所有。無論如何，廣大農民是隸屬在領主的土地之上成爲繳納租稅負担一切封建束縛的直接生產者。即使原來有些自由農民，也因避免搶奪與求得保護的原故，依賴領主，終久也就變成爲隸屬於領主的農民。這時，氏族社會遺留下的馬克共同體制也隨之崩潰下去。德國封建領主之強化，封建壓迫之繁重並不遜於封建時代的俄國法國。

封建時代的德國同樣是充滿了戰爭：一方面是國王與封建領主之爭；另一方面，又有德國國王與羅馬教皇之爭。前者，因封建制度之基於農奴生產的自然經濟，加之交通不便以及對外作戰的頻仍，致使各地封建領主權威日大，割據稱雄，而謀與國王對抗。這使德國王朝自八世紀以來，山喀墨林王朝，而撒克遜王朝（九一九年——一〇二四年），而哈布斯堡王朝（十三世紀末起），一直到十五世紀，均時斷時起的發生國王與封建諸侯的戰爭，使德國始終不能真正走上國權的集中與國家的統一。後者，則因自十世紀末鄂圖大帝（Otto）建立了德國的『神聖羅馬帝國』之後，這種又想依賴羅馬教皇之名，又想行脫離羅馬教皇羈絆之實的政策；在十一世紀末葉，亨利第三，亨利第四時代，特別是十二世紀中葉菲立特第一時代，均發生過德皇與羅馬教主之爭。到一二二八年，菲立時二世時代，因五次十字軍東征的

勝利歸來，又舉兵征意大利，一二四一年完全征服羅馬教皇所在地之意大利。到一四九五年哈布斯堡王朝，馬克西米連第一時代，德國領土向西愈見擴大，對內則極求統一，曾召集帝國會議，企圖形成中央集權；然而德國實際上的分裂還是存在。

德國在中世紀初期的手工業與商業是怎樣呢？當時莊園的自足自給經濟中也養得有許多不自由的手工業者，修道院中也有。但同時因爲要滿足國王、領主、武士、教堂的需要，不僅木工、石工、織工，甚至鐵工也發達起來。這些手工業也逐漸變爲專門的職業。他們大部常是巡行作業，無有定居。接着，商人也發展起來。並且，在喀羅林王朝已有物品經過專門商人向國外貿易。至十、十一世紀，萊茵河畔商業卽逐漸發達，十字軍東征，對德國商業亦有影響。然而這時的城市還是半農村性的。到十三世紀中葉，最大城市如紐倫堡、佛蘭克府、巴塞爾，亦不過幾千人到一萬人而已。統治手工業的還是農村村落的地方手工業。至於德國城市手工業中間的行會（Zunft）的組織則開始於十二世紀，它較法、意、諸國爲遲，十三世紀才普遍化。

『到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德國手工業已有顯著進步，城市行會組織的生產已取封建村營的地方工業而代之，爲較大的銷路而生產，甚至爲遙遠的市場而生產。』（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技術的進步（爲滿足主教與諸侯、貴族的奢侈品，手工技術及火藥、印刷業之發明），手工業的發展，使商業亦追隨工業前進。『汗撒同盟』（十四世紀起）在差不多一百年中間襲斷了海上航路，使北德意志全部脫離中世紀的野蠻狀態。雖然，在十五世紀末期以後，因大西洋到東方航路的發現，德國商業已敵不過英、荷的競爭；然而印度到北歐的商業大道還是要經過德國。十五世紀，德國的鑛工是世界上最熟練的

工人。而農業亦因植物肥料採用，大批開墾而顯有進步了。

但是應當說明，『這時德國國民生產的進步却趕不上其他國家的進步，農業遠遠落在英國、荷蘭之後，工業遠落在意大利、法倫米和英國之後了。至於海上航路，則英國人特別是荷蘭人，都把德國排斥於勢力範圍之外了。人口依舊稀疎……沒有一個城市像英國倫敦那樣，成爲全國工商業的中心。國內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及幾條交通要道。距這些內河與商業大道很遠，有無數較小的城市，因爲和那些商業中心隔斷，繼續停滯在中世紀後期情況之下，只消費不多的舶來品與製造不多的輸出品。鄉村居民中，僅僅貴族與廣大世界與新需要接觸，而農民羣衆則不曾踰越地方關係和地方眼界的範圍。』（同上書）

『英法兩國工商業的發展使全國的利益連結一貫，因而造成政治上的統一。而德國這種過程，僅僅促成以省爲單位，環繞地方中心之各種綜合，所以造成政治上的分離。又因德國被排斥於世界商業之外，所以這種分離不久卽得到穩固。統一的紐帶按照純粹封建帝國崩潰的比例而鬆懈。大封建藩屬幾乎變成獨立的諸侯，而且帝國直轄的諸城市和帝國的騎士們，都締結同盟，或互相對抗，或與諸侯對抗，或與皇帝對抗……而必操最後的是分離中間統一的代表，卽地方和各省統一的代表，這就是衆諸侯。皇帝降於衆諸侯之例，漸漸降爲與衆諸侯中之一個相等』。（同上書）

這時階級關係較之從來有顯著的變化。「諸侯」從貴族中發生成爲脫離皇帝獨立的地方統治者，大權在握，爲所欲爲，盡情的剝削人民，以滿足慾壑與塡補空虛。小貴族日益破產。「僧侶」：大者形成教權貴族，極力剝削人民以增殖財富；其下層分子則益不免陷於貧困。從中世紀傳來的「市民羣」內面

發生這樣集團：一，名望貴族，擁有大批資財，且有買得封建特權的閥閱之家，他們也是很厲害的壓迫中下層市民；二，中等階級反對派，卽富裕的溫和的中等階級，爾後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自由主義者的先輩；三，城市平民反對派，包括中等階級破產的分子和無公民權利的城市居民羣（手工業工人、日工、貧民）這中間是一部分由舊封建與行會社會破產的分子，與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之前身的分子，結合而成。至於「農民」，恩格斯說：

「一切階級的基礎——除了平民反對派之外——是立於大多數被剝削民衆卽「農民」之上的。負着社會一切階層的重担者是農民。這些階層就是諸侯、官吏、貴族、僧侶、閥閱之家和中等階級。無論農民是隸屬於諸侯、帝國、勛爵、僧正、僧院或城市，他在各地都被認爲牛馬，或比牛馬更壞的東西看待。如果他是奴隸，那他要完全聽從於主人的驅策；如果他是農奴，由契約所規定之法律的束縛，就可以完全壓倒他，甚至這些束縛一天天加重。他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其主人的產業上面。從他不多的自由時間之內所得到的東西，又要拿出來繳納什一稅、欠款、地租、戰爭稅、土地稅、帝國稅和其他開支。他不支付主人的錢，不僅不能結婚，並且想死也死不了。除了這些正規的賦稅之外，他不得不替其主人收集乾草，摘梅採橘，收集蝸牛殼，打獵、研椎等等。釣魚與打獵，屬於主人。農民睜開眼看着自己的收成受野獸踐踏。農民的公共牧場與森林，到處被主人強迫沒收。而且主人可照處理農民財產的方法，更糟踏到農民本身和他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權，無論何時，可任意把農民投之獄中。在獄內拷問農民正和現在預審法官拷問犯人一樣。無論何時，他可撲滅農民或者把農民斬首。加洛林納法典各章中，指出「割耳」、「割鼻」、「挖眼」、「斬首」、

『車裂』、『焚燒』、『夾火鉗』、『砍四塊』等等，沒有不被仁慈的貴族主人任意實行。誰能來保護農民呢？法庭被勛爵、僧侶、閥閱之家坐滿了，他們深知自己爲什麽而享受薪俸，帝國的一切官吏是不虛糜農民血液的啊。』（同上書）

正是這樣的階級矛盾——中等階級，平民以及農民等，反對封建諸侯貴族僧侶的矛盾，發展到十六世紀初葉，於是爆發了中產階級反封建的大鬥爭。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這個反封建的大鬥爭是從馬丁路得（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的宗教改革運動開始的。爲什麽呢？因爲『它「中世紀」從古代破碎的世界保留下來唯一的東西，是基督教和多半已經荒廢與失掉文明的城市。結果僧侶得到知識教育的壟斷權。在僧侶掌握中的政治學、法律學和其餘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支幹，均按照神學上流行的原則去處理，……神學在知識活動領域內的最高特權，是從當時教會地位產生出來的必然結果，而這教會地位則爲贊助和承認現存封建統治下之總的力數。很明顯地，在這種情形之下更要向封建制度作總的公開的攻擊；首先要向教會攻擊』。（同上書）

如果說，在反對舊的基督教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那末當時馬丁路得所提倡的改革，只是代表當時中等階級，而且是中等階級改良派的。中等階級要求一個廉潔的教會，要求恢復古代簡單的教會制度，和廢止獨佔的侶僧階級。所以馬丁路得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德國威頓堡教堂公佈的九十五條論文中，反對羅馬教會的獨佔的教義，反對教權超於俗權之上，論述國家的神權，主張應以俗權召集宗教會議改革教會弊端等等，都無非是當時中等階級的要求的反映。

馬丁路得這一發動，不僅引起了中等階級的擁護，不僅博得一些與教會或王權對立的諸侯與小貴族的同情，而且推動了下層階級，特別是農民運動的開始。可是，馬丁路得在一五一七年間，是經過一個轉變，開始他是站在運動前面，並對開幕的農民運動表示同情。他說：「如果羅馬教徒的憤怒狂繼續下去，我以爲除了國王諸侯採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這些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一舉而致其死命之外，又有何法去對付他們呢？」他認爲「農民反叛是由於政府壓制的結果」，「不僅農民反對政府，上帝也同樣反對政府」。可是，到農民暴動發展起來之時，馬丁路得亦如當時中等階級一樣，立刻受後面的民衆與革命黨的威嚇而一蹶不振了，他由調和派的立場就進到公開贊助反動勢力以撲滅農民暴動。這時他的立場是「無論是誰，只要他力所能及，都應該秘密的公開的把農民隊打得粉碎，或用繩絞，或用刀刺，像我們撲殺瘋狗一樣」。

馬丁路得這種轉化，正是反映當時社會內溫和的中等階級的立場。當時社會的營壘：第一，是反動的天主教；第二，是中等階級溫和派（路得派）；第三，是孟采爾的革命派。中等資產階級首先在宗教上發難，同時只在於改革宗教以適合於中等階級的胃口；但是爲了反對天主教與必然觸怒當時政體，自然非依賴民衆與發動民衆作爲後盾不可。可是民衆起來之後，當然不只以中等階級的宗教要求爲滿足，他必然要擴大爲解決社會問題而鬥爭。這樣，就使中等階級不安，亦猶之使統治階級不安一樣。於是馬丁路得及其所代表的中等階級，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事業半途而廢，不但去與反動勢力妥協，而且極力向反動勢力鼓吹，以來鎮壓農民暴動。十六世紀的德國中等階級到底還是十九世紀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先輩人。然而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也就不可免的失敗了。爾後由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中產生了適合於專制

帝國的宗教。

農民戰爭　現在來說十六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農民戰爭吧。

從上面的敍述中，我們可以知道中世紀末期，德國農民生活之萬分痛苦。這種農民革命的要求與中等階級改良的要求是同時生長於封建統治的壓迫之中。一四六七年德國在武志堡地方開始有農民祕密結社，一四七六年在培斯白烏河發生一次農民暴動，一四五一年一四九二年荷蘭發生了農民暴動，一四九三年在亞爾薩斯地方出現農民鞋會運動（以農民之鞋懸於旗上以示貧極思鬥之意），這些暴動都相繼失敗了。一五一四年春天，在符騰堡又發生了三千到五千農民的暴動，暴動者佔領了伯克蘭、溫蘭敦、馬克郎林根等城市；同時在匈牙利也發生了農民暴動，結果亦均失敗。當時，一切反對份子投入運動漩渦中，一五一八到一五二三年在黑森林和斯德比亞上部，各地暴動接踵發生。可是德國農民戰爭眞正的發端，則在斯託林根（Stuehlingen）開始。

斯託林根的農民爲了堅決拒絕對於伯爵的各種負担，集合強大的羣衆，一五二四年十月他們在汗斯、密勒（Hans Mueller）的領導之下向瓦爾德休前進。他們聯合亞爾薩斯，摩西爾，全部萊茵河上游的地方農民，組織同盟，宣言剷除封建勢力，破壞一切城堡僧院，消滅皇帝以外一切統治者。暴動擴張到巴敦的全部領土。密勒的農民軍，直向馬拉黑，佛特瓦根前進。當時貴族無力與戰，不得不向農民軍求和。農民，提出十六個條件（如廢止農奴勞動，額外租稅及　般領主特權等），貴族均加以口頭接受，農民遂樂意解甲歸家。可是貴族很快就準備反攻，農民又集合起來從事抵抗，運動深入到符騰堡，然而由於佛提德蘭公爵之助，就將農民鎮壓下去了。

一五二五年全德國農民戰爭大爆發了。首先在正月，多腦河、萊茵、利黑之間的全境，都在醞釀暴動。二月大風暴起來，布爾根爾黑的汗斯，密勒農軍與武武騰堡方面策應起來。利德農民在希米德（Schaid）領導下，組織成了一萬到一萬二千的巴爾特林根農軍，亞爾加上部出現了七千人的農軍，在君士斯坦湖成立農民水軍，在亞爾加下部成立了七千人的農軍，同時，在多腦河成立了第六農民軍。所以在三月初只在斯德比亞上部六個大營內，手執武器的農民已有三萬到四萬人。另外，四月初，在法蘭哥的暴動也爆發了。五月初農民軍佔領武志堡。在北德意志方面，孟采爾自二月初卽到苗爾哈遜，領導德國北部農民暴動，其許多信徒則分散於德國南部。三月苗爾哈遜發生過早的革命（孟采爾的弟子領導），孟采爾一時爲革命政府議長。所以到五、六月間，農民暴動幾乎蔓延到德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區域。

反動勢力在農民大亂全國之際，本已手忙脚亂，但是他們毫不疑慮的用剿騙兼施的辦法（遇強的騙，遇弱則剿），節節施行反攻與進攻。然而一方面由於德國的分離，因而貴族、諸侯、領主、閥閱之家的力量之有組織與強大，一面由於中等階級之半途投降反動勢力（路得之極力鼓吹鎭壓農民），同時也由於農民隊伍本身之弱點太多，（成分複雜，無組織，無好的領導，不能統一行動，敵弱不進攻，敵強則畏懼），而終於使暴動完全失敗了。一五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孟采爾被殺（時年二十七歲）農民主力軍被各個擊破，在格斯邁爾退到威尼西亞邊境之後，農民戰爭最後一幕遂行結束。

農民戰爭結局，是：一，各地農民死者以十餘萬計，生者再屈服於教會、貴族、閥閱之家的統治之下，可恥的失敗，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壓迫，加上繼續進行的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把農民、平民、破產的市民的生活標準，降到愛爾蘭貧困的最壞形式」；二，農民戰爭中最受打擊的

階級是僧侶，其土地財產寺院，先被農民沒收燒搶，後又被權勢階級奪爲己有；三，貴族也受了打擊，只有去依賴諸侯爲生；四，諸城市亦大半未得到任何利益，可是閥閱之家幾乎到處復興起來，中等階級反對派仍是長期破裂屈服於諸侯之下；五，『唯一得利的是衆諸侯，他們不僅從其敵人——僧侶、貴族、城市——的削弱中得到相當的利益；而且從他們所搜括的戰爭掠奪之中，得到了絕對的利益。』（同上書）

德意志分離的擴大和加強，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這種分離又是農民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這裏還要補充說到，爆發農民戰爭之思想上的刺激者與實際上的指導者孟采爾（Muenzet 一四九八——一五二五）怎樣？孟采爾原來是與馬丁路得同流，但在農民戰爭開始就很快與路得告別了。如果說，路得是代表當時中等階級的改良主義，那麼孟采爾則是代表當時農民與平民的革命主義。

孟采爾的學說是如此：其宗教哲學，不僅是攻擊天主教一切主要點，而且攻擊基督教的一切主要點，接近無神論。其政治綱領所認爲的『上帝王國』，不過是沒有私產，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權力的社會，接近共產主義。其行動步驟不僅反對僧侶，而且同樣熱烈的攻擊諸侯、貴族、閥閱之家。他眞正深入羣衆與羣衆站在一處來實際指導鬥爭。恩格斯認爲他這種思想『與其說這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滙，毋寧說他是由平民中正在開始成長的無產階級分子解放條件之天才的預期』。（同上書）

然而孟采爾這種理論，仍然是反映當時不成熟的生產條件的不成熟的理論。『這種理論與要求，不是從一定時間各社會階級的相互關係出發，不是從生產和交通工具的關係之幾分偶然的水平線出發，而是從他對於社會和政治運動一般的結果之幾分透視的觀察力出發；因此他必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他所

能做的事，是和他向來實踐的一切行動，他的一切原則，及其黨派目前利益相矛盾。他所應該做的事情就不能成功。總而言之，他不是代表自己的黨派或自己的階級，而是迫不得已代表那統治條件成熟的階級，在運動本身利益上，他不得不保護異己階級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詞與諾言來敷衍自己的階級，不得不斷言異己階級利益卽自己階級的利益，誰把自己放到這種愚笨的地位，誰就是不可救藥的墮落」。（同上書）

自從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之後，從那時起，鬥爭遂蛻化爲各地諸侯和中央皇權間的混戰。其結果使德國在兩世紀中失去了在歐洲民族中起政治作用的資格；就是說，把德國革命一直推延到十九世紀才爆發。

第二節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

政治經濟的狀況　從上面第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一）德國的分離狀況與地方諸侯的封建割據，始終不能形成德國的統一；（二）世界航路由北海地中海移到大西洋之後，德國遠離這世界交通要道；（三）十六、十七世紀以來，德國不斷捲入戰爭，這些戰爭都在德國國境進行，特別是一六一八年開始的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時代的戰爭，把德國糟踏得非常厲害。由於這些主要原因，使德國的封建制度保存得比英法諸國長久而且深篤，使德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發展得比英法諸國遲緩，使德國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集權的國家。

十八世紀中，德國神聖羅馬帝國還包括有三百六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國家，拿破崙時代、合併與消滅了很多小國。根據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決定，組成了以普、奧爲首的「德意志聯邦帝國」以代替「神

聖羅馬帝國」一，然而事實上，德國並未因此而告統一。這時聯邦帝國之內，還有三十六個國家。其中最大者爲普魯士、奧大利、，其次爲撒克遜、巴威略、符騰堡、巴敦諸國。如果再分割來看，普魯士帝國有八個儼如獨立的地方行省；奧大利帝國則用兼併手段，擴奪諸多弱小民族除維也納以西至瑞士、巴威略邊境，是日耳曼人居住外，南部卡尼鄂拉、斯士尼亞、克倫地亞、依斯地尼亞，各省類多斯拉夫人；北部波西米亞及摩羅維亞各省大部爲撒克人（Czech），與俄國交界處則爲波蘭人。至於匈牙利王國內，除居住多腦河流域的馬基亞人外，東南有羅馬利亞人，西南有哥羅的亞人。亞爾卑斯山外之倫巴多、威尼西亞王國，則完全是意大利人。德意志聯邦由許多國家與民族結合而成，其目的，表面上爲同禦外侮，實則專在於反對外國及本國的革命運動。聯邦公會設於佛蘭克府（Frankfoif），其權力極小，並不能干涉各國內政，每個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各自獨立，甚至在一國中每省也有獨立的關稅制度。直到一八二六年，才在德國北部由普魯士等六個國家組織關稅同盟。一八三四年，又加上汗諾威等四國，成立了十國關稅同盟。同樣，一八二八年成立南德關稅同盟。德國關稅同盟的成立，對德國的發展是有進步作用的。至於政治制度，普、奧及其他大多數國家是君主專制政體，惟南德諸國如巴威略、巴敦等於二、三十年代採用了溫和的君主立憲制憲。總之，這類封建專制國家，不管它形式上是成立了聯邦，但國與國之間（大國與小國，小國與大國，小國與小國），一國之內，中央與地方之間、階級與階級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都是充滿了明爭暗鬥的。在聯邦之內主要是普、奧兩國的爭雄。

這樣的政治制度是建築在當時德國的相當落後的經濟結構上面的。十九世紀之初，德國還是明顯的農業國家。在普魯士，城市居民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六，鄉村人口則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四。就是到四

十年代城市與農村人口之比例亦爲二十八比七十二。巴威略王國，城市人口只佔該國人口百分之十六。號稱工業區的撒克遜王國，其城市人口亦只佔自己全人口百分之三十四。一八四六年奧大利有一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只佔該國全人口百分之六。至於全德城市人口，一般說來，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從事農業。這就是說，到四十年代，德國還是農業佔優勢，農村經濟駕乎工業之上。

封建制度在農村中仍然保持優勢，封建貴族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是與中世紀保留下來的農奴制同時存在着。拿破崙侵入德國，更加動搖了德國農村封建基礎，致使普魯士政府不能不於一八〇七年採取自上而下的改良辦法，宣佈『解放農奴』，一八一一年，一八二一年繼續施行這種解放。這顯然是當時君生政體害怕自下而上的農民革命，並藉此以號召農民捍衞國土，不能不採取的一種聰明辦法。在這幾次法令中，宣佈廢除農民隸屬關係（農奴制），農民可以自由購買地與選擇職業，領主可以合併小塊土地爲大土地的經營，廢止公共土地，由私人自由購買。這種解放，表面上看來，似乎也很有利於農民；可是，在實質上，正是大有利於地主階級，使他們大批可以集中土地，並有權強佔農民的及共有的土地；可以在農民購買封建義務中發一批大財；對欠債購買的農民成爲債主，實際上還是保持其特權；可以把小塊的土地合併爲大塊的土地，施行大規模的經營；換句話說，就是以大地主經濟爲首腦，逐漸變封建的地主爲資本主義的地主，變農奴剝削爲資本主義的剝削而已。至於農民呢？有少數的富裕農民，用錢贖回封建義務與購置土地而成爲富農。一部分成爲自由的中農，而廣大農民，則成爲農業勞動者以及仍然脫離不了農奴關係的佃奴。普魯士農奴解放之後，是相當開闢了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種道路就是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土地進化的道路之『普魯士的道路』。普魯士的道路在四十年代才眞正開

始發展着，這時由於農業肥料之應用，農業機器之開始，大批荒田之開墾，輪耕制逐漸代替三田制。總之，由於大工業技術之幇助而發展起來。這時農村經濟的特點，就是：一方面，大多數而且肥沃的土地在大地主手中，大地主的經濟佔極大優勢，這些土地主要是在農奴制殘餘的保存之下，佃給農民耕種，少數用資本主義經營方法；另一方面，自由農民失去三分之一的土地，使小農經濟居於劣勢地位，而且在封建的和國家的重租重稅之下，在資本主義襲擊下，呈現着極端動搖與不穩的狀况。

在工業方面，自十九世紀初葉直到四十年代仍是手工業，家庭工業佔優勢，手工工場次之。四十年代初，普魯士有四十五萬七千個獨立工匠主，他們的手工夥計約有三十八萬四千人。工業中主要是紡織業，其次爲鑛山業。手工工場內設織機一部，家庭內約設織機兩三部。手工業生產依然是行會制度統治着。只有在經拿破崙掃蕩得最厲害的地方，如萊茵省某些城市，如西里西亞，如撒克遜等地，工業較爲發達，行會制度亦消除殆盡。德國產業革命只是開始於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才比較發展起來。一八一〇年亞麻紡織機器開始輸入德國，一八三七年工廠僅有五個，錘數一〇、三〇〇；一八四八年工廠十四，錘數四五、〇〇〇。羊毛紡織業，起初僅以家庭工業經營，一八四六年在普魯士有錘數四、五萬，一八四六年，北德七個國家（關稅同盟的）的紡織業總數爲：工廠三一三，錘數七五〇、二七四，其中以撒克遜，普魯士兩國爲最多（撒克遜佔百分之六十三，普魯士佔百分之二十三）。焦炭熔爐於上西里西亞，到一八四六年只有九個。一八四〇年初，魯爾區的產煤量才增到九十萬噸，一八五〇年增加到一九六萬噸。整個普魯士產煤量一八二四年爲一二〇萬噸，到一八四三年增到三〇〇萬噸。一八二〇年全德國只有蒸汽機二部，到一八四八年僅普魯士一國，已有一一三九部。四十年代中間，德國有工場七

八、〇〇〇家，僱傭工人有五十五萬。一八三五年，德國最初敷設鐵路（紐倫堡——孚爾特），長僅六公里，一八四〇年有四七〇公里，一八四五年有二千餘公里，一八四八年達五千五百公里。對外貿易總數：一八三〇年爲六·六億馬克；一八四〇年爲一一·二億，一八四八年爲二〇億。

由是可知，德國工業的發展較之英法諸國爲遲，直到四十年代，主要的還是手工業，其中行會限制還很厲害，德國工業城市少，更沒有如倫敦、巴黎、里昂那樣大而集中的城市，這就是革命前德國工業的特點。但是，應當指出，德國大工業的發展雖如此其遲，可是在四十年代開始以後，其發展速度也相當快的。然而要順利的發展除非打破當時極力阻礙這一發展的障礙物不可。

障礙德國工業資本發展的原素，一則是德國地理位置的不適當，十六世紀以來即遠離世界商業要道，不可能如英法一樣在海外掠回巨量資本，以資本發展國內生產；二則是國內幾百年以來不斷的戰爭的消耗，許多舊的工業在拿破崙大陸系統下已破壞無餘。然而根本原因，還是德國封建統治下的整個舊的生產關係（國家的分離，半農奴制的存在，行會的勢力，國家苛捐雜稅的重担……）障礙了工業與農業中新的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這種矛盾的反映，我們滿可以在當時德國階級矛盾中找到根據。德國革命的社會根源即在於此。

革命前的德國階級結構　恩格斯說：「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是其政治組織的基礎。」（「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上面已經講過德國當時的經濟結構，現在我們就來敍述由這種經濟結構所形成的德國階級結構，在革命爆發前又是怎樣的呢？

第一，封建階級。「封建制度之在英國與法國是早被摧毀了。或者如在英國，封建制度縮得很不重

要的形式。因爲英國有強有力的富厚的資產階級，集中於大城市，特別集中於首都。德國封建貴族，則仍保存着由古代承襲下來的大部分的特權。佃租的封建關係幾盛行於各地，地主有審判其佃戶之權。他們政治上的優越地位，雖被剝奪，無權監督各邦的王侯，但他們仍保存對其領地農民之中世紀的統治，亦無捐稅的負担。封建制度在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較爲繁榮些，只在萊茵河左岸它才完全毀滅。此種封建貴族在當時是極其衆多，一部分也極富厚，一般人都公認他們是國內的頭等「等級」，他們担任政府的高級官吏，軍隊中的長官也差不多完全是他們担任。』（同上書）

第二，資產階級。『德國資產階級遠不如英國資產階級之富厚與集中，德國自採用機器製造以來，又加以英國工業的勢力迅速的擴充，德國舊式製造業都被毀滅了。在拿破崙大陸系統之下，本國某幾處所辦的近代工業，不能補償其所失的舊式製造業，也不能夠造成一種強有力的工業利益，壓迫當地政府，對他們的要求注意，因爲這些政府都是嫉視非貴族的財富和權力之擴充的。……英國中等階級自一六八八年即已享有政治的統治，法國的資產階級自一七八九年已經奪取政權成功。唯有德國的資產階級，因爲數量上的缺乏，特別是集中數量的缺乏，不能達到像英法資產階級這樣統治的目的。但是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德國資產階級的財富以及與財富相伴的政治上的重要，均不斷增進。政府看到這種情形雖然不很願意，但它不能不顧及目前的物質利益。我們可以更正確的說，自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和自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四〇年，各小國在其憲法上所已許給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在同上的兩個反動時期中，又從資產階級手中一點一滴奪去。每奪取一點一滴，卽用一些給資產階級更實際的利益來交換。因此資產階級每一個政治上的失敗，緊接着就是他在商業立法上的勝利。自然在德國的工商業家看來，一八一八

年普魯士的保護關稅和新成立的關稅大同盟，比較在小的王國的議會中之可疑的表決權，實在貴重得多……。」（同上書）

「德國資產階級財富的不斷的增進，商業不斷的擴張，到了這個階段，他就感覺到，他的最重要利益的發展爲其本國政治組織遏止；如像：國家任意分裂爲三十六個王侯的統治，各具野心與互相鬥爭；封建制度的鎖鍊，束縛着農業及與之有關係的商業；殘暴而專擅的官僚階級對於一切交易都苛徵重斂，而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張與鞏固，交通上一般地採用蒸汽機，國內貿易競爭之發展，使各邦各省的商業更爲接近起來。他們的利益也一致了，他們的力量也集中了。於是，其自然結果，便是他們全部變成了自由主義的反對派，……一八四〇年是這種轉變的開始，也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成爲德國資產階級運動首領的開始。」（同上書）

第三，城市小資產階級。「因爲德國大資本家與工業家階級發展得緩慢的關係，他的小資產階級便十分衆多。在城市中他差不多佔全人口之大多數，在小城市中因爲沒有富者的競爭與影響，他完全佔着優勢。這一階級在各個近代國家和一切近代革命中都佔最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國則更爲重要，在德國最近所發生的鬥爭中，他的態度常左右勝負。他所處的地位，是在大資本家、商業家、工業家（即一般所稱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這就決定了他的性格。他總企圖達到資產階級的地位，但是稍稍橫逆的命運就把這階級的個人投擲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在帝制與封建制度的國家，小資產階級的生存須仰賴宮廷和貴族的惠顧，若失去這個顧主，他的一大部分就要破產。在小城市中，一個兵營，一個衙門，一個法庭及與法庭有關係的人，常常是他們興隆的基礎；沒有這些人，則商店、裁縫、鞋匠、木匠

等人的生意就要淸淡。因此，這一個階級永久是在兩個前途之間搖擺，他一面希望躍入富有階級的隊伍，而一面又害怕淪於無產階級的生涯；一面希望參加公共事業之管理以求提高其利益，而一面又害怕時機不宜的反對政府，觸犯政府之怒而結果了他們的生存。他們所有的財產旣微，而其財產之不安定，又正與財產之多寡成反比例。這個階級的見解是十分動搖的。假使封建或帝制的政府是強有力的，他便低首下心，諂媚服從。假使資產階級剛剛得勢，他又轉到自由主義一方面。假使資產階級已經獲得政權，他就瘋狂似的，沉溺於民主主義的幻想。但是當在他下面的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企圖其獨立運動時，他又陷於垂頭喪氣的狀態，害怕與消極。』（同上書）

第四，工人階級。『德國工人階級之政治的與社會的發展，比英、法工人階級落後，猶之德國資產階級，比英、法資產階級落後一樣。相似的主人就有相似的夥計，一個人數衆多強大集中及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之發展，是與一個人數衆多及強有力的資產階級之發展相輔而行的。在資產階級的各派，特別是最進步的一派大工業者，未取得政權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永遠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純粹無產階級性的。只有在那一個時候，僱主與傭工之間的必然衝突，才變爲緊張，再也不能遲緩；工人階級再也不能爲那幻想式的希望和那永不能實踐的諾言所欺騙，於是十九世紀的大問題，無產階級的解放問題，才最顯明的適當的顯示出來。』（同上書）

『德國工人階級的羣衆，不是像英國一樣，受僱於近代的產業大王，而是受僱於小手工業者，其全部生產系統，僅爲中世紀時代之殘餘，正如棉業大王和鞋匠、裁縫老闆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一樣。同樣，在新式工業區域的廣大醒覺的工廠工人和一個小城市的裁縫工人及木匠的中間，亦有根本上的不同。或

者說這些裁縫與木匠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性質與他們五百年以前的祖先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因爲沒有近代的生產關係與近代的生產方法，自然也同樣缺乏近代的思想。在革命之初，大部分工人尙要求立卽恢復行會和中世紀有特權的手工業組合，這是無足奇怪的。然而，在近代生產系統佔優勢的工業區域，因爲交通便利，因爲大多數工人由遷徙不定的生活，而得到思想上的發展；於是在這種地方，有一種中堅組織的形成，他們關於工人階級解放的思想，是淸楚明瞭，而且更符合於現在的事實狀況與歷史的需要，但是他們只佔少數。假如資產階級的積極活動，我們說他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那末，工人階級的運動，則是從一八四四年的西里西亞和波西米亞的工廠工人暴動發端。』（同上書）

第五，農民階級。『最後就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大階級——農民。把農村工人算在一起，他佔全國人民的極大多數。但這個階級內面又分成若干不同的部分：首先，就是富裕的農民，卽德國人所稱的大農、中農。他們擁有面積多少不等的土地，每家都僱有幾個農業工人。這個階級的地位既在那無捐稅負担的大封建地主與那小農農業工人中間，他顯然是以與城市反封建的資產階級聯盟爲其天然的政策。第二，是小的自由農，在萊茵區頗佔優勢，因爲封建制度在那一帶早爲法國大革命的偉大力量所摧毀。這種獨立的小農，在別地也有，他們是曾經用錢贖囘了他們土地上所應納的封建義務的。然而，這些農民，只是在名義上是自由的，他們的財產已經很多的抵押出去，其條件之苛刻，等於說，土地的眞正所有者不是農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第三，是封建的不自由的農民，他們固然不易從土地上被驅逐出去，但他們須永久向業主完租或須替他做很多的勞役。最後，是農業工人，他們在許多大農場中的狀況是與英國的農業工人階級的狀況完全相同，由生到死，永久是貧困飢寒，永久是他們主人的奴隸。農村人口

中最後的這三個階級——小自由農，封建的不自由的農民，農村工人——在革命以前從未問過政治。但是革命這個東西，使他們睜開了眼睛，看見了新的事業，前途充滿了光明。革命對於他們每個人都有利益，假使這個運動循着正當途徑發展，他們每個人都可望參加的。但同時我們應當明白，農民因散居於廣大區域與他們中間得到大多數一致之困難，使他們獨立運動之企圖是永遠不能成功的。他們需要城市中更集中的、更有知識的、更易於行動的人民的領導和推動。」（同上書）

正因為這樣複雜的階級關係與夫各階級固有的這種特點，特別是在德國沒有如倫敦、巴黎這樣的重心——這樣的有決定作用的重心，使德國革命運動爆發時，不能不發生很多連貫不一致與表面上矛盾的情形，不能不發生許多重複的不連貫的鬥爭，不能不消耗巨量的流血與能力，仍不能得到重要的結果。同時，也就由於這樣的階級結構也就決定了在革命前革命中各階級的立場。我們在後面再去看他們各階級做些什麼？

此地還要說到德國在革命前所具有的民族矛盾。這種矛盾是與階級矛盾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德國民族的統一與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若干小民族的獨立等等，這些要求是當時德國所極待解決的。這也是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所應完成的民主任務之一，詳細情形留在第六章中去專門敍述。

自由主義運動之成長 上面說過，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但是在這時期之前，已經有過這樣的徵候，表示出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是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政府之下繼續的消極與忍耐了。他們要求消滅農奴殘餘，要求採用保護關稅，要求監督財政與改良立法，並且要求國家在政治上有堅固的統一。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德帝國的內部如巴維利亞、符勝堡、巴敦、漢諾浮這些小

國，爲了要獲得較大的團結，以對付普、奧，同時又要對付國內的貴族，於是首先頒佈了多少帶點自由主義的憲法；並且在這些國家內，出現了一羣自由主義的律師和職業的反對派——如羅特克、威爾克爾、司徒夫等，從事宣傳立憲主義。以後一八三〇年革命，同樣也震動了德國，使當時德國新文壇上都在宣傳立憲主義和更幼稚的共和主義，或多或少都是帶點反政府的傾向。一八三〇年以後，在德國思想界最有權威的就是黑格爾的哲學。黑格爾在『法律哲學』中宣言君主立憲是最後與最完備的政權形式時，就等於宣告德國哲學已贊成資產階級；等於說，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日快要到來。接着少年黑格爾派之不停的發展，更大胆提出德國從未有過的政治原理。他們並且企圖恢復法國大革命英雄們的光榮。不管當時政府如何封閉國外消息，如何檢查國內消息與言論，但是德國輿論界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即自由主義的思想是在向前發展着。

一八一三到一八一五年，普魯士政府本有建立『人民代議制』的諾言，一八二〇年又有過『不得人民代表機關同意，不能借款或增稅』的法律，結果是毫未執行。到菲烈特立．威廉第四即位，資產階級曾對他表示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頒佈憲法，容許出版自由，來一點和平改革，結果適得其反，國王並不接受這些要求。自一八四〇年起，自由資產階級即猛烈攻擊國王，萊茵省成爲自由主義運動的中心，科倫地方的『萊茵報』，就是當地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創立於一八四二年一月）。然而政府因爲財政上的困難，爲了找錢，不得不對『人民代議制』作小小的讓步；原來在普魯士八省中，組織有各省的省議會，這時國王爲了通過渴望的公債，遂召集八省駐柏林的常委會議。不管國王如何招搖撞騙，但這常委會議，乾脆的拒絕了國王的提議，申明無權代表人民，要求國王實踐其父親在時對人民的諾言，國王

的憤怒，更加引起資產階級與國王間的裂痕。一八四七年，國王更因財政拮据，仍不免召集八省省議會的聯席會議。國王在這會議中表示『決不宣佈與永不宣佈現代的憲法』，結果，聯席會議同樣否決了國王募集公債的提議，國王則命令解散議會，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同盟』則堅持『必須頒佈現代代議制的憲法。不然，就不給一文錢予政府』。

在『自由主義同盟』內部，除資產階級之外，還有大部分的下層貴族和下層等級中各種不滿意現時政體的分子。這就是說，當時反對政府的人，已經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結成了反專制政體的統一戰線。資產階級與政府之中，如果不能即時妥協下去，革命就不可避免。資產階級要使反對專制政府有力，則必去求助民衆，只有在廣大民衆幫助時，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地位才有力量。

恩格斯說：

『當時，只有這種事是很明顯的。就是這樣的情形不能支持下去，或者兩造的一方必得讓步，或者雙方破裂，結果就是一個流血的戰爭開始。而許多資產階級知道他們是在革命的前夕，他們也向革命進行準備，他們用盡可能的方法去奪得城市裏的工人和農村裏的農民的援助。大家都知道，在一八四七年之末，沒有一個資產階級裏的政治要人，不是宣佈他是社會主義者以獲得無產階級的同情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現在，我們來看普魯士的工人運動以及工人運動與這個民主主義運動的關係怎樣？

一八四〇年前後，一部分德國工人常來往法國、英國、瑞士一帶，特別受到在法國工人中間流行的幼稚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影響。加之，德國內部工人階級的生活地位是非常惡化（工作時間很長，薪

工工作亦在十二、十三小時，工資極少，有些家庭手工工人還要受地主、定貨商人以至直接老闆的幾重剝削），政治上毫無權利可言，於是社會主義也很快的流到德國工人中。一八三六年德國工人在巴黎成立了一個秘密的「正義同盟」；一八三九年五月，巴黎暴動失敗後，組織即遭破壞，會員仍四散各地。有些跑回德國，從事秘密宣傳，大大促進德國工人階級之醒覺。在「正義同盟」中，演主導作用的，是威特林（Weitling 一八〇八——一八七一年）。他是一個德國的縫工，巡遊外國多年，不斷作反政府及社會主義的宣傳與活動；他主張工人依靠自己力量用革命手段達到自己解放，可是他的思想正反映當時德國手工業勞動者之要求，他主張革命只能依靠貧苦人——最好是流氓無產階級。

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亞職工的暴動，是德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始。西里西亞的職工，因為忍受不住定貨資本家、地主、老闆的幾重壓迫，作出一個職工歌以示反抗。當年夏天，在布列斯勞近郊的維爾晉斯發爾茲村中，因為職工唱這個歌，一個職工被殺，於是全體暴動起來，佔領主人住屋、貨棧，搗毀了主人的織機，附近一帶的職工也羣起暴動。結果，軍隊開來，暴動者與之互鬥甚久，終於被軍隊鎮壓下去。死傷三十餘人，職工均逃入山中。同年波希米亞亦發生職工暴動，很快亦被軍隊鎮壓下去。這些事件引起了社會上深刻的注意，給了工人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刺激。一八四七年年荒，工人中又發生了麵包的騷動。

由於德國工人階級的特點，加之當時言論出版之大受限制，這時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雖已形成，然而德國工人知道的還是很少，就是知道，也是很模糊的。可是大城市的工人是日益了解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他們是望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其解放的旗幟。應當指出，這時，德國無產階級是比十七世

紀英國的與十八世紀法國的有更多的發展。德國工人是歐洲工人中最富於理論的人民，他們保存有理論的興趣；這樣不但是說明，德國經黑格爾的哲學而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且說明，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已經開始，並且能很快的滲透到工人的脈絡之中。我們還應當知道，德國工人運動不是離開一般的民主主義運動，而是相反的，德國工人是積極參加在一般民主運動之中，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中，是站在最積極最堅決的立場，來反對專制政體，力爭德國的統一的。他們在『萊茵報』中，以及革命爆發後『新萊茵報』中的立場，就可以想見。但是，他們毫不容情的、不斷的批評自由資產階級與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之動搖性，嚴明指出無產階級最後解放的道路。德國在革命前並沒有共和黨之存在，亦沒有眞正無產階級政黨之組織，當時德國人民，或者是君主立憲派，或者是程度不齊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者。立憲派的資產階級，爲了抓取工人，不惜也冒稱自己爲社會主義者，而在他們的立憲政綱內部，却找不到一個爲工人利益的字句來。雖然如此，德國工人開始還是在資產階級的號召之下，去爲最近的利益而鬥爭。並且能在這鬥爭中起他的驚人的前進作用。這種鬥爭正是爲了將來的利益所必需的。

德國革命前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內幕就是如此。『在現有的這些因素下，則稍一輕微的衝突，即會爆發爲一大革命。當時高級的貴族和平民長官是現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擁護者；當時下級貴族，工商業資產階級，大學生，各級學校教員，甚至於下級官僚與下級軍官，都在反對政府的一條戰線。當時，站在這些人後面的，就有不滿意於政府的農民及大城市的無產階級的羣衆。……政府則頑強的進行一種路線，促成衝突的爆發。德國在一八四八年初，是處在革命的前夕。縱然沒有二月法國革命來促進革命，

革命也是快來的」（同上書）

第三節　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

從以上的敍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德意志內部種種經濟的、政治的、階級的因素，使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成爲不可避免。並且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確地指出，當時「德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一八四六年的飢荒及一八四七年的經濟恐慌，已經愈使革命的危機達於成熟與快要臨產的狀態。卽使法國二月革命不先爆發，但德國的革命也是快要到來的。然而法國二月革命轟然一聲的爆發了，消息傳來，使德國革命也不能延遲，而如疾風暴雨般的發作起來了。可是德國革命，首先是爆發在奧地利的都城——維也納，然後緊接爆發的才是普魯士的柏林，這是值得大家玩味的。現在，就首先從奧地利說起。

奧地利的狀況　敍述首先爆發的維也納革命，必須先來看看革命前奧國的狀況。

奧地利也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它還是一個古老的落後的而且特別頑固的君主專制國家。甚至到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它還是一個爲世界上的外國人所不了解的國家，恰如鴉片戰爭前的中國一樣。

自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奧國卽在極端反動的梅特湼首相的操縱之下，不特恢復了本國的實力，造成奧國極專制的統治，而且成爲德意志以至歐洲反動勢力的主宰之一。國王法蘭西第一時代，梅特湼的政策是：一，對外利用英、俄、普、法間的矛盾，使自己居於支配地位，特別是盡力組織一切力

量來阻止歐洲的革命運動；二，對於那些服從於奧地利的各小國，則使之互相牽制，不致於聯合反奧，並從而支配之；三，對內則把自己封建專制政體，寄託在封建地主與金融資本家這兩個階級的擁護之上，使之彼此牽制，政府又從而操縱之；四，對工商業家，則一面保護他們，杜絕外貨競爭，以增加其納稅能力，一面又審慎地保存對工商業的限制，使之勿過大發展；五，把手工業者關閉在中世紀行會的黑牢中，促長其互相爭執，而不易移動。對工人、農民則極力保持過去生活狀況與風俗習慣，尊重其主人的威權；六，實行極端愚民政策，教育權操在天主教之手，學校只是特殊人材養尊之地。除匈牙利外，整個奧國統治下，沒有一家報紙；國外消息絕對封鎖，國內文化完全閉塞起來。

這樣，奧國在經濟上是異常的落後，在政治上是無上的野蠻；自然，國內的階級矛盾，不容易明朗的發展。因為，奧國地位偏僻，國內只有一個小小商港；農村則主要是依據農奴制上面的大地主所有；城市則主要是手工業的家庭工業小生產。一般說來，奧國還是一個標本式的農業國家。這是一八一五——一八四五年的情形。恩格斯說：

「在一八一五年以後的三十年，這種制度的實行是收到了驚人的成功。歐洲幾乎完全不知道奧地利，亦猶之奧地利也很少知道歐洲一樣。無論在人民一切階級的社會狀況中，無論在全體人民狀況的總和中，好像絕對沒有什麼變化似的。在階級與階級間很大的仇敵行為是沒有的，即或有之，那就正是梅特涅統治的一個主要條件，他馬上擴大這種仇敵行為，利用上層的階級作為政府一切壓迫手段的工具，使人民只怨恨他們，而不怨恨這般下級的國家官吏。一般說來，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差不多或者是完全沒有看見的。大家都崇拜皇帝。法蘭西第一老王似乎是體察了許多事實，

所以當他疑慮到這種制度能否堅固時，曾經自慰的說道：「當我與梅特涅在世的時候，這種制度是可以維持下去的」。——（同上書）

然而，法蘭西第一老王的估計，到底是錯了。奧大利並不是一個脫離世界的特殊國家，梅特涅其人並不能夠有轉移乾坤的能力，奧大利的歷史依然跳不了一般社會發展的規律，依然免不了自由主義的運動與革命。就在梅特涅統治時代，就有一種運動潛伏在奧大利的封建制度之內，緩緩地、祕密的成長起來。資產階級之日益形成，及其財富和影響的擴充，特別是採用了蒸汽機和機器製造工業之後，這種新的力量，不僅破壞了社會內各階級間的一切舊的關係，而且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方式，使新的工商業人民處處與舊的封建制度發生衝突，遂使奧大利的封建制度不可免的進到日益崩潰的過程中。梅特涅即有天大的本事，也阻止不了新的勢力的發展，阻止不了民主主義思想與運動的形成。許多資產階級在國外經商，染受了與帶回了國外新文化的祕密，而與國鐵路的建築，更是加速了工業與知識的運動。何況匈牙利已經有了封建的憲法，有了國會與議事記錄，議會所在地——布列斯堡正是坐落在維也納大門之前。

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七年這個時期，是奧地利急劇變化的時期。資產階級感覺到自己的利益是不能與當時這樣政體相容了；但他們却不是眞正反對政府，不是幹眞正反對派的活動，而只是不滿意於政府，希望政府在行政方面（而不是在立憲方面）有所改良而已。一部分官僚貴族，不滿意梅特涅的家長制度，而思戀他們的老王約瑟夫，因而也與資產階級接近起來。到了一八四七年底，情形就不同了，奧地利也同樣發生當時在德國盛行的政治上與宗教上的運動；雖然這種運動並沒有像在普魯士那樣強，可

是總是帶着反對政府的性質。至於奧地利的農民、農奴、佃農，他們受到地主和政府的横征暴斂，壓迫剝削，已經是不可忍受了。工廠工人在極痛苦的環境之下作工，他們不僅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且受警察的鞭笞。手工工人爲同業組合的法律所阻，沒有獨立與自由發展的機會。商人，不僅受到重稅的壓迫，而且受到許多法律上的限制而難於發展。總而言之，奧國政府是遭全體人民（除了少數封建統治階級及與政府有來往的金融資本家，與大股東老闆之外）怨恨的。奧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到一八四七年底也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亦如德國一樣——是處在革命的前夜。何況在階級矛盾之外，還有那些被奧國統治的小國，亦在那裏發生對奧國的不滿而醞釀民族運動呢？

正在這個時候，法國的二月革命爆發了。

維也納三月革命　法國二月革命消息，最初傳到了維也納，奧國資產階級卽向政府提出「改革制度」的要求，政府置之不理。三月十三日，大羣的學生、工人，出現於維也納街頭，其勢洶洶，並高呼「打倒梅特涅、憲法萬歲」的口號。政府立刻派軍隊來彈壓，並向羣衆射擊。示威羣衆卽築起工事，利用牆壁以行抵抗。數小時後，大批羣衆趕到，猛烈向政府軍衝擊，大有非擊破這一反動大本營的政權就不停止之勢。國王見勢不對，只有暫時讓步，雄據歐洲三十餘年之梅特涅，遂從此解職，逃往英國。此外國王又允許召集國民會議，改組內閣，着手編製憲法，並同意學生要求，組織學生軍；同時又按財產爲標準組織資產階級的國民軍，以負「維持市民運動」之責。資產階級又設立「社會治安委員會」，他們在這中間佔着領導地位，儼然成爲非正式的革命政府。可是，國王的政府，除了調換幾個閣員給予人民一些諾言之外，實質上並未有所改革，而梅特涅的黨羽，保王黨們，仍盤踞於政府之中。

維也納的三月革命是勝利了，但只是局部的勝利，究竟結局如何，還要看以後鬥爭來決定。不過此地要說一說，在這次三月革命中有什麽重要之點值得我們注意呢？

第一，這次革命是各革命階級聯合的全民革命。資產階級（除極少數銀行家交易所資本家外），小資產階級，工人以至農民，都是在反對專制政體的旗幟之下，萬衆一心的參加這次革命。當時奧國社會內部，封建與民主的矛盾是遠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之上。因爲奧國工業之不發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還在隱蔽中，奧國資產階級不僅力量很弱，而且受的敎育很少，它從來沒有看見過奧國有過工人運動，他所看到的工人的要求（憲法，自由）又是與自己的要求一致；加之，他的愚昧無知，所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等等天下大事，他都不知道，有時他從政府方面聽到一點，他還以爲是梅特涅造謠生事故意嚇他們的。這樣，當時奧國資產階級至少在三月是竭誠擁護這一運動。至於學生與工人，在這次革命中，是站在最前線，就靠他們與反動政體作決死的鬥爭，才能夠造出這樣的勝利。農民在鄉村中，也是積極參加這次革命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各革命階級聯合是奧國三月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

第二，這種各階級聯合的革命內部是有鬥爭的，同時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持久的。三月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只是從政府中奪來了一些讓步，這些讓步並沒有實際執行，使資產階級只能是理論上的統治階級，而不是實際上的統治階級。然而，資產階級也在「治安委員會」中握得了政權，也組成了自己的武裝，同時在工人中也有一部分武裝，學生則有四千人的很好的武裝。如果當時資產階級能夠堅持這次革命，有了這些力量是不難實際取得政權的。然而，他們太弱，也太顧前顧後，並沒有把封建制度推翻澈

底；而工人、小資產階級也因爲失業與負担加重，而表示不滿。因此，資產階級在一邊，工人、學生在一邊，很快地發生了一種冷淡、磨擦與鬥爭。其所以這種磨擦不能即刻轉爲公開的破裂者，主要還是因爲大敵當前，內閣，特別是朝廷，還在極圖恢復自己的力量與舊的秩序。大家都知道梅特涅專制主義之復活，各革命階級都是倒霉的。正因爲如此，不但使各階級聯合戰線可以相當持久，而且『當五月十五日、十六日或因政府企圖進攻（解散學生軍），或因政府想奪去新得的自由，而在維也納又發生各階級的新的反抗暴動。在每一個時機，國民軍（武裝的資產階級）、學生和工人的聯盟又在一定時間內鞏固起來』。（同上書）如果沒有這樣持久的各階級的聯盟，那末，奧國反動勢力早已在五月就勝利了。

第三，維也納三月革命，充分證明了『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奧國在革命之前是如何的陳舊落後，反動統治是如何的頑強兇橫，奧國在歐洲是如何被人視爲野蠻無理。可是，由於各階級聯合而爆發了革命，由聯合的相當持久而相當支持了革命，短短的時期內，就把奧國推進到歷史的前面。不管梅特涅如何兇強，而人民的革命，就可以把它打倒。這正如恩格斯所說：『革命是社會與政治的原動力……在這些猛烈的變亂中，使一個國家，在五年之內所走的道路，比在平時一百年所走的道路還遠得多。』（同上書）

第四，維也納革命中眞正得到利益的是農民。奧地利農民參加革命是很積極，當着革命爆發，貴族銀行家大地主都紛紛逃走，農民則忙於剷除封建制度，以至最後的殘餘都不留。因爲朝廷要專力對付維也納，而且又要去制止匈牙利的革命，自然無力來對付農民，使農民得到充分時間來達到剷除農村封建勢力的目的。奧地利的農民，在這次革命中是成功了解放自己的事業，這種解放事業較德意志任何國家

都要充分些。爾後，根據普選制所召集的奧大利議會，農民代表佔一百席。會議上批准了農民已經獲得的利益，宣佈無償還的取消一切個人的及封建地主的特權；只有工役及什一稅須以代價贖回。無論以後斯吐茲伯洛親王政府，如何能恢復旁的東西，但他永不能有權恢復農民的封建奴役。正因爲農民得到實際的利益，安於一時小成功脫離革命隊伍，使爾後反動時期，政府能利用農民以制止革命，至少在農民中，一時尚無變亂發生。

「假使奧地利現在（即一八五一年）是重新比較平靜而且強固，主要原因，是佔人民大多數的農民從革命中得到了眞實的利益。同樣是由於復辟的政府無論怎樣強奪，可是，農民已經得到的顯然的、眞實的利益，至今還保存未動。」（同上書）

柏林的三月革命　前面已經說了很多，在一八四七年年底，普魯士的革命是不可避免，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是站在反對專制政府的前頭，正在進行眞正的鬥爭，而「聯席會議」之結果，又是那樣的破裂，資產階級堅決表示他的反對派地位，似乎決心要與政府一戰。這都說明，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已是迫在眉睫。從此，大家應該來看普魯士革命的熱鬧劇了！然而事實上革命的第一砲，不先在柏林，而先在維也納爆發，甚至到柏林革命爆發前後，而普魯士資產階級突然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這又怎樣解釋呢？未敍述柏林三月革命之前正要把這一點解釋清楚。恩格斯說過：「假使沒有法國二月的巴黎革命，這個革命在其初爆發時，或者也會如維也納一樣。」由此，可知法國二月革命對普魯士革命的影響的重要性，特別是影響普魯士資產階級地位變化的重要性；什麼影響呢？

第一，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政府（大資產階級貴族）正是普魯士資產階級所要準備建立的政府。

第二，聽說二月革命，宣告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

第三，普魯士資產階級早已嘗過工人的苦味口（特別是西里西亞的暴動），他本想轉變工人鬥爭方向以供自己利用，可是二月革命一來，普魯士的工人階級反而鼓燥起來了。

第四，普魯士資產階級看見，二月革命之後，法國臨時政府執政的人中，還有資產階級之私有財產與現代財神的仇敵。

這樣一來，本來一鼓作氣，準備去革命的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好像急於拉小便的人，聽見了飛機警報一樣，嚇得小便拉不出來，就藏在防空洞裏去了。結果呢？動搖畏縮，裹足不前，害怕革命，並掉轉頭來去謀與專制政體妥協。法國二月革命之後，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極力去哀告國王讓步，國王還不大理會。即至三月十四日維也納革命消息傳來，時機緊急，國王乃急行頒佈命令，召集各階級代表會議，廢止檢查官以緩和革命。柏林資產階級大為慶幸，認為革命已成，紛去拜謝陛下，並對出現於演講台上的國王，熱烈歡呼，表示敬意。至於普魯士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衆呢？他們一聽到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歡喜如狂，柏林市公園及滿街上，都有羣衆在交談，歡呼與集會，紛紛提出向政府的要求；特別是工人們聽到亞爾柏特任法國臨時政府委員後，尤為興奮。維也納消息剛一到，柏林大震。這時民衆已經如春潮狂浪般的起來了。縱然號召革命的資產階級已經退縮，工人及其他羣衆們是不顧一切，走到革命最前線，大有非來一個「二月」，「三月」革命不可之概。

三月十八日，柏林的砲聲響了！廣大遊行示威的羣衆，遂與軍警發生衝突，軍隊開槍射擊民衆時，工人及其他民衆們，就在街上遍築防禦工事，巷戰激烈，民衆前仆後繼，人愈戰愈多，力愈戰愈強，戰

鬥繼續到三十小時之久，軍隊無力壓服，暴動者大有直搗王宮之勢，政府不得已，只好暫時讓步。國王發表告柏林民衆書，正式允許召集會議編製憲法，撤退城內駐軍，並組織內閣，國王一時屈服，暴動獲得勝利。

此地應當說明：

第一，柏林革命是在資產階級臨陣脫逃與無產階級平民堅決鬥爭的結果。我們知道，在暴動之前，資產階級已經表示屈服，極力制止民衆運動；暴動開始，資產階級已是胆戰心驚，極力維護國王。暴動正酣之際，階產階級就與保王黨締結聯盟。暴動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就立刻把羣衆打來的勝利品完全奪在自己手中，只想把民衆限制在選舉權、出版自由、陪審權、集會權等等範圍之內。但是工人們、民衆們，他們太驚喜於巴黎「二月」與維也納的「三月」，而且不甘落後。爲了自身的希望所驅使，不得不衝破資產階級的限制，不得不丟掉自己原來的帶路者，而走上革命的最前線——拚命、流血、犧牲，爲了力爭革命勝利，一切在所不辭，而終於使柏林的三月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柏林革命的勝利迫使國王與資產階級棄仇修好。暴動嚇倒了國王，爲了反對革命民衆，不得不從原來反對他的資產階級那地找到自己的救星，使垂危的王位得以倖免於消滅。同時，暴動也嚇倒了資產階級，民衆們既然如此「無法無天」的打將起來，資產階級害怕民衆，害怕革命，巴黎「無政府主義」的危險已在目前！爲了對付工人階級，不得不與多年的敵人聯合，反轉來反對自己多年的朋友。資產階級不願意王政被革命推翻，猶之國王不願意自己被推翻一樣。爲要合力對付民衆，資產階級與國王都太需要王冠、軍隊、法庭等等武器的勢力了。因此，國王爲了避免革命的危險，爲了報酬資產階級的

救駕，爲了將來再來進攻革命，於是命令原來「聯合議會」反對派的領袖，大商人——汗思曼、坎蒲好生先生，組織新閣。這般大資產階級的先生們，也爲了壟斷革命的勝利品，爲了壓制民衆，爲了限制一下國王，也就「敬謝主恩」、一切「遵命」，這樣就產生了新閣。資產階級看見國王難於復辟，看見民衆太兇，於是就利用整個舊式國家機關以爲恢復秩序之用。沒有一個官僚與軍官被他們撤職，舊的行政的官僚系統一點也沒有改變，甚至一些過去被革命熱潮所驅逐的官僚，現在又重新任用。總之，除內閣換了幾個閣員外，普魯士的一切都沒有改變。

這並不是說，國王與資產階級間完全沒有衝突了；相反的，新閣組成之後，國王雖見到自己的王冠猶在，但總感覺有失尊嚴；而他下面的朝臣官員，也不甘屈服，他們看清內閣的弱點，利用各種機會以妨礙內閣的前進。至於在內閣方面，現時所最關心的事，是要對於現存劇變的事實與自己奪來的勝利品加以法律上的保證。他們不顧人民的反對，召集「聯合議會」，以爲「國民」合法的立憲機關，通過召集國會的新選舉法（間接選舉法），並商得國王同意，着手編製「五月二十二日」的新憲法，資產階級的要求，盡於此矣！其他的事，都是集中在如何對付民衆了。

第三，民衆在革命之後，企圖努力推進革命前進。雖然民衆在革命勝利之後也得到一部分民主權利，然而由於國王與資產階級的這種聯合行動，加之資產階級又要求國王重新把退走的軍隊開入柏林，新的資產階級國民軍已經開始在各地制止民衆運動，這些事實，自然激起民衆的不滿。首先是小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即當時所謂「民主黨」——小手工業者及商人所領導），迅速的發展起來。其中激進派則要求直接普選制、一院制的立法會議，要求承認三月十八日的革命爲新政府成立之基礎，要求建

立共和國爲其最終目的。至於其中穩健派，則認爲只實現一種「君主化」的民主制，卽可滿意。不過兩派都同意承認佛蘭克府的全德國民會議爲國家最高主權機關。至於立憲主義反動派，則對於這機關的主權，假意表示贊擁，認爲它是太革命了。總之，我們可以看出這般民主黨內部是不一致，是缺乏革命的勇敢性與堅決性。從此，就可以揣測他們將來要做些什麼了。

至於工人階級，由於德國的歷史社會諸關係，由於在革命之前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一時遭受挫折，由於眞正工人階級的政黨現在還未出現，因而現在普魯士工人的大多數，還在依附於小資產階級民主黨，而整個工人階級的運動，還是在這資產階級革命中與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普魯士資產階級革命，現時並未完全勝利，其應完成的任務，還差得太遠。「事實是如此，當工人們獨立行動的地盤還未掃清，當直接普選制還未成立，當三十六國大小不齊的國家將德意志切成無數小塊；當此之時，無產階級的政黨，若不注視對於他有極重大意義的巴黎運動，而與一般的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以便達到能夠爲着今後單獨事業奮鬥的權利；除此之外無產階級的政黨還能夠做到什麼？」（同上書）。此地應當指出，正因爲普魯士工人階級當時社會的政治的力量不足，組織的力量不夠，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未浸潤到廣大工人羣衆中去，特別還沒有眞正無產階級的政黨，雖然他們積極的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鬥爭，但是大多數工人是顯然處在動搖、怯懦的民主黨領袖的影響之下，做了他們的尾巴；只有那些大羣工人集中的地方，才完全脫離了這般民主主義的影響。這就是當時德國無產階級不能成爲當時革命中的領導力量，而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後，就不能引導革命眞正前進的根本原因。

最後是農民。普魯士的農民亦如與大利的農民一樣，在中心城市的革命一爆發，他們卽在農村中暴

亂起來。他們在革命中，脫離了一切封建的束縛，雖然沒有與大利那樣有力。因爲，一般說來，普魯士的封建勢力沒有與大利那樣強有力的壓迫農民。但是，資產階級不僅是幫助君主政體壓迫工人，同樣也幫助貴族地主鎮壓農民。內閣否決了卽時取消勞役的提案，並決定農民仍須執行一切封建義務。經過流血鬥爭之後，有許多地方仍然恢復了封建制度。特別在西里西亞一帶，資產階級不忘過去農民對暴動工人的同情，遷怒農民，把農民的勝利，完全奪去交於地主去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亦因他們破壞私有財產，受了驚嚇，沒有援助他們，致使農民革命遭受失敗。但主要的是由資產階級負責。恩格斯說：

「經過了三個月的解放，經過了流血的鬥爭與軍事的刑罰，封建制度由昨天還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手中恢復了。特別是西里西亞。沒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實用來審判他們（資產階級）。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對於他的最好的同盟者，對於他的本身，完成了這樣的叛變。」

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論到三月革命的結果，曾經這樣說到：

「柏林無產階級於三月十八日勝利之後，革命的結果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民衆武裝，集會權，實際上已獲得民主的政治；另一方面——君主制的保存和汗思曼、坎沛好生內閣的成立，卽大資產階級政府的成立。這樣，革命得到了一個兩層性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必然要破壞的。民衆是勝利了，他們已獲得民主主義澈底性質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統治權，未轉移到民衆手內，反而落到大資產階級手內去了。總之，革命未得實行到底。民衆會使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得建立內閣，而這些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就表示了自己的圖謀，提議與舊式的普魯士貴族和官僚合作。亞爾尼、康氏利和史維林等都加入了內閣。

……大資產階級從最初起，就是反革命的。他因害怕民衆，即害怕工人們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便與反動勢力結成了攻守的同盟。」

佛蘭克府的全德國民會議　在兩個三月革命勝利之後，普魯士組成了大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君主立憲政府，奧大利因資產階級政治幼稚而由自由主義的官僚組成了君主立憲政府。大家都成立了立憲會議的國會，大家都宣佈以資產階級原則爲其施政方針，大家都滿以爲革命已經結束，而且應當結束似的。可是，這裏出現一個問題，即德意志的統一問題。這個問題怎樣辦呢？於是在德國革命的舞台上，出現了一幕全德國民會議的滑稽劇，這幕滑稽劇是由一部分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扮演的，開始的主角是資產階級，以後的主角是小資產階級。他們以爲成立了這個全德國民會議，就可以表示他們統一了德國，表示了德國革命之「大功告成」。但是要知道這個全德國民會議是與全德君主聯邦公會同時存在的。

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全德國民會議開幕於佛蘭克府，代表共五百八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及一部分貴族，也有少數的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而極左的共和派，只有幾個人而已。據說，這個會議是全德民意機關，是全德統一的最高的政治組織，是全德優秀人民的聚會地；是德國精神、文化之集中所，並以製定全德憲法爲己任。然而，可惜得很！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腿太軟弱無力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太搖擺不定了；可憐得很，他們所做的事，實在是太滑稽了！國民會議與聯邦公會不是並肩而立，而是國民會議受制於聯邦公會（要求後者批准前者的法令）；不是國民會議駕駛各國政府，而是各國政府特別是普、奧政府駕駛國民會議。國民會議自稱爲是一個全德國最高主權的唯一合法的代表

機關，然而它從來沒有一種意志與實力來行使自己的職權：國民會議自命爲德國文化科學精神之所繫，德國人民最優秀的代表，然而自它成立之日起，不僅各國國王（特別是普、奧）毫不理會它，官僚政客都鄙棄它，甚至以後人民對它失望，就連佛蘭克府本地的老百姓也反對它。恩格斯說得好：

「這一羣老太婆的會議，從其成立之第一日起，就害怕最微弱的民衆運動，比害怕德國各邦政府反動陰謀之總合還要利害……它所討論的，是想像的政府、想像的和永久不能實行的辦法，它所通過的，是誰也不能想像的決議……佛蘭克府的可憐蟲們，他們的快樂只是在夢境逍遙的時候。」（同上書）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第一期「新萊茵報」上，就看穿了這幕滑稽劇，在六月六日「新萊茵報」上，曾經這樣的批評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

他說：

「國民立憲會議，首先應該是一個積極的會議，是一個革命的積極的會議，而佛蘭克府的會議却在那裏拿着學者的態度，練習國會主義的詞令；同時依政府去行動。我們假設這種學者的會議在長篇討議之後，能得規劃一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出來。但德國政府已經把刀槍來作議事日程了。試問在這個時候，從那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中能夠發生什麼效力呢？」（見「兩個策略」書後，列寧的引證）

在革命公開的國內戰爭時期，放棄眞正革命鬥爭，睡着去做憲法夢，這是德國民主主義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莫大的錯誤。

至於以後他又扮演些什麼滑稽劇，那就到後面去看了。

第四節　維也納十月革命

奧地利之各階級聯合戰線的破裂　我們知道，在維也納三月革命之中，因為資產階級力量軟弱，工人階級亦無足夠的獨立力量，可以澈底的推翻封建君主政體。在維也納三月革命之後，各革命階級聯合戰線內，雖不免有些磨擦，但因反動勢力之威嚇，而這一聯合戰線依然支撐下去。可是，到了六七月的情形就不同了。

第一，奧皇及其宮庭早在五月十六日就離開了維也納，逃到因斯普魯克去積極組織其反動勢力，只留下一個空洞的內閣來與革命勢力周旋。加之，高等貴族和交易所的資產階級，從前曾經是梅特涅統治的主要支柱，在三月革命之後，遂能左右政府，而現在更加積極地活躍起來了。因此，反動勢力就日益增大起來。現在的反動勢力，並不想用直接進攻革命的辦法，如此反而更促成革命勢力的團結；而主要是採用分化、威脅、利誘的辦法，來收買革命營壘中的資產階級，並造成許多困難加在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身上，以動搖小資產階級，孤立工人階級。其目的就是首先破裂革命階級的聯合戰線，然後才好撲滅革命。

第二，維也納的資產階級以為宮庭遭受了幾次的失敗，而且又有依普選成立的立憲會議，自以為宮庭已不足畏，天下可從此太平無事了，於是他們日漸疲倦與消沉。加之，反動勢力，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故造謠言，來威嚇資產階級，也把他們的心弄軟了。再則，奧國工業多限於奢侈品方面，而宮庭的

出走，貴族的逃亡，使資產階級的生意清淡，無利可圖，他們愛利心重，眼光短小，忘記了大敵當前，却想歡迎宮庭回京，藉此可以恢復商業的興旺。

第三，工人因失業衆多，生活貧乏，感覺自己的利益沒有絲毫保障，自然也增加了對資產階級的磨擦；小資產階級亦因生活困難，負担日大，也有點疲乏之象。

這樣，到了七月，立憲會議中反動勢力日大，而斯拉夫人的多數議員在中間作各種陰謀活動，於是立憲會議就來了這樣一次集會：一面慶幸革命的終結，一面歡迎宮庭回京。到皇帝與宮庭回京之後，立憲會議正在討論解決對農民的法律的時候，宮庭遂乘機議出妙計，敦請皇帝於八月十九日去檢閱國民軍。到了那天，不僅是皇帝，而且許多皇親國戚、貴人君子，都爭向國民軍灌了一大頓迷湯。國民軍見到這些貴人，甚至皇帝來恭維一頓，大概心也軟下去了，被收買了。於是不久，內閣就發表一道命令，取消政府從前對於失業工人的補助令，這當然是反動勢力收買資產階級（特別是他的武裝）與分裂聯合戰線的毒計，這一毒計是實現了。當着工人們起來舉行示威反抗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國民軍就遵守內閣的指令，馬上向着示威工人進攻，極其殘暴的撲滅了手無寸鐵的工人，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天，被屠殺的工人很多。從此，成爲革命勝利與堅持至今的各階級聯合戰線破裂了。資產階級不明大義，可恥的向反動勢力方面動搖了。

維也納十月暴動　匈牙利的事件正好給了反動宮庭一個機會，來公開宣佈他們所已準備完善的行動計劃。原來，匈牙利在政治上完全依賴奧國，在維也納三月革命之後，它取得了奧國對它的許多讓步，匈牙利可以自行召集國會，組織內閣。匈牙利的新內閣組織之後，在奧國宮庭力有不及的時候，本來也

相安無事；可是到了現在，奧皇對撲滅奧國內部的革命已有相當成就，自然就有力量來對付匈牙利的革命了，馬上，匈牙利的內閣，就變爲不合法了。十月五日，奧皇公佈命令（未得立憲會議的同意）宣佈解散匈牙利的國會，並任命一個反動心腹，南斯拉夫的反動領袖，匈牙利的仇敵——耶拿其奇去當匈牙利的軍政首領。令下之後，維也納的軍隊就隨之出發，並聯合其他武力，齊去向匈牙利問罪，並迫其承認奧皇的命令。這樣一來，只要是革命的人，那個也怒氣冲冲。於是維也納的工人、民衆、學生軍和稍有良心的國民軍，即在十月六日舉行示威運動，阻止軍隊的開拔。民衆與軍隊中頓時發生衝突，暴動民衆很快就把陸軍總長拉杜爾殺死，當晚暴動達到勝利。

不多時，已經出發了的耶拿其奇就被匈牙利軍的柴伯爾將軍擊敗逃回到維也納附近。維也納的軍隊本來是開去援助他的，現在假意對他表示敵，以騙國人。皇帝見勢不對，又逃出維也納，到半斯拉夫人的地方——啊爾穆慈去了。維也納暴動勝利之後，許多反動分子及斯拉夫議員，都跑到皇帝那地方去集中。斯拉夫人的反動英雄狄希格萊茨，假口於討伐這匈牙利人與德意志人，爲斯拉夫人復仇，而大批集中軍隊到維也納附近，並與耶拿其奇及首都近衛隊會師。在很快的時間總共集中的軍隊有六七萬人，馬上圍攻維也納。這時維也納的情形怎樣呢？

資產階級在這次十月暴動中，開始是很動搖的，暴動勝利之後，也只好默認這既成事實，但是，仍是不信任這般敢作敢爲的所謂「無政府主義」的工人。治安委員會是由民衆代表組織而成，其中大多數是市民小商人，他們不能堅决領導鬥爭。學生軍總部通過了很堅决的决議，但事實上不能負領導之責。工人們記得不久以前所受國民軍的待遇，看到資產階級動搖與慣於妥協；因此也不相信他們；工人自己

想武裝起來守城，而自己的武裝太少，又無組織，並且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還剛剛醒覺，無能獨立領導。此時留在城內的少數議員，只知高論空談，毫無補於大局，有的議員還替皇帝暗中坐探。在這種情況之下，維也納是非常紊亂，但是他們（主要是工人隊及四千學生軍，一部分國民軍與徒手民衆）鬥爭得非常堅決。那怕幾萬的反動軍隊極力圍攻，並用大砲攻城，那怕防衛者方面無良好指揮與組織（特別是以後新成立的工人隊——只是學生軍是主要可以抵禦的力量），那怕他們武裝不好，也不齊全；但是，他們以弱敵強，以寡敵衆，就靠自己革命的熱血與極力克服困難，而終於支持了幾星期，並且還執行這樣的命令，『防守該地至最後一人』。到十一月一日維也納被反動軍隊攻陷。革命方面總共戰死與被殺者達六千人，勝利的是反動的皇帝與貴族勢力。

恩格斯論到這次暴動，他說：

『維也納一八四八年十月的暴動，是一件決定的事變，他在德國的革命意義，等於巴黎六月暴動之在法國……他的失敗，使德國的事情，完全走到一個新的方向。』（『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什麽方向呢？就是德國反動勢力的勝利與革命的失敗。

維也納十月暴動中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麽呢？ 首先，是維也納失敗的原因：

第一，敵強——六七萬的正式軍隊，配有優勢的武器，在相當的統一指揮下，向着一個小的城市作主動的陣地的進攻，自然勝負可操。

第二，我弱——城內無堅固的團結，與行動的統一，而且混亂無組織。國民軍的一部分動搖，一部分完全不準備鬥爭，只是少數作戰。無產階級數量雖大，但沒有領袖，缺乏政治教育，最初無武裝，卽

拿着武裝上戰場，而武器不良，不會使用，且無組織。一羣不中用的議員，不是動搖慌佚，就是爭小事。

第三，沒有匈牙利打到維也納附近的勝利軍隊配合，這主要是歸罪於匈牙利，見朋友不救，見潰敵不徹底殲滅，先令朋友遭殃，後該自己挨打，（陷維也納的軍隊到十二月又打到匈牙利，翌年一月佔領布達培斯）。次要的就是維也納方面，沒有積極去聯合匈牙利軍。

其次，他告訴了我們不少的教訓：

第一，沒有內部的堅固團結，沒有集中的統一領導，沒有即時發動民衆，武裝民衆（反而害怕民衆），沒有強力的政治動員，弱者是不能戰勝強者的，反之，是能夠勝利的。

第二，弱者反抗強者，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其作戰形式是不能限制於一個固定的陣地完全的被動的消耗戰的。在強大的敵人與優勢的武器之下，死在一個城市防禦，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勝利的基礎雖主要是靠自己，但有利的客觀援助是必須爭取的。

第四，匈牙利太對不住人，也對不住自己，維也納人的暴動是爆發於援助匈牙利，寧可把開往討伐一千二百萬匈牙利人的軍隊吸引轉來打僅僅十萬人的自己，把自己的社會解放與匈牙利民族解放看成一體，這是多麼偉大的事業啊！但是，匈牙利只顧自己一時之安，不去攻打朋友的與自己的共同敵人，這是如何可恥可責。他不知維也納的失敗，也就是自己民族的失敗，拋棄援助生死與共的朋友，拋棄對敵人後方起義的援助，不把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與壓迫民族的人民起義聯繫起來，這是如何錯誤啊！

第五，恩格斯不僅站在公正無偏的國際主義的態度，責備匈牙利人之放棄對維也納的援助，同時也

責備維也納的第二個同盟者——德國人，特別是儒弱無能的佛蘭克府國民會議。國民會議沉迷於吹牛拍馬空談仲裁的夢境之中，從來不敢對維也納事變有堅決的表示，至多派出幾個議員到維也納觀察情況。除此以外，佛蘭克府會議什麼事也沒有做，它在歷史上又印下了可恥的一頁。

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所主持的「新萊茵報」，才極力號召援助維也納革命，指出維也納人民的義氣勇敢、堅決抵抗，比之小心謹愼的匈牙利政府更偉大，比之德國人的鬥爭爲更光榮，比起佛蘭克府的「娼妓」人物，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所以我們從這中間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以革命的民族主義教育被壓迫民族，如何以國際主義教育工人。

第五節 反動時期

普魯士的反動 大家知道，維也納革命的失敗，決定了整個德國革命的命運，十二月一日維也納陷落，同月九日普魯士的立憲會議，即在柏林被反動君主勢力解散，普魯士的反動時期，從此開始。此地還要追述一下，三月革命之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在實際上所做的事，幾乎都在迎合舊的勢力。所謂立憲會議，無非是爲了與國王協定一個憲法。而被選舉出來的會議，其中大多數議員是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民衆，害怕工人階級，和宮庭勾結，進行種種不利於革命的陰謀，使這一立憲會議早已失去民衆對它的信仰。立憲會議批准過（也就是恢復過）農民共棄的封建特權，背叛過農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不敢解決，也不願意去解決實際問題，所討論的只限於憲法形式與儀式的問題。立憲會議中的多數就是這班自由資產階級的中央派，他們處左右兩派中間，（右派爲君主派，左派爲少數的民主派）常起決定的作

用，一方面爲了欺騙民衆，一方面向宮庭賣淫，而自鳴得意。而宮庭反動分子則在極力準備它的力量。在他們力量還未準備充分之時，一個繼汗思曼內閣而起的官僚軍人內閣，表面上還對立憲會議的要求讓步，旣至反動宮庭實力準備妥善之後，維也納十一月一日的消息一來，國王馬上命令威廉第二的兒子——勃蘭登堡組織十足反動的內閣，並調到四萬大軍進駐柏林。

這時立憲會議已危懸卵，死期已到。假令資產階級還有一點革命氣味的話，就應當表示反抗，至少也要把武裝地盤抓一點在手，以示反抗。誰知軍隊開到之後，城市當局與資產階級的國民軍會議，竟一致主張不抵抗。自由資產階級甘心讓反動勢力去佔領各重要地位與一切自己手中的防禦武器。反動政府宣示解散國民軍，而國民軍竟一點不差的按時按數交出自己武器。而頓時集會的立憲會議又被政府軍隊從這一處驅逐到那一處，把議員們弄得像喪家之犬一樣；最後，政府宣佈解散立憲會議（十一月九日）。自由資產階級除了宣告政府徵稅爲違法以外，是否還覺得政府解散國會爲違法，而表示半點反抗呢？半點也沒有。恩格斯說：『在一個革命中，誰佔着堅決的地位而將它出讓，不去以進攻逼迫着敵人，以一試身手，這種人絕對要被人名之曰叛賊。』

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後，國王卽同時宣佈新憲法——君主立憲的新憲法。其中設立兩院制，更加擴大了君主的權力，更加縮小了國會的權限。從此之後，普國的反動勢力已經是定局了。它在革命中失去的東西，一天天要收回去了。

這個時期，只有『科倫民主聯合會』（馬克思、恩格斯亦參加在內）不斷表示反抗。至於全德國民會議，這時又在那裏呢？它並沒有搬家，還是在佛蘭克府。它的立場又怎樣呢？它的立場還是與從前一

樣，在那裏當革命與反動中間的調解人，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老太婆。還在柏林立憲主義者進行和平鬥爭的時候，國民會議雖通過這樣的決議：『不贊成普魯士政府的行動』與『贊揚全民對暴力的消極的合法的抵抗』，到了維也納陷落與普國立憲會議解散的消息傳來，他們亦視若無覩，也難得表示態度。別人都知道維也納、柏林革命的命運，已經有人解決了，與國民會議無關；可是國民會議大多數議員，却還保存着十足的『阿Q主義』，彷彿他們，精神上現在是勝利了，將來還有勝利之日，現在點把失敗，自認為滿不在乎的，橫直還有一個佛蘭克府。

這就是反革命勢力，在德國的一大中心柏林大獲勝利的一方面。

奧地利的反動　在鎮壓了維也納十月革命之後，奧地利的反動統治已經足大的勝利了。這使奧國立憲會議（國會），不得不遷到摩納維亞的一個小城——克勒塞利去，繼續它在名義上的存在。而奧國原來被革命破壞了的許多舊的形態，現在是被恢復了。至於農民已得的真正利益，政府明知恢復之不可能，亦只好聽其如此，並藉以收買農民，以為自己對付革命的後備軍。資產階級雖在七月中去與宮庭妥協，在十月中對革命動搖畏懼，在維也納作戰中，充分表現其消極退縮，好像反動宮庭並沒有什麼危險似的！誰知反動勢力勝利之後，就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宮庭也不容它們了。

縱有國會存在，其生命已經是朝不保夕！滅亡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國會中一般斯拉夫的議員在三月革命以後，雖與其選舉人極力維護國王的死命，在維也納十月革命中及更前時期，也對國王政府盡了主要的援助力量；現在呢？『狡兔死，走狗烹』，他們就活該倒霉了。他們不但沒有幾分勝利之彩，就連國會議員的地位也站脚不住了。

一八四九年三月四日，政府下令解散國會，並用武力將一羣議員驅逐，資產階級代表固然如鳥獸散，而斯拉夫議員也成爲『喪家之犬』。這時斯拉夫議員們才知道上了當，受了騙，但是悔之晚矣！然則到那裏去呢？他們說『這裏我們既不能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我們只好到佛蘭克府去進行去』！這班斯拉夫人雖然表面上爲爭取自由而奮鬥，實際上，除了波蘭人的一部分民主派外，他們都站在專制主義和反動方面，這種想依賴反動勢力，並極力鞏固反動勢力來做民族解放的夢，不但是達不到目的，而且造成了本身的滅亡。

同時，政府又頒佈了五月六日的憲法，宣告奧地利爲一個單一的不可分離的君主專制國，宣佈財政統一，軍隊統一；換句話說，就是拒絕任何想把奧國統一到全德意志之內的企圖。這就不能不給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一個迎頭痛擊！究竟這國民會議如何對付，則在後面去講。

現在來講講奧國如何對付匈牙利。維也納攻陷之後，到十二月，奧皇立即命令攻破維也納的指揮官溫狄希格萊茨率兵入匈牙利，一八四九年一月，佔領布達培斯，四月因匈牙利反攻，奧軍又退出匈境，接着就是尼古拉第一出兵二十萬助奧，八月將匈牙利打敗，給匈牙利一個暫時的但是很嚴重的失敗。

這又是反革命勢力在德國革命第二大中心維也納大獲全勝。

擁護帝國憲法運動　此時全德意志國民會議在佛蘭克府，繼續其空前未有的憲法大討論。關於德國聯合問題分成兩派：一爲德意志派，主張以奧地利爲首，把德國各邦都聯合起來；一爲小德意志派，主張以普魯士爲首，除開奧國而把全德國聯合起來。他們兩方始終爭論得沒有結果，而奧地利的反動勢力，終於替它們決定了命運。奧國既然宣佈自己是一個單一的不可分離的君主國家，這無異是不但不承

認國民會議的精神與方案，而且是直接向佛蘭克府挑戰。這班大夢不醒的國民會議議員們，也感覺到形勢不對，爲保持自己的尊嚴，除掉自己束住手脚，跪在普魯士的國王之前，藉以表示反抗奥地利的侮辱之外，是沒有絲毫辦法。他們做出這樣的結論，說「莊嚴神聖」的德國統一思想，在實行的時候遇着了障礙；並認眞的開始工作，以便於最短期內產出他那「莊嚴」的作品——「帝國憲法」。而帝國憲法中的一個大問題——帝國的皇帝問題，在他們看來自然一致希望於普魯士國王。誰知普魯士國王，早已看不起這個寶貝——國民會議，甚至用過最難堪的態度對付他們。現在的問題，正是普魯士國王如何結束國民會議的性命，而不是普魯士國王願意來接受這個高貴的帝冠問題。當着國王乾脆的拒絕了國民會議的帝冠的時候，於是國民會議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十二日通過了「帝國憲法爲一國的大法必須維持」的決議，並選舉了一個三十人的委員會來推進帝國憲法運動。

這個決議與這個委員會的通過，是引起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與各國政府間的衝突爆發的信號，資產階級都宣言擁護這一憲法，因爲他們眼見這般反動君主政體，破壞了本國的立憲會議之後，只有希望於這個國民會議的憲法，自己來安慰自己。特別是普、奥的革命已經被反動勢力壓服下去之後，寧願找着一種和平的方法來結束革命，現在正是他們不可放棄的機會。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願意依附於這一憲法，他們受夠了反動勝利後的苦惱，自然他們比自由主義兼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要激進些。甚至他們中間還有主張要用武裝抵抗，「爲自由而鬥爭，不惜流血與犧牲」。民衆在反動勢力勝利之後，太爲自己的環境所迫，同時又無能獨立行動；但當着憲法高唱入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表示得那樣左傾，資產階級也同聲應和的時候，自然，他們也捲入到這一運動的漩渦中。

四月二十八日，普魯士對政府更進一步的宣佈「帝國憲法是無政府最革命的文件」；同時，普國軍隊集中於距佛蘭克府三天行程的地方，以示威嚇。當此之時，帝國憲法運動卽到處燃燒起來了。首先在德國南部，有些地方，舉行民衆大會，通過擁護憲法與國民會議的決議，並有「遇必要時決以武力爲後盾」的這樣表示。科倫的市議會也在開會討論。在柏拉丁納特，在柏爾伯，在紐倫堡等地農民也起來了，響應這一運動。在匈牙利，這時正是匈軍把奧軍打退，且有直搗維也納之勢。這個時候武裝衝突已成爲不可免，人民的幻想達到最高度，而政府的進迫亦逐日加劇；只有國民會議中，才有人相信可以和平過去。

一八四九年五月之初，國民會議中許多右派的腐朽的議員，或被自己政府召回，或畏懼事變，都偷偷離去。這時國民會議中，原來的少數，變爲多數。雖然現在的多數，在實際行動上，比從前的分子，是要堅決一些。他們在口頭上却表示很左，宣佈「排除任何障礙，帝國憲法必須執行」，並決定七月十五日，人民當選舉新的國民會議員。八月十五日在佛蘭克府召集國會，護憲運動的示威更加發展。工人爲最極端的政黨所領導，亦準備拿起武器鬥爭，各處的政府與人民間已經拔弩相視。忽然之間，撒克遜的議會解散，普魯士的後備軍召集，各政府對帝國憲法公開反抗，於是德國西南各部的擁護帝國憲法的武裝暴動開始了。

暴動的五月　德國民衆爲了擁護帝國憲法的武裝暴動，首先爆發於撒克遜萊茵河流域、威斯德法里亞、巴敦各處。五月四日，佛勒斯登（Vresden）被民衆佔領，把國王趕走，組織臨時政府；一切鄰近區域，都派遣援軍，幇助暴動民衆。在萊茵普魯士，有威斯德法里亞的後備軍拒絕開拔去鎭壓民衆，反

而響應暴動佔領了兵工廠，武裝擁護帝國憲法。在帕拉丁納特，人民扣留巴維利亞政府的官吏與公款，組織一防衛委員會，將該省置於國民會議的保護下，在符騰堡，人民強迫國王承認帝國憲法。在巴敦，有民衆與軍隊聯合，也把政府要人趕走，組織一個省政府。在德國他處人民，也都是等待國民會議，發出一個堅決的信號，就武裝起來，聽國民政府指揮。

當時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處在自己意想不到的順利形勢之下：（一）德國西南半部已經拿起武裝為它的憲法而鬥爭；（二）各地的軍隊都在動搖，小邦的軍隊無疑問地贊成這一運動；（三）與國為匈牙利的勝利所牽制，俄國正忙於幫助奧國去對付匈牙利；這樣看來，國民會議面前的主要敵人就是一個普魯士，而該國人民也同情於這一運動。

這時國民會議處在這個洶湧澎湃的浪潮之中，又有這樣順利的客觀條件，它現在應當做的事是什麼呢？它應當：

第一，應當無條件的、堅決不二的站在民衆方面，領導這一運動。應當無情的同一切反抗與阻礙這一運動的各國政府作鬥爭，把已經發生的武裝鬥爭推廣到全德的革命鬥爭範圍上去。只有依據於這種全德民衆的武裝革命，才有戰勝一切反動勢力與實現這一運動目的之可能。

第二，應當宣佈一切反動政府、諸侯、閣員及其他人，凡敢於反對人民主權所在的民意機關者，都是叛逆。應當公開宣佈原來全德帝國聯邦之非法，用實力做後盾，毫不承認其存在，實際上把它推翻。

第三，應立刻建立一個積極的革命的領導機關，統一全德的革命鬥爭。

第四，號召叛變的軍隊到佛蘭克府來直接拱衛，並且迅速從暴動中組織實在的堅強的革命武裝。

只有這樣，國民會議的憲法運動才能名符其實，才能執行與完成其歷史使命。

可是，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所做的事，剛剛與它所應做的事完全相反。

第一，他們利用反動力量，壓倒了一切正在準備的暴動計劃，如在卡爾弗容特、紐倫堡、撒克遜、萊茵普魯士等地，暴動被反動勢力鎮壓時，他們不但不幫助暴動方面，反而去間接的做出有利反動方面的事。

第二，他們在暴動爆發時，不去眞正用力去推動暴動的發展，反而去希望袒護各國政府的帝國大佐，從中調停，而這帝國大佐——國民會議的行政首領，正與各國進行陰謀，以加速他們的傾覆。這樣，國民會議不能不自掘墳墓，就是民衆不起來打倒它，它自己也不得不走入滅亡。

在這次暴動中各階級的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

資產階級很快又是害怕、妥協而投降了。就是有些尙在國民會議中的議員，現在不是胆戰心驚，也是力求事變快平服下去。因爲他們受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驚慌之後，一見到民衆起來『弄武』，就害起頭痛病來；和平立憲則可，武裝鬥爭則不行，這是他們的現行法寶。

暴動中眞正最初拿起武器來鬥爭的戰鬥部隊，是城市的工人羣衆。他們一如任何時候參加暴動一樣，總是希望這個鬥爭能夠勝利，能夠掃除那走向奪取政權與社會革命的障礙，取得一個爲着解放全社會與解放本階級的順利的地盤。

鄉村的貧民、小農勞動者，一般說來都是在暴動發生之後才參加的。他們因爲捐稅負担的加重，封建制度的壓迫，而又重新起來革命。但是他們是追隨在其他參加暴動的領導之下，而且是在這兩個階

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中間動搖着。

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小商人，是這次五月暴動的領導者。這次擁護憲法運動之所以發展，正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特別受到威脅的原故；而運動的中心區域，也正是這般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地方。在暴動勝利地方所組成的臨時政府，主要是代表這一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由於經濟地位的動搖不定，使他們在政治上也是軟弱無能，沒有定見；暴動未起，易於大言不慚；暴動發生，瘋於急求勝利；稍有勝利，即刻因勝而驕；一受挫折，馬上垂頭喪氣。既然這一次各地暴動，落在他們的領導之中，而暴動失敗，也是他們無能領導之故。並且在德勒斯登，小資產階級及商人不僅不幫助暴動，反而幫助軍隊去鎮壓暴動。巴敦的領導者布倫唐諾，他在勝利之後，時常感覺自方的暴動是犯法的，是有罪。

自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民會議如此懦弱無能，小資產階級如此動搖不定，民衆在他們領導之下，固然拚命鬥爭，結果仍是失敗。德勒斯登在鬥爭四天之後，即被軍隊鎮壓下去了。在萊茵普魯士只是開始一個小的接觸，就完結了。在帕拉丁納特，在巴敦，暴動開始不久亦被消滅了。五月底以前大大小小的暴動，就從此都完結了。

五月暴動的失敗，也就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最後迴聲底撲滅，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從此告一結束，反動勢力從此取得它一時的勝利，而所謂國民會議亦於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八日被解散了。

恩格斯在論到這次五月暴動時曾經着重指出暴動的藝術與暴動的原則問題，值得每個革命者注意與領會的。他說：

『第一，不要玩弄暴動，除非你對於暴動所發生的後果有完全的準備。暴動是包含着一些極不

可知的量的微分，此種量的價值，隨每日而變換；反對你的力量，有一切的組織紀律和因襲威權的優點；假使你不集中巨大的力量對抗它，你就會失敗與毀滅。第二，暴動事業一開始，就要用極大決心繼續行動，而且要處於進攻地位。防禦是每個武裝暴動的死刑，它（防禦）去與敵人較量以前就已經失掉。當你的敵人的勢力分散的時候，你應出其不意的襲擊它，準備新的勝利，雖然勝利小一點，但是每天要有，保有着由第一次勝利的暴動所給你的士氣的高漲；奪取那些動搖的分子到你這方面來，他們永遠是跟着最強的衝動跑着，永遠找着安穩的一方面；要在你的敵人能集合其反對你的力量之前壓迫他們後退。但頓是直到現在的革命戰略最偉大的領袖，我們引用他的話說：勇敢！勇敢！更要勇敢！』（『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第六節　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的工人運動及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

革命期間的德國工人運動　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特點及其在這次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已經在前面講過了；此地只是說德國工人階級的團結、組織與政治的發展的問題。

在革命初起時，一般說來，德國工人階級還是相當軟弱的。工人不但沒有獨立的政治組織，就是職工會的組織也是遭受禁止的。在三月革命勝利之後及爾後革命進程中，工人們獲得了一些民主權利，於是工人組織也開始發展。在柏林及其他某些城市中，工人與小資產階級共同建立有政治俱樂部；在大城市中，如柏林、維也納，並常有罷工發生，幾次得到了地位的相當改善，如工資增加，及十小時工作制

的採用。工人運動，在革命中有這樣組織上的發展：一方面，產生了手工工匠的組織；一方面，又有工廠工人的職工會發生。萊茵省的科倫城是產業比較發達，而且是該省的政治中心，在這裏由一個貧民醫生哥加克領導，成立了『科倫工會』，這個工會曾經在這八萬人口的城市中，吸收了七千工人參加。這個領導人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思想接近於魏特林派，可是這個團體內不少進步的分子是接近馬克思的。

一八四七年七月，手工業工匠大會舉行於佛蘭克府，當時工匠們還帶有舊的行會觀念。會議曾經提出：反對工業自由，保護行會職權，此外則主張頒佈勞動法，十小時工作制，廢止勞動簿記，廢止對工人遷徙自由的限制。

然而在德國工人運動史上，大有意義的是一八四八年八月在柏林所舉行的第一次全德勞動大會。這次大會是本年四月在柏林所組織的勞動者中央委員會所召集的。其著名領袖爲波倫（Fdang Bonrt）。他是一個印刷工人，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出席這次會議者，有三十五個工會及工人聯盟的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工人之友社』，作爲全德工人總聯合組織，並以以下各點作爲自己的政綱：要求國家保護勞動權，由國家幫助組織社會工廠，頒佈十小時工作制，組織勞動部及工人社會保險所；此外還有組織信託銀行。很顯然的，這位波倫及其所領導的這次大會的思想，主要是受了小資產階級烏託邦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與蒲魯東的影響。『他們完全忘記了，問題在於首先要以政治的勝利去獲得這些條件，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這些要求才能眞正實現。』（恩格斯：『共產主義同盟史』）正因爲是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統制，所以他們對於當時德國革命的見解，也認爲唯一的是追隨資產階級之後，毫不應有

工人自己獨立的要求。正因爲如此，所以這時德國工人也在這個聯合的影響下，大多數還脫不掉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籠罩，還不能達到眞正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雖然，他們在革命中有過英勇的鬥爭，但也不能有充分的力量，來挽回德國革命的命運。波倫在一八四九年五月暴動中曾經積極地參加撒克遜之特勒斯登的暴動，德國革命失敗之後，一八五〇年，『工人之友』報紙亦被政府封閉，工人的組織是幾乎被摧殘殆盡。

『共產主義同盟』雖然它還是一個祕密的宣傳團體，但是，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無論在德國或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德國），都起了偉大的領導工人運動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上首先就指出這一點：『第一，「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都是很英勇的參加這些運動，他們在刊物上，在巷戰中，在戰場上，都是站在唯一堅決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前列。』在這次革命中，眞正拿無產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策略，積極教育與組織工人階級，並且成爲『共產主義同盟』的領導中心人物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

德國革命中的馬克思與恩格斯　德國二月革命爆發時，馬克思、恩格斯尙在比京布魯塞爾。當時『共產主義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的職務，全權交給布魯塞爾指導局，歸馬克思負總的責任。因爲，比利時的政府實際上已宣佈戒嚴，『共產主義同盟』會員，已失去行動的自由，三月三日，指導局決議予馬克思以全權，立刻到巴黎去組織新中央委員會。不久，馬克思被捕，比政府勒令馬克思於翌日出境，於是馬、恩等人均前後去到巴黎，並在該地組織六個人的中央委員會，以馬克思爲主席。委員會以委員六人——馬克思、沙配、鮑爾、恩格斯、莫爾、吳爾夫——署名發表了德國共產黨的要求共十七條，作爲

當時德國工人階級與德國人民鬥爭的民主政治綱領：

一，宣佈全德國爲統一的不可分離的共和國。

二，凡年滿二十一歲的德國人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人民代表者領薪俸，使德國工人可以在德國人民國會中，參加開會。

四，普遍的武裝人民。

六，向來加於農民的一切封建負担、賦稅、力役以及什一稅等等一律取消，不給補償。

七，貴族的封建的財產礦山等等，都變爲國有產業。

八，宣佈農民土地的押款爲國有財產，農民當以此押款上的利息交給國家。

九，在地租制發達的地方，其地租或租金，當作稅款納於國家。

十一，一切運輸的工具，如鐵路、運河、汽船、公路和郵政等，均歸國有。

十四，限制承繼權。

十五，推行高度累進稅，取消消費品稅。

十六，創辦國營工廠，國家保證一切工人的生存，並維持一般無能勞動的人的生活。

十七，普遍的免費國民教育。

（這是恩格斯摘要寫出的，原文見『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五八五——五八六頁）

馬、恩在巴黎時，當時巴黎成立革命『自願軍』的空氣很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荷蘭人、波蘭人和德意志人爲着圖謀他們祖國的解放，均在成羣結隊的活動。德意志自願軍是由黑維，波

恩斯坦，伯恩斯台所領導，他們以爲召集旅法的德人組成軍隊，打回德國，即可收革命之大效。馬克思堅決反對他們這種盲動的無濟於事的主張，認爲他們這種舉動是幫助德國政府，不但自取滅亡，而且可以使革命不利；同時，馬克思極力派遣工人同志回德國去眞正作革命活動。

這時，他們組織了一個德國共產主義俱樂部，勸其中工人勿加入自願軍，應當零星返國，從事革命活動。另外馬、恩二人就派遣了三百至四百德國工人回德國去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

因爲工作與經費的關係，使馬、恩二人不能早回德國，直到一八四八年四月初才能成行。他們不先到柏林，而先到萊茵省的科倫城。因爲那時科倫在政治上，在指導工作上，特別在適宜於工人羣衆中工作這點上，比較柏林適當得多。他們洞察當時德國革命形勢及德、法階級鬥爭的發展，決定參加到當地民主主義運動中去。首先，就決定創辦一種中心的革命報紙，藉此以推進歐洲各國，特別是德國的革命運動，並以此來教育團結與組織德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恩格斯說：

『當我們來到科倫時，那時，民主主義方面正在籌劃辦一種大報紙，有人要將此報作爲純粹的科倫地方的報紙，把我們趕到柏林，但我們——特別是藉馬克思的力量——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即將這種地盤拿到手中了。此報變爲我們的報。我們相當讓步的地方，就在請勃爾格斯加入編輯部做過一篇社論，（第二期）再也沒有第二篇了。』

這個報紙就是著名的『新萊茵報』。獨任主筆者爲馬克思。該報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第一期。這個報紙是民主主義激進派的報紙，同時（在實質上）也就是德國以及當時國際工人階級的報紙。

這個報紙不僅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具有政治上唯一無二的至高威權，成爲推動當時民主革命的政治火車頭；而且，特別在指導德國及他國工人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策略上，在組織與訓練工人階級上，都具有無上偉大的歷史意義。

『新萊茵報』第一期的社論，就是批評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論到他們對革命儒弱無能，對民衆提心吊胆，對反動皇室甘作傀儡，對自己則妄自高大，實際上是背叛革命。巴黎六月暴動發生，馬、恩堅決站在暴動者方面。暴動失敗後，馬克思在六月二十八日的論文上，嚴正估計法國六月暴動的意義與前途，抨擊法國資產階級之殘殺自己革命中的朋友——無產階級，結果自己在政治上也不免失敗。

一八四八年八月馬克思以『新萊茵報』的主筆資格，曾經去過維也納（報務、主筆由恩格斯代理），在那裏看到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並且參加了八月二十八日『民主聯合會』的大會。雖然當時維也納的工人尙未脫離民主派的思想，可是馬氏此行，對奧國工人與奧國革命是有很大影響的。

九月馬克思回到科倫，這時正是普國（因爲斯列斯威、好斯敦兩公國問題）與丹麥開戰，又忽而訂立不利於這兩小國及普國人民之和約的時候。科倫的民主黨，因爲此事，號召民衆示威（七月），二十五日又舉行羣衆大會，並與軍警衝突，使『新萊茵報』一度遭受封閉，至十月十二日才繼續出版。維也納十月革命中，『新萊茵報』極力號召普國及他國工人援助之。旣至暴動失敗，普、奧反動勢力高漲，『新萊茵報』堅決向反動勢力表示反抗。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由馬克思等人署名，代表萊茵省民主聯合會，發表一個宣言，反抗政府的反動政策，並努力推進民主運動。一八四九年二月七、八兩日，馬氏兩次受審（第一次因爲侮辱檢査

官），最後被判無罪。四月馬氏因萊茵民主聯合會的分子過於複雜，民主派的資產階級均公開反對革命，如此繼續下去沒有好處，於是退出民主黨，特別致力於無產階級的獨立活動，並準備於五月初召開萊茵省與威斯特華倫工人團體的聯合會。一八四九年四月，『新萊茵報』上發表了馬克思的重要作品——『僱傭勞動與資本』。五月德意志地方暴動發生，五月十六日馬克思就接到普魯士政府封閉令：『「新萊茵報」在最近論文中，愈加煽動民衆蔑視政府，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德境，否則驅逐。』『新萊茵報』於五月十九日出版了最後的一期，除告別書外，還有科倫工人的告別詞：

『我們同人，最後警告你們，在科倫不要有任何暴動。按照科倫的軍事情況，你們暴動失敗是無疑的。歐爾拍非爾特的資產階級怎樣將工人送入砲火中，怎樣卑鄙齷齪的背叛工人，這是你們已經看到的。你們如果安靜，將使普魯士軍人失望。』

一八四九年法國六月十三日事變的瓦解，德國五月暴動的失敗，奧大利在俄皇幫助之下，撲擊了匈牙利的革命；於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結束。五月底，馬克思接到普魯士政府的逐客令以後，即逕往巴黎。七月，又被法政府通緝，八月即去倫敦，此後長居於此，恩格斯及他『共產主義同盟』會員最大部分均於一八五〇年初齊集於倫敦。一八五二年，『共產主義同盟』完結了它的歷史使命，而德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時期（自一八三六年到一八五二年）也從此告一段落。

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策略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革命中的政治策略，就是『新萊茵報』的政治策略，也就是當時在『共產主義同盟』中，由少數人的幹部組成，而名曰『德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路線。這種政治策略，就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鬥爭中的具體指導與運

用，也就是在一八四八年二月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在基本上已經規定出來了的。其主要之點就是：

第一，『共產黨人代表無產階級鬥爭階段上之全部運動的利益』；『共產黨人到處都在擁護反對現存社會狀況與政治狀況的每個革命運動』，『同時擁護運動的將來』。（『共產黨宣言』）還在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馬克思、恩格斯就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德國，堅決擁護德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其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白揭示了自己的政治態度與戰略方針是：

『共產黨人把他們主要注意力轉向於德國，因爲德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爲這一革命，是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是在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更加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之條件下來實現的；因之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前奏。』

及至德國革命爆發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就堅決站在革命的最前線，發動與領導德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與實際工作上來推動這一革命運動。他們發表了德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他們參加了萊茵省的民主聯合會，他們主持了『新萊茵報』，他們成爲當時最激進的民主派，他們不斷地與一切反動勢力作堅決不渝的鬥爭，他們爲着澈底完成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但是，他們毫不掩蓋的標榜着，這種擁護對無產階級目前有利的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因爲這個革命能夠成爲對無產階級將來有利的社會主義革命。

恩格斯曾經在『馬克思與新萊茵報』一文中明白地說明了無產階級爲什麼要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

『無產階級還沒有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在廣大羣衆中應當站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極左派的

位置的首位。德意志的工人，首先要爭取他們獨立組成工人階級政黨所不可少的權利，即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這些權利都是資產階級爲自己的統治的利益所必須爭取的，但現在資產階級自己在工人面前驚懼起來，對於此等權利和工人爭執起來了。至於幾百個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忽然投到羣衆運動的大漩渦中，就看不見了。所以德國無產階級起初出現於政治舞台，是爲極端的民主黨。我們在德國辦一種大報，自然就有了這種旗幟，它只能是一種民主主義的旗幟；但是，這種民主主義到處都把無產階級的特別性質逐漸的標明出來了（這種性質還不能到處一次的標在旗幟上面）。我們如果不願意這樣做，如果不願意打起這種現存的、最先進的和實際爲無產階級的旗幟，而投入這一運動中，並促其前進；那末，我們除掉在一種小報中宣傳共產主義和拋棄一個行動的大黨而成爲一個小派外，實別無他法。』（『馬克思選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三頁）

在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特別在當時德國的具體情況下，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堅決參加並積極推動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則這種民主革命才能達到澈底勝利。

因此，共產黨人應當領導無產階級廣大民衆，堅決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爲他最近的民主政綱——即最低政綱而奮鬥，應當成爲這些民主革命的核心，應當努力去推進這些民主運動，爲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鬥爭到底，絲毫不要對這些民主革命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因爲資產階級的革命，正是最能決心消滅國內封建制度殘餘的革命，也是最能保證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發展的革命，也正是必然造成無產階級力量之發展使其足以担負其前進的歷史任務的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正是社會主義革命順利到來的先決條件。無產階級因自身階級地位，逼使他不能不成爲澈底的民主

主義者，因而共產黨人就不能不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最堅決最前進最徹底的負担者。但它毫不隱瞞地官佈，他今天要爲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革命也在內）而鬥爭，也正是便於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若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得愈堅決愈徹底，則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最終目的的鬥爭，就愈加便利與愈加有保證。

第二，「共產黨人到處都在努力於一切國家民主政黨的聯合與團結。」

「共產黨人鄙棄把他們的立場與意見隱蔽起來，他們公開聲明他們的目的」。（「共產黨宣言」）就是說，共產黨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當去與其他革命的民主派作一定的革命的聯合；但是，在與革命的民主政黨聯合時，同時必須保持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他並不因此放棄對於那種空談與幻想採取批評態度的權利。」（同上書）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二月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說到：

「在德國，當着資產階級還革命的時候，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共同去反對專制君主、封建的土地主與市民。（指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底反動成分——編輯部附註）

然而共產黨人一刻也不放鬆地在工人中間，造成對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矛盾之盡可能更明白的認識，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所不能不與他的統治一同帶來的社會條件與政治條件，作爲極多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德國反動階級推翻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這是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未發生之前，馬克思對於「還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所採取的策略。即是

說，當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反君主政體、反封建制度或者反民族壓迫的原則之上，去與他聯合；但是馬克思又毫不客氣的指出『德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有背叛民衆的傾向』。即至德國革命中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革命之後，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就非常嚴正的揭露它的反革命實質，他說：

『德國資產階級發展得很遲鈍、怯懦、緩慢，當他開始威脅到專制制度與專制政治的時候，已經在另一方發現了自己是無產階級及與無產階級利益思想一致的城市平民的敵人：他的敵人不只在階級背後；還在全歐洲的前方。普魯士的資產階級與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不同，他是一個擁護整個當代社會來反抗舊制度代表（帝制與貴族界）的階級，從最初起，就是趨向於背叛民衆以及與舊社會的王室代表妥協，因爲自己也屬於舊社會之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在上層階級前面怒吼，在下層階級前面戰慄；對兩者的態度都是自私，而又要爲自私辯護；在保守者眼中是革命，在革命者眼中是保守……老的眼，老的耳，老的牙齒，老的五官百體，三月革命後掌握普國大權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是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仍不拒絕與萊茵省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作必要的革命聯盟。因爲在三月革命之後，這裏的民主派資產階級仍是革命的。『新萊茵報』就是這裏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報紙，馬克思毫不猶豫的加入這個報紙，並把這個報紙變爲眞正的激進的民主主義的報紙。但同時馬克思毫不放棄自己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他不但把這個與資產階級聯盟的報紙拿到自己手中，並且還毫不讓步的去批評這般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與不澈底性。勃爾格斯雖參加在該報的編輯部，但只能讓他做過一篇社論（第二

期），再多就沒有了。即至一八四九年四月，科倫民主聯合會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分子，已經走到公開的叛賣革命時，馬克思就毅然決然的退出這一聯合會，可是依然堅持自己的「新萊茵報」到最後的一日。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佛蘭克府國民會議，也是採取同樣的策略。佛蘭克府國民會議從它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佔大多數的自由資產階級及一部分民主資產階級把持之下，表面上彷彿是站在革命與反動之間，實際上是迎合反動勢力與破壞革命。「新萊茵報」第一篇社論就是嚴厲批評他的動搖性，指出他在實際上是一步一步的背叛革命。恩格斯說：

「「新萊茵報」第一期社論就是譏誚佛蘭克府國民會議的空虛，其冗長詞句之無的放矢，其怯懦決議之無濟於事。此文使我們失去半數的股東。佛蘭克府國民會議還不算是討論的俱樂部，在那裏幾乎沒有討論，而只是提出事先準備好了的學院式的論文，與通過那只可以激勵德國庸人而任何人也不感興趣的決議。……柏林的左派代表，如舒爾池代立蕬、柏南斯、亞爾斯勒、西台等，我們對待他們也不比對佛蘭克府議員較為緩和，我們無情地揭破他們之無堅決性，懦弱無能，優柔寡斷，並且證明他們由妥協而一步一步的背叛革命。」（「馬克思與新萊茵報」同前書第二五——二六頁）雖然如此，但在一八四九年擁護憲法運動中，國民會議中成分稍有改變，並在客觀上仍帶有反抗反動勢力的意義時，馬克思仍不拒絕對他們的幫助，主要是推進民衆五月鬥爭的發展，而同時卻依然斥責國民會議之始終妥協與無能，終於使暴動失敗。

至於對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也是如此。他們一方面在反對反動勢力

上與他們共同行動，同時，又不斷地、明確地、劃分自己與他們的基本不同的立場，揭露他們的弱點。

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說到：

『無產階級政黨在政治行動上，當時與小資產階級政黨或者當時所稱爲民主黨，主要不同之點有三：第一，對法國運動估計不同，民主主義者攻擊巴黎的極左派，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則擁護他。第二，無產階級政黨主張有建立一單一的不可分離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必要，而民主主義者中的極端派，只敢低聲要求聯邦共和國。第三，無產階級在任何條件下顯示自己的革命的英勇與行動的準備性，而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和他們佔大多數的政黨則缺乏這種東西。』

所以，馬、恩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在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通告上，指出當時德國工人政黨對當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策略是：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關係是如此：它（工人政黨）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一齊來反對它（工人政黨）所要推翻的政派，當它（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要鞏固自己的時候，工人政黨在任何條件下，都要起來反對他們。』

這就是說：共產黨（工人階級政黨）不僅是要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要爲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因此，它就必須去與一切革命的其他階級的黨派謀政治上的聯合與團結：換句話說，即與他們在一定政治綱領上結成革命的民主的聯合戰線。藉此，以造成階級的團結，增強反對共同敵人的力量，以達到這一革命之順利的、完滿的與徹底的勝利。然而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主義，無產階級因其特殊的社會階級地位，使他能夠爲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共

產主義因其科學性與徹底性，它能夠成爲全部無產階級鬥爭的武器，今天它能夠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的武器，將來它能夠成爲無產階級的以至全人類的解放的武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他的共產主義指導之下，今天能夠爲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將來還要爲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即爲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今天爲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是實現共產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最低綱領，將來爲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即爲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

因此，無產階級，共產黨，共產主義，可以與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在一定的歷史社會，一定的革命政綱上，和衷共濟，但他絕對不能與他們的政黨、主義混爲一體，或溶爲一物。因此，共產黨必須要在這種政治聯盟中，保持自己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有對同盟者批評的自由。這樣，不但不妨害革命的發展與聯盟的要求，而且剛剛是順應歷史社會發展的規律，剛剛是具備了民主革命的支柱，剛剛是保持了聯盟中團結的核心，剛剛是能於影響友黨前進，能於使革命力量加強與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剛剛能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了徹底勝利的保證。

第三，「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獨立的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參加民主主義鬥爭中，它不放棄無產階級本身之團結訓練與組織，特別努力於組成獨立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他們的一切工作都是向着這個方向前進的。他們把理論與實際鬥爭緊緊的聯繫起來，他們努力在工人中活動，不斷的同有害於工人的思想意識作鬥爭。他們在革命過程中，特別是一八四九年初起，是極力想統一德國的工人運動，想從工人的團結中，組成無產階級之獨立的羣衆的政黨。雖然因爲環境關係，特別是由於工人階級還多半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之下，未能應有的覺悟

起來，使這一企圖還未能眞正實現，而這一企圖之未能實現，也就使德國工人階級不能達到應有的團結與發展，不能在革命中起他更雄大的鬥爭作用，反而大多數工人始終拘束在小資產階級以至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這也是這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所以，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上，特別指出：

「工人們，首先是全體同盟，應當照着這個方向工作，以便與公認的民主派併列起來，建立一個工人政黨的、獨立的、祕密的與公開的組織，並且轉變每個工人團體成爲工人同盟的中心與核心；只有在這樣組織中間，無產階級的地位與利益才能夠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中解放出來。」

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給特洛爾的信中，也曾經這樣說道：

「如果沒有強大的革命，無產階級是不能夠奪取政治上的統治。關於這一點，我們都是同意的。爲了無產階級在決定勝負的日子表現他的足夠的力量，爲了勝利（我從一八四七年起就堅持這個意見）就必須無產階級組成一個單獨的階級、自覺的、階級的政黨，以別於一切其他政黨，並且，是與其他政黨敵對的政黨」。

第四，關於革命在退潮與低潮時的策略：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三月，是估計到革命新高潮是快來的。但是，到了七月，他們詳細分析了當時歐洲的經濟與政治情況之後，認爲當時經濟繁榮向上，是不利於革命的高漲，看出革命是向下低落，於是他們認爲倘若沒有另一種經濟恐慌出現以後，創出更有利的形勢，革命運動的恢復倘不可能。因此，主張當前的鬥爭策略應當是趨重於鞏固自己的力量，改造無產階級，使之適合於將來取得統治的

勝利。當時共產主義同盟中有幾位會員，不信服這樣的見解，如威理契、沙配、哥隆工會一些會員、老的魏特林派，這一般人就結合起來，他們主張有立刻在德國發動革命的暴動的必要。列寧說：

『沙配等曾經這樣說：「我們應當立刻取得政權，或者我們去躺着睡瞧。」馬克思不同意沙配的意見，他以為僅僅靠自己的精神來代替實際的條件，這還不能算是一個革命推動者；無產階級還要經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的衝突，「這不僅是為了改變這些條件，並且亦為了改變無產者自身，使之能適合於政治上的統治。」』（見列寧：『論革命臨時政府』一文）

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到英國後，自一八五〇年初開始就着重於恢復與鞏固德國及他國共產主義同盟的組織，這正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上所已指出的策略『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將到來的鬥爭』之具體運用的時候。

因此，『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時代已經完結之時，便反對任何以革命為兒戲的行動（沙配、威理契），並和他們作鬥爭，要求善於在似乎「和平地」準備着新革命的那個新時代中進行工作。』（『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第五，關於革命民主專政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新萊茵報』上曾經這樣說過：

『革命後一切臨時的國家組織都需要專政，而且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最初就責備甘加仁（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後的內閣總理）說他未按專政的手段行事，說他未馬上打破舊機關的殘餘；當甘加仁先生在那裏做憲法夢的時候，已被擊破的政黨（反動黨）就得在官僚中和軍隊中鞏固自己的地

位，敢於在各地開始公開的鬥爭。」

馬克思這個意思，就是說：臨時革命政府應該以專政的手段行事，它的任務在於依靠民衆革命的實力，在於澈底消滅舊機關舊勢力的殘餘，這樣來鞏固來擴大革命的勝利，只有這樣才能夠去達到勝利的完成的革命。

同是，馬克思還說：

「國民會議應當以專政的手段去對付已被推翻的政府的反動陰謀，到那時候，它方才能夠在民衆意見中取得一個能夠破壞一切刀槍的力量。……否則這樣會議，只能拿些寂寞的詞令，來疲困德國的民衆，不能吸引民衆也不能被民衆所吸引。」

這就是說，要實行革命的專政，必須依賴民衆，要依靠民衆也只有實行革命的專政，這種依據於工人農民之廣大民衆的力量，實際上去肅清一切與民主主義原則相違背的原則。這種專政「不是別的辦法，就是革命的民主主義專政。」（列寧）

在柏林三月革命之後，是存在有兩種可能的：第一種可能，就是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只獲得「批評的自由」，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必然去與反動勢力妥協，使革命流產。第二種可能，是政權落到民衆手中，這樣有民主主義專政可能，卽革命完全勝利的可能；雖然德國在事實上走上了第一種可能，然而馬克思所告訴於民衆，所期望於無產階級者，却是第二種可能，卽革命之完全勝利。

由此可知，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就提出民主主義專政問題，並且把這一專政作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保障與其澈底勝利的標誌。如果法國大革命是完成於小資產階級與勞動者的民主專政，馬克思却

特別重視它，那末，一八四八年革命開始之後，在資產階級就已經叛變了革命的情形之下，如果期望革命完全勝利，則這種勝利，不是別的，正是民衆的民主專政。這個民主專政與馬克思同時所主張的民主共和國，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前者正是後者之政權內容及其發展。當時馬克思沒有提出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是以後列寧提出的。列寧在「論臨時革命政府」一文中，大致說到馬克思所提出的民衆民主專政，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因爲當時工人在德、法諸國都沒有佔人口的大多數，所謂「民衆」這個大多數，就是指工人與勞動農民之結合，不然，就不能成其爲大多數民衆。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策略路線，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已經完全證明其正確，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同時也就是馬克思在總結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中所指出了的。

簡短的結論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沒有完成的、混雜的、半途而廢的革命。」（列寧：俄文本「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一四頁）因爲這個革命沒有完成其歷史任務，沒有推翻君主專制政治，沒有實現德國的統一。這次革命是失敗了，可是它部分地削弱了半封建基礎，動搖了封建制度；相當地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醒覺發動並組織了廣大民衆，特別是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受了這次革命的鍛鍊，從切身的經驗中，開始感覺到將來解放的道路。並且「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是德國地方的事變，而且是大歐洲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指示出歐洲的進步」。（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因此，它還是有他的歷史意義的。

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七月二十九日）就指出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特點，他說：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不過是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一種流產能了。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佔領巴士提三星期後，法國的民衆於一日之內，把一切封建的負担都解除了。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距三月巷戰後四個月，封建的負担却把德國民衆征服了。喬爾桀、汗思曼，是其中之狠狽爲奸者。

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鐘曾經拋棄過自己的同盟者——農民，他知道自己統治的基礎是在於消滅鄉村中封建關係，而造成自己地主農民階級。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毫不顧良心的出賣了農民，出賣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這個同盟者是與德國資產階級骨肉相親的，德國資產階級沒有他們，是無力量反對貴族的。』（參閱『兩個策略』書後）

由是可知，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失敗，最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叛賣革命，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動搖不定，亦足以葬送革命；無產階級力量不足，並且大部分還在小資產階級影響的籠罩之下，不能有全階級的獨立政治行動，而在革命失敗之下，受到重大的打擊。然而這種結局，對於無產階級說來不是無意義的。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中指出：

『德國無產階級，正處於充分有力的醒覺狀態，能夠給資產階級看，在德國已經播下了這些種子，而且這些種子是能夠給這樣的收穫的。』

特別是這次革命，教訓了德國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的先驅部分，脫除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和平主義的幻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明白的向無產階級指出：唯一達到勝利的道路，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道路。

從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極寶貴的經驗教訓，昭示給無產階級，即無產階級在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必須有自己獨立的階級政黨，正如列寧所說：

『馬克思的意思是如此：一八五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組織起來，我們在革命中的第一個時期是失敗了。我們完全落在資產階級的尾巴後面去了；我們一定要獨立的、經常的、無條件的組織起來——無論如何要獨立的組織起來；不然，在所獲得的將來勝利之下，因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強大，我們又要做他們的尾巴。』（列寧：『論革命臨時政府』）

第六章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

本章研究提要　我們要講的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主要是從一七七六年到一七八三年的北美獨立運動起，到一八七一年西歐民族運動完結爲止。這個時期，在北美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時期，在西歐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也正是民族運動與建立民族國家時代。列寧說：

「在西歐大陸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包括一個十分確定的時期，例如是從一七八九年起到一八七一年止，這個時期，恰恰是民族運動及民族建國的時期。這個時期完結以後，西歐已轉變爲資產階級的，而照例是民族統一的國家底成熟系統。」（列寧：一九一四年「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

歐美民族運動是與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相適合，是與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主義及其他障礙的時期相適合，這種民族運動也就成爲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在共同文化上表現出共同心理結構的國家集團。」（斯大林）那末，民族運動就是在一定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上，爲形成這樣的民族及造成保障民族自由發展條件的一種政治運動。這種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就是：在一定民族領域的社會中，因爲資本主義發展到必要階段，爲要使商品生產完全勝利，需要打破封建制度與外族壓迫諸障礙，需要有同一言語，同一領土，同一經濟生活，同一心理結構的民族集團；在這樣的民族

集團之中，用國家的形式把它們團結起來。列寧說：

「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曾與民族運動有聯繫，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就在於：爲要使商品生產完全勝利，就需要由資產階級奪取國內市場，就需要使言語一致的人民底領土用國家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妨害這種言語的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之統一及其順利發展，是眞正自由的、廣泛的、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週轉底最主要條件之一，是人民自由的廣泛的團集爲各個階級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最後，又是市場與任何及每個大經濟主或小經濟主、賣主及買主發生密切聯繫的條件。」（同上書）

由是可知，這些民族運動正是基於這樣的經濟基礎所不可避免的政治運動。這種民族運動的政治任務，就是對內要掃除封建割據求民族的統一，對外要打倒民族壓迫以求民族的獨立，以達到建立滿足於現代資本主義要求的民族國家底這個目的。列寧繼續說：

「所以，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向，就是要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底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最深刻的經濟原素推動這一點，所以整個西歐——而且是對於整個文明世界，資本主義時代標本式的經常的國家，就是民族國家。」（同上書）

歐美民族運動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政治任務，就是如此。不過就其「內容」說來，有的國家主要是民族獨立運動（如十八世紀的北美，如十九世紀的波蘭，匈牙利、愛爾蘭），有的國家主要是民族統一運動（如十九世紀的德國與美國），有的國家，是民族獨立運動與民族統一運動連帶發生（如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如拿破崙第一與拿破崙第三侵略下的德國）。另一方面，有的國家是唯一反民族壓迫（如十八世

紀的北美，十九世紀的愛爾蘭），有的國家是反民族壓迫與反封建制度結合起來（如大革命時代的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德意志，十九世紀的意大利）。有的民族運動聯繫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如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有的民族運動沒有聯到農民的土地問題（如統一時期的德國）。其次，就其『性質』說來，最大多數國家的民族運動，是革命的民族運動（如美國與反外族壓迫時的法國，一八四八年及六十年代的波蘭、匈牙利、意大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的德國、愛爾蘭），而少數的民族運動確是反動的民族運動（如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的斯拉夫運動）。再其次，就其『動力』說來，大體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勞動階級、農民均爲革命的民族運動的動力，所以民族運動帶有全民性，但在不同的民族或時代，也常有它的特點。例如，在法國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反民族侵略中，當時民族運動還是在反資產階級之下進行的。至於民族運動中的積極的、重要的、不可缺乏的力量，則是工人與農民。再其次，就其『領導』方面說來，最大多數國家是資產階級領導（如美、意、匈、愛），或資產階級式的貴族領導（統一時期的德國），但是，亦有小資產階級領導（如小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法國），甚至還有純貴族領導（如六十年代前的波蘭），不過他們還是執行資產階級所要求的事業。最後，就其『結局』說來，有多數國家完成了民族運動的任務（如美、法、德、意），有些國家在這一時期沒有完成這一任務（如波蘭、愛爾蘭、匈牙利）；有的國家是多借助於民衆的下層革命手段完成的（如美、法、意），有的是多借助於上層改革手段完成的（如德國）。

正由於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力量還發展得不夠，既不能做到與資產階級共同領導，更不夠實現無產階級的獨立領導，所以在民族運動勝利與民族國家完成的國家中（如法、德、意、美），這一任務達到之

後，馬上由被壓迫民族，被侵略國家轉變爲民族壓迫與民族侵略的國家，爾後轉變爲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在民族運動失敗或半途而廢的國家與民族，不但在這一時期仍然是被壓迫的與被侵略的（如波蘭、愛爾蘭），就是在超過這一時期之後，仍然是一蹶不振；不是形式上獨立實際上是附屬國（如二十世紀的愛爾蘭、波蘭），就是，曾經在一時獨立而終於屈服於侵略國之下（如現時的捷克）。

歷史上的證明，以及充分科學理論的根據，只有無產階級勝利了的國家，才能徹底的、真正的解決民族問題，也只有社會解放、階級消滅因而民族也不存在，才算是最終的解決了民族問題，世界才真正進入於大同——這時就是所謂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個時期的歐美民族運動，不但給了我們一個科學的理論的認識，而且提供了基本策略上的指示；這種理論與策略，正是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解放的旗幟，也正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所採取的立場，也正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時代解決民族問題所根據所發展的立場。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我們須在本章加以簡要說明。

研究本章時應注意之點是：

㈠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發生與發展的必然性。

㈡ 這些民族運動在不同國家與民族中表現出一些什麼特點？

㈢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的實質何在？

㈣ 從這些民族運動中有些什麼經驗教訓值得今天我們注意？

第一節　北美民族獨立與民族統一運動

美洲之發現與歐洲人之移殖　現在的北美合衆國，是在美洲發現之後，由歐洲移殖來的人們，經過相當長期的民族鬥爭，而從新建立起來的一個民族國家。所以，我們在敍述北美合衆國這個民族的獨立與統一運動之前，應該首先講到美洲的發現及歐洲人向美殖民的史的經過。

美洲的發現究竟在什麼時候呢？據有些外國歷史家的研究，在紀元一〇〇〇年左右，就有諸爾曼人，首先發現美洲；不過當時歐洲正進到封建時代，社會的技術、經濟、政治諸條件，尚不可能向該處繼續發展，亦無急於向該處發展的必要，而且歐人知道此事者亦甚少。此後時過境遷，外人亦無人知道歐洲海外有此世界存在。自十二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社會的生產力逐漸發展，生產品的交換擴大，自由都市的成長、商業的前進，除歐洲內部貿易之外，對外商業亦大加發展起來。不過此時的對外貿易，尚以東方貿易爲中心。歐洲自東方輸入香料、茶、咖啡、寶石、珍貴紡織品、染料、香水等物；而向東方輸出毛織品、銅、鉛、錫、水銀等物，在對東方貿易中，歐洲商人能夠賺得大批的利潤，能夠攫取大批的現金財寶，於是經營者日多，貿易亦日加擴大。然而，到十四世紀時，因阿斯曼・土耳其人（Osman Tucks）的興起，盤據了對東的商路，而且一四五三年攻陷了東羅馬帝國的最後堡壘——君士坦丁堡，使歐洲商人無法與東方貿易，於是西班牙、意大利及其他依賴東方貿易的商人，不得不另找出路。加之在這時候（十五世紀），歐洲造船業亦頗發達，九百噸以上的大船給了航海業以有力的工具；羅盤針亦已由中國傳入，並且地圓之說，亦盛行於歐洲。

十五世紀末期，歐洲出現了所謂「探險與發現」的時代。首先是葡萄牙王子亨利極力講求航海業，相信繞過非洲南端，可以海行東達印度，並在大西洋東岸附近發現了一些島嶼。一四八六年，葡萄牙探險家狄亞子航海南行，發現了非洲南端之好望角。一四八九年佛斯哥・德加馬（Wasco Da Gama）航過印度洋到達印度南岸，正當葡萄牙人追求對東航路的時候，西班牙人亦聞風而起。這時有意大利基諾亞人哥倫布者深信地圓之說，以爲由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可以直達印度而不必遠航非洲。一四九二年八月，哥倫布得到西班牙女王伊沙貝拉之助，開始西航，經過兩月之久，遂發現了美洲之桑沙爾華陀島。當時，哥倫布以爲這就是印度，並命當地土人爲印第安人。接着，哥倫布又發現了海地與古巴，並到過南美地方。但是他終以爲他所到的地方是亞洲。一四九八年到一五〇五年間，意大利人——亞美利哥（Amerigo）再往美洲去探險，才知道哥倫布所發現的地方不是印度，而是另一新大陸，於是，歐人稱這個新大陸爲亞美利加洲——即美洲。

原來住在美洲的土人，即所謂印第安人，在哥倫布未發現該地之前，其社會組織爲氏族制度。據美國摩爾根的研究，美洲各地土人的氏族制度，在基本上都與易洛魁人的氏族完全相同。氏族之內是經營着共同的經濟生活，其社會經濟形式主要是漁獵、遊牧和原始的農業；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制，許多氏族結合爲宗族，由數個宗族結合爲部族，部族之內，由各氏族的首長及軍帥組成部族集會，處理對內對外一切事宜。部族集會，有正式承認及罷免各氏族首長與軍帥之權。部族中有共同的觀念、神話與宗教儀式。在易洛魁族的印第安人中，還有更高的部族與部族之結合體。而所謂「易洛魁聯合」，自從歐洲人移殖進來之後，這種美洲土人的原始社會組織就急劇的崩潰下去了。

新大陸的金銀之光，最先觸動了歐人的慾火。自十六世紀以降，歐洲人不斷的航海而來，最先努力於殖民地事業的，主要是西班牙人，這種事業貫徹於整個十六世紀。不過它所佔領的地方只是南美的全部(除巴西外)，中美，及北美南部一帶。西班牙政府的殖民政策是非常殘暴的掠奪政策，他們每發現一個比較富庶的地方，盡力開採金銀礦產，並以最野蠻的手段掠取土人的財物輸回本國；禁止殖民地種殖橄欖、葡萄、煙草、蔴等農作物，而以藥物煙草爲國家專利品。目的爲了增殖本國的財富而極力阻止殖民地經濟之發展。這種政策是與最橫暴的姦、擄、燒、殺政策相輔而行的。彼得莫爾太爾的日記中，說到：「西班牙人對於土人太無人道，被他們毀滅的人口有一千二百萬之多，其中有婦女有小孩。」(見庫斯聶：「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卷下附錄)次於西班牙人而着手殖民於美洲大陸的是荷蘭人，十七世紀開始，荷蘭人的勢力亦日益增大，一六一八年，在紐約設立荷蘭西印度公司，並積極向哈德遜河和德拉瓦爾河發展。至於法蘭西人，到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才大肆向北美中部——聖羅倫斯河、密執安湖、蘇必利爾湖、密士失必河流域及墨西哥一帶發展。到十七世紀時卽佔有北美之加拿大，密士失必河流域及墨西哥灣的廣大地區。其他如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瑞士人、德意志人、威爾斯人和瑞典人，亦同樣因經濟上政治上以至宗教上的原因，亦繼續不斷的向美洲大陸遷移。因此自從美洲異的被發現之後，它一方面，成了歐洲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就是土人的不斷沒落與本身之淪爲殖民地。

馬克思說：

「美洲金鑛銀鑛之發現，土著居民之被迫而從事開鑛工作，搶刼西印度，獵取黑人——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曙光，這些美滿的過程是原始資本積累的主要階段。」(「資本論」第一卷)

「原始積累的各個階段，先後發生於各國。這些國家，即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與英國。英國當十七世紀末葉，已經有系統的形成了殖民地制度、國債制度、現代賦稅制及保護關稅制。這些方法之所以能夠實行，主要是藉助於武力，如殖民系統。」（同上書）

講過了這段歷史之後，現在就要講繼西、葡、荷、法之後，而在美洲殖民中演極大作用的英國了。

英國在美洲之殖民事業的發展　歐洲各國之殖民於美洲大陸，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英國的殖民。它是歐洲各國最後從事美洲而表現異常強霸與收獲最大的國家。遠在亨利第七時代，即派嘉波約翰及其王子瑟巴亭繼西、葡之後到美洲探險，一四九七年佔有紐芬蘭，嗣後並宣告亞美利加地方——自勒本拿多到佛羅利達爲英國屬地。至依利沙白女王時代（一五五八——一六〇三）更加努力於殖民事業，並在北美開闢了斐基利亞洲。當時英國的許多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的被壓迫者亦紛去美洲。然而英國眞正在美大陸上建立永久的殖民事業，則始於一六〇三年開始之詹姆士第一時代，詹姆士第一予南斐基利亞公司（即倫敦公司）以在北緯三十四度到三十八度一帶地域之特許權，又許西斐基利亞公司（即普里茅斯公司）以在北緯四十一度到四十五度一帶地域之經營權，兩公司領地的中間則爲自由殖民的地帶。一六二九年，由英國移來的異教徒、清教徒們又開辦了馬薩諸塞灣公司，從事這個地帶的殖民。此後撒冷於一六二八年，波士頓於一六三〇年，羅得島、康湼克的克於一六三六年，均相繼被英人開闢爲殖民地。一六六四年荷蘭西印度公司所在之紐約，亦被英國人奪去成爲英國殖民地了。除以上這些由英王特許的殖民地之外，還有由個別殖民者自由開闢的地方——如賽西爾德利亞（一六八一年），新吉爾綏（一六六四年），馬利蘭（一六三二年），喬治亞（一七三二年）等。因此，到十八世紀中葉，北美洲

沿大西洋大部地方，均入英人之手，而爲英國之殖民地。

英國這種蒸蒸日上的殖民地事業，必然要與當時（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前半期）已經是雄霸北美之法國殖民政策發生急劇的衝突。兩國爭奪殖民地的結果，於是自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發生了多次的戰爭。第一次發生於一六八九年到一六九七年，第二次戰爭發生在一七〇一年到一七一三年，第三次戰爭，發生在一七四四年到一七四八年。雖然在三次戰爭結束時，英國由法國手中得到阿卡底亞、哈得遜灣與紐芬蘭諸地，然而基本上的勝敗並未分明出來。於是一七五四年到一七六三年又發生了俄亥俄（Ohio）戰爭。當一七四九年法人武裝佔據了這個地域之後，遂使英國西進政策大爲阻塞，英人向西發展，必欲得此地域而甘心。戰爭開始，英方敗績，一七五七年後英軍大爲增加，並利用其殖民地人民與法作戰，到一七六三年，英方終於大勝。同時在歐洲發生英法七年戰爭亦結束，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的結果，關於美洲殖民地方面，使法國不得不以全部加拿大及密士失必河以東之地（除奧爾良外）完全割予英國。並且英國又從西班牙得到佛羅利達半島（另由法國割路易西亞納予西班牙以爲報償）。這樣在北美殖民地上，英國已經基本上打倒了法國的勢力，而一躍爲北美的霸主了。

英國在北美殖民地所採用的政策，基本上是與西、葡、荷、法等國政策一樣的。這種政策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主要的是藉助於武力，如殖民系統。但是，他們對於這一切，都是利用國家的權力，即是集中而又是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對付土人之惡劣，自然以農業區爲最甚，例如在西印度，此地爲出口貿易的中心，同樣的，人口衆多的地方也受到搶刼的犧牲。……在歐洲以外，由搶刼、奴役土人及屠殺所得來的寶庫流到宗主國之後，即刻變爲資本」。（「資本論」第一卷）所以英國亦如他國一樣，在以武

裝爲後盾，以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爲指導的政策之下，很快就能夠征服當地的土人——弱者。不過，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多富於金銀鑛的埋藏，西班牙可舉其全力採掘金銀。反之，在英領十三洲之中却少有貴金屬之發現，因而在英國殖民地中殖民者主要是利用本地的自然富源發展農業工業與商業。可是這種發展並不是爲了殖民地本身，而是爲了宗主國的實利的要求。就是說，把這殖民地變爲宗主國的商品銷售者與原料供給者而已。在這樣政策之下，遂建立了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固定的社會形態。其中最重要之點，即（一）限制殖民地產物輸出於本國以外之他國；（二）保護殖民地產物輸入於本國；（三）限制外國貨物輸入於殖民地；（四）只許可本國船向殖民地貿易；（五）對殖民地的產業干涉的種類。

北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結構　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分爲三區，共十三洲：（一）北區四洲，即新英格蘭，包含馬薩諸塞、康涅克的克、羅得島、紐罕普捨爾；（二）中區四洲，即紐約、新吉爾綏、賓西爾德尼亞、德瓦拉；（三）南區五洲即斐基利亞、馬利蘭、北加羅林納、南加羅林納、喬治亞。這十三洲的全部人口，在十七世紀末期，只有二十五萬，到一七五四年也還不到一百五十萬。殖民地內部經濟生活，主要還是農業，十八世紀初，農村人口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即到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大部分人口還是在農村。當時最大城市如菲利得爾菲亞（Philadelphia），也不過一萬人口，他如波士頓則只有七千。紐約只有五千。

在農業方面：殖民地的土地原來都是屬於英國國王所有的，但在實際上，土地的取得，都是由團體或個人用搶奪殺害或「購買」的方法由土人方面得來，不過在形式上都是由國王賦予的。北部新英格蘭的土地，是特許爲政府所有。這種土地可以依照郡區公賣制，由當局許可的承領的團體，各承領三十六

平方英里的郡區，承領之後，又以一部分可耕地分授予各移居人，並賦以世襲不動產所有權，以其另一部分的森林、沼澤、牧地作爲公共使用土地。除新英格蘭、喬治亞之外，國王（如在佛基利阿）或個人的地主（如在馬利蘭、賓西法爾利亞），則在授與移居者的土地上，保持其徵收租課之權。但因國王或地主遠在英國，事實上土地租稅亦難於澈底徵收。因此，在新英格蘭，最大部分的農民均爲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加以該地帶氣候嚴寒，土質不好，農產品不豐，主要農產品爲玉蜀黍……（沿海漁業甚爲發達），以致轉營工商業的人數日益加多。在英國殖民地中部地方如紐約、新吉爾綏、賓西法爾利亞等地，土地比較豐饒，氣候較暖，農產麥子爲主。除哈得遜河保存有歐洲移來的大地主制外，其餘地方也和新英格蘭一樣，大都是獨立的自耕農。至於在英國殖民地南部地方（如馬利蘭、斐基利亞、卡羅米納、喬治亞……），氣候甚暖，土質亦肥，那地盛行大地主佔有制及殖民地大田莊經濟。耕作者大半是從非洲運來的黑奴，其數佔全體居民的五分之三。農產品主要是煙草、米、麥之屬；北美英國殖民地農產品的輸出數是日益加多，在北部新英格蘭，主要是漁類、皮毛；中部是麵包；南部是烟草、靛青之屬。

在工業方面，可以說，整個殖民地時代的土著工業，還沒有脫離手工業家庭工業的範圍。即至十八世紀中葉，手工工場還沒有表現到顯著的地位。這種小生產的產業經濟，如纖維工業……大都是用家庭勞動製造，而供給家庭與地方之需要；一般重要的日用品，多半是仰給於英國。自十八世紀以來，在這殖民地中，工業上日漸佔重要地位的，是木料工業、漁業與製鐵業。新英格蘭的沿海地方，造船工業及其他製木工業甚爲發達，一七五五年英國船舶噸數中，其三分之一就是在美洲製造的。英國需要此種產業，故異常重視其發展。漁業爲新英格蘭的重要產品，一七六五年產量値竟超過二十五萬五千鎊。金屬

製造業，發達最早的是製鐵業，因爲鎔鐵木材的豐富，所以在十七世紀中，馬薩諸塞，已成爲製鐵的中心；隨後在羅得島、科內堤卡特等地，發現大批鐵鑛，製造中心亦移到該地。至於大規模的製鐵業，在紐約、新吉爾綏、賓西法爾利亞之建立，主要還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事。

在商業方面，殖民地的對內商業，較之對外商業，是佔着很劣勢的地位，而對外商業中，則以對英國貿易佔決定的重要地位。對內商業之所以不發達，是由於在前一時期，內地諸殖民地區，大都構成自足自給的單位，而在未開發的土地上，又深感交通不便，因而無法構成統一國內市場。至於對外貿易上，新英格蘭輸出皮毛、木料、魚類於英國，又從英國及荷蘭輸入羊毛、鐵及其他製造品；從西印度羣島輸入砂糖、蜜、銀等物。中部殖民地亦如新英格蘭差不多相同。至於西部殖民地，其對外貿易量更大，它向英國及荷蘭輸出煙草、毛皮、穀物，而輸入其衣物、種子、葡萄酒及工業製造品。據一七〇〇年的統計，這個英屬殖民地，只就其對英貿易總額而論，輸出方面已達三九五、〇〇〇磅，輸入方面，則已達三四〇、〇〇〇磅。到一七七〇年殖民地對英貿易可見下表：

殖民地	向英輸出	從英輸入
賓西爾法利亞以北的北方殖民地	一七八、〇〇〇磅	一、四一〇、〇〇〇磅
南方殖民地	九三二、〇〇〇磅	八三九、〇〇〇磅
西印度羣島	二、三五〇、〇〇〇磅	八九七、〇〇〇磅
合計	三、四六〇、〇〇〇磅	三、一四六、〇〇〇磅

從這殖民地的工商業情形看來，一方面是土著工業之不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對英貿易之激劇增加（在

七十年之中無論輸出輸入，都幾乎增加了十倍），主要原因是英國殖民地政策之強化，藉以保證殖民地成爲工業品銷售市場與農業原料的出產地。在十八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產業革命開始之後，這種殖民地政策，更是雷厲風行的猛進着。

由於自然與社會經濟諸條件，英屬殖民地的北、中、南三區中亦呈顯不同的政治與階級結構。北區殖民地以工商業資產階級勢力佔優勢，該地的移民原以商人、水手、大批小廠主及手工業者爲最多；他們多半是英國中等資產階級的代表（主要是被壓迫而來的淸教徒），到這裏後，初則經商，業農，捕魚。爾後在這殖民地漸次發展了工商業，而繼續經營工商業者逐甚夥。他們的經濟日漸獨立，因而在政治上也最先發生脫離宗主國，而要求新英格蘭獨立的企圖。一六四三年，他們已經有了「新英格蘭同盟」的組織，大半的殖民區已實行共和性的政治機構。不過這種政治組織，仍帶新貴族性質，有財產的人才能享有政治的權利，這個殖民區的管理者，雖是英國派來的官吏，不過他的勢力較之其他殖民地區爲小。中區殖民地則以富裕的小資產階級佔優勢，農村中多係獨立自耕農，城市內多係小業主商人，至於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發展還不十分顯著。賓西法尼利亞的民治制度較爲發達，該地禁止使用奴隸，宗教信仰較爲自由。可是，南部殖民地區則不同，南區的統治階級是農業貴族——田莊主人、黑奴主人，田莊工作者則大部分是由非洲運來的黑奴。爲數無多的工商業資產階級，每每依附於這些貴族，而在政治上說來，也是最落後的地方。

至於勞動者狀況怎樣呢？北美殖民地的勞動力在殖民地時代，一般的是很缺乏的。因爲土地的廣

闊，小生產的經營，交通的不便，在生產中除依靠自力的獨立小經營者之外，則有不多的幫工，或兼營農業的短工。此外有不自由勞動的定期僕役，這般人們多係歐洲破產之輩，無錢買船票而來，或係被拐帶而來的兒童與犯罪者。他們以定期僕役償債與贖罪，在期滿之後，仍可獲得自由報酬，有時亦受到相當數量的土地（據說有五十英畝者）。但是無論如何，不論是僱傭勞動，是短工，是定期奴役，其生活都是很惡劣的。有產階級並不因勞動力之缺乏，而眞正提高勞動者的生活地位，而當時勞動者都想藉此以躑躅到小有產者的地位，亦是事實。奴隸勞動則多半出之於土著印第安人，他們身體是不自由的，可是一般印第安人，寧可逃入深山荒郊之中，不願作奴隸式的勞動。所以，在十七世紀時，主要的勞動還是依前述之定期僕役的白種人。及至十八世紀卽開始輸入大批黑奴，大批用在南部農業區中。一七一四年，這殖民地共約黑奴五九〇〇〇人，到一七九〇年已增到六四〇、〇〇〇人了。總之，在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運動之前，北美殖民地社會內部階級分化是不甚顯明的，無產階級是還沒有形成起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民族的矛盾。卽由各國移來的移民，在相當長期的歷史過程與完全是新的社會上，形成起來的民族，與宗主國的壓迫民族，主要是英國民族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成長，是北美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中心因素。

北美獨立運動與民族解放戰爭　北美民族獨立運動之發生，是有它長久歷史的與社會的根源。殖民地與歐洲的關係，特別是與英國的關係，起初是極爲密切，居民大多數從歐洲移來，其生活必需品，大都仰給於歐洲，爾後則多仰給於英國。殖民地內部經濟的互相聯繫，開始是非常薄弱，彼此間尙保有國籍的隔閡，語言、文化、宗教的各殊，加以相距甚遠，交通不便，各地區社會經濟結構也不一致，內部

經濟落後，且多各自獨立經營，其內在的經濟聯繫，反不如與歐洲的外在聯繫之大。所以直到十七世紀下半期，一般說來，殖民地內部經濟雖有發、，但尚未達到要求獨立的程度，只是在北部較爲先進的經濟中心，局部的孕育起民族運動的種子；而在整個殖民地內，尚無什何統一的民族運動發生。

然而，自十八世紀開始——特別到了十八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情況就不同了。雖然，英國政府一貫的採用壓制殖民地經濟的獨立發展，使之完全依賴於英國的政策，可是殖民地內部的工商業，自十八世紀以來亦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殖民地內部相互間的經濟聯繫也日漸密切。一六九三年聯繫南北殖民地的郵局建立起來，更促成殖民地內部的接近。英法不斷在殖民地內戰爭，殖民地人民也轉入了戰爭的漩渦。這種戰爭，不但強有力的促進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彼此間的接近，而且在英國鼓勵殖民地人助英反法中，訓練與組織了殖民地的人民，並把準備反英的武器傳授給殖民地的人民。特別是一七六三年完結的最後一次英法戰爭，竟使殖民地人民取得組成獨立軍事組織的機會，並在戰爭中訓練了無數的戰鬥羣衆，造成了許多能幹的軍政領袖。一七六七年，僅紐約一城的出口貨已值二百五十萬元，而當時殖民地與西班牙葡萄牙及印度羣島的貿易亦已漸擴大。一七七〇年，北美十三州人口已增至二百餘萬。這樣，英國之殖民地政策，本來是要極力束縛殖民地經濟之獨立發展，可是在它的高壓政策之下，又不能不同時相當促進殖民地經濟的發達，遂引起了他們的獨立與統一要求日益擴大，原來殖民地對於宗主國之經濟上、政治上的依賴，遂日愈變爲殖民地獨立發展的障礙了。另一方面，殖民地的移民，開始雖然保存有本國的經濟文化語言，而彼此間難於接近；可是大家長期處在一個新的社會條件之下，年代久遠，就由經濟政治文化語言上的接近，把原來許多不同的民族，

溶化爲一個新的民族形態了。從前殖民地的人民對本民族是依賴的，現在基於新民族之成長，而原來民族（特別是英國民族）遂變爲自己新民族的壓迫者與新民族成長的障礙物了。到了這時，殖民地本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於是把「使言語一致的人民的領土，用國家形式團結起來」的需要，提供到歷史的首位了。因此，殖民地與宗主國的民族矛盾也發展到一定高度，只有從政治上用革命手段，打倒宗主國的壓迫，才能達到自己建立新國家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看十八世紀以來，英國政府所施行的種種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實爲殖民地所難忍受。這種壓迫，焉得不逼使殖民地人民去尋求他們的解放與獨立之路?!

一六六〇年的「航海條例」，規定歐貨輸入殖民地及殖民地產品輸到歐洲，必須用英國船隻；這個條例，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仍保存其效力。一六六〇年的「貿易條例」，規定殖民地只有砂糖、煙草、棉花、靛、生薑及其他染料等七種「列舉品」，才能向英國輸出，亦只能向英國輸出。一七〇四年，又追加了船舶用品；一七〇六年，又追加了糖蜜與米；一七二七年，追加了鋼鐵、皮毛；一七六四年，追加了鐵、銑鐵、鯨骨、木料、皮革、加里；一七七六年的「列舉品」幾乎包括殖民地產品全部。至於特定的食品——如新英格蘭的魚類、小麥、玉蜀黍等，自一六六〇年以後，就很難向英國輸出了。至於殖民地輸入方面，根據一六六三年的「主要產品法令」，除少數貨品如鹽、葡萄酒外，規定歐洲製品，只有是英國製造並且只有由英國船隻，才能輸入到殖民地，他國或他國船運來的貨物則課以重稅。一六九九年，英國竟禁止殖民地毛織品出口；一七五〇年禁止殖民地製煉鋼鐵；一七六五年頒佈「印花條例」，凡報章、證書、契約、小册子，均一律粘貼印花；同年頒佈「宿營法令」，凡英國派駐殖民地軍隊所需

用的燈火、燃料均由當地供給；一七七〇年，又嚴禁新發明的機器及圖案輸入殖民地。

這樣一來，使殖民地工商業者異常憤慨（特別是北區與中區），加之英國在殖民地內苛課橫行，物價任意提高，特別是紙幣法，更遭致一般小資產階級、農民、勞動者的反對；就是南部殖民地的田莊主人與奴隸主人亦因英國政府壟斷奴隸貿易而表示不滿。

在政治統治上，英國派有駐此殖民地的總督、高級官吏、地方官吏，他們大權在握，作福作威，常與當時立法會議發生衝突。總督們極力箝制會議，侵犯會議的權利，會議也難得讓步，雙方衝突時起。因爲上述經濟上、政治上的原因，殖民地人民，除了一些官吏及少數沾染英國殖民地政策利益的商人田主之外，差不多全體都仇視英國，希望從英國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領導者則爲殖民地工商業資產階級，北美英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遂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列入議事日程之上，而無法遏止矣。

北美民族革命發端於一七六四年反對英國所徵收的軍用稅（英法戰爭之後，將戰爭的負担加上於殖民地人民身上）。一七六五年『印花稅法』頒佈之後，第一次在殖民地發生了廣大抵制英貨運動。一七六七年，英政府強行城市增稅條例，又發生第二次抵制英貨運動。這種抵貨運動，在北區、中區殖民地發展得很廣，値到革命戰爭前夜，仍繼續發生着。這種抵貨運動，對於打擊英貨與掀起各地民族運動有重大意義。一七六九年，又發生更強烈的抵制英貨運動，抵制結果，使英國對殖民地北區與中區的輸出由一七六八年之一、三六三、三一一磅，驟減到一七六九年之五〇四、六〇六磅，即一年之內減少五分之三。這樣，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有相當的讓步，而廢止了一七六七年的新關稅法。然而，這種讓步不能使殖民地人民滿足，運動仍向前進展。一七七〇年，因英兵槍殺波士頓市民案，反英騷動大起，波士

頓附近及其他城市亦羣起響應，並在波士頓成立了有許多城市代表參加的「殖民地委員會」，實際上就是殖民地人民謀民族解放的初次領導機關。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在波士頓有「茶黨」(Poston Tea Party)出現，並決定對英國保護之東印度公司的茶船舉行暴動，卒之將三船的茶葉投入海中。這件事情成爲北美民族革命底軍事行動之發端。英國政府爲懲治這次暴動計，遂於翌年宣佈封鎖波士頓港，要求賠償損失，並將馬薩諸塞直轄英國政府，將俄亥俄河以北劃方劃歸魁洛克（英國直轄殖民地，包括加拿大）管理。同時取消地方憲法，而將殖民地政務移交駐美英軍總司令管治。這樣一來，使北美殖民地的民族運動不可避免的要訴之於民族革命戰爭了。

自波士頓事件發生，英國政府施行武力壓迫之後，各殖民區人民均羣起響應波士頓及其所在省的馬薩諸塞，反抗英國。一七七四年九月，各殖民區的代表（除喬治亞外）齊集菲利得爾菲亞舉行「第一次大陸會議」。大會決議擬草「權利宣言」與英斷絕通商關係，決定「在英國憲法一日不除則與英絕商就一日不止」。自一七七四年十二月一日起，停止一切英貨及其他殖民地貨（如東西印度……）之輸入。爾後又決議自同年九月十日起，停止一切向英國及其他殖民地的輸出。自此之後，英國與北美殖民地貿易遂一落千丈★。同時這殖民地與其他各國的通商亦行開始。至於英國原來東縛殖民地的一切政令，均無

★（見諸谷壽一：「美國社會經濟史」）

年代	從英國來的輸入	向英國去的輸出
一七七四年	二、五九〇、四七三磅	一、三七三、八四六磅
一七七五年	一九六、一六二磅	一、九二〇、七五〇磅
一七七六年	五五、四一五磅	一〇三、九六四磅

條件的加以廢除。然而英國政府仍異常強硬，不但不絲毫讓步，反而增集軍隊，宣佈戒嚴，認爲殖民地人民是無能與『皇軍』作戰，更無力戰勝皇軍的。傲慢凶暴之勢，反而與日俱增。

一七七五年四月的『第二次大陸會議』，當場決定與英絕交，組織自己軍隊、發行貨幣，準備與英一戰，並任命華盛頓爲北美軍總司令。當時，北美殖民地人民，除極少數的南區棉業資產階級（向英輸出棉花）及其他與英政府有利害關係的民族敗類之外，全體人民都是盡忠竭力擁護大陸會議的決議，寧願與英一戰而生，不願受英踐踏而死。大陸會議有了這樣的廣大民衆的後盾，不但在最倉卒的時間內急忙組織軍隊發動民衆，而且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發表了著名的『獨立宣言』，這個宣言成爲全美人民奮鬥的政治綱領。宣言內容，大意謂：（一）舉凡人類生而平等；（二）天賦人權，不可侵犯；（三）政府之權力由人民之同意而產生；（四）推翻舊政府成立新政府，係完全合法之行爲，必要時得用武力。宣言中歷舉英國王政統治的種種罪惡，宣佈北美十三州正式與英脫離，自成爲『自由與獨立之邦』。十一月締結『聯盟規約』，名此聯盟爲『亞美利加合衆國』。獨立宣言發表之日，即光耀雄偉的獨立戰爭開始之時。

美國獨立戰爭是革命的、自衛的、謀解放的戰爭，是弱者的殖民地反抗強者的『大英帝國』的戰爭。然而，它又是相當大的、進步的、有國際援助的國家，與小的、野蠻無理的、失援寡助的國家間的戰爭。在這樣的敵我關係對比之下，決定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長期性與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事實上，在獨立戰爭開始的時候，華盛頓所統率的美軍，數不過一萬七千名，軍隊倉卒成立，並無很好的訓練，武器落後，彈藥缺乏，更談不上好的裝備。加以糧食缺乏，物質困難，以之敵抗數質兼強之英軍，優劣之勢，

起初懸殊甚大，自然在戰爭開始一個時期，美國方面就不免吃了許多敗仗，一連失去許多城市要塞。並且，在一七七六年末，中心城市的紐約也被英將荷威攻陷。第二年，英軍又乘勝攻破勃郎狄温城，甚至進逼到當時首都——菲利得爾菲亞，以致『大陸會議』不能不遷移到波爾貼摩爾。當斯時也，在美軍方面，動搖主和者有之；悲觀失望者有之；暗中與英妥協作奸者有之；此正千鈞一髮勝敗攸關之頃，美國方面，在表面上看來，不能不說危乎殆哉！但以殖民地人民之團結奮起，華盛頓之勇敢堅持，大陸會議之鎮定前驅，而終於度過了這一難關。

首先，在華盛頓領導之下，實行改造軍隊，發揚民主精神，極力號召民衆從軍，並在各地襲擊敵人；同時，大陸會議派出富蘭克林等多人，到歐洲去活動，爭取外援孤立敵方。結果，一七七七年在美軍與民衆結合抗戰之下，遂在薩拉多加（Saratoga）第一次大敗英軍。這使北美獨立的前途一放明光，而革命人民之勝利信心亦大爲提高。

但是這次戰役，尚未決定戰爭的勝負，持久抗戰之最後勝利，仍待美國今後之努力。自此之後，雙方均有局部的勝負。北美革命者既不因敗而餒，亦不因勝而驕，唯脚踏實地，埋頭苦幹，從各方面加強自己削弱敵人，本此宗旨，竭力進行持久抗戰。在政治上，則極力團結內部；經濟，則出之於內外債款（內債約一一、六百萬美元，外債約七、八百萬美元），富有者大量捐輸，以及開源節流諸法；軍隊則不斷從民衆中募集；軍火，則加緊自製與向外購買；總之，以自身之努力爲基礎，去爭取與招徠國際之援助。一七七八年，法國政府因與英之敵對，首先與北美訂立聯盟，正式出兵援助美軍對英宣戰。接着西班牙（一七七八），荷蘭（一七八一），亦因仇英而願助北美。俄國則因英國軍艦故意攻擊中立國船

隻，宣佈武裝中立。尤其是在獨立戰爭發動之後，歐洲人士幾乎全部同情美國，有數千的歐洲義勇軍，自動來參加美方抗戰，其中以法國義勇軍爲最多。在法國義勇軍中，有後來成爲法國大革命主謀者之一的青年侯爵——拉斐德（一七五二——一八三四），有後來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經過激烈而持久的苦戰，一方面是美國自力之加強，另一方面，則是國際援助之益大，使戰爭形勢終於轉變爲利於美而不利於英。結果，美之困難縮小，優勢形成；英之困難加大，劣勢開始。於是，英方則轉勝爲敗，美方則轉敗爲勝。英國在陸戰上受到革命軍民的頑強突擊，海軍又受法、西聯合艦隊之牽制，兵疲力之，而愈戰愈敗。美方則士氣愈旺，愈戰愈強，至一七八一年，不僅失地大致收復，甚至英軍根據地約克鎮也被美將格林所攻陷，英將孔華里投降。至此，英政府雖求最後掙扎，但亦知道北美殖民地民族之無法征服。一七八三年，自由黨內閣謝林伯，便和美國殖民地代表，在巴黎之凡爾賽，締結條約，承認北美十三州之獨立，以密士失必河以東之地爲美國領土，美國獨立戰爭之最後勝利，於此乃大功告成。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致美國勞動者的信」中，曾經這樣說到：

「亞美利加殖民地的解放戰爭，是眞正爲求解放的革命戰爭，這在歷來諸侯、地主、資本家間爲爭取佔領的土地或掠奪的利潤部分而發生的許多次戰爭中，是最罕有而且是最偉大的。這是亞美利加的民衆對壓迫亞美利加使其陷於殖民地奴隸狀態的英國強盜之戰爭。」

北美合衆國之建立　抗戰勝利之後，擺在美國人民面前的中心問題就是「建國問題」。這固然不是說，一定要抗戰勝利之後才能建國，而抗戰與建國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不過美國的歷史證明，抗戰確是建國的先決條件，它替建國定下了大廈的基礎，建國則是抗戰的目的，它是抗戰勝利之後迫不容緩的建

設事業。現在我們來看看當時美國的建國；只是按美國當時的條件，看它所建立的那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怎樣？

獨立戰爭時代的大陸會議不過是戰時十三州的共同臨時政府，「亞美利加合衆國」名稱出現之後，所謂聯盟規約會議無非是十三個獨立國家的攻守同盟，所以在獨立戰爭時代，美國並無集中的統一的中央政府，抗戰勝利之後，到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才有在費拉德爾費亞召開之各州代表會議，即歷史上所謂「憲法會議」。會議代表的選舉，係在高度的財產限制之下，由當時全體三百萬人口中之十二萬選舉者選舉出來的。代表均係工商業家，田莊主人，他們以資產階級利益爲依歸，會議根據聯盟規約來議定憲法。到九月間才議定了全部「憲法草案」，一七八九年，得各州之同意，乃正式成爲美國憲法，美國新政府乃於是年正式產生。在這憲法中，規定由上下兩院組成國會，成爲最高立法機關。下院議員，按各州人口比例由人民選出；上院議員，由各州分派，每州兩人。國會有權決定重大對外政策，可與外國簽定條約及決定關稅，劃定各州疆界等權；其他問題，各州仍保有其獨立性，但不能與聯邦憲法相抵觸，執行權屬於大總統，總統四年一任（第一任的大總統爲華盛頓），並受上議院監督，在上議院同意之下，才可以訂結條約，委任共和國官吏。憲法規定最高法院有最高司法權，可以增訂合乎憲法的新法律；倘若認爲某種法律不當，可以將其删除。除開賓西法尼亞與羅得島兩州外，其餘各州的憲法，都把選舉的財產限制定得很高，而廣大的下層民衆都沒有選舉資格。顯然，這個聯邦的實質，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戰爭雖然勝利，可是勝利的重大成果是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了。

在經濟方面，一七八三年到一七八九年間，是經濟上一個最困難的時期。因爲在戰時，美國經濟受

到大破壞，只有軍事工業相當發展。在戰後，因戰債繁重，人民購買力減低，產業無法恢復，英國廉價商品仍不斷輸入，壓抑美國幼稚的工業，這樣致令國民經濟瀕於困境。這時，美政府採取了如下的政策：（一）設立保護關稅，建設聯邦大銀行，課取必需品以捐稅，如此以整理國債，保護內部工商業之發展；（即「汗密爾敦計劃」）（二）沒收親英派的財產（達四千萬美元以上），以為復興經濟之基金；（三）許多大地主的土地（有的是被沒收後發賣，有的是帶強制性分售）分為自耕的小農場，恢復農作；（四）獎勵向西移民。一八〇三年以後到一八五三年，美國政府用戰爭、收買、征服與訂立條約的手段，得到北美洲西部直抵太平洋岸的很廣大領土，用廉價（一英畝值一到二美元）出售土地的辦法，以獎勵移民。這些步驟都是造成美國資本主義發達的重要機會。不過它的結果是大有利於工商業資本家，並造成了土地的大投機事業，對小資產階級亦相當有利；至於下層勞動階級所獲得的利益則甚為有限，而「汗密爾敦計劃」則遭受農民小有產者、貧苦群眾之反對。

在外交上，當法國大革命爆發，英、西等國干涉法國革命之際，華盛頓政府拒絕了對法國共和政府應有的報酬，並宣佈實行中立（這就是以後美國超然孤立外交的萌芽）。當英國海軍封鎖法國海口之際，美國與法國貿易仍保持着。當時，英國乘機非法沒收美國向法領西印度及向法國運貨的海船，然而美國的孤立政策，並不對英反抗。這種向英退讓屈服的辦法，既得罪了法國，引起了在拿破崙時代，法、美關係的惡化，與海上法、美兩國的衝突；同時，又助長了英國的兇橫，致使英國又開始了侵略美國的第二次戰爭。美國政府這種只顧自己的政策，寧可向侵略者（英國）退讓，而不願乘機起來打擊侵略者，結果自己也不免遭禍，歷史也有先例存在。至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總統門羅的宣言（「門羅主

義」，即美國不與歐洲的事，歐洲各國亦不得干涉美洲的事，不得在新大陸上開拓殖民地）無非是這一中立主義進前一步的發展而已。

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四年又發生了英、美第二次戰爭。當時英國雖然一面在歐洲與拿破崙爲敵，可是仍不忘侵略北美。首先，抑制美國勢力在大洋上崛起，大肆在海上拘捕美國商船（達九百艘）並且還要進一步破壞美國民族的獨立，因而就爆發了這第二次戰爭。戰爭開始，英軍仍居優勢，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征俄失敗，於是英國集中大兵侵略美國。在海軍方面，美國海口全爲英國封鎖；而陸戰方面，美軍亦陸續敗績，至一八一四年八月，美國首都華盛頓亦被英軍攻下。幸而，美國人民之竭力與戰，加上拿破崙失敗後，英國忙於在歐陸分贓，同時亦不願在美國方面再陷第一次戰爭之覆轍，反而想藉此保持通商利益，及保持它在美洲其他殖民地之勢力，是年十二月遂與美媾和。

自從這次戰爭之後，美國建國過程，基本上已收到成功，而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在大步的前進中，至於建國事業之最後完成則在南北美戰爭勝利、統一國家告成之後。

南北美戰爭與建國之最終完成　民族革命勝利與北美合衆國建立之結果　美國在一方面脫離了英國羈絆，樹立了民族經濟獨立的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又開闢了廣大的國內市場，並相當統一之，這使美國資本主義在掃除了許多障礙之後，自十九世紀起，其發展之迅速，爲空前所未有。

首先，說到美國領土的擴張：如果說到十九世紀開始之年，美國還只有十三州的領土，面積爲八八九二、一三五、〇〇〇方里，到一八六〇年以前，美國領土面積增加到三、〇二六、七八九、〇〇〇方里，約增加三倍以上。

其次，在人口方面：如果說，在一七九〇年只有三、九二九、〇〇〇人；一八〇〇年爲五、三〇八、〇〇〇人；一八四〇年爲一七、〇六〇、〇〇〇人；到一八六〇年，增加到三一、四四三、〇〇〇人。

再次，在工業方面：美國北部中部的工業，在這時期，是大加向前發展。棉織工業——一八〇五年工廠只有四個；一八一一年就有八十七個；一八三〇年增到七百九十五個；紡錘數爲一、二四七、〇〇〇個；生產額爲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六〇年，工廠增加到一〇九一個；紡錘數增加到五、二三六、〇〇〇個；生產額增加到一一五、六八二、〇〇〇美元。鐵的產額——在一八二〇年，只有二萬噸，一八三〇年，增至十六萬五千噸；一八四〇年，又增到三十一萬五千噸。

其次棉花生產（主要是南部）：一七九〇年生產量爲一、五〇〇、〇〇〇磅；一八二〇年生產量爲一四一、二〇〇、〇〇〇磅；輸出額爲九一、一四四、〇〇〇磅；到一八六〇年生產量爲一、七四九、四九七、〇〇〇磅，輸出量爲一、三八三、七一一、〇〇〇磅。

其次，對外貿易：一七九〇年，輸入額爲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二〇年，輸入爲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爲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六〇年輸入爲三五三、六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爲三三三、五七六、〇五七美元。

其次，鐵路交通：一八三〇年美國才開始有鐵路，一八四〇年長度爲四、五三四公里，一八五〇年爲一四、五一四公里，一八六〇年增加到五三、九三五公里。

最後，銀行事業：一八二九年銀行數三〇九，資本總額一一〇、二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六〇

年，銀行數增加到一、五六二，資本總額增到四二一、九〇〇、〇〇〇美元。

從上面數字中，可以看出這時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大步發展，同時因為工業的發展，亦引起了農業生產的突飛猛進。然而，美洲南北兩部的經濟結構不同，其社會階級利害亦各殊。北部工業發展，其工業資產階級需要保護工業，以免英國的競爭，因此贊成保護關稅制度，要求國家權力之更加集中，要求工業保護立法，使美國工業資本主義更加長足的發展；南方則反是，南方以農業為主，地主們利於把棉花輸入英國，故主張自由貿易。同時北方工業之發展，要求廣大的自由勞動力，因而主張廢除黑奴；南部則以黑奴為主要的棉業勞動力，因而南方地主極力去維持黑奴勞動，反對任何的廢除。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加促成南北經濟制度的矛盾，而南部經濟制度之保守性，確是大有障礙資本主義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因為經濟上的矛盾，必然引起了政治上的分歧。在南北美戰爭之前，北方固有工業上獨霸之勢力，而南方亦因其在全美生產上，特別是輸出上佔非常重要的地位（一八六〇年全美輸出總值為三三三、五七六、〇五三美元，而南部棉花輸出值即為一九一、八〇六、五五五美元，後者約佔前者的五分之三以上），經濟力量之雄厚能於與北部抗爭。這時南北兩方，幾乎勢均力敵，儼然成為兩個國家。因而國家統一問題，成為迫不及待的要解決的問題。

一八六〇年，美國舉行大總統選舉，『共和黨』首領（共和黨係北方工業家的政黨，於一八五四年組成，而與代表南方大土地主的『民主黨』相對峙）林肯當選。他是北方工業家的優秀代表，代表當時北方進步的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奴隸制度之激烈反對者；他之上台當然對南方地主大為不利。因此南部諸州逐漸有脫離北方的傾向，卒之自行組織『亞美利加聯邦』（The Confederation of America），而

與「亞美利加合衆國」脫離。自然，這種脫離對於北方工業就失去了國內原料出產地，對於整個美國，就是實行國內分裂；對於美國民族，就是實行反叛從敵。爲了美國獨立的鞏固，爲了建國之完成，爲了摧毀暗無天日的黑奴制度，北部在阻止這種分離運動無效之後，進而實行與南部作戰，這是必要的、正義的。

一八六一年南北美戰爆發。開始，南方尙處優勢，因爲該方主要有英國政府在後台幫助。以後北方軍在林肯總統領導之下，實行以二萬萬美元的軍費，招募五百萬名義勇軍，並派艦隊封鎖南方諸州的各要港，阻止南方外來的英國援助；加之北方領域較大，人資俱豐（當時全國人口三千一百四十萬中，北方佔一千九百四十萬人），這都成爲北方的有利條件，特別因爲北方戰爭是革命的進步的戰爭。當林肯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宣佈解放黑奴之後，不但更加獲得本國廣大民衆之同情與積極參戰，不但強有力的瓦解了敵方的經濟基礎，大大動搖了敵方的軍心，而且博得當時西歐各國進步人士，尤其是工人階級及其代表者們（第一國際）的莫大贊譽。這樣使戰爭結果終於是革命的北方獲勝。一八六四年九月，南方大總統大衞士，最後爲北方俘虜，南北戰爭遂告結束。

南北戰爭的結束，才使美國的統一運動實現，才使美國資產階級的建國達到最後的成功。而美國的資本主義乃得自由迅速的發展。加之美國有豐富的物力，生產上沒有中古時代的傳統，又向來受勞動力的缺乏，大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快；其發展速度爲世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一直到帝國主義時代。同時，美國民族運動勝利之後，因爲只是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原來被壓迫民族遂一變爲壓迫的民族了。

十八世紀的北美獨立戰爭與十九世紀的南北戰爭，都是美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它不僅對於美國民族的解放、民族國家的建立上有偉大的意義，而且對於歐洲（對於世界）革命說來亦有重大的意義。美國獨立戰爭，激發了法國大革命及影響了爾後的西歐民主革命，而解放農奴戰爭，亦且驚醒了歐洲的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中說過：

『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好像警鐘一樣，敲醒了歐洲的資產階級；而十九世紀美國的國內戰爭，却驚醒了歐洲的工人階級。』

★　★　★

第二節　波蘭、匈牙利、斯拉夫的民族運動

北美獨立運動成功之後，接着就是法國大革命，在這次革命中，法國人民不僅是澈底的推翻了國內的封建制度，而且是勝利的解除了反動歐洲對法國的民族壓迫與侵略。法國人在反對民族侵略中所提出的口號：民族平等，民族解放……不僅是當時革命法國解放的旗幟，而且成爲歐洲被壓迫國家被壓迫民族謀解放的警鐘。不過自法國反動勢力勝利拿破崙專政之日起，法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即告完結，法國民族自衛戰爭轉爲民族侵略戰爭。這時歐洲許多國家、民族被其征服，這就使當時歐洲被壓迫被侵略的反抗運動高漲起來。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四年所謂反拿破崙的『解放戰爭』，並沒有使歐洲各被壓迫民族得到解放，戰爭勝利的成果，只是使幾個建築在封建貴族基礎上的（如俄、普、奧）或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的（如英）大國政府，得到勝利的分贓而已。維也納會議之盡力破壞民族主義的原則，盡力鞏固歐洲

的反動勢力，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如：德國、意大利依然分裂，波蘭又被瓜分，匈牙利併屬於奧，奧、德之侵凌意大利，比利時之給予荷蘭等等。然而，歐洲的民族運動並未因此停止。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法國革命，又給了歐洲民族運動一個新的刺激。比利時、波蘭、意大利及德意志帝國內之一部分，民族運動又重新起來。一八三〇年八月，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發生革命的民族暴動，以求脫離荷蘭而獨立，南方各省聞風響應，十月比利時的宣佈獨立，並與荷蘭作戰，結果比利時勝利，建立了比利時的民族國家（一八三九年荷蘭承認比利時的獨立）。他如德、意、波諸國亦相繼發生民族統一與民族解放運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風暴，更加撼動了歐洲的民族運動。不管這次革命的結果是反動勢力的勝利，但民族運動仍若斷若續的前進着，到一八七〇年基本上達到完結。

關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民族運動，已在本書第二章中論及，事實經過，此地不再重複；而意大利、德意志、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將在下節中去分別論述，本節所要講的，是波蘭、匈牙利、斯拉夫這幾處的民族運動。

第一 波蘭

波蘭的民族運動前史 波蘭，是屬於斯拉夫民族，到十世紀時，歷史上才見到它。它的第一個君主波勒斯拉夫（Polesiav——九九二—一〇二五）在阿底術河與非希士拉河（Vistula）中間建樹過一個較大的王國，爾後衰落下去，到十四世紀時又復興起來。這時，波蘭與其東鄰之里索尼亞逐漸混合爲一個國家。一四六八年，波蘭並設立了一個一院制的國會，其政體仍爲波蘭王國，除了俄國以外，當時波蘭發爲歐洲最大的王國。幅員雖廣，但無天然的國界，國內人種複雜，除了波蘭人外，其西普魯士諸城中

多日爾曼人，里索尼亞人，猶太人到處都有。政體則爲封建貴族的，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集中的君主制，波蘭貴族專橫，王權衰弱，國會爲貴族把持，不得到國會同意，國王不能單獨宣戰、媾和、徵稅或通過任何法律；而國會的議案，不得到全數的贊同不能通過。國王不是世襲，而是在國王死後由國會選任國王。普通選出的國王多半是外國人，當時外國人常說：「波蘭是無國家的國王，無國王的國家。」這種非常紊亂的政體，不但阻止國內生活之進步，而且易於招致國外之干涉。

波蘭的貴族很多，人數約在一百五十萬左右，大半都是很窮的，主要是依靠強力的壓迫農奴以爲生。只有少數有財有勢的貴族，才操縱政府。直到十八世紀以至到十九世紀，波蘭的經濟仍是非常落後的，除了幾個少數的日耳曼人的城市之外，一般說來，波蘭自己還沒有資產階級。就是波蘭本身的工商業，也還是操縱在猶太人手中。而這班猶太人並不被認爲是波蘭的國民。農民的狀況極爲悲慘，他們大多數是佃農，無異於奴隸。地主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他們就是地主貴族的財產之一部分，生活地位是苦不堪言，政治權利完全沒有，等於是在最黑暗的地獄中過活。

恩格斯講到：「斯拉夫人，而且特別是西斯拉夫人（波蘭人與捷克人），都純然是一農業民族，他們從來不喜商業與製造，其結果，由於這一地帶人口增加與城市建立，一切製造品的生產，都落在德國移民手中，而這些商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完全爲猶太人所佔：而我們假定考察這些猶太人的國家時，一定發現他們是德意志人，而非斯拉夫人。」（「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最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剛剛躋在歐洲三大列強（俄、普、奧）之間，自己既如此落後，如此頹弱，如此一蹶不振，自然就不免成爲三大列強的角逐之地與犧牲品了。一七六三年，波王奧古斯都第三身

死，普王佛勒特里克與俄女皇迦色雲第二協定，立俄女皇親信斯他尼斯拉斯第二為波蘭國王。一七七〇年，法國助土耳其攻俄，反被俄國打敗，斯時，奧國恐俄南侵土耳其，於己不利，遂與普王佛勒特里克諒解，迫俄停止前進，而以波蘭領土一部予俄。一七七二年，俄、普、奧三國成立協定，第一次瓜分波蘭。俄得東部，普得西部，奧得南部。波蘭被瓜分後，才深感亡國的痛苦。爾後，乘三強之衝突得到一時的復興，並於一七九一年仍然達到國家的相當自立，並仿效英國式政體成立了新國會與新憲法。如果繼續發奮圖存，加之當時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所及，未始不可以存在下去，但以內部之不團結，守舊派貴族等，寧可依人作嫁，而不願革新，其反對革新與內部分裂的結果，又招致了一七九三年之第二次波蘭的瓜分。這次俄、普、奧瓜分波蘭的理由，就是說：『它（波蘭）為法國甲可賓派所擾亂。』『但澤地方送糧食到法國去接濟革命黨。』總之，說是波蘭通敵，有害歐洲反動勢力的安全。於是普王威廉第二斷然出兵佔領波蘭西境及但澤、波森、多農諸城市，與一百五十萬人口，俄國亦乘機得到三百萬人口的地方，奧國只從俄、普方面得到了空的允諾，為了對付革命的法國，大家亦只好相安下去。

波蘭再被瓜分之後，又促成了民族的覺醒，特別是北美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一時民族思想深入到國人的腦筋中。時機尚不算晚，正在這個時候，波蘭有一個民族英雄——葛休斯克（Kosciusco）他曾在華盛頓指揮之下，參加過為着自由解放的戰爭，他力鼓吹復國雪恥運動，並得到國人的同情。一七九〇年，發動了一個大的民族暴動，葛休斯克號召波蘭人民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之下，一致動作起來。結果，在大多數人民間的團結與抗爭之下，逼退了威廉第二的駐軍，第二次奪回了自己的大部國土。可是俄國繼以出兵，葛休斯克在領導抗戰中受傷，並被俘虜。因為領導之人，內奸搗亂，加之法國

反動勢力勝利，俄、普、奧均可集中力量對付波蘭，是年十二月波軍戰敗，波王又被迫退位。於是俄、普、奧三國又第三次瓜分波蘭。俄國所得的東波領土，幾佔普奧兩國所得總數的兩倍。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將普魯士方面佔來的波蘭領土，建立一個瓦薩公國。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又是將波蘭重新瓜分，藉以造成俄、普、奧之均勢。

十九世紀的波蘭民族運動 波蘭民族處在如此不幸與被壓迫的境地，但是，它並未被列強完全征服。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由於內部民族的覺醒與法國七月革命的刺激，波蘭的民族運動，又從新昇騰起來，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俄領波蘭發生一次民族暴動，領導人爲進步的貴族，他們的口號是：「民族自由」、「統一被割的波蘭」。但這次暴動，由於未能發動廣大民衆參加，沒有其他地方的波蘭人的起義配合，終於在一八三一年九月即被俄國軍隊壓平下去了。鎮壓是鎮壓，但波蘭的民族運動仍未消滅下去，並且，因爲俄、普、奧反動勢力之壓迫益劇，特別是歐陸反動柱石的俄國的踐踏愈烈，使波蘭民族運動到四十年代、六十年代更呈現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時期——即是波蘭爲解脫俄、普、奧等國的統治而鬥爭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民族鬥爭，較之以前帶有更廣大與更深刻的性質。

一八四六年一月，當歐洲革命尙未爆發之前兩年，克拉可夫發生了暴動，這次暴動不僅是掀起波蘭的民族運動的高潮，而且成爲一八四八年西歐革命運動的信號。另一方面，歐洲一八四八年的大革命爆發之後，又特別有力的刺激到波蘭的民族鬥爭。因爲波蘭處於俄、普、奧三強之間，普、奧的革命火炬，很迅速的燃燒到波蘭。這時，波蘭被壓迫民族的要求，就是：民族獨立，恢復一七七二年以前的疆土，主張自己有權處理自己的事，統一被分割的波蘭於獨立的共和國之下。不過此時，波蘭經濟仍是落

後，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尙未形成，其社會機構仍建築在以農奴制爲基礎的封建主義之上，民族運動仍爲貴族領導，但這個運動的本質，仍是革命的。他們首先是積極的反對俄國，一八四八年三、四月，民族解放運動又普遍發生於普領波蘭境內，幾乎全波蘭都捲入這個運動的漩渦。

普魯士的自由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之前，是揚言擁護波蘭獨立，因爲波蘭人之反對俄國，是與普魯士資產階級本身有利的。旣至三月革命爆發時，普魯士資產階級已經動搖妥協以至於叛變；可是在德國民衆壓迫之下，仍不能不咬住牙根，佯言願意幫助波蘭。然而，在普國自由資產階級上台之後，他們立刻拋棄了對波蘭的諾言。因爲實際上，他們是不願放棄這一贓物（普領波蘭），不願把主要是德國人的波蘭城市與領土，歸還波蘭，更不願意做到爲了助波蘭去與俄國一戰，爲什麽呢？

「因爲他們（指普魯士統治的資產階級）很清楚的預見他們會因對俄的民族戰爭而傾覆：因爲實行戰爭需要更積極，更堅決的人民執掌政權，所以他們佯作熱烈的擁護德國民族的擴張，實行宣告革命鼓動中心地的普領波蘭，即爲未來德意志帝國之一部分。在緊張的最初數日所給予波蘭人的諾言，是很可以的拋棄了。」（恩格斯：「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正由於：（一）普魯士資產階級不僅背叛本國革命民衆，而且背叛了被壓迫民族的波蘭人民，尤其可恥可惡的，普魯士資產階級不獨背叛波蘭人民，甚至於去贊助與主持用普國軍隊去協助俄國鎭壓波蘭；（二）俄國當時是歐洲反動的柱石，是民主革命與民族解放的強敵，當時俄國旣沒有革命運動，而歐洲大革命的火炬，又隔在俄國之外，這使俄國能集中力量對付波蘭；（三）波蘭本身的民族革命力量，尙不能單獨去達到與俄宣戰，更不可能去推翻俄、普、奧共同的壓迫，特別是波蘭貴族不能發動農民與廣

大羣衆來充實民族運動力量，因此，一八四八年的波蘭民族運動很快的就失敗了。恩格斯又繼續說道：

『波蘭的軍隊，曾爲政府所批准而組織起來的，亦爲普魯士的砲隊所解散所屠殺。直到一八四八年的四月，距柏林革命不到六星期，波蘭的運動被人擊碎了。對於俄國專制君主盡了這樣無限的功績，這樣功績是由自由主義的商人內閣——坎蒲好生與汗思曼所貢獻的。』（同上書）

只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及當時德國的急進民主派，對於波蘭民族運動，表示了熱烈的同情與積極贊助，馬、恩把波蘭民族運動看成是當時歐洲民主運動重要環節，特別對於德國革命有重大意義。馬克思曾這樣說道：

『波蘭已成爲俄國、奧國和普魯士革命的組成部分……甚至其中有一部分人還站在封建基礎上的波蘭貴族，也帶着空前的犧牲態度，贊助民主的土地革命。當德國還處於最粗陋的立憲思想和矜誇的哲學思想狀態中的時候，波蘭已經成爲歐洲民主運動的發源地。當我們（德國人）還幫助壓迫波蘭時，當我們還使波蘭的一部分受着德國的束縛時，那我們自己就還是受俄國和俄國政治的束縛的，我們自己也不能在本國澈底地解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創立民主制的波蘭，是創立民主制德國的首要條件。』（見『列寧選集』中譯本第三卷，『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的引證）

不僅如此，馬、恩還具體提出爲了波蘭的獨立，德國應與俄一戰，這才是當時眞正實現波蘭獨立的辦法。關於要求德國對俄宣戰問題，恩格斯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中，這樣說道：

『……然而，德國人曾宣告其熱烈擁護恢復波蘭，人們應當要求它：第一應當放棄他們的贓物，以爲他們的同情的眞實證明。但是在另一方面，該民族還沒有證明其進步的能力可以超過以農

奴制爲基礎的封建主義，則德人佔主要成分的大塊土地和完全是德人的大城市，他們是否放棄給該民族呢？這個問題是很糾纏的，唯一可能解決的辦法，是與俄國宣戰。這樣在各革命國家中，劃界問題成爲次要的問題，首要的是建立一個安全的疆界，以禦共同的敵人。波蘭民族假如能在東方擴張領土，在西方必需說服和講理。他們終會承認理加（Riga）和米蘭（Milan）對於他們是和但澤、愛爾賓（Elbing）同樣的重要。所以德國的急進政黨，認爲如欲支持歐洲大陸的運動，則有對俄戰爭的必要，認爲卽令波蘭只是一部分的恢復，亦必會引起此種戰爭。」

並且恩格斯在『論馬克思與新萊茵報』一文中，更加着重說明這一點，他說：

『「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是由兩個主要點構成的，卽統一的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及對俄宣戰，而以波蘭的復興列入其中。』

馬、恩這種觀點之確立，理由就是：（一）波蘭人之反對俄國的革命運動，不僅是純粹波蘭人的事情，而且是全歐洲民主派的事情，因爲這是反對全歐反動憲兵（俄國政府）的革命；（二）民主波蘭的恢復，等於使波蘭成爲反動俄國與民主歐洲之間的有力屏障，與俄國反動隔離的西歐反動，比與俄國反動聯接的西歐反動，不知要軟弱多少；（三）波蘭民族倘無能力足以打倒其雄強的壓迫的敵人而恢復波蘭，只有促成德國爲了波蘭自由而對俄宣戰，才是唯一可能恢復波蘭的辦法。

這就是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馬、恩對波蘭民族運動所採的立場。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後，自然，波蘭的民族運動，也備受打擊而沉淪下去了。可是，波蘭仍有反俄的民族運動，不過這時俄國在文化教育工業中，資產階級的成分比貴族式的波蘭要進步得多，而

波蘭在一八五一年一時反對俄國的運動，却沒有什麼進步的意義。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曾經說到，研究歷史，使他對於波蘭的問題做出悲觀的結論，就是說波蘭的意義是一時的，只是到俄國土地革命以前爲止。這時波蘭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大胆的荒唐行爲」，「即使波蘭所反對的，只限於一個俄國，即我們還是絕不能假定說，它代表進步或有什麼歷史意義」。在俄國文化教育工業，資產階級底成分等，都要比「貴族式的、沉眠的波蘭」多些。「瓦薩與克拉可夫怎能敵得過彼得堡、莫斯科與奥德司呢？」所以列寧說：「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暴動能有成效。」（以上見列寧：「論民族自決權」）

然而，到了一八六三年一月，波蘭又發生了反對俄國沙皇政府壓迫與屠殺政府的暴動。這次暴動比之過去是更加擴大與更加有力。誰知因爲俄國的野蠻鎮壓與歐洲資產階級均對之持旁觀態度，使這次暴動依然很快就失敗了。這時歐洲工人階級，以至有些民主派分子，都替波蘭鳴不平，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波蘭的運動表示深切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工人會議，首先就是討論波蘭問題，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國際的工人協會）開幕詞中，對於一八六三年俄國壓服波蘭變亂與歐洲各國資產階級袖手旁觀，曾提出嚴厲的抗議。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際總會開會時，曾提出下列決議：「（一）波蘭的獨立戰爭，是爲歐洲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起，這種戰爭的失敗，使文化與人類進步的事業受到一種嚴重的打擊；（二）波蘭可以要求歐洲各主要民族給它以恢復民族主權所必需的每種資料。」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八日，國際總會決議與波蘭同盟會合開一個波蘭會議；是年三月一日，舉行了並儘力援助紀念一八六三年

波蘭革命之舉。同時，馬克思深刻揭露那般對於波蘭運動採取消極態度的資產階級，與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的錯誤，馬克思在是年二月二十五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道：

「此外已有其他議員如太羅等等（他們與馬志尼結合一氣的）告訴我們，說現在舉行一個波蘭會議，時機尙未成熟；我由總會回答道，工人階級有自己的對外政策，對於資產階級所謂時機，絲毫不以爲意。他們總是藉口於所謂時機，在一種新騷動的初期激勵波蘭人，而在這種騷亂進行之中，就藉着他們的外交去陷害波蘭人，當俄國壓服了波蘭的時候，卽拋棄波蘭人。」（「馬恩書信集」第三卷）

另一方面，馬克思特別盡力的反對蒲魯東對波蘭問題的觀點，因爲蒲魯東根本反對波蘭復興，他在一八六一年，尤其是在一八六三年當俄國壓服波蘭暴動之後，曾經寫出文章，堅持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完全否認民族問題。在一八六五年二月，馬克思論及蒲魯東時，說他最後反對波蘭的文字是「爲俄皇那種愚魯的殘惡行爲助威張目」。

馬克思在六十年代，始終堅持他在四十年代的觀點，認爲俄國是瓜分波蘭的主犯，普、奧是俄國的同謀，沒有一個民主主義的波蘭，德意志將成爲神聖同盟的前哨，歐洲工人階級的運動是會繼續被破壞的。直到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國際總會與波蘭工人開紀念波蘭革命大會時，馬克思的結論仍是「波蘭不獨立，歐洲無自由可言。」（以上見葉贊洛夫：『馬克思與恩格斯論波蘭問題』）

現在，我們用列寧的話來做個結束，我們就可以知道四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波蘭民族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

『大家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認爲積極的贊助波蘭獨立的要求，是西歐一切民主派，尤其是社會民主派所絕對應該的；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俄國『農民改良』時代，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是唯一澈底的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俄國最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底民衆還在酣睡不醒的時候，當這些國內還沒有獨立的羣衆的和民主的運動底時候，波蘭的貴族解放運動，不但從全俄的、全斯拉夫的民主派看來，就是從全歐民主派看來，都具有偉大的、第一等意義的。』（列寧：『論民族自決權』）

『當時（指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正是整個波蘭，不僅農民，而且貴族羣衆也是革命的。爲民族解放鬥爭的傳統，竟這樣厲害與這樣深刻，即在本國失敗之後，波蘭的優秀子弟，曾處處幫助革命階級，董勃洛夫斯基和佛列勃列夫斯基底名字，與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與巴黎工人最後一次的（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失敗的）暴動，彼此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列寧：一九〇三年著『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列寧選集』第三卷）

不過此地要附帶說明一聲：在十九世紀末年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一）在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甚至於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俄國却掀起了獨立的民主運動，而且是無產階級的獨立運動；（二）原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貴族的波蘭已經消滅了，而讓位於資本主義的波蘭；（三）波蘭的統治階級也與德、奧的貴族地主俄國的工業財政大王都起來擁護那些壓迫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而另一方面，與繼承過去革命傳統的波蘭無產階級一塊，有了俄國、德國無產階級也在爲着自己解放而鬥爭。『現在波蘭問題的情形，就與五十年代以前根本不同了……現在的階級衝突已把民族問題，遠遠地

推在後面了』。（列寧：『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九〇三年）『在這種情形之下，波蘭曾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義』。（『論民族自决權』）『我們始終要告訴波蘭的工人，只有與俄國無產階級作最圓滿最緊密的聯合，才能滿足目前當時的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底要求；只有這種聯合，才能保障完全的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列寧：『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九〇三年）

因此，十九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馬克思、恩格斯與二十世紀初的列寧，其對於不同時代的不同條件的波蘭問題的立場，同樣都是正確的。

第二　匈牙利

匈牙利的民族解放運動　一八四八年以前，匈牙利是奧大利帝國領土之一部。居民約一千二百萬，其中一半是馬基亞人，其餘一半是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及塞爾維亞人。匈牙利是一般很落後的農業國家，工業人口只佔百分之三，封建勢力頗大，農奴殘餘尙存在，貴族佔人口百分之五，而所佔土地達四千萬英畝，農民佔人口之絕大多數，僅佔土地一千八百萬英畝。農民大都是斯拉夫人及羅馬尼亞人，他們受地主的剝削，比奧國其他各地尤甚。奧國政府曾在十八世紀時，實行過的農民的小小改良，因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的農民，頗傾向於奧國政府。在政治上，匈牙利是完全依附於奧國，奧國對於匈牙利的政策，是極力阻止其經濟勢力的發展，匈牙利沒有自己的貨幣制度，不能實行獨立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沒有自己的軍隊，所以本國政府只不過是奧國的附屬品罷了。然而，匈牙利的一般貴族，對農民的統治是獨立的，法庭與地方行政都操在他們手中。另一方面，匈牙利本國的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也開始成長起來。那些經營資本主義的那些貴族，與剛剛開始成長起來而且非常幼稚的資

產階級，逐漸生長了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對於現存政治制度感到不滿。貴族中的先進代表們，知道要謀民族解放就需要農民起來幫助，而發動農民起來，就非要向農民實行某些改革不可。這般革新派首領人物如噶蘇士（Kossuth）、狄克（Deak）等就主張實行溫和的農民改革，然因大多數匈牙利貴族反對終難實現。另外，噶蘇士等更主張與奧國分立，創造獨立的匈牙利民族國家，這種民族意識却日益深入匈牙利人——主要是馬基亞人的腦海中。可以說，匈牙利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四十年代已經開始醞釀着。

一八四八年三月，維也納革命的消息傳來，馬基亞人即乘機而起義。當時奧皇爲其本國革命力量所牽制，自然不能不對匈牙利表示一時的讓步。匈牙利首先將國會改組，三月十四日，國會通過解放農民的法令（這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農民解放中，國家負責償還地主的損失），並成立新內閣，噶蘇士、狄克均參加新政府。政府又頒佈了新出版法，設立法庭陪審制。此時匈牙利尙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只不過是創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最初嘗試而已。它在政治上，只有相當的自主權，同時，並未放棄承認奧皇爲其統一的君主。按當時革命形勢說來，匈牙利是有乘熱打鐵、澈底脫離奧國而獨立的機會，並且還有協助維也納的革命，一舉而推翻奧國專制政體的可能。因爲奧皇統治正是危急，奧境革命正是發展，意大利反奧革命亦甚有力，德、法的革命仍在前進，匈牙利人正好利用這個時機以成就自己的解放事業。然而，匈牙利的民族運動並未達到這樣勇敢堅決的程度，他們未能重視奧國內部的革命，未能與之密切配合並加以有力的協助，他們未能在國內發動廣大民衆起來，即時武裝民衆，澈底推翻奧皇的勢力。而在這時期內，他們所做的事，多限於逼迫奧皇所能承認的、自上的和平改革，儘可能不要民衆參

奧國事。這樣，自然不能不放棄非常有利的時機，反而使奧皇有機會去準備力量，來打擊奧國革命，同時進攻匈牙利。

到了十月三日，奧皇政府在國內勢力漸趨穩定，特別是在斯拉夫人與沙俄的幫助之下，已經準備好自己的力量。在它還不便直接進攻國內革命，並企圖移轉國內視線的主意之下，自然首先要來一個先外後內的辦法，首先從匈牙利下手。十月五日維也納頒佈了皇上的命令，宣言解散匈牙利國會，指出新政府的議案無效，並且任命克魯西亞的反動領袖——耶拿其奇爲匈牙利的軍隊首腦，這位人物正是極力反對匈牙利合法政府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同時調動維也納的軍隊，並聯合其他地方調動好了的軍隊，去壓迫匈牙利人，承認耶拿其奇的權力，與維護奧國對匈牙利的統治。這樣一來，在匈牙利就發生了民族暴動以表示對奧國的反抗；而在維也納，就發生了革命民衆的十月暴動，以阻止奧國軍隊向匈牙利出發。結果，維也納的暴動勝利，而耶拿其奇帶往匈牙利的軍隊又剛剛在希士爾懷森堡被匈牙利軍的泊爾柴所擊退，一直退到維也納附近之奧領的日耳曼人住地。匈牙利的勝利軍已成勢如破竹，大有直搗維也納之勢，而原來要開拔去援助耶拿其奇的維也納軍隊，坐見時機不利，也只好在維也納附近停去，假意對自己敗下的軍隊表示敵意，藉以慫惑維也納革命民衆，其實奧政府這時的主意是先集中軍隊進攻維也納，然後再去對付匈牙利。

現在爲匈牙利人爲匈牙利革命着想，任何人也覺得這是千載一時之機了。這一時機較之前幾個月的時機，又不知好到若干倍：

第一，匈牙利的民族壓迫者——奧皇政府已經公開揭舉了侵略匈牙利的戰爭，這種侵略戰爭，不但

引起了匈牙利的反侵略戰爭，而且直接激起了與匈牙利唇齒相接的奧國首都內之民衆武裝起義；這時，反侵略戰爭。剛剛與敵後的武裝起義呼應起來。

第二，奧國反動的侵略軍隊一部分尚未集中完善，許多軍隊被維也納及各地革命勢力所箝制，只有一部分先遣的冒死鬼出發，很快就慘敗下來、退回到維也納附近。這時勝利的匈牙利軍，又進擊到距維也納不遠的地方，這時的維也納又剛剛落到勝利的暴動民衆手中，這些民衆正已負着槍桿爲接合匈牙利與維也納的革命，爲打倒共同敵人——奧國統治者而拚死鬥爭；奧皇政府剛剛處在國外與國內敵人的緊密夾攻之下，正是手忙脚亂，岌岌可危的時候。

第三，當時國外形勢，雖然法國六月暴動已告失敗，普國革命尚未更深發展，但一般說來，革命形勢仍然對匈牙利有利，而各國革命派都同情與擁護匈牙利革命，尤其是德國急進黨人，正在用大力援應匈牙利的革命，維也納十月革命勝利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這時匈牙利人第一等任務，應該毫不躊躇地、刻不容緩地，把自己反奧國的民族革命與奧國民衆反奧皇的民主革命結合起來，應該把兩者的命運看成血肉相關生死與共，應該堅決不貳的去援助維也納革命，用已經勝利的武裝，澈底擊破已被擊破的敵人，硬要一直打到維也納城下，接通維也納革命，乘勢夾擊與殲滅共同的敵人；這是成功匈牙利民族解放運動的絕好機會，也就是幫助奧、普革命之不可少的重要步驟。

可惜！匈牙利人沒有這樣去遂行自己神聖的歷史使命。他們忘記了維也納人替自己打了第一次仗；忘記了維也納是匈牙利獨立的唯一屏障，忘記了維也納的勝敗就是自己的勝敗，而抱着『只顧自己不顧

人家』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在自己軍隊擊敗耶拿其奇之後，不但不乘勢進擊，反而把攻打自己的敵人，驅逐到維也納來，而增強了敵人進攻維也納的武力。當時匈牙利人替自己這樣失策辯護，彷彿不能打到維也納的原因是：（一）他們的武力不足；（二）維也納不向他們乞援；（三）他們謹守憲法，避免與德國中央政權之糾紛。其實這些理由，沒有一點能夠成立的。

第一，當耶拿其奇失敗之時，奧國常備軍並未集中，維也納已陷於革命者之手，當時乘勝追擊，並不要足夠武力，只要在希士耳懷森堡打了勝仗的地方軍隊，就可以打到維也納，實行夾擊已經殘敗與零碎集中的敵人。敵人稍受打擊，革命力量就不知長大多少，而反動武力也要削弱得多，『至少使奧國軍隊的集中推延到六個月。』（恩格斯）

第二，維也納人是主要為着援應匈牙利革命而實行暴動；匈牙利人為什麼不能為着維也納革命而自動出援呢？莫說在勝利之後，就是在不利之時，也應當去設法援助維也納革命。援助維也納是自己的急迫任務。尤其是在自己勝利之後的必盡義務。只能怪自己不援人家，那能怪人家不來求援呢？

第三，維也納不怕驚動憲法而起來暴動援助匈牙利，佛蘭克府的『中央政權』遵重憲法，坐視匈牙利而不顧；革命之中，戰爭之下，是勝利與失敗的問題，是你死我活，還是我死你活的問題，不顧一紙空文的憲法而得到勝利，較之拘於形式而坐遭失敗，其得失是不可以比擬的。打擊侵略者，並不管誰先進攻，也不怕在侵略者土地境內作戰，消滅侵略者於國境之外，這是正義並不違法。維也納人『三月』、『十月』的勝利，正是在『不合法』之下取得的。革命對於反動統治，應該是不合法的，在反動統治之下專去講合法就可以不革命。

結果怎樣呢？奧國反動軍隊集中齊備之後遂猛攻維也納。維也納十月革命失敗之後不僅造成奧國以至普國革命的失敗，而且特別靈效的造成匈牙利的失敗。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溫狄希格萊慈率領攻破維也納的大軍，侵入匈牙利，翌年一月，佔領了匈牙利的首都——布達培斯，匈牙利的革命，也就在維也納革命失敗之後，不到兩個月的光景也跟着失敗了。

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四月九日的「紐約論壇」上曾經這樣批評道：

「人人知道我們對於匈牙利素具同情。我們曾在鬥爭中擁護過它，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報紙「新萊茵報」比任何家的報紙都盡力於在德國宣傳匈牙利的解放運動。……我們甚至於現在也可以說，在將來歐洲大陸的動亂中，匈牙利也是德國必要的而且是天然的同盟者。但是我們對本國人既十分嚴厲，我們亦有權批評我們的鄰居；我們須用歷史家公正無偏的態度紀載事實，於是我們必須說到這件事實上來：維也納人民的義氣與勇敢，不僅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謹愼更爲偉大，而且比它更爲遠見些。我們可以德國人的資格說，討伐匈牙利戰爭中，所有的赫赫勝利與光耀的大戰，都比不上維也納人的，即我們同胞的那種蓬勃的單獨的運動和其英勇的抵抗，它給了匈牙利以組織軍隊的時間，以後始能獲得這些偉大的勝利。」（見「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好在匈牙利人還不甘屈服，匈牙利人在噶蘇士領導之下，又重新組織力量繼續革命戰爭，終於逼退奧軍，一八四九年四月十九日宣佈匈牙利獨立，以噶蘇士爲共和國元首。可是這次運動，不久仍歸失敗了。失敗原因是：第一，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高漲時之有利時機，爾後，對二次潰敗的敵人又不能作應有之進攻；第二，奧國政府允諾解放匈牙利農民，藉以拉攏農民，而匈牙利的貴族，連以前

對農民改革的法令都不能實行，並且依然如故的壓迫農民，對農民表示害怕。這樣，不但不能發動廣大民衆參加抗戰，反而失去農民的援助，而使民族革命戰爭輭弱無力；第三，當時歐洲革命形勢已經衰退，反動局勢已佔上風，特別是反動支柱的沙俄出兵二十萬助奧，遂使匈牙利的解放戰爭不能支持，結果，八月休戰，匈牙利民族戰爭失敗，獨立國顛覆，噶蘇士逃往外國，匈牙利民衆大受殺害，此後匈牙利仍成爲奧國的附屬品。

一八五九年，意、奧戰爭發生，意大利自奧國手中奪回了倫巴底，並擊敗奧軍之後，奧皇約瑟夫曾實行自上的改革，並頒佈一八六一年的憲法，其對匈牙利仍不許有自治權。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六年間，匈牙利人拒絕派代表加入帝國會議，並以革命相威脅。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發生，奧國爲普大敗，於是奧帝不得不對國內他種民族讓步，特別要拉住匈牙利以對付普國及其他，一八六七年根據奧、匈兩方意見（主腦自然是奧地利）頒佈新憲法，在這新憲法的基礎上，成立奧匈帝國。在這個奧匈帝國中，兩個主要的國家各有其憲法、內閣、法庭、官吏與首都，但是國旗、外交、陸軍與君主却不能分開。帝國政府只有三個大臣——外交、軍事、財政——處理共同政務。另外兩國國會中須各派代表六十人組織一委員會，處理關稅、商務、公債與鐵路事務；至於外交和陸軍的預算，也要經過這個會議通過；這個會議輪流在維也納與布達培斯兩處開會。從此時起，匈牙利才以獨立國家資格加入奧匈帝國，在趨重於保持奧國完整性以保障自己的民族獨立的特殊情形之下，匈牙利遂如此實現了自己的民族國家。

列寧關於這一點，曾經這樣說道：

「另一方面匈牙利人曾經企圖創造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企圖還在一八四九年就在俄國農奴制的軍隊打擊之下而遭受了失敗。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非常特別的情況：在匈牙利人方面，後來又是捷克斯拉夫人方面，正因爲要謀民族獨立所以不趨重於脫離奧國，而趨重於保持奧國的完整性，因爲，否則民族獨立就會被更野蠻更強悍的鄰國所完全破壞。」（「論民族自決權」）

第三 其他斯拉夫人

其他斯拉夫的反動民族運動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波蘭發生了民族運動，同樣在奧國境內的波希米亞，與克魯西亞也發生了民族運動。雖然兩者同樣是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可是在本質上兩者根本不同：波蘭的斯拉夫人的運動，則是革命的民族運動，而其他這些地方如波希米亞、克魯西亞的斯拉夫運動，則是反動的民族運動。前面我們講完了波蘭的革命民族運動，現在就來研究這些其他斯拉夫的反動民族運動。

首先說到波希米亞。波希米亞即現在的捷克斯拉夫的主體，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奧地利領土內的一個王國。它有二百萬德國居民，有三百萬說捷克話的斯拉夫人。它也有過偉大歷史遺跡，早先是捷克人佔優勢，從十五世紀虎斯戰爭（War of the Hussits）以後，這個斯拉夫的支派，就衰落下去了，說捷克話的各省，都彼此分裂了。一部分組成波希米亞王國，另一部分組成摩拉維亞，第三部分成爲斯普瓦克人，爲匈牙利之一部分。這三部分之中，除了波希米亞人外，餘則久已失去了民族的感情與精神而與其他民族同化，不復單獨存在了，只是至多還大都保存着它的言語。波希米亞王國的四邊，有三邊與純然的德國毗連，而主要受着德國的影響，並與德國人不斷同化。在該國之內，日耳曼人佔着主要成

分，而且逐漸發展。波希米亞的工商業與文化事業，都操在德國人手中，甚至在它的都城布拉格中，日耳曼人與捷克人這兩個民族，也是經常勢均力敵的。

其次克魯西亞（即現在的南斯拉夫），也是斯拉夫的分派，它處在奧國境內，接近匈牙利，而在歷史上是受匈牙利的影響的。到十九世紀時它仍然十分落後，國內經濟文化及少許的工商業，多半操在匈牙利人手中，而日益與匈牙利同化。

總之，波希米亞與克魯西亞，都不是強大的民族，足以成爲一個單獨的眞正的國家。他們各種民族都受到社會歷史諸原因的影響，漸漸在瓦解崩潰與同化於其他更強大民族的過程中。恩格斯說：

『假使他們希望恢復獨立，只有和別的斯拉夫國家聯盟。世界上有二千二百萬波蘭人，四千五百萬俄國人，八百萬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爲什麼不可以結成一個全體八千萬的斯拉夫人強大的同盟，驅逐或撲滅那侵犯神聖的斯拉夫土地的侵略者！如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可恨而又可少的德國人呢？』（『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如果這般斯拉夫人能夠走着這樣的一條道路，即是眞正革命的、打倒侵略者的、解放的道路，那才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民族運動，而且這條道路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高潮中，是可能去走而且應該去走的。然而，不幸，他們不去——實在是不願意去——走這條革命的道路；恰恰相反的，去走上擁護當時侵略者的，亦即反動的道路。誰都知道，俄國是十九世紀反動的台柱，是反動歐洲的憲兵，是積極去幫助各國反動勢力來撲滅歐洲革命運動的罪魁，而所謂『大斯拉夫主義』的故鄉——波希米亞、克魯西亞，在一八四八年及爾後所揭舉的民族運動的旗幟，剛剛做了反動的俄國以至奧國反動勢力的忠實走狗，主要

是聽命於後台老闆——沙俄，扮演着伸張俄國勢力於歐洲的爪牙的角色。正如恩格斯說：

『在斯拉夫人中，在少數愛好歷史科學者的書室內，起有一種滑稽的反歷史的運動。此種運動沒有別的意義，只是想將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城市屈服於鄉村，商業工業和知識屈服於斯拉夫農奴制的原始農業。但在此滑稽理論之後方，站有一俄羅斯帝國的可怖的實際，帝俄之每步行動，都表示其野心，想把整個的歐洲當作斯拉夫人（主要是俄國人）的領土。……波希米亞、克魯西亞的大斯拉夫主義者，有些是自覺的，有些是不自覺的，都替俄國直接利益工作，他們為了民族的憧影，背叛了革命的主義。』（『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一八四八年六月，波希米亞人和克魯西亞人在布拉格，召集斯拉夫人大會，準備成立一個全體斯拉夫人的大聯盟。目的在於擁護反動的沙俄，是大俄之威風，以表示斯拉夫人的氣概。出席代表三百餘人，彼此間不能說共同的語言，根本沒有一個說得大家能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語。最初試用法文，大多數仍不懂，以後不能不用可恨的德文。他們對於當時的革命的德國，不但不表示同情，而且還發出這樣的怪話：『寧願受俄國的鞭笞，不願享德國的自由。』對於奧國，則傾向於皇室，而反對革命。大會開會不久，就被另一個武裝的斯拉夫人大會——在溫狄希格萊茨指揮下的奧國軍隊（士兵皆斯拉夫人），以不到二十四小時的速度，就把這般虛假的斯拉夫人的『優秀』代表驅出城外，如鳥獸散去，

以後，這般可憐蟲，幹些什麼呢？

在奧國立憲會議中，波希米亞的、摩拉維亞的、德爾馬亞的代表則堅決反對革命的進步的日耳曼人與一部分波蘭人（破產貴族）的代表。他們並不以此為足，而乃遺臭萬年的去和那解散了他們的布拉格

會議的奧國政府，進行陰謀的勾結去找一碗反對革命的飯吃。在一八四八年維也納十月革命暴動中，這般斯拉夫的垃圾，就是有名的擁護反動的政府派。接納由維也納逃出的皇帝的是半斯拉夫人的阿爾穆慈地方。開去進攻匈牙利革命的主要是斯拉夫人的官兵。攻陷革命的維也納的，正是斯拉夫人的軍隊。就因爲這些大功績，『就使得他們在奧國議會中終於佔得多數，直到議會解散時爲止』。議會解散之後，政府乃大與烹狗之師，警告他們：如再動作即將他們逮捕。這般斯拉夫議員才知道自己是受了騙，臨別的話不多，只有這樣兩句：『這裏我們既不能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我們只有到佛蘭克府那裏去！』去幹啥呢？依然是去幹反對革命的工作。他們既幫助了奧國、普國反動勢力之勝利，又幫助了俄國斯拉夫軍鎭壓了匈牙利的革命。總之這班斯拉夫主義者實質上都是擁護反動勢力的強固爪牙。歸根到底，究竟這班斯拉夫人是獨立了呢？還是沉淪了呢？還是前進了呢？還是後退了呢？這不待智者卽可知矣！

恩格斯在這一定時代（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認爲『過去四百年來捷克是死亡的民族』，認爲，當時這班斯拉夫人（除波蘭外）沒有共同語言，並『首先缺乏民族生存的眞正條件，卽人數衆多和地域密接』，證明『波希米亞的存在此後只能成爲德國的一部分』。當時恩格斯這種論斷完全是正確的，誰也不能否認的。然而七十年以前恩格斯的這種論斷，並不妨害在六七十年後，事實之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由於，捷克人南斯拉夫人的社會歷史情況之變化，在他們具備了民族生存條件之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後的具體時代之中，他們可能於成爲相當獨立的民族國家。這是恩格斯所不可能預見的，也是他所無權禁止的。如果拿六七十年以後的歷史演變，去懷疑恩格斯在六七十年以前的歷史眞理，這就是曲解馬克思主義。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反對這班斯拉夫人的反動民族運動，這種立場是完全正確的；亦猶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擁護捷克斯拉夫之革命的反法西斯運動的正確一樣。

所以，斯大林說：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助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政體的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都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列寧主義概論』——民族問題）

第三節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與統一運動

意大利史的略述　意大利是由古代的高盧人、葉特魯斯克人、奧斯干人、薩陪利安人、溫伯羅拉丁人、希臘人、羅馬人及以後的日耳曼人、亞拉伯人以至法蘭克人，在長期歷史過程中組合起來的。意大利在歐洲人類史上，佔演過很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紀元前四世紀，羅馬人佔領意大利，而以此地爲中心建立起基於奴隸制的有名的羅馬帝國。這個羅馬帝國：極盛行於紀元一世紀之末到二世紀之初。日耳曼人崛起之後，到四世紀末，大舉侵入到羅馬帝國。紀元三九五年，羅馬帝國分爲東西兩部。五世紀初，日耳曼人佔領了意大利。四七六年鄂多沙稱意大利皇帝後，西羅馬帝國滅亡。七六八年，查理曼大帝時

代，統治到意大利的北部，而中部南部仍爲東羅馬帝國，教皇及倫巴底人的勢力，這四大勢力仍紛爭不已。九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分裂，意大利乃單獨成爲一個封建王國。十世紀中葉，北部與中部意大利，爲德意志的鄂圖大帝所佔領，成爲『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之一部。意大利的封建主義（亦大致和歐洲封建主義相同），也就在這羅馬世界的原理與日耳曼的原理之同化發展與相互作用的過程之中，成長與發展起來。

意大利的封建主義支持得較爲長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仍保存其殘餘勢力。意大利的封建時代，表現出它的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外來的『民族侵略』與內部『封建勢力』，兩者綿連交錯的進行着，造成意大利歷史上之異常複雜的社會與民族關係。現在我們來簡明的加以說明：

第一，外族不斷地侵入。從紀元開始就是日耳曼人之南下，滅亡羅馬帝國與佔領意大利。自五世紀起，意大利是不斷遭受外族的侵略，除日耳曼人外，他如西哥德人（四一〇年），匈牙利（四五二年），凡德爾人（四五五年），東哥德人，希臘人（四九二年），倫巴底人（五六八年），法蘭克人，九世紀時的亞拉伯人，馬基亞人，均曾相繼侵入。十世紀到十三世紀，意大利主要爲德意志人的勢力範圍，十四世紀起初轉爲法國人的勢力範圍，不久又加上西班牙人。十五世紀末，又有德、法、西之角逐，十六世紀，則有法德之爭奪。十七世紀，法國波旁王朝勃興，又扶持奧國起來，壓倒西班牙在意之勢力。到十八世紀中葉（一七四八年），『阿利和約』告成，那波里、西西里兩王國屬西班牙；米蘭、塔斯卡尼兩公國屬奧地利；巴馬、彼阿成薩兩公國，熱內亞共和國屬法國。此後，西班牙德意志在意大利的勢力都衰退了，餘下來的就是奧法兩國在意大利之互爭。這種長期受外族侵略蹂躪的結果，就是：（一）造

成意大利內部的分離割據並彼此對峙；（二）連續不斷的戰爭，一方面破壞意大利經濟生活，同時在一個時候，又加強許多商業城市經濟的相當發展；（三）造成意大利封建教皇與領主之拚命掙扎與無情的維持對農民之統治。

第二，羅馬教皇與封建主之勢力。意大利的羅馬教皇，用僞造的文書形成他在天主教上無上的威權。不僅在意大利管區內，並且在其他歐洲在教的國家內，教皇有『加帝王冠冕』之權，同時，還在握意大利世俗政柄之權。這是意大利遭致外國干涉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幾次與德與西之戰），也就是極力保持封建統治與支持意大利封建勢力到最後的禍根之一。至於意大利內部的貴族領主與教皇之間，貴族領主的彼此之間，亦發生不斷紛爭。在這些紛爭中，貴族們多半仰賴外來勢力，以對抗教皇，造成意大利的分裂割據。而這種分裂割據，又往往招來外族的干涉。這在整個封建時代都表現得異常明顯。

第三，社會經濟發展的畸形狀態。自從日耳曼人征服意大利之後，不斷分封土地給武士親信，他們遂成爲佔有許多土地的封建領主。爾後，有的則自成獨立國家，有的則強制割據。其在經濟生活上，依靠於自然經濟上對農民之剝奪。因爲割據稱雄與不斷戰爭的結果，使意大利封主對農民的壓榨，是異常厲害。雖然封主與封主間、封主與教皇間，存在許多矛盾，然而對於壓迫農民保持其特權地位，仍是一致的，農民雖於獨起反抗，更不能聯合起來反抗。在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商業與城市發生得最早，羅馬帝國時代已見其雛形。九世紀時意大利既出現了許多著名城市（如北部沿海之威尼斯，熱內亞，彼薩及內地交通要道上佛羅倫斯，米蘭等），手工業相當發達。這些城市在歐洲說來，是首先戰勝封主，取得自由。他們不但與歐洲貿易，並且與近東各國貿易，十字軍東征，更促進其發達。十二、十三世紀是意

大利自由城市獨盛時代，佛羅倫斯的毛織等爲歐洲之冠，而威尼斯在當時是世界第一大城市。然而因爲地理條件及意大利內政紛亂原因，這些城市之對外貿易，要重於對內貿易。加之這些商業城市彼此間也不統一，而且互相對抗，遂難於組成國內經濟的發展。十五世紀土耳其人截斷東方商路之後，接着新航線發現商業中心轉移到大西洋，此時，意大利商業城市遂大衰落下去。此地要說明的是，就是意大利的經濟之畸形發展：（一）自由城市與封主領主的經濟之懸殊；（二）商業城市對外關係重於對內關係；（三）重要商業城市中間及其與小城市中間之不能統一的狀態；（四）各國與各國、各地與各地間，經濟上之分離狀況，這就是意大利的內部經濟結構之特點。

第四，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之所在。意大利的國內矛盾，一般說來，是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結合生長，然亦有其特異地方。封建時代，工商業發達的自由城市，對外關係之異外密切，並且許多還依賴外族力量，以對抗封主避免戰禍向前發展。這使早已興起的城市市民與有產階級，在開始一個長久過程中，並不迫切需要國內之統一與獨立，而羅馬教主之企圖以教皇勢力統一意大利並與外族戰爭，並不能處處招致中等階級之擁護。經濟生活中之決定地位，主要是商業資本而不是工業。加之各地的割據對峙局面；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紀以前，意大利不能早期成長資本主義，不能形成資產階級，亦不能產生民族獨立與統一思想。那時的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尚在一種紊亂狀態中遊離着。但是，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世界商路中心他移，意大利商業遂行停滯，但資本主義的因素仍在生成，其發展趨勢，日益有賴於國內市場的形成與國家之獨立統一。因而對外來的民族侵略與內在的封建割據，就日益明顯的成爲民族資本主義成長的障礙。這種矛盾到十八世紀末，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刺激之後，就愈加暴露出來。

從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結論，意大利革命的基本要求，就是外除民族之壓迫，內除封建殘餘之束縛，達到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其歷史任務即在於此。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　十八世紀末年（一七九六——一七九七）拿破崙首次進入意大利，那時客觀上仍帶有革命意義。法國革命的思想意識與力量，傳入到意大利之後，強有力的刺激到意大利的覺醒，部分的摧毀了封建勢力的基礎，推翻了奧地利在皮蒙特、倫巴底的統治，並且成立了許多共和國：如北意地方以波羅涅為中心的基斯巴達耶共和國（這是近代意大利國家的雛形），以熱內亞為中心的利求利阿共和國，以那波里為中心的巴頓諾役共和國。但自拿破崙第二次侵入意大利，就顯係帶着侵略性，他合併基斯巴達耶共和國，以米蘭為中心建立起沙彼拉共和國，後改之為「意大利共和國」，自兼大總統。拿破崙稱帝後，又改為「意大利王國」。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意大利仍恢復原狀，意大利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倫巴底、威尼斯，復為奧國領土。獨立的國家只有撒丁王國（並包括皮蒙特王國），羅馬附近的教皇區，西西里王國，那波里王國及其他小國，共九個獨立國。這些獨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兼有世俗權力的羅馬教皇。王政恢復之後，意大利的反動局面愈加厲害。小資產階級與少數微弱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因拿破崙法典所獲得的市民權亦隨之剝奪。意大利外則仍受奧國較前更甚的民族壓迫，內則不僅為政治國界而且為關稅分割為許多小國，這種分割更加障礙着國內工商業的發展，當時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偶有不滿的表示，政府則施以殘酷的懲罰。

也正是這個時期，意大利的自由主義的國民運動就在祕密狀態中形成起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不久，意大利首先有「**燒炭黨**」（Carbonali）的活動，這是意大利自由資產階級的組織，目的在於建

立君主立憲政體。在他們領導下有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參加，其在軍隊中及一些失職的軍官中也有其活動。一八二〇年初，西班牙發生革命，突然的加強了燒炭黨的活動。七月，燒炭黨指導一部分叛軍長驅那波里，毫未受到抵抗，迫使該國國王不得不承認照一七九一年法國憲法所編定的意大利憲法。但這次革命並未成為廣大運動，而與他地革命運動亦未採取協同動作。一八二一年三月皮蒙特又起革命運動，撒丁王國亦照那波里宣佈憲法。但兩週後，那波里的革命為奧軍所擊退，又三週後，撒丁王國下的燒炭黨亦被奧軍所打敗；革命分子遭受很大的犧牲與懲罰。一八三〇年法國發生七月革命，又影響到意大利，中部意大利於一八三一年爆發革命，聲勢浩大，但不久仍為奧地利之援助下的反動勢力所撲滅。

四十年代意大利的工商業亦有相當的進步，而反動勢力依然專橫如故。這種情形，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下層民衆，愈加感於難堪。不過，在前次革命之後，燒炭黨已大受摧殘，工業之不發達亦反映到資產階級之軟弱少力，而意大利的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因其人數甚多，民族與民主意識日強，其中產生了意大利的革命領袖馬志尼（一八〇五——一八七二）與加里波的（一八〇七——一八八二）。斯時在馬志尼領導之下組織了一個祕密團體，「青年意大利黨」（La givinl Italia），其政綱為驅逐奧地利人，統一意大利為民主主義共和國。他們與自由資產階級間雖有政綱與原則上之分歧，但對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共同目標上是一致的，而且開始也是合衷共濟的。

一八四七年，歐洲經濟危機與革命形勢之到來，這種形勢，同樣出現於意大利。青年意大利黨的活動、一時普及意大利全境，倫巴底地方因奧人之殘暴壓迫與民衆生活之異常痛苦，革命首先在此地發難。一八四八年一月中旬，巴勒莫再起暴動，瞬息間，革命蔓延到全西西里島，教皇軍隊自島上潰退，

西西里遂成立革命臨時政府。不久那波里亦起暴動，國王不得已又允許憲法，而撒丁王國亦在革命影響下，同意於改訂憲法之要求。巴黎二月革命特別是維也納三月革命的消息傳來，革命烽火，燃燒到全意大利。倫巴底的暴動馬上得到撒丁及那波里的革命來援，遂驅走奧軍，並由國民投票加盟於撒丁王國。接着威尼斯亦宣佈脫離奧地利，成立獨立共和國。在這種革命風暴之中，一八四八年十一月，羅馬教皇及皮阿九世亦不得不由羅馬逃亡。一八四九年二月，羅馬亦宣佈共和，而以馬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三人總攬國政，於是意大利的革命收到了第一步的成功。

可惜，意大利的革命的命運，也如德國一樣，首先是革命勝利之頃刻間，即暴露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即君主立憲派與民主共和派間的分裂。工商業資產階級鑒於革命勢力之發展與民衆力量之可怕，不惜馬上與反動的敎皇、貴族，以至與外敵合謀。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氣燄雖高，志願雖大，但一無社會綱領，更無明確的行動方策、勝利中異常驕狂，稍一不利卽表示恢心，特別是他們不能重視民衆具體利益，因而不能發動廣大羣衆參加。當時意大利尙無眞正的無產階級，農民並未興起，革命的主力軍是城市貧民、無產者及港灣居民。正由於意大利之落後、分裂、交通不便，使這次革命沒有全國的統一指導，特別是普、奧、法革命的失敗，尤其是奧國革命的失敗，對意大利革命有決定一時命運的作用。因此，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革命，就與德國革命一樣，到一八四九年就歸於失敗。奧軍在平定本國革命之後，卽調大軍進攻倫巴底，於是倫巴底與威尼斯相繼爲奧吞併。同時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亦派軍隊到意大利，擁護敎皇復位，並圍攻羅馬，加里波的卽在羅馬率領義軍，作英雄無比的抗法戰爭。抗戰至兩月之久，終因彈盡援絕，反動力大，而於一八四九年七月，放棄羅馬，意大利一八四八年革命就從

此完結。

馬克思、恩格斯對意大利的革命是甚表同情，他們在「萊茵報」上攻擊奧地利，尤其是攻擊佛蘭克府國會之對意大利冷淡。恩格斯這樣說：

「德國政府寧願在波蘭、意大利、以後在匈牙利進行極猛烈的軍事行動，而對於這個唯一的人民的戰爭和唯一（至少各部分的）的革命的戰爭，進行許多無結果的進攻與退守，以後又屈服於別國的外交干涉，使許多英勇的交戰，竟受得最可憐的結果。

它——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讓德意志的奧地利去進行討伐意大利的戰爭，然而它又讓奧地利人安全退到德國，禁止意大利人追擊。」（「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幾次抗戰與最後勝利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意大利各國，內受教皇及各國君主的封建壓迫，外受奧地利以及德國的摧殘蹂躪，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其所受的痛苦，較前更甚。奧地利在倫巴底與威尼斯每年所徵的賦稅，等於奧國歲入的百分之二十八。一八四九年倫巴底的土地稅增加一倍又半，威尼斯的間接稅亦大為增加。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一年間，意大利境內是充滿了白色恐怖，凡革命被鎮壓了的區域，革命組織是摧殘殆盡，一般革命者或殺或捕者不知凡幾。所有革命時的憲法都取消了，特別在那波里王國，反動得更加厲害，教皇區更不待言。然而，革命的祕密活動，並未因此停止，零星暴動仍時有所聞。當時，在意大利境內，只有皮蒙特一國仍保存憲法，情況較好，因而意大利的革命家均薈集於此。這時意大利已開始有大工業（那波里較為發達），可是手工工業手工廠仍佔優勢。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愈苦，無產階級甚屬幼稚，而資產階級又因反動勢力的籠罩，不能不又來傾向於革命。革命中最積極

的力量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無產者，貧農亦極力贊助革命。這樣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又重新高漲起來。

意大利革命的基本任務——外除民族壓迫，內滅封建殘餘，達到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現在又提在歷史的議程上來，而完成這一任務只有團結國內人民，爭取有利的外來援助，首先靠自己力量，用革命與戰爭來解決之。意大利人當時是正向着這種方針努力，而其最後勝利，也剛剛是從這種堅苦的、長期的解放戰爭中所得來。

由於皮蒙特王國之比較前進，於是影響其所屬之撒丁王國亦不如其他小國之那樣反動，這就使意大利革命的中樞，能在撒丁、皮蒙特站起脚來。一八五二年，自由資產階級的先進人物加富爾被任為撒丁國王伊曼紐第二的內閣首相。加富爾開始並沒有眞正求得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願望，只不過是想強大皮蒙特以至抓得撒丁，擴張自己領土，使其餘意大利土地及奧國所佔地方為己有而已。不過在加里波的的影響與推動之下，才把『獨立與統一』的共同政綱，作為自身的奮鬥目標。當時他們的計劃是：第一，內部團結——不但加富爾的立憲派，馬志尼的共和派及加里波的革命黨，親密合作起來，而且要把全國的工、農、商、學、兵各界團結起來。第二，以撒丁為革命中心地，及時整理內政，振興實業，發展交通，擴充軍備，充實國力，鞏固這一根據地，以担負起解放與統一意大利的任務。第三，利用法、奧的衝突，爭取法國的援助，中立普國，首先集中目標打倒奧國，當時他們的政略方針、就是如此。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四年間，他們對於第一第二兩點已經做的有些成績，所難者就是第三點，因為法國傾心羅馬教皇，尚無贊助撒丁之意。恰好，一八五四年，東歐發生克里姆之戰，英、法助土打俄，初尚無效，英、法約奧參加，奧國拒絕，反去就俄，斯時英、法正疲乏求助，而法與奧又成不睦，加富爾乃乘

機出兵（一萬七千），協助英法戰爭，獲勝之後，加富爾得機出席一八五六年三月的巴黎會議，博得法、英及其他歐洲人士對意大利統一之注意。而此時英國雖無明顯表示，然法國確有在意大利發展力量驅逐奧地利之心。正當奧國拒絕英法提議之後，就已開始興師伐意之時，法國卽大舉出兵。一八五九年四月，法、意軍（撒丁軍八萬四千，加里波的的義勇軍二萬六千，法軍十四萬），與奧軍十六萬大戰，結果，奧軍完全敗北，意大利首次抗戰得到勝利。

如果加富爾的政策，眞正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積極發動民衆，這樣去貫澈抗戰到底，則奧國勢力未始不可在這次全部逐退，而意大利革命事業亦可早日告成。那知加富爾派之努力不着重在依靠自力，而着重在依賴法皇，不願意去發動民衆，而僥倖於專靠外援成功，因而國內政治不大進步，團結不夠堅強，軍力未能擴張，民衆未大興起，戰爭的主動權握在人家手中，遂使法皇拿破崙第三得以左右一切，意大利反而做了他的尾巴。因此正在勝奧之下，拿破崙爲了自己的目的，（自然是害怕意大利勝利於己不利，特別是害怕意大利共和派革命黨人之得勢）反而與奧妥協，成立休戰條約。結果，奧割倫巴底使之獨立，意大利各國共組聯邦國，而以教皇爲首，實際上是在法皇影響之下。撒丁領土加大，成爲意大利的大國。法國得着尼芝（Nizza）、撒服雅（Savoia）兩個地方以爲報酬。這樣意大利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奧國勢力沒有除淨，而法國作用反而加大起來，分裂局面固然存在，而教皇勢力更擴張不已。這使資產階級自由派也感覺不滿，更無論於共和派革命黨了。此地經驗告訴我們：第一，外援是要爭取，但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去爭取外援，而不可失去主動；何況當時拿破崙第三係歐洲反動台柱與侵略者之一，依賴於反動台柱，依賴於侵略者去打侵略者，自己失掉了主動權，結果，不但不能達到

本身解放之目的，而且還與侵略者以可乘之機。第二，資產階級自由派不願發動廣大民衆力量以爲革命戰爭的主要實力，故不能在戰爭中起堅持主動作用，故不能不去主要依賴侵略者。第三，羅馬教皇之存在，在內是封建最後堡壘，對外是民族奸細，寧肯依附外族而不願民族獨立與統一。不打倒這種內奸，是不能謀民族獨立與統一的。

一八五九年以後，意大利民族革命主義者，旣不滿於奧力之猶在，亦不滿於法國之新佔領，更不滿於羅馬教皇之作祟爲奸，加里波的所影響下的革命運動仍堅持不止。一八六〇年西西里發生暴動，急進派提出統一意大利口號。五月，加里波的率北部民衆義勇軍一千來援，沿途民衆響應，不到一月卽擊破二萬四千之那波里軍，並佔領二百萬人口的西西里島。加里波的乘勝渡海北進，各地民衆響應，加以撒丁派隊來助，九月佔領那波里城，並擊破羅馬教皇軍隊。當時除羅馬城以外，全教皇區落入革命派之手。在那波里與全教皇區人民投票之下，大多數贊成歸附撒丁。一八六一年二月，在撒丁之吐林，召集意大利第一次國會（選舉財產標準很高，二千一百七十萬人民中，只有三十九萬四千人有選舉權），宣佈意大利爲君主立憲國，奉伊曼紐第二爲意大利國王。歐美各國亦先後承認意大利這個政府。六月加富爾死。

一八六六年七月，普奧戰爭開始，意大利的革命派，極力主張與抗奧之戰。在主要依靠自力而聯普擊奧的結果，奧地利大敗，威尼斯歸還意大利，此後，奧國在意勢力全部肅清出去。現在的問題，就是羅馬與法人新佔的兩個地方，只要這個問題解決，意大利的獨立與統一就可以完成了。然而法國到底是侵略者的法國，它不但不想意大利眞正自生，還想乘機樹立在意大利的力量。當奧國勢力驅出之後，法

國反而派兵進駐羅馬，竭力保護教皇，以阻止意國的獨立與統一。這樣引起了意大利人對法國的仇視增加，同時力求消滅教皇勢力。民主派與加里波的都主張開戰，革命軍曾在加里波的領導之下，一度圍攻羅馬，結果爲法軍所敗（並又引起奧軍來助教皇）。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大戰爆發，法軍由羅馬撤回，意大利王國的軍隊擊退了教皇的抵抗之後，即進佔了羅馬。一千餘年來封建反動的教皇政權從此滅亡。十二月，意大利政府遷都羅馬。政體仍爲君主立憲制，不過是以資產階級利益爲依歸，表示資產階級得到統治而已。歷史上從來被分裂與受外族侵略的意大利，從此達到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最後勝利，而意大利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亦從此完結。意大利資本主義的大步發展亦從此開始。

這裏，經驗告訴我們：（一）意大利的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是從長期的革命戰爭（主要是外抗強敵，同時內擊人民公敵——羅馬教皇與封建勢力）中所得來的。只有革命與戰爭，才能解決民族解放與建國的事業，不管意大利在千餘年來外受敵族壓迫與內呈封建割據，積弱無能，然而一旦歷史演變，民族醒覺，就可以用革命戰爭來解救自己。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救自己。（二）抗戰首先要內部團結，團結是指革命的黨派團結，政府與人民團結，同時要剷除內奸。意大利當時內奸，就是封建殘餘的教皇統治，不同時打倒內奸，是不能順利抗戰的，肅清內奸正是團結內部與戰勝強敵之道。（三）抗戰與建國不能分離。抗戰中固要盡一切可能來建國，不如此不足以充實抗戰力量，然而大規模的建國仍在抗戰勝利之後。（四）意大利的統一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而是資產階級領導，所以統一的結果，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不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因此意大利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對外說來，就馬上由民族革命

主義變爲民族侵略主義，由解放民族變爲侵略民族，一直走到帝國主義，對內說來，主要是壓迫本國工人與民衆。

雖然如此，意大利的統一還比較是眞正的統一，即公開的革命的道路底統一。恩格斯論到德國統一問題時曾經這樣說過：

「第一條道路是推翻一切分立的國家，實現眞正的統一，換言之，即公開的革命的道路。這一條道路，不久以前在意大利獲得成功。薩甫瓦王朝加入革命，因此得到了王位。」

而這一條革命的道路，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德國所不能實現的。

但是，一八五九年，意大利與拿破崙第三聯合，這一點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考茨基在沒有離開革命事業時，曾經在一八九三年論「波蘭亡了嗎？」這篇文章上說過：

「馬克思、恩格斯十分堅決地主張意大利的統一與解放，可是這並不妨害他們在一八五九年反對意大利和拿破崙聯合。」

第四節 德意志的民族統一運動

統一運動 我們在前面第五章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就已說過德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推翻封建政體，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然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德國革命，主要因爲資產階級的妥協叛變，使這任務未能得到解決。而客觀社會歷史的演進，遲早總要解決這個任務。現在我們就來講到着重德國的民族統一問題。

德國一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李斯特曾經這樣說過：

「德國有三十八道關稅，妨害國內商品的流通，正像人的身體全被綑縛，血管與血管隔開，週身血液不能彼此流通一樣，從漢堡到奧地利，從柏林到瑞士，爲了做一趟買賣，一定要經過十個國家，研究十種稅制，繳納十次稅款，誰要不幸生在三四十個國家交界的地方，那末，他就要在這些國家彼此敵對的收稅吏司之下，斷送他的一生。」

德國內部這種分裂狀況，自然有它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如第二章中已經說過的），而外族侵略，特別是十九世紀初葉前後，法、俄兩方對它的壓迫，也成爲重大原因之一。侵略者瓜分過德國的領土，干涉過德國的內政，特別在拿破崙第一時代。一八〇七年，爾希特條約，使普魯士喪失了許多領土與人口，只剩下不到三千方英里的土地，與四百五十萬的居民。拿破崙組織的萊茵同盟，實際上只是把這塊土地抓到自己的懷抱中來。拿破崙失敗與維也納會議，至多不過是滿足了一些王室的利益，並沒能解決德國統一的問題。國國相望，關稅林立，分裂離析之狀，仍然存在，而德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不能不終於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恩格斯說：

「資產階級非常不願意走幾條路，就遇到一道新關稅；度量衡和幣制單位，各處都不一致與紊亂，工業每發展一步，即受到官僚勒索與苛徵的障礙，他們都十分感覺得國家分裂成若干小國，是工業發展的障礙，由此而發生民族統一的要求。」

統一德意志的思想，已發生於十九世紀上半期，「當時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爲兩派：北德意志派，歡喜一個民主主義的皇帝，南德意志派——當時幾全爲巴敦派——願意依瑞士的榜樣使德意志成爲

一個聯邦共和國」。（恩格斯：「論馬克思與新萊茵報」）在這種和平的政治統一運動無力實現之後，於是發生一種宗教上的反對派。「德國天主教」運動，就攻擊天主教國家，特別是攻擊奧地利與巴維利亞政府。反之，「自由組合教會」就攻擊新教的普魯士政府。可是兩者都「缺乏確定的主張……他們想建造那一所大宮殿，在其屋頂之上，把全德國人聯合起來，他們在宗教形式裏代表當時德國統一的思想，然而，他們自己中間就永遠不能一致與統一」。（「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只有代表德國無產階級，亦即代表德國人民的馬克思、恩格斯，才眞正提出了革命統一德國的政治主張——即統一的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與對俄宣戰。這種主張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特別在「新萊茵報」上，是異常鮮明的提出來了。恩格斯曾經這樣寫道：

「「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是由兩個主要點組成的，即統一的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與對俄宣戰。……我們對於兩者——即南北德意志派——都必須反對，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在阻止德意志的普魯士化與其長久分爲小邦；是在使德意志終久聯合爲一個民族，然後那掃清了原來一切小障礙的戰場，才能夠出現以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比武之地。可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一樣是在阻止普魯士構成一個頂點普魯士國家及其全部組織沿革與朝代，恰爲內部唯一重要的敵人，這個敵人，是德意志的革命應當打倒的。並且普魯士要使德意志分裂，將德意志的奧地利除外；他才能統一德意志。普魯士的敗亡，奧地利的傾覆，德意志眞正聯合爲一個共和國，這就是我們的綱領——其他綱領我們是不能要的，並且只有與俄國一戰才能實現這個綱領。」（「論馬克思與新萊茵報」）

這就是說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內除普魯士的君主政體，撇開意大利，外與俄國一戰，才能夠眞正統

一德意志，眞正統一的德意志不是別的，就是統一的民主的共和國。

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沒有實現這一任務，資產階級已經叛變，懼怕無產階級，依附與捧喝普王之不暇，自然談不上肩負這一任務。所謂佛蘭克府國民會議也只是空談統一，毫無濟於實事，無產階級力弱，亦不能負此任務。這個問題，仍是一個懸案。然而，德國客觀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日益尖銳的提出這問題。我們現在來看一八四八年以後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情形：

一，蒸汽機的馬力：

一八四六年	七、〇〇〇
一八五九年	六二、〇〇〇
一八七五年	二五〇、〇〇〇

二，煤的產量（噸）（全德包括盧森堡）：

一八四三年	三、一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一六、三七〇、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三四、〇〇三、〇〇〇

三，鐵的產量（噸）：

一八四〇年	一四三、〇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二〇八、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五二九、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一、三九二、〇〇〇

四，鐵道長度（公里）：

一八四八年	一、五七三
一八六二年	二八、八〇〇
一八七六年	四六、四五四

五，農村人口對全人口之比率（以百分法計算）：

一八一六年	七八
一八四九年	六四
一八六七年	四八
一九〇七年	二八

從這些材料看來，一八四八年以後，雖然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沒有大的肅清，但資本主義也在舊的社會桎梏中，部分的發展起來。這種發展，顯然與現時德國分裂狀況不能適合。因此，統一德國問題，不但不會取消，反而更急劇的提供出來。可是，在當時德國政治狀況，特別是階級關係上面說來，究竟德國統一問題，可能經過什麼道路來實現呢？恩格斯具體分析了一八四八年以後德國社會的具體情況時，曾經這樣說過：

「國家統一的完成，在一八四八年模糊的努力，差不多到處失敗以後，很明顯地，只有三條道路存在：

這條道路沒有出現就給別的兩種可能開闢了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推翻一切分立的國家，換言之，即公開的革命道路……但這條道路沒有出現就給別的兩種可能開闢了道路。

第二條道路——是在奧地利領導之下的統一……但是實際上它比普魯士要弱些……。它和德國關係日弱一日，梅特涅的政策使奧地利與其他的德國之間建立了一道長城隔離起來，無數次的完稅和奧地利的反動擁護，章程等等都異常妨礙兩方面的經濟、政治、思想和知識上對奧地利的影響，因檢查制度，而相當困難，奧地利成了最反動的國家……此外，宗教的因素，難以使一切德國人在奧地利領導之下統一。

現在只有第三條道路——德國在普魯士領導之下統一。這是由上層統一的道路，因為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已成為歷史的不可能。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之後，繼起的有維也納的三月革命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的革命，資產階級沒有認真的參加鬥爭，很容易的獲得了勝利，他們不想作堅決的鬥爭，不久以前，他們和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有過接洽（特別是萊茵省），但是很快的，他們看出德國也誕生一個整個的工人階級，雖然他（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沒有經驗，然而在本能上是革命的，是仇視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法國的事情就是明顯的教訓。從此時起（指法國一八四八年六月暴動），全歐的資產階級都轉到反動勢力一方面。和在不久以前想藉工人的幫助以推翻專制主義的官僚們締結聯盟，以反對「社會公敵」即反對那同一的工人。」

恩格斯的意思，就是說，德國資產階級出世太遲，當他得勢的時候，正是西歐資產階級衰老的時期。在一八四八年，已經達到他轉變的頂點，過了這一點，他的資本權力每一次的增加，只是助成他一

天天失去保持政治上的統治能力，他眼見背後的無產階級已經勝過了自己，從這時起，他已失去了獨立的政治上的統治權力，他要尋找同盟者，或與同盟者共分政權，或把政權交給同盟者，這就是說，他不能夠担負德國革命與自下的統一的任務。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力量尙弱，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來一個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統一，奧地利不夠資格亦缺乏領導統一的條件，那時只有由普魯士統治的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的捧場之下，實行自上而下的統一。

一八五九年德國資產階級組織一個自由主義的「民族聯合會」，要求由普魯士領導以統一德意志，因爲自己領導革命之不可能，因爲害怕無產階級，於是不能不矚望於統治的地主貴族。一八六一年威廉第一做了普王，一八六二年俾斯麥爲宰相，盧恩、毛奇爲將軍。於是他們就來担負這個由上層來統一德國的任務。俾斯麥在國會中宣稱：「德意志所希望的，不是魯普士的自由主義，乃是它的軍力」，又說「德意志的統一，不是靠演講，也不是靠大多數的表決，乃是靠鐵與血」，這就是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俾斯麥統一德國的計劃是：

一，普魯士必須樹立一個所向無敵的戰鬥力；
二，普魯士政權與土地必須藉武力而增大；
三，時機成熟須以勝利的戰爭，驅逐奧國於德意志之外；
四，爾後普魯士必須聯合所有的德意志國家於其統一之下；
五，最後這軍事化與普魯士化的德意志，必成爲歐洲一個主要國家。

在這一計劃之下，普魯士卽整軍經武，坐待統一德意志時機之到來。

三次戰爭　一八六四年開始第一次戰爭，即普國與丹麥的戰爭。

這次戰爭發生於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問題。這兩個地方，位於丹麥半島與普國北境接連處。好斯敦有日耳曼人口五十萬，什列斯威有日耳曼人與丹麥人各五十萬。「這些國家的民族、語言、習慣、無疑義地是德意志的，而且從海陸軍與商業的見地上說來，也應當屬於德國。」（恩格斯：「德國革命與反革命」）歷來，丹麥政府對這兩個地方，採取高壓政策，一八四八年起，該處發生了反丹麥的民族鬥爭以至演成民族革命戰爭，以求脫離丹麥而獨立，事實上是願歸入德意志。「最近三年來，該地居民爲反抗丹麥的干涉，頗有艱苦的鬥爭」，可是，由於「德國政府在戰爭期內，在每次的機會，都是背叛什列斯威、好斯敦的革命軍隊。當他們被驅逐或分散的時候，有意任其被丹麥人截擊」，（同上書），於是兩地民族運動遂遭失敗。但是，一八五一年，丹麥給普、奧的允諾，並不敢公開吞併這兩地，而到了一八六三年丹麥新王克里斯聖第九即位，即宣佈新憲法，把這兩地併爲丹麥所有。這不但引起這地人民的反抗，更加傾向德意志，同時正與普國俾斯麥以可乘之機，以爲統一德意志之先聲。

俾斯麥首先結好奧地利，一則增加德意志的威力，保證能夠壓服丹麥，二則不使奧地利懷疑普國有包辦獨佔之心，三則要排斥奧地利，必先故意拉攏奧地利，以種日後反擊之根。這樣一來，普奧兩國就聯合給丹麥以哀的美敦書，限其即日取消新憲法，然而丹麥偏偏拒絕，一八六四年，即爆發普國與丹麥之戰，結果，丹麥大敗，除交出兩地外，並創勞恩堡公國以和。

關於處置戰利品問題，普國的計劃就是針對着準備與奧一戰。奧國意見就想把這些地方組織一個公國，加入德意志聯邦，以免普國獨佔。俾斯麥的計劃，就是要直接併入普國。結果，普就不免要與奧即

時一戰。但普魯士此時對奧戰爭，尚未準備就緒，爲不願與奧馬上決裂計，一八六五年乃與奧國訂立加斯太茵條約：（一）普魯士即刻從奧國購買勞恩堡；（二）普魯士治理什列斯威；（三）奧地利治理好斯敦。這樣表面上是普、奧平分秋色，實際上是種下了普奧戰爭之根。

第二次戰爭是普奧戰爭（一八六六年），德意志聯邦實際上是普奧爭霸，奧國早已就是與普國對立。奧國一貫政策，都是阻止普魯士之獨霸與妨害普魯士之統一德意志，反之，普魯士則又大不容奧地利之爭雄。俾斯麥的國策，也就是要驅逐奧地利，由普魯士來統一德國。兩雄既爭峯對壘，結果不免一戰。俾斯麥無日不在準備與奧作戰，唯以羽毛未豐，尚不敢輕於挑釁，即加斯太茵條約亦無非是爭取時機之舉而已。然而普魯士欲保證戰勝奧地利，不但要強化內力，同時還要爭取國際有利形勢，孤立奧國才能有把握。當時法、俄兩國關係重大，於是俾斯麥一面交好俄國使其中立，因普魯士曾於一八六三年助俄平定波蘭革命，俄之中立似有可能；另一方面則竭力誘導法國，斥責奧國於克里姆之役背法就俄，指出在意大利方面，奧甘與法爲難，並且許拿破崙第三以在比利時或萊茵方面給以報酬，再三聲明普對法素無領土野心，藉此以聯絡法國，至少使其中立。另外，則暗中結納意大利反奧，並與之訂立攻守同盟條約，以威尼斯（奧屬）許意。這樣，普魯士之孤立奧國與爭取外援的目的成就之後，差不多「萬事俱備，只差東風」了。

一八六六年六月，普魯士宣佈解散德意志聯邦會議，除去奧地利，組織新的國民會議，同時以武力佔據什列斯威、好斯敦。當奧國動員軍隊起而反抗時，於是雙方戰爭發生。七月三日薩多瓦（Sodowa）一戰，奧軍大敗，同時意大利軍乘勢驅逐奧軍出境。根據布拉格條約：奧地利與德意志聯邦脫離，由普

魯士爲首另組北德意志聯邦，除南德意志的巴威路、符騰堡、巴敦、黑森、丹穆斯達均各獨立外（實際上仍暗與普約，爲普所有），其餘？茵河以北二十一個小國均爲北德意志聯邦統轄。另外奧與匈合成立奧匈帝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始解散）。

二次戰爭勝利使德意志的統一完成了大部的事業，此地所要注意的問題是：

一，普魯士大勝之後，對於奧地利首先是把它打出德意志之外，次則使南德諸小國獨立，以隔離奧國，然而不公開合併之；此外，又對奧無過高苛求者，正是俾斯麥之手腕，以備將來有所求於奧也。

二，新德意志聯邦又慨然實行普選制，組織新的國會，一八七六年編訂聯邦憲法，以普王爲主席；他不受國會多數限制，有自由委聯邦首相大臣及決定一切國策之權，這也是俾斯麥對內政策，這種政策就是在於利用國內階級的矛盾，而從中控制，以爲己用，實際上，是利用資產階級及一切有產者宰割無產階級。同時利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 資產階級與貴族諸侯間，小邦與小邦間之均勢，以資總的控制，這就是普魯士式的拿破崙主義的政權形式，卽恩格斯所謂『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同等的表演把戲的此種最近傑作；爲俾斯麥式的國民的新德意志帝國，在那裏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互相平衡，又爲墮落的普魯士地主貴族的利益所騙』，（『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九章）這種政權正是在壓抑長大了的無產階級的條件之下，由上層貴族來統一德國所具有的政權形式。

三，戰勝了丹麥只是替德意志的統一事業做了第一步工作，戰勝了奧地利只是第二步。但是，還不是最終的一步。最終的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乃是如何戰勝法國拿破崙第三的問題。因爲拿破崙第三，始終是直接障礙德國統一的罪魁，對於德國也可說是民族侵略主義者，不最終戰勝法國的侵略

主義，則德意志的統一是不能最終實現的。普魯士的統治階級已見及此。如果說，戰丹是戰奧的準備，那末，戰奧也是戰法的準備。如果說勝丹而不驅丹，目的是爲了勝奧；那末，勝奧而不苛求，目的也就是爲了勝法。何況內政軍備，一切一切，都是準備好了要與法一戰呢？

因此普魯士在勝奧國之後，統一的議事日程上就是如何與拿破崙第三一戰。

未說到第三次戰爭——普法戰爭（一八七〇）之前，首先要說到拿破崙第三的侵略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站在德意志統一的這個進步事業（雖然俾斯麥政權對德國工人階級仍是壓迫的政權）的觀點上，爲什麼說當時法國政府是侵略的呢？恩格斯說得非常清楚，他說：

「但第二帝國對於法蘭西國家主義的號召，也就是擴張國土到一八一四年所失去的第一帝國的邊疆，至少也是第一共和國邊疆的要求。法蘭西帝國，不能永處於舊皇國的疆界之內，更不能永處於一八一五年更狹窄的疆界之內，因此，就不時發生了戰爭與擴大國界的必要。最吸引法蘭西國家主義幻想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的萊茵河左岸，在國家主義的眼目中看來，萊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較之亞爾卑斯山或其他地方的十平方英里，還要寶貴得多。在第二帝國之下，歸還萊茵河左岸（一次的或分次的）的要求，實不過時間的問題罷了。這個時間，在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之後，是已經到來了。被俾斯麥所欺騙並被他自己的狡猾而猶豫的政策所欺騙的拿破崙，在等待着「土地報酬」之際，便只有出之於戰爭一法。」（「法蘭西內戰」引言，一八九一年）

拿破崙第三既然早就垂涎萊茵河左岸夢想擴大國境恢復拿破崙第一時代所侵略的疆土，既然法國從各方面攔阻德國的統一與進步，又加之在普奧戰爭前夜，從俾斯麥口中所得到的「土地報酬」不能實

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在法國方面說來自然是迫於一試身手；何況法國在這第二帝國時代，國內階級矛盾的深入正欲藉此發揚愛國主義特別是藉與德一戰以移轉國內視線呢？法國是要與德一戰了。

至於德國方面亦已準備一戰，此時，不但『土地報酬』徒託空言，甚至唯恐法國不戰，特別又拉攏了奧、俄兩國能守中立，而引意大利作爲聯盟（這時法軍近駐羅馬，並在意奧戰爭中，佔獲了意大利的大塊地方，法、意衝突甚大）。在這種已是準備妥善的情形之下，就是一個簡單的西班牙王位承繼問題，俾斯麥易改了一個艾姆斯公文（The Ems Dispatch）就引起了法皇之怒。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國即宣佈對德作戰。以普魯士軍爲主體的德軍，已在八月間屢敗法軍，九月一日瑟當（Sedan）之役，毛奇大施包圍的、殲滅的運動戰術，大敗法軍十有二萬。翌日，拿破崙第三率八萬一千之衆被俘，法軍全部覆沒，德軍大獲全勝，直逼巴黎。自是之後，德國的自衛戰爭完結，而其侵略戰爭開始了。一八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德軍陷巴黎，法國賣國求榮的資產階級國會，遂於三月一日，完全接受俾斯麥奴役法國人民的和約，以便集中與聯合一切力量，對付法國工人階級。凡爾賽和約（五月十日正式批准）決定：（一）法賠款五十億法郎，三年付清，（二）割亞爾薩斯與勞倫兩州與德。德法戰爭於此結束。

第三次戰爭勝利之後，德意志的統一乃告最終實現，德國的民族國家，才得最後形成起來。南德四國都加入聯邦，北德意志聯邦改爲德意志帝國，以原來主席爲皇帝。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威廉第一在法國凡爾賽宮上德意志聯邦皇帝稱號。德國統一與民族建國，從此實現，德國政權從此成爲資產階級與貴族調協的（即在資產階級甘願把政權交給政府，政府則自上執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普魯士式的政

權了。

馬、恩對統一與戰爭的態度　這個時期，馬克思仍在倫敦，恩格斯原居曼切斯特，在普法戰爭結束的前五月亦移居倫敦。他們站在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之一致的立場上，努力於德國的統一與各國無產階級的團結。他們在這個時期，對於德國的統一與戰爭，採取了非常正確、堅定與模範的政治策略。這種政治策略剛剛是代表德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德國的民族利益，也就是代表國際工人的利益。他們的基本政治策略是什麼呢？

第一，德意志的統一，雖然已經走上上層統一的道路，這種道路在當時還是需要的，但是要區別全民族利益與單獨統治者的利益。我們從前面所引證的恩格斯的論斷中，可以知道，既然當時『德國的統一，不可能由下層革命的道路來實現』，既然當時『只有第三條道路——在普魯士領導之下的上層統一的道路』，而且自俾斯麥上台以來，事實上已經走上了這條上層統一的道路。爲了德國民族與無產階級之現在的及將來的利益着想，這種統一還是當時德國所需要的。因爲上層的統一，較之下層的統一，固然差得太遠；然而，上層的統一，較之不統一，則是勝過一籌。可以說，與其國家的分裂，不如上層統一之爲愈。恩格斯在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寫信給馬克思說道：

『德意志的歷史，在我看來，現在較爲簡單。自俾斯麥將小德意志資產階級的計劃和普魯士的軍隊連貫起來，並獲得這樣巨大的成效以後，德國的發達已經決切地向這一方面（即指上層的統一方向）前進，無論願意與否，我們和別人一樣，必須認清這種完全的事實。……就好的方面說，此舉將局勢弄簡單了，因而使一種革命易於進行，並且消滅各小邦的騷擾，促進國內的發展。一個德意

志的國會，畢竟將與一個普魯士的會議完全不同，全部小邦制度將牽入運動中，各種最壞的地方勢力都要銷聲匿跡，各派終久也要變成全國的而非地方的。就壞的方面說，主要的是德意志免不了要爲普魯士所操縱，這是一種很大的壞處，於是將有德意志與奧地利的分離，這種分離的結果將使斯拉夫人即刻向勃門馬倫和頓屯進發，可惜對於此兩事，都無能爲力。依我的意見，我們除掉明白承認事實而不加贊成外，別無他法，我們除掉在可能的限度內，利用現今所存在的很容易着手的狀況，使德意志的無產階級形成全國的組織和聯合外，也別無他法。」

馬、恩的觀點，是明白承認這個上層統一的事實，爲了德國民族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他們對於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是贊成的。但是他們又嚴格區別德意志民族利益與普魯士王朝利益。對於普魯士王朝的特權上面，對於德意志爲普魯士王朝所操縱這一點上面，他們是不加贊成的。因爲這種特權與操縱是強制全民族利益與造成將來民族侵略的先兆。馬、恩的基本精神，即在於此。所以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致馬克思的兩信中，一方面提出：「因爲將反對俾斯麥主義提出來作爲一種單獨的指導原則，未免荒謬，第一，俾斯麥現在和一八六六年一樣，總是在他的方式中將我們的工作做了一部分，這雖不是他所願意，但是總算做了，他和從前一樣替我們創造出來乾淨的地盤。」——這就是他之所以承認的根據。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在同信中，明白指出：「注重德意志民族利益與普魯士王朝利益的區別。」——這就是他之所以不一般贊成的根據。而這種不贊成普魯士王朝特殊利益，正是馬、恩之贊成德意志民族與工人階級的利益，問題的樞紐即在於此。

第二，德意志的戰爭是自衛的戰爭，但須防止自衛戰變爲侵略戰。自衛戰爭則擁護，但一旦變爲侵

略戰時則反對。法國拿破崙第三要使德國分裂而極力阻止德國的統一，在普魯士方面是爲求德意志的統一而去掉分裂，在這樣兩方對立的政略而引起的普法戰爭，不管誰先進攻誰，在法國方面是侵略戰爭，而在普魯士方面則是自衞戰爭；也不管在普國方面是俾斯麥主持（自然俾斯麥是別有企圖），然而德意志爲獨立統一而抗法，在這種意義上，乃是自衞的戰爭。馬克思在這戰爭開始不久之日（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國際爲普法戰爭告同志的第一書上，就指出：「對於德意志方面，這次戰爭是防禦的戰爭。」（「法蘭西內戰」）

因此，他就極力號召德國及各國無產階級來擁護德方的自衞戰爭。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第一國際的第二書上說道：

「德國工人階級沒有阻止這一戰爭的可能，他把這一戰爭作爲爲着德國獨立，爲着把德國與全歐洲，從第二帝國腐爛的羈絆之下解放出來的那種戰爭，而用力來擁護它。」

然而正因爲馬克思明白看到，德國這種自衞戰爭是普魯士的統治階級所單獨領導，明白看出普魯士王朝的利益與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有區別；因此也明白看到，並且事先指出，在這樣的自衞戰爭的發展中，工人階級與民衆力量尙不足以管制這種自衞戰爭的結束時，則其前途，有由自衞戰變爲侵略戰之可能。當着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的普法戰爭告同志的第一書上，指出德國是自衞戰爭時，同時就預示着：

「如若德國的工人階級，容許這一戰爭失去其純粹防禦的性質，而蛻化爲反對法蘭西民衆的戰爭時，那不論是勝利，不論是失敗，都同樣是敗滅之路。」（同上書）

並且恩格斯在當年八月致馬克思信中又說到：

「民族運動旣以防衞德國爲限，在現今情況之下，侵略一事，直到媾和爲止，並非不可能。」這就是說，德國無產階級固然尙無能力担保其不向侵略戰變化，但是，如果這種自衞戰轉變爲侵略戰時，德國無產階級及德國人民就應當起而反對。

果然，不出馬、恩之所預料，九月一日，瑟當之戰，普勝而法大敗，普軍直向巴黎進犯，從這時起，德國的自衞戰爭就變爲侵略戰了。所以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告同志的第二書上就首先說道：

「……我們對於在德意志方面，戰爭會失去它的純粹防禦的性質而蛻化爲反對法蘭西民衆的戰爭的危懼，也是沒有錯誤的。在拿破崙第三出降，瑟當投誠，並在巴黎宣佈共和國的前後，防禦的戰爭，眞的是已經終結了。……普魯士當局已經決定把戰爭變爲掠奪的戰爭了。」（「法蘭西內戰」）

從這時起，馬克思卽號召德國及世界的工人民衆，來反對德國方面的侵略戰。

第三，德法工人及全世界工人的團結，這是使自衞戰爭有利於全民族，有利於民衆，使侵略戰爭滅亡，及最後根絕一切戰爭的保證。在民族自衞戰爭中，無產階級的利益與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民族的侵略戰爭中，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其統治者的「愛國主義」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所以，馬克思在德方自衞，法方侵略的戰爭階段中，一方面極力號召德國及世界工人擁護德國自衞戰爭，而反對法國的愛國主義。他在國際第一書中，嚴厲指摘當時法國支部贊成國民投票的罪惡說：「這就等於贊成國內的專制與對外戰爭。」另一方面，則極力號召法國工人與德國工人的團結。

馬克思贊揚柏林支部的宣言，「任何勝敗，都不能使我們拋棄我們的共同事業——全世界工人聯合的事業」。其中這樣說：

「我們反對吞併亞爾薩斯與勞倫。……我們為了共同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事業，將和我們的同志們、其他國家的工人們共同奮鬥到底。」

只有工人階級的團結，才能保證使自衛戰爭的結局，有利於民族，有利於民衆——對外則阻止變防禦為吞併，對內則反對洒無數民衆之血，為少數統治者謀私利。馬克思又在『法蘭西內戰』上這樣提出：

「……德意志的工業工人及鄉村工人組成了英勇的軍隊的骨幹，而他們家庭中的人丁，却處於半飢半餓的狀態之中，他們不僅過着國外戰場上的痛苦，而且還有家庭的貧困的極大痛苦，在等候着他們。他們現在也要求「保證」，保證他們無數的犧牲不會付之流水，保證他們眞正的得到自由，保證他們對於拿破崙之勝利不會像一八一五年那樣變成德意志人民的失敗。」

同時，也只有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最後消滅侵略戰爭，才能最後根絕一切戰爭，才能保證社會的眞正和平。

國際工人聯合總會，為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第一書上，最後這樣說到：

「他們相信，不論現在的可憎的戰爭如何結局，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聯合，最後是要根絕一切戰爭的。……只是這一件在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事實，已經展開着對於更光明的將來之希望。這事實指示出：與經濟貧窮政治荒謬的舊社會相反的新社會，是在誕生着了。這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就是和平，因為在一切民族中，將只有一個同樣的統治原則——卽勞動。這新社會的預告者，是國際工人聯合會。」

第五節　愛爾蘭問題

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　愛爾蘭位於英國西部，它是與英國不同的民族。自一六六二年爲克倫威爾征服以後，此地就成爲英國的屬地。一八〇〇年與英國間成立了所謂『最終聯合』，後來自己就沒有任何議會，一切受英國宰割。英國對愛爾蘭的政策，就是把它造成爲供給英國原料與銷售英國商品的農業國。因而愛爾蘭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那怕英國的工商業已在長足進步，『然而愛爾蘭，就在今天還不過是由寬大海峽所隔開的英格蘭的一個農業區域，它對英格蘭供給穀物、羊毛、家畜，並供給產業上軍事上的新兵』。（『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章）愛爾蘭最大部分的土地，爲住在愛爾蘭的英國的大地主所有，他們在那裏由奴役愛爾蘭人民來耕種，其所收穫的羊毛、穀物、家畜完全供給本國，而對愛爾蘭農民則施非常蠻橫的壓迫政策。加之，一八四六年的大災荒，所以愛爾蘭的人口急劇減少。一八四一年愛爾蘭人口爲八、八二二、六六四人，到一八五一年爲六、六二二、九八五人，一八六六年更爲五、五〇〇、〇〇〇人，約與一八〇一年人口相當，而到十九世紀末則減爲四、五〇〇、〇〇〇人。其結果就是：（一）大批人口移到外國，自一八五一年五月至一八六五年七月間，移出人口計一、五九一、四八七人，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之五年間，移出人口則有五十萬人以上；（二）愛爾蘭土地愈益集中於英國地主手中，自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一年間，各種租地的總數減少了一二〇、〇〇〇之多。這種減少就是完全由於十五英畝以下租地的消滅，與土地之愈益集中化；（三）外國市場，特別是英國國內市場上勞動力之增加，因爲愛爾蘭既無大工業（當時唯一麻織業工業並不需要這多成年工人），可以容納

這些剩餘勞動力，自然大批向美國以至英國流入；（四）愛爾蘭本國勞動者生活之愈趨惡化，勞動人口之過剩，就必然使愛爾蘭的工業勞動力與農業勞動力過剩，因而愛爾蘭勞動者的生活原來是異常惡化，而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八這二十年間，雖然工業工人名義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可是因生活品的昂貴，其實際工資仍是提不起來，特別是農村的僱傭工人，工資更低。因爲城市勞動力過剩與工資貧乏，使城市的勞動者多兼營農村的短工或季工，又成爲農業後備軍，這是愛爾蘭的特點。從此又可以想見愛爾蘭勞動者生活之惡化；（五）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家、大地主，遂大發其財，因爲土地的集中化，地租反因人口減少而增多，加上橫暴權力的施與，自然，這般大土地所有者就大發其財。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上所列舉的材料中，一八四八年愛爾蘭的總利潤爲四、三六八、六一〇鎊；到一八六四年，一、一三一個貨殖家攫有利潤二、一五〇、八一八鎊，等於當年總利潤之一半。

由此看來，英國奴役愛爾蘭的結果，是：第一，愛爾蘭人的銳減與奴化；第二，英國財富的驟增與資本權力的更加加大；第三，英國工人階級與英國民衆的壓迫更加加重。所以愛爾蘭的問題，不僅是愛爾蘭民族的解放問題，同時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解放問題。

愛爾蘭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受到英國這種殘暴不堪的壓迫與痛苦，到一定時期，就必然發生民族運動。遠在一六四一年，英國革命開始時，愛爾蘭人就發生過反英的民族運動，曾經有大部分的地方，脫離了英國的勢力。但是，一六四九年，這種民族運動被征服下去，而到一六六二年，完全被英征服。爾後愛爾蘭就長期陷於英國統治之下。一八四一年，英國根據『最終聯合』的條約，將愛爾蘭完全吞併。一八三〇年愛爾蘭人又在鄂康尼的指導之下，用和平的方法向英政府要求取消『最終聯合』，但絲毫沒

有效果。一八四〇年間，愛爾蘭有「少年愛爾蘭黨」出現，他們鑒於和平解放之無效，於是主張用暴力來達到愛爾蘭的獨立。可是他們無廣大民衆做基礎，卽是沒有發動廣大的民族力量，這種暴動企圖，終於被英政府壓制下去了。英國政府運用高壓手段，對付這種民族運動，拘捕革命首領，封閉言論機關，甚至於在愛爾蘭實行全部戒嚴，屠殺宰割，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如此，愛爾蘭的民族運動並未因之停止，一八六三年流亡在美國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又在美國成立「芬尼亞黨」（The Feniam），力謀使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他們在紐約開會，議決於下年在愛爾蘭與英格蘭共起革命。

一八六七年三月，愛爾蘭的首要城市都會柏林與其他地方，爆發了抗英的革命，然而終於很快的又被英國政府鎮壓下去了。爾後愛爾蘭的革命家們仍奮鬥不止，甚至在英格蘭亦從事零星的暴動，是年九月曼撤斯特的警察用車押送兩個愛爾蘭革命黨人，在途中被其他手持武裝的愛爾蘭人刧去，英政府於是大捕黨人，甚至將沒有證據的被捕者三人判處死刑。十二月他們又在克萊肯威爾的監獄中施放炸藥企圖暴動，結果，死十二人傷百餘人。然而在這個時期，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始終沒有完成，列寧說過：

「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的是早就完成了。但是它在愛爾蘭，還沒有完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由英國自由派的改良來完成。」（「論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四年）

一八六六年萬雷領導下的自由黨，曾在英國國會提出愛爾蘭自治案，首先在下院就被否決了。一八九三年，他又提出二次自治案，下院通過，但遭上院否決。最後，到一九一二年，英國自由黨又提出第三次愛爾蘭自治案，規定：

一、愛爾蘭得設立兩院制的國會。

二、軍事、外交、財政與商業問題，仍由大英國會管轄。

三、英下院中仍有四十二個愛爾蘭議員。

這個議案終於在一九一四年被英國國會通過，一九一五年經英皇簽字成爲法律，這就是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間實行的一種可憐的改良與妥協。這種改良的內幕就是：（一）英國政府向愛爾蘭富裕農民讓步，使他們容易購買地主土地，以促成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二）減輕地方行政的壓迫，以收買愛爾蘭的人心。一九二二年英國最後承認愛爾蘭自治領如加拿大一樣。實際上愛爾蘭的民族問題還是沒有眞正解決。

馬、恩與愛爾蘭問題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愛爾蘭問題非常關心，並且給了世界無產階級之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際的模範。馬、恩的基本精神表現在那地呢？

第一，愛爾蘭是英國第一個殖民地，它脫離英國而獨立是不可免的，因爲愛爾蘭距離英國只一海峽之隔，英國固然便於統治它，但由於英國壓迫之厲害，必然要使愛爾蘭走到脫離英國而獨立。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曾經這樣說：

「我曾設法激起英國工人爲援助芬尼亞運動而舉行示威遊行……過去我們以爲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以爲是不可免的，那怕分立以後弄成聯邦。」

馬克思這種觀點在當時是否正確呢？是完全正確的。因爲芬尼亞運動是要求愛爾蘭獨立，而且因爲這種要求，激起了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同時得到了一部分英國工人與他國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在客觀上

說來，這種『不可免』是可以藉當時的及爾後的以革命手段來實現。

第二，愛爾蘭人所需要的正是脫離英國而獨立與土地革命。馬克思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上又補充道：

『愛爾蘭人所需要的是：（一）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認爲愛爾蘭的脫離英國而獨立，不僅是不可免的，而且是愛爾蘭人所必需的。只有愛爾蘭人來爲這需要而努力，則這種需要是可以達到目的的。馬克思在此地所說的自治，並不是爾後一般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所了解的單純的『自治』，而是在一直做到脫離英國而獨立的自治，這種自治剛剛就是民族自決的自治。同時，馬克思認爲要達到這一點，必須與愛爾蘭的土地革命聯繫起來，因爲愛爾蘭的土地，最大部分在英國的大地主手中，成爲壓迫愛爾蘭人的強有力的武器。而愛爾蘭人的土地革命，正是摧毀英國統治愛爾蘭的堡壘，這種土地革命，正是愛爾蘭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死問題，正是實現脫離英國而獨立的先決條件，也就是達到這一政治目的所必採取的革命手段。

第三，英國工人要積極援助愛爾蘭的獨立。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國際總會』的報告中曾經這樣說道：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絕對的利益，要求它與愛爾蘭斷絕現有關係……我在許久時期內，認爲英國工人階級的高漲，可以推倒愛爾蘭所受的壓迫；我在「紐約論壇」上總是擁護這種觀點。但是更深刻的研究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却使我相信相反的情形：英國工人階級在未擺脫愛爾蘭以前，它使一點也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其根源就在於對愛爾蘭的束縛。』（參見『列

寧選集』第七卷『論民族自決權』）

馬克思認為愛爾蘭是英國反動統治的要塞，站在被壓迫的愛爾蘭人的立場方面，固然需要脫離英國而獨立；同時，站在壓迫民族的英國無產階級以至英國民族的立場方面，就要努力於援助愛爾蘭人民實現脫離英國而獨立，這是解放愛爾蘭民族，同樣也是解放英國無產階級的本身。因為：

一，愛爾蘭不僅是英國貴族財產的主要來源，而且是他們極大的精神力量。英國貴族藉助於愛爾蘭這個工具的幫助之下，才在英國保持他的統治力量。

二，假如明天英國的軍隊離開了愛爾蘭，則愛爾蘭的土地革命，就要馬上開始。可是，英國貴族在愛爾蘭的傾覆，其必然結果，就要引起他在英吉利的覆沒，也就是造成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

三，土地問題是愛爾蘭大多數人民的生死問題，是與民族問題分不開的。在愛爾蘭推翻英國的土地貴族，較之在英國去推翻他，是比較容易的舉動。

四，『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民族』。『英國工人階級，如不擺脫愛爾蘭，他便一點也沒有辦法。』（以上參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二卷馬恩關於愛爾蘭的通訊）

因此，馬克思一方面號召英國工人階級來極力援助愛爾蘭，贊成其脫離英國而獨立，『那怕分立以後變為聯邦』；另一方面極力告訴英國無產階級，『要求與愛爾蘭斷絕現有的關係』，即是要求他打破對愛爾蘭的狹隘的『大國主義』，這種『大國主義』正是英國資產階級、貴族欺騙英國工人仇視愛爾蘭人的精神武器，也就是幫助敵人來束縛自己的武斷工具。

馬克思這種政策，雖然在爾後愛爾蘭的歷史發展中並未成為事實，但是，這種政策在當時是完全正

確的，是完全實際的，而且是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不過由於愛爾蘭本身力量之不足，領導之人，特別是英國工人階級長期處於自由派的影響之下，做了他們的尾巴，遂使愛爾蘭的民族運動不是走上革命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改良的道路。結果不是愛爾蘭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而是形式上自治、實際上仍被束縛於英國，直到現在亦如此。

列寧說：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眞正以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了羣衆。只有這種政策曾能使愛爾蘭及英國都不至於將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至於由自由派爲反動勢力着想而來損傷這個改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做了一個最偉大的有實際意義的榜樣，指示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付民族運動；警戒他們不要沾染各個國家、各個種色以及各種言語的小資產者所持有的那種「奴隸式的急燥性」……

愛爾蘭及英國無產階級如果沒有採納馬克思的政策，沒把愛爾蘭獨立作爲自己的口號，他們就犯了最惡劣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忘記了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向英國反動勢力及資產階級表示了讓步。』——（『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七卷）

第六節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　以上各節，我們敘述了歐美民族運動的歷史，同時敘述過馬克思、

恩格斯，對於具體國家的民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現在，我們就來將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與策略，作一個總合與簡要的說明——說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現在，首先說到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族問題在方法上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

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問題，猶之對於一切其他問題一樣，決不是抽象的、機械的、片面的提法，而是歷史的、辯證的、具體的提法。就是說，把一定問題，放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國家或民族，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情勢之上，找出民族運動的一般規律性；同時把握到某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社會情勢中的具體特點；針對這一般性以及特殊性，具體地提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策。這正是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所首先着重說到的：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無條件的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一國（例如講到該國的民族綱領），則還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之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特點。』（『列寧選集』第七卷）

什麼是民族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呢？

第一，馬克思提出民族問題時，首先就要區別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國家民族：（一）他對於同一時代之不同國家的看法不同。例如，同樣是一八四八年的時代，他對波蘭人與其他斯拉夫人的看法不同；同樣是一八七〇年，他對普魯士與法蘭西的看法又不同；（二）他對於不同時代之同一國家或民族的看法不同。例如，波蘭還是波蘭，馬、恩在一八四八年時，擁護它的民族運動；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五月時，又認為它是『大胆的荒唐行為』；而在六十年代又熱烈的擁護它。這猶之，同樣是一個捷克斯

拉夫人，馬、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反對它的民族運動，而到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又擁護它的民族獨立一樣。看法不同，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同。

第二，就是要區別不同的民族運動的本質。在表面上看來，同樣是一個民族運動，是一個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運動，並且有時還是同一個民族的民族運動；然而在本質上，如果這個運動，是擁護當時的民族侵略者的，都是帶反動性的，不管這個運動在形式上，標榜如何漂亮的民族詞句。例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反之，如果這個運動，在形式上，還是貴族領導的，非民主的，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的，而在實質上，這個運動仍是革命的。例如十七世紀四十、六十年代的波蘭。本質不同，看法不同，自然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同。列寧說：「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僅僅當這運動眞正是革命的。」（一九二〇年在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的報告）其意思就是如此。

第三，就是還要區別不同民族與不同階級：（一）區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對前者無條件的反對，對後者只要它是革命的，就加以擁護；（二）區別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前者無條件的反對，對於後者則不然。例如：意大利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及開始時，曾經也積極參加民族鬥爭，馬克思贊許之；而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及爾後不久，又由動搖轉爲與敵人妥協，馬克思則反對之；既至五十年代又能回頭參加並領導民族鬥爭時，馬克思又認爲它是革命的。此地還可以引證到一九〇三年列寧論波蘭問題，雖然當時的波蘭是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雖然當時波蘭的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的，但是列寧毫不輕視波蘭還存在民族矛盾，認爲波蘭的資產階級，在某種局面之下，還可能站到獨立方面來。列寧這樣說：

「現在的波蘭問題情形與五十年以前根本不同了。可是現在這個情形是不能常着永久的。無疑的，現在的階級衝突已把民族問題遠遠的推到在後面，可是，還不能絕對肯定的說（如果不想陷於理想主義的話）：某個民族問題，就不能暫時出現於政治舞台前面。無疑的，在資本主義未顛覆之前，波蘭的恢復只有極少的可能性；可是不能說，它絕對沒有可能，不能說，波蘭資產階級不能在某種局面之下站到獨立方面來。」（「列寧選集」第三卷，「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文）

這就是說，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但是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具有他的特點。雖然他隨時具有與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去謀妥協的妥協性，甚至在某種情況之下，寧可倒到民族敵人方面來共同壓迫革命；然而，到底他還是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在民族壓迫之來，使他不能再行退讓忍受時，他也有可能重新站到謀民族獨立這個方面來，實行民族革命。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對他也有看法與策略之不同。

（三）區別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同樣是一個無產階級，但是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間也有不同之點。卽是說要區別他們中間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或精神上的區別（參看「列寧選集」第九卷）馬克思曾在愛爾蘭問題上，說服與教育英國的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他們中間存在的大國主義，要他們脫離英國資產階級的民族欺騙，斷絕對愛爾蘭人的仇視態度，贊助愛爾蘭的解放等等，並對他們兩方指出不同的任務。又如，在普法戰爭時，在普方自衛與法方侵略時，馬克思要求法國工人「反對國民投票」，號召德國工人擁護自衛戰爭。而在反過來——法方自衛，普方侵略時，馬克思又要求法國工人：「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不智的絕望的蠢舉。」而對德國工人則號召他們起來反對德國的侵略戰爭。（四）區別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同樣是一個被壓迫民

族的人民，但是在被壓迫民族中；既然有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則對於這兩個階級決不能看成一樣。這兩個階級在共同反對民族壓迫時，在革命的民族意義上，卽在求民族獨立、民族統一與民族建國的事業上，一般說來，是可以聯合，可以一致的（還要看具體的時代與具體國家）。但是，在另一方面，是大不相同了。如：（一）無產階級能夠一貫地、徹底地、爲民族事業奮鬥到底，資產階級則可能在中途動搖或退出革命，又可能在退走之後重新回頭來參加革命。但缺乏堅持性與徹底性。（二）無產階級要求實行民主、民生，發動全民力量，保證民族主義之完全勝利；資產階級可能只要民族主義，不要民主、民生，控制民衆運動，使民族主義不能徹底實現。（三）無產階級不僅爲徹底的民族解放而奮鬥，並且還要爲全人類社會解放，亦卽爲自身最終解放而奮鬥；資產階級則否；他至多只願意民族解放勝利，只願意把持民族運動勝利的成果，作爲本階級包辦統治的工具。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普國自衞戰爭中，警告德國工人階級『把德國民族的利益與普魯士皇朝的利益分開』。一方面號召德國工人進行自衞戰爭，另一方面又揭發俾斯麥的陰謀，不要使之『蛻化爲侵略戰爭，而趨毀滅之路』。在巴黎被圍開始，法國變爲自衞戰爭時，馬克思一面號召法國工人『應完成他們公民的義務』，同時要求他們『更切實地鞏固本階級的組織』去爲法蘭西新生命與我們無產階級解放的共同事業而鬥爭。（『法蘭西內戰』）

因此，在列寧所提出而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殖民地問題決議案上，曾經這樣說過：

『共產黨對於民族問題：第一，不以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則爲觀點，而以歷史的具體的尤其是經濟的形勢爲觀點。第二，要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從全國的普遍人民的利益區別出來。第三，把被壓

迫的民族的獨立的、無法律平等的民族，同壓迫的民族區分開來。」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方法上的基本精神。

民族問題之基本理論的出發點　民族問題在理論上之基本出發點就是：對於壓迫民族說來，壓迫其他民族的，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對於被壓迫民族說來，民族未得到解放，社會就不能解放。總的方向，是為了人類社會亦即無產階級之最終解放。

既然，民族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民族壓迫民族，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馬克思不僅說「人壓迫人」——「階級壓迫階級」，而且說到「民族壓迫民族」。在資本主義社會未顛覆以前，民族壓迫是不可免除的。同時，既然有了民族壓迫民族，則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的馬克思主義，在他的理論與綱領中，不僅要最終消滅階級的區別，而且要消滅民族的區別，不如此，則不能實現其必然到來與最終奮鬥的目的。怎樣才能消滅民族的區別呢？首先要求得民族接近與民族融合。怎樣使民族接近與民族融合呢？要首先求得民族的真正平等。怎樣才能求得民族平等呢？一方面要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與勞動民衆起來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需要被壓迫民族人民起來打倒外國民族的壓迫；總之，要共同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若不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則一切民族的平等與階級的消滅是不可能的。」（列寧：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殖民地問題決議案」）

現在，首先說到壓迫民族方面：究竟壓迫民族的統治，是建築在什麼上面呢？固然，它一方面還依賴於壓迫與剝削本國的勞動階級與廣大民衆；同時非常重要的，是依賴於壓迫被壓迫的民族。它從被壓迫民族中，攫取無數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力量，來維持在本國的統治；藉此以增強對於國內無產階級的

壓迫，以及對於無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收買；同時，也就藉此來增強它對被壓迫民族的壓迫。因此，有了被壓迫民族的存在，有了本民族之壓迫其他的民族，則本民族的統治階級，就更有力量，就更加厲害的來壓迫本民族人民，特別是無產階級；因而造成本民族是不自由的，「是何等的不幸」。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羅斯只差一步……看了愛爾蘭的歷史，就可以知道，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的民族，它自己是何等的不幸。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由愛爾蘭問題而發生的。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對於我無疑義的是：如果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建立軍事統治和創造新的貴族，那末，英國的情形就採取了另外一種局面。」（見「列寧選集」第七卷「論民族自決權」的引文）

這就是說，英國是一個壓迫愛爾蘭的民族，英國從愛爾蘭方面獲得了維護新貴族統治的力量，促成了英國工人仇視愛爾蘭人的心理，結果也就發生了英國的卑鄙現象，加重了對英國工人的壓迫，使英國不能早些走上「另一種局面」，不能早些獲得英國工人階級的解放與英國民族之眞正自由。所以恩格斯說：「一個民族奴役了別的民族，它自己是何等的不幸。」

次之，在被壓迫民族方面，當着自己民族的經濟政治權力，都操縱在（或者被箝制在）壓迫民族手中，整個民族都處在火熱水深的陷阱之中，無產階級要求得本身的解放，必須首先推翻民族的壓迫，取得民族的眞正獨立與自由，然後工人階級才能順利的發展組織與強大自己的力量，才能夠創造出爲社會解放而鬥爭的乾淨的便利的地盤，才能便於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不首先求得

民族的解放，則無產階級的社會解放，是無從說起的。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給馬克思的通信中說道：

『依我看來，大局的形勢如下：德意志爲着民族的生存，因巴登極（Bodingnet，卽拿破崙第三之混名）而出於一戰。德意志如屈服於巴登極之下，則邦那帕特主義，在許多年中便鞏固了，而德意志在許多年中——或許多代中——便敗滅了。至於德意志工人運動更無從說起，因爲一種企圖民族生存的爭鬥將耗去一切精力，德國工人最好也不過落在法國工人的窠臼中。德意志如果勝利，則法國邦那帕特主義一定敗滅，而那種因德意志統一的長久紛擾畢竟也破剷除，於是德國工人可以在一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民族標準上組織起來，法國人也一定會比在邦那帕特主義之下，獲得一種較爲自由的地域。德國各階級的人民的全部羣衆已經看出了他們首先當注力於民族的生存，才可以因此馬上抬起頭來。』（見『馬恩通訊集』）

這就是說，當德意志處在法國侵略之下，德意志工人，一定要首先取得民族的生存，打倒法國的侵略，然後德國工人及德國全體民衆才能抬起頭來。不然，如果德國因戰敗而滅亡，德意志民族已不能生存，則德國工人運動更無從談起。

我們還可以引證恩格斯在七十年代論到西班牙問題時，也曾在他所著的『共產主義與巴枯寧主義』一文中說道：

『西班牙是一個工業很不發達的國家（按西班牙亦曾處在法國拿破崙第一，拿破崙第三的侵略蹂躪之下。一八七三年三月，西班牙只在表面上宣佈爲共和國），所以說不上勞動階級的卽刻解

放。在這種解放未實現之前，西班牙還須有預先幾步的發達，並且還須把許多障礙物除去，在最短期的時間內，踏過這預先的幾步，並迅速除去這些障礙物——這種機會共和國已曾獻出來了。西班牙的勞動階級，只有藉實際參與政治的力量，才能夠利用此機會。」

可是當時些班牙雖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然而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亦更必須眞正去肅淸這民族的與內部的障礙物，取得眞正民族獨立民權自由，然後才能夠達到自己社會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堅決反對巴枯寧派在西班牙所舉行的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尤其是一八七三年），他們不估計到西班牙的民主革命還未完成，企圖以少數人的「英勇」行爲以號召一個總同盟罷工，就可以推翻現政權，而立刻達到社會主義。所以恩格斯在以上這篇論文中，曾經這樣批評巴枯寧派：

「他們的根本錯誤原則，就是以爲勞動者除了無產階級即刻得到充分解放的革命之外，其他革命不可參加………結果除了對於革命鬥爭的工具作一種無辦法的和一種無意識的破壞之外，一無所有。」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之理論上的出發點，就是如此。

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策略　根據以上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在方法上在理論上的基本出發點，現在我們就來講講馬、恩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的具體的策略。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怎樣具體的來解決民族問題。列寧曾在「論民族自決權」一文的結論中說道：

「民族完全不等，民族有自決之權，各民族工人溶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全世界底經驗和俄國底經驗，把這個民族問題綱領教給工人們。」

可見，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策略，就是：

一，民族完全平等，民族有自決之權；

二，各民族工人團結起來。

這個基本策略，就是根據前面所說的出發點而來的。現在，就來分別講到這幾個問題。

第一，民族自決。馬克思主義民族綱領上的民族自決就是政治的自決；國家的獨立；民族國家的形成；決不能有其他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民族在政治上有隨意脫離壓迫民族的自由權，就是用民族自決的方法來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

馬克思根據「壓迫其他民族的、不是自由的民族」的出發點，得出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以至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必須切實贊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即民族自決。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根據德國工人運動的利益，要求德國勝利的德謨克拉西，宣告並實行被德國所壓迫的民族的自由，他們不僅一般地要求德國人援助波蘭的人民解放運動，而且具體的要求德國與俄國一戰，這樣才能眞正幫助波蘭民族的解放，實現波蘭民族的自決；同時堅決揭露與打擊德國的資產階級之口頭上宣言幫助波蘭，實際上去把波蘭作爲德意志領土的吞併政策。在普魯士資產階級叛賣革命，並幫助俄國去壓迫征服波蘭民族運動時，馬克思是極力號召工人階級以示反抗。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爲英國工人的革命鬥爭起見，要求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在愛爾蘭未脫離英國而獨立之前，「英國工人階級連一點辦法也沒有」。並且要求英國工人的黨，把愛爾蘭獨立一條成爲自己的黨綱。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寫信給恩格斯說：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做些什麼呢？我以爲他們應當把聯盟破裂（所謂聯盟，就指英國與愛爾蘭

聯盟，所謂破裂聯盟，就是指愛爾蘭脫離英國），作爲自己綱領內的一條，這就是愛爾蘭解放底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愛爾蘭所需要的是：（一）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爲了要使愛爾蘭脫離英國獨立的行動，能夠成爲現實，甚至於補充說過，只要愛爾蘭能夠脫離英國而獨立，「那怕他將來弄成聯邦」。

此地應當說明，馬克思爲了要達到愛爾蘭的民族獨立，容許愛爾蘭與英國「弄成聯邦」，但是馬克思決不是聯邦主義者，而是集中主義者。馬克思不贊成聯邦主義，並不等於他絕對反對聯邦主義。此地，馬克思把聯邦主義看成是「達到完全民主主義的集中主義」的唯一道路；就是說，「與其民族不平等，則不如聯邦之爲愈」；就是說，與其讓愛爾蘭受到英國的直接壓迫，亦寧願愛爾蘭與英國有聯邦制度。這種聯邦主義也是達到愛爾蘭的完全德謨克拉西的集中主義的可以採取的過渡形式。不過，馬克思的中心策略決不是聯邦主義，而唯一是愛爾蘭的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的完全民主的集中主義。

同時，還要說明，無產階級要堅持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那怕這個民族在反對某一個強大壓迫民族的鬥爭中，可能有被其他另一個強國所利用，這時也少能放棄承認其民族自決權。列寧在揭破那般藉口這種情況來拒絕承認自決權的分子時，就這樣說過：

「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底民族解放鬥爭，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被其他另一個「大」強國所利用，以遂其同樣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情形，少能逼迫社會民主黨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猶之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的口號以達其政治欺騙和財政掠奪之目的，這種情形，不能逼迫社會民

主黨放棄自己的共和主義是一個樣子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馬克思堅持這個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一方面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蒲魯東主義者作鬥爭，因爲他們「爲着社會革命」而「否認了」民族問題，因爲他們把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看成與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的解放無關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反對英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所傳染到工人中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是帶着輕視甚至仇視愛爾蘭人的心理。馬克思把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壓迫其他民族的、不是自由的民族——提到第一位，也就是堅決贊助民族自決。

列寧堅持與發展了馬克思這種政策，曾經這樣着重的說道：

「馬克思只有提出這樣的要求，才以國際主義的精神眞正教育了英國的工人，只有這樣馬克思才能把這歷史任務之革命的解決與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對立起來……只有這樣，馬克思才會能並且在民族問題之解決方面，也拿羣衆的革命行動與那種口頭上的和往往是假仁假義的承認民族平權和民族自決權的態度對立起來。」（「列寧選集」第九卷）

「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不能只限於用籠統的千篇一律的爲各個和平的資產階級所重複的空話，去反對呑併與贊成一般的民族的平權。……無產階級不能不反對那種強迫被壓迫民族歸併於某國版圖以內的政策，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不能不爲自決權而鬥爭。無產階級應當要求：爲「本」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上分立的自由，否則無產階級底國際主義只是一種空話，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底工人之間卽不能有相互的信任與階級的團結，而民族自決底改良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的擁護者的假面具還是沒有揭破。」（「列寧選集」第九卷——「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第二，各民族工人階級的團結。壓迫民族的工人應當堅持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團結，而這種團結是以贊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爲前提的。當法國進行侵略戰時，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宣言上最後指出：「在官場的法蘭西與官場的德意志進行自相殘殺的搏鬥時，工人們却相互致送和平與友愛的感詞。」這就是說，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應當在侵略戰爭中堅持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實行堅固的團結，主張本國政府的失敗，主張被壓迫民族的自決，來表示自己工人階級的團結。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亦應當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謀團結，堅決不渝的贊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以達到打倒共同的敵人——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最終目的。

特別在被壓迫民族方面，更加要堅持這個原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要在堅決爲解族本民族的鬥爭中，絲毫不能有仇視壓迫民族之工人階級的心理，要與他們及全世界工人團結。不要忘記，被壓迫民族的工人與壓迫民族的工人與其他國家工人的團結，是解放自己被壓迫民族之必不少的勝利條件。不要忘記，推翻民族壓迫者，是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共同事業。不要只限於本民族解放之自自的現象，解放了本民族，還要繼續爲解放本階級而鬥爭。不要忘記，各國工人階級共同奮鬥的目標，是消滅階級與民族的差別，是共產主義新社會。馬克思在普法戰爭中，完全贊成站在自衞方面的國際柏林支部對巴黎支部的回答：

「我們以十二分誠意擁護你們的抗議，我們敢立大的誓言，任何軍號的響聲，任何大砲的轟聲，任何勝利，任何失敗，都不能使我們拋棄我們共同事業——全世界工人聯合的事業。」（見法蘭西內戰」）

「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給馬克思的信中所提出，而爲馬克思、恩格斯在普法戰爭開始的基本策略，就是，一方面承認普國是自衛戰爭，同時要求德國工人政黨，應當「不停的鄭重主張德國與法國工人團結起來」。

沒有這種被壓迫民族工人與壓迫民族工人之親密團結，是不容易從雙方來夾擊敵人取得更快更大的民族解放勝利的。也只有這樣親密團結，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勝利就能成爲社會解放之第一步的勝利。因此，列寧又告訴我們：

「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特別堅持和實行那種壓迫民族的工人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完全的、絕對的統一；組織上的統一也在內。沒有這種統一，則在資產階級底一切妥協叛變和欺騙之下，就不能堅持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該國無產階級就不能與其他各國底無產階級實行階級的團結一致。」（「列寧選集」第九卷）

無產階級在民族自衛戰爭中的任務 如果這種戰爭是反對民族侵略的敵人，是爲貫澈自己民族解放統一的事業，是爲打擊、削弱與消滅當時侵略者的力量，則這種戰爭，無疑義的是革命的、自衛的、正義的戰爭。對於這種民族自衛戰爭，壓迫民族及其他國的無產階級應當切實的加以援助，特別是在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應當用「敗北主義」，主張本國政府的失敗，以來具體援助被壓迫民族。至於在被壓迫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其最中心的任務，就是要竭力爭取本民族自衛戰爭的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普法戰爭所給予我們的正確的模範的策略，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在民族自衛戰爭中，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的主要任務是：

第一，被侵略國家的工人「應當完成他們公民的義務」。馬克思根據上述對民族問題的基本策略，在普法戰爭末期，法國轉爲自衛戰爭之時，曾經這樣警告法國工人：

「法國工人階級現在是處在最困難的情況之下，正在敵人敲着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不智的絕望的蠢舉，法國工人們應當完成他們公民的任務，但不應爲一七九二年的民族回憶所誘惑，如像法國農民爲第一帝國的民族的回憶所欺騙一樣。」（「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根據當時法國情況的具體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敵臨城下，工人們不應該起來推翻自己的政府；第二，但是當時法國的政府是以退爾爲首的政府，這個政府一開始就是私謀與俾斯麥妥協出賣法國。所以，馬克思要他們不要一般地去重複過去法國大革命時之「祖國危殆」的口號而受到誘惑，要他們時時注意政府的叛賣行爲，同時還是要盡自己公民的義務。這就告訴我們：（一）被侵略國的工人應該成爲抵抗侵略的中堅分子，猶之在普國自衛戰爭中，普國工人成爲抵抗侵略的柱石一樣；（二）在被侵略國中，工人應該對自己的祖國，負公民應有的責任，應當保衛自己民族的祖國，打倒敵人的侵略，同時要監督政府，不讓自己的祖國爲如退爾這樣的人所出賣；（三）巴黎工人「容忍他們（指國防政府的首要人物如退爾等）的僭位行動，完全是以他們利用這政權在保衛祖國這一點爲條件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因此，馬克思認爲在大敵當前之下，法國工人不應當推翻政府（雖然他們實質上是企圖投降——然名義上還是要保衛巴黎），應當去盡公民的義務。可是，在退爾政府的叛賣行爲已經暴露，「羣衆已經起來時，馬克思就和他們一起前進」。（列寧）這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被侵略民族的工人去保衛祖國的。而他的「工人階級無祖國」（「共產黨宣言」）的口號，則是指壓迫民

族而言，指民族問題已經解決而資產階級已經統治了政權的國家而言；在這般國家，工人們除了直接創造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祖國之外別無出路。而在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與國家，這裏的工人階級應當去保衛祖國，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在抵抗民族侵略與謀民族解放的條件下，工人階級應當有條件的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但同時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就早已指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這個光明磊落的政策，在那裏說：

『共產黨人到處都在努力於一切國家民主政黨的聯盟與團結。

共產黨人鄙棄把他們的立場與意見隱蔽起來，他們公開聲明他們的目的。』

這就是說，在一般民主革命運動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這裏的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人，就應當在抗敵救亡與建立獨立自由的民主國家的條件上，可以而且應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建立聯盟。這種聯盟的目的，爲的是要強固民族的力量，爲的是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爲的是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但同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聯盟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因爲（一）無產階級今天爲了民族解放而鬥爭，將來還要爲着社會解放而鬥爭，沒有這種獨立性是不行的；（二）無產階級是民族解放的最堅決最澈底的先鋒隊，沒有他的堅持性與澈底性則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保證是缺乏的；（三）打倒侵略者是有賴於被壓迫民族的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之共同努力，沒有這種獨立性是不容易謀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來順利打倒侵略戰爭的。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號召德國工人來堅持自衛戰爭時，同時指出德國民族與俾斯麥之分別；在警

告法國工人不要推翻政府時，同時要他們不爲退備的背叛所欺騙。他的中心意思是什麼呢？就是爲了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就是爲了堅持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不致使民族自衞戰爭，可能爲資產階級的中途動搖與妥協所出賣，不致使民族解放的勝利，變成少數人的特權與私利。

列寧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立場，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殖民地決議案上這樣說到：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地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持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尙在萌芽的形式。』

第三，爲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而鬥爭。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在反對民族侵略的自衞戰爭中，究竟爲什麼樣的政權形式而鬥爭呢？換句話說，在民族自衞戰爭勝利之下，應當成立什麼樣的國家政權呢？如果說，在壓迫民族中民族國家已經成立，資產階級已經獨持統治，亦卽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的國家，無產階級所爭取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共和國；那麼在民族還未獨立，民族國家還未建立，卽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還未完結的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所爭取實現的，則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爲了德國革命勝利的需要（卽剷除君主政體與民族統一），卽明白提出『無產階級政黨主張有建立單一不可分離的德意志共和國之必要』。（『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在當時『新萊茵報』主要的綱領之一，就是『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之後，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在起草的『共產主義同盟告同志書』中，仍然指出『無產階級不僅應當堅持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而且要達到把力量掌握在國家政權手中底最堅决的集中主義』。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國際第二封告同志書中，最後向一切國家工人階級提出『共和國萬歲！』的口號，這

對於被壓迫民族工人說來，就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此外，在意大利問題中，馬、恩堅決贊助加里波的「民主共和國」的政綱，而指斥馬志尼的民族機會主義，因爲他不但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政黨表示消極，而且事實上是幫助了加富爾之君主立憲派的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旣把民主共和國作爲被壓迫民族的所需要的政權形式，那末，這種民主共和國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權實質呢？我們應當說，這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實質就是：

第一，是民族完全獨立的。即是說，完全解除了民族壓迫，取得了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而且保障這種民族獨立與自由。這種共和國，一方面不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就是說，一方面不受外來民族的壓迫，同時也不去壓迫國外與國內的其他民族，對內對外，都處在民族眞正平等的地位。

第二，是民權完全平等的。即是說，在這民主共和國之下，國內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大家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都有參加政權的自由，各級官吏都是民選的，對民負責的，不負責者可依民意更換之。也就是說，實現眞正是大多數民衆有權利的民主政治，不是少數人壓迫大多數國民的政治武器，是各個革命階級共管共享的國家政權，不是那一個階級特出包辦的國家政權。

第三，是能改善民衆生活的。民主共和國並不取消財產私有制，但是，必須使國民大衆都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有事做。在這中間，自然是使農民有田耕，廢除苛雜重担；使工人有工做，改善勞動條件；使貧苦學生能讀書，做到對他們的免費教育；使各界職業者都能因才而用。也就是說，人民生活

得到改善。

民主共和國的實質即在於此。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民主共和國，並不是舊日的法蘭西共和國，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批評考茨基的「福特綱領」時，說明了自己所主張的民主共和國。他說：

「……這樣說來，是統一的共和國，但這不是指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而言；法蘭西共和國並非別的，只是一七八九年所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每一個省份和每一個鄉里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也是我們應該有的。」

恩格斯的意思，是說那時法蘭西共和國，只不過是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的國家，只不過是沒有皇帝的共和國而已，但是不是眞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只是在法國一七八九——一七九八年的各省與鄉村中才是民主主義的，但這些不過是局部與暫時的現象而已。在歷史上，那些民族問題已經解決，資產階級已經奪得政權的共和國，眞正說來，都不是民主主義的，而只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而已。至於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要求的共和國，則是各階級參政民衆都有利益的民主主義共和國。

這個共和國，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取消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達到並實現消滅階級並準備走向高度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的國家形式。至於前面所說的民主主義共和國，仍然是不超過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範圍，其經濟基礎，仍然是建築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上，而且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這種共和國，自然還不是取消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要求的共和國，既不是推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剛剛是還不超過資本主義範圍、能謀全民族全人民共同利益之民主主義共和國。

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宣佈自己需要這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眞正要爲這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而鬥爭。但是，這裏的無產階級，同時也不絲毫隱蔽自己的獨立政治面目，即是說，無產階級不僅要第一步爭取民主主義共和國，而且要第二步爲社會主義共和國而鬥爭，最終還要爲實現全世界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民主主義共和國較之社會主義共和國其民主與進步成分是相差甚遠，但較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其民主與進步成分却是要多得多。民主主義共和國正是無產階級在完成民族獨立之後所應爭取的政權形式，同時民主主義共和國也就是走到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近便途徑。

恩格斯繼續上面的批評時說到：

『……這裏有一點是絕對無疑問的，就是我們的黨與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即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特殊的形式（列寧解釋這點，說道：「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最近便的途徑」）。』（以上是『國家與革命』引文與解釋）

並且，根據列寧的解釋，在這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之下，在人民的民主權利自由的條件之下，是可以『想像的』和平的轉到社會主義。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文中，一方面說到恩格斯的意見，『正因爲那時德國缺乏共和國與自由，所以「和平」道路的幻想簡直是荒謬的』，但同時又說道：

『恩格斯十分小心地使自己不致擊肘，他承認在共和國或極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和平的發展到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十二卷『國家與革命』第四章第四節）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此地就來說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我們所說的國際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換句話說，就是爲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全部的革命鬥爭的理論與策略，就是爲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主義。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換句話說，就是馬克思的民族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中之局部的民族革命鬥爭的理論與策略，就是爲推翻民族壓迫與實現民族之眞正獨立自由平等的主義。無產階級全部的國際主義，包含局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後者正是前者的組成部分；實現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正是實現無產階級全部的國際主義之必要步驟；也只有實現無產階級全部的國際主義，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才能最終與徹底的完成。具體說來，馬克思主義指出壓迫民族及其他國家工人階級應當堅決贊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實行與被壓迫民族及各國的工人團結，這就是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民族問題的策略，亦即他們的國際主義。同時又指出，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應當堅决去爲本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鬥爭，實行與壓迫民族及其他國家工人的團結，這就是這樣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亦即他們的國際主義。『工人無祖國』是針對那些壓迫民族或國家的無產階級而言，這裏的無產階級，應當用推翻本國政府來贊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這是他們應有的國際主義。『應當盡公民的義務』，這是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而言，這裏的無產階級，應當來保衛自己的祖國，爲澈底的民族解放而鬥爭，這是他們應有的民族主義。總的目的，無論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都是或先或後的爲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全部的或最高的國際主義。

這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相互關係。

至於說到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那我們就要認清：在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對自己的民族，沒有任何民族主義，就只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在侵略戰爭中，是主張本國政府失敗的『敗北』主義，這裏只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絕對對立。然而，在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對自己的民族，不但有民族主義，而且他的民族主義是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的革命政綱上，可以相容，可以一致的。亦猶之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一定革命的政綱上，可以相容，可以一致的一樣。而且無產階級的政黨，可以去爲這樣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整個的民主主義之澈底實現而奮鬥，爲什麼呢？因爲：（一）反對共同敵人；（二）向着最近的共同目標前進；（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澈底實現，是無產階級澈底的民主主義勝利的先決條件；（四）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只有在與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結合，才能充實，才有力量，才能夠澈底實現。在這兩個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民主主義中，存在有他們的共同點，這種共同點正是這些不同的革命階級可以結成聯盟的根據。

然而，常常使人易於忽略的，就是在被壓迫的民族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間存在有他們的不同性，亦猶之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都存在有他們的不同性一樣。什麼是不同的地方呢？（一）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能夠澈底的完成民族解放，因爲無產階級是被壓迫民族中最受壓迫的階級，而且有全部科學的澈底的馬克思主義以爲指導。資

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常常不能澈底的完成民族解放，因爲資產階級是被壓迫民族中統治的、至少是受壓迫最小的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力量強大的被壓迫國家或民族，其中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更大。如果說，在美國，部分說來在法國的民族運動中，資產階級可以完成他當時的民族革命，但在十九世紀以來，因爲無產階級力量之發展，歷史證明，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就不能至少是難於單獨勝任了。(二)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與無產階級的全部民主主義接連不分的，而且是願爲全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的，因爲要澈底完成民族主義，必需實行民主主義以至民生主義，然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整個民主革命才有勝利的保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有時拋棄民主主義，更不去談民生問題；有時存在全部民主主義，但不願去眞正的全部的實現它，因爲他愛好獨佔民族主義的領導與勝利，而不願民衆分肥，特別是懼怕無產階級力量之發展，這種單純的或空洞的民族主義自然就缺乏勝利的保證。(三)實現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實現無產階級澈底的民主主義之基礎與前提。無產階級實現了他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還要去實現他的澈底的民主主義——卽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則不然，卽令他的民族主義實現，也難於實現他全部的民主主義，卽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也談不到再進一步了，這時，他不可免的要被歷史淘汰了。這也就決定了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之澈底性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之不澈底性。

被壓迫民族的共產黨人，要認清這一點，所以他的民族主義，雖可以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民主主義在一定條件下，攜手前進，然而他決不能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民主主義混爲一談。如果說把兩者融爲一體，那便是十足的糊塗。所以這裏的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中，應當保持其獨立

性，只有這樣，則民族解放的事業，才有勝利的保障，只有這樣，則無產階級走完了第一步，才能走上第二步。

至於再說到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問題，這也是與本題有關的。有人說，有了對外的民族鬥爭，就不存在民族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樣說法是不合乎歷史事實，不合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上既然存在階級，既然存在階級鬥爭，這種階級與階級鬥爭，並不因爲有了對外的民族鬥爭而忽然取消，並不能劇然隨着人意把它取消。民族之內既然有階級，民族鬥爭中仍然存在着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隨階級而產生，老早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的。它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火車頭，過去有階級鬥爭，今天有階級鬥爭，將來仍然有階級鬥爭，只有階級消滅，階級鬥爭才隨之消滅，而這正是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標。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正表現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之民族主義之不同點上面；正表現在統治階級之極力控制民衆，抑壓民主，不願改善民衆生活上面；正表現在無產階級與廣大民衆之要求民主要求民生這樣才利於民族鬥爭上面。在革命的民族聯盟中，階級鬥爭，正表現在不同政黨之磨擦、鬥爭，有時走到破裂上面；正表現在資產階級政黨之極力防範、限制與排擠無產階級政黨上面；正表現在無產階級政黨之力圖民族鬥爭的澈底勝利有所要求與統治的政黨上面。總之，在民族鬥爭中，階級與階級鬥爭仍是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告訴我們，即大而言之，民族利益是服從階級利益（壓迫民族的工人要反對本民族統治的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的工人，要在完成民族解放之後，走上無產階級的民族聯合——以期共同達到解放無產階級之最終目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告訴我們，即小而言之（即對被壓迫民族工人階級言之），階級利益要服從民族利益（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必須首先爭取民

族鬥爭的勝利）。這就是說，共產黨人在壓迫民族中，應當指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且還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時就應當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應當指導階級鬥爭去服從民族鬥爭，應當儘可能使存在的階級鬥爭不要發展到障礙民族鬥爭，使存在的政黨間的磨擦不致去危害民族聯盟。然而共產黨人，旣沒有權去製造階級鬥爭，也沒有權去取消階級鬥爭，也不會去放棄階級鬥爭，更沒有權去干涉與取消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對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不過這裏的共產黨人，根據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亦卽國際主義，能夠指導無產階級的鬥爭去適應民族鬥爭，他不僅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且是民族的代表。可是，這裏的資產階級及其他的政黨却要擴大他們階級鬥爭，毫不讓步的去與工人農民及工人政黨鬥爭，以致妨害民族鬥爭，有時分裂民族聯盟，那又怪誰歸誰負責呢？至於在民族矛盾佔主位時特別是在民族抗戰中有人打起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冒充代表無產階級，故意把階級鬥爭提到第一位，來破壞民族抗戰來分裂民族聯合戰線，這自然是民族鬥爭的敵人，同時也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這就是在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之對立的統一，只有這樣來了解其中關係與運用這一原則才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西歐民族運動中，一面反對普魯東與巴枯寧的左傾錯誤，他們否認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爲國際主義就不能有民族主義，否認在被壓迫民族中，存在着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否認在這裏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一定條件下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可以符合，否認這裏的無產階級應當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奮鬥；另一方面，他們又反對德國拉薩爾派和意大利馬志尼

的右傾錯誤。前者認爲當時德國的民族統一事業，只要靠俾斯麥去幹就夠了，德國工人階級不應當有自己的獨立性，德國工人階級只要去跟隨俾斯麥走就完了，不應當有任何獨立的行動；後者是只願意追隨加富爾派（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之後，只迎奉加富爾派去領導意大利的統一，不願意發動民衆的獨立行動。所以兩者的錯誤，都是在被壓迫民族中，忽視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統治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區別，拋棄自己的獨立立場，一味去遷就統治階級的民族主義，專門去做統治階級的尾巴。總之，無論是『左』是『右』的錯誤，同樣是機會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所以馬克思公開指責拉薩爾『在客觀上背叛了工人運動與投降了俾斯麥』，爾後材料證明，拉薩爾是與俾斯麥有過勾結。

簡短的結論

總結起來，歐美的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給了我們一些什麼經驗教訓呢？

我們研究了這個時期歐美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的歷史，就很顯然地看出了：勝利的經驗教訓，失敗的經驗教訓以及總的經驗教訓。現在分別來說一說：

第一，什麼是勝利的經驗教訓呢？

在這個時期中，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是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勝利了的國家，從它們的勝利中可以看出這些經驗教訓：

一，這些勝利是從堅持長期的艱苦的抗到底的民族自衛戰爭所得來，而不是從屈服妥協投降所得來。美國有第一次七年獨立戰爭，第二次對英戰爭，第三次南北統一戰爭；法國也有幾年的對外戰爭，

德國也有三次戰爭，意大利又是四次戰爭，就是十六世紀的荷蘭，也經過對西班牙的戰爭，十七世紀的英國，也是經過對荷蘭的戰爭。這些戰爭在開始時，都是敵強我弱，敵勝我敗，都是從持久抗戰中，增強自己力量，削弱敵人力量；都是抗戰到底，中途不和平妥協，這樣最後才取得敵敗我勝的勝利。也只有這種持久的長期的抗戰，經歷百折不回的苦打苦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那一個國家的勝利，都不是從僥倖一時的「速勝論」中所得來，更不是從屈服妥協投降的「亡國論」中所得來。雖然這些國家在自己的自衞戰爭中，客觀上都存在這種危險，主觀上也有過這類險象之部分的發生，然而，他們確能堅決無貳的克服這種危險，達到最後勝利，尤其是美國的經驗教訓，特別明顯的告訴了我們。

二，這些勝利都是內部大體團結，同時堅決反對和平妥協中所得來。美國當時那種內部團結與堅決反對和平妥協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同樣，法國在「祖國危急了」的號召之下，是如何團結一致，上下一心，去對付國外敵人，其模範精神更無待論。就在德國，雖然階級對立很明顯，但擁護民族自衞戰爭時，還是相當一致的。在意大利雖然加里波的民主革命派與加富爾的君主立憲派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反抗侵略與統一意大利，大家意見仍是相同的。內部團結是戰勝外族侵略的先決與中心條件，然而這種團結，決不是無原則的團結，而是在「抗敵第一」的原則之下謀團結，凡是主張堅決抗戰的，就精誠攜手起來，主張和平妥協或賣國求榮的，就把他堅決驅逐出去。美國華盛頓之反對內部的妥協派，法國之同時驅逐本國的保王派、貴族與基倫特派，意大利之同時反對羅馬教皇，這都是爲了團結抗戰所採取的必須驅除內奸的正確步驟，不如此，就不能抗戰到底，就不能最終戰勝國外的敵人。

三，這些勝利都是離不開廣大民衆的參加。對外抗戰是全民族的戰爭，無論從軍、生產，無論前

方、後方，沒有廣大民衆參加，是決不能勝利的。美國戰局之轉敗為勝，是在組織五十萬新義勇軍之後；法國擊退外敵，是由於個個青年男子從軍，個個婦女參加後方工作，甚至老人做宣傳隊，兒童做看護生，卽是全體民衆參加抗戰所得來。德國、意國發動民衆是非常不夠，但致勝之路，沒有相當多的民衆參戰，是決不成功的。就是匈牙利的抗戰，貴族們也了解到也得要掀動農民起來。發動民衆參戰，有賴於民主政治之發揚，亦賴於民衆生活之相當改善，法國在這一點上做得特別好，所以，不怕當時內外敵人夾攻，不怕戰局那樣困難，但終能戰勝內外之敵。美國在民主政治與改善生活上，也有相當成績，不然就不會發動那樣多的民衆抗戰。德、意的情況不同，但為了作戰，統治者對民衆亦不得不施行些許讓步。總之，爭取長期抗戰勝利，必須發動民衆；發動民衆，必須發揚民主與民生，古今中外，此理正同。

四，這些勝利也離不了善於爭取外援。如果不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而專門依靠外援，或者主要依靠侵略者去反抗侵略者，這都是民族自殺主義，決不能勝利；但是，只依靠自己力量，絕對不去爭取外援，這又是民族左傾幼稚病，也不會勝利。正確的道理又是依據具體的國際形勢，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抗戰，但同時不絲毫放鬆爭取一切有利的國際形勢，孤立敵人，削弱敵人，以增強我之力量；抗戰愈堅持，自力愈強大，則國際幫助亦愈大，這是被侵略民族或國家在反抗某一個主要敵人時所不可缺少致勝的條件。美國的例子，就在於它善於利用英與法、西、荷諸國中間的矛盾，利用幾個國家特別主要法國的幫助，集中火力來反抗侵略的英國；英國勢力打倒後，自己的力量強大，他國也終得讓步，美國也終於獨立。法國自衛戰爭中，雖是同時打幾個侵略國家，但是打的辦法，也是用各個擊破。德國的外交用

得很巧妙，但亦逃不出「中立一個，聯合一個；先打這個，再打那個」的辦法，也就是利用敵人矛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辦法。意大利在一八五九年不正確的主要依靠了侵略的法國去打侵略的奧國，結果在當時還是達不到目的，延遲了解放之路，這是相反的例子。因此，爭取有利的外援，這是弱者戰勝強者的必要的手段。

第二，什麽是失敗的經驗教訓呢？

在這個時期中，波蘭、斯拉夫、愛爾蘭，都是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失敗的國家（在眞正獨立意義上說來，匈牙利也是相當失敗的國家），從他們的失敗中，可以得出這些經驗教訓：

一，依靠侵略者去謀民族獨立與建國者必失敗。斯拉夫的民族運動是標本式的例子，他們不靠自力更生，他們不去眞正結合自己的民族力量，他們不去與反侵略的民主陣線聯合，反而去做俄奧侵略國家的頑強工具，反而去幫助他們「爲虎作倀」，擴大侵略力量，反而去幫助侵略者鎮壓革命的民族的民主的運動，結果怎樣？在這個時期中，只能是『死亡的民族』，是反動的民族運動，是民族運動的失敗。這就充分教訓了今天在被侵略民族中，主張聯合侵略者。如果照他們這樣主張做去，就不免要走十九世紀斯拉夫人的道路了。

二，國內不團結，民主不講，民生不要，不發動廣大民衆抗戰者失敗。波蘭是標本式的例子。他們的民族運動，只由貴族領導，政治落後，民主民生是一點也談不上，廣大農民也不願去發動，結果，幾次民族運動就幾次失敗。匈牙利雖然好一點，但是民族運動領導者，總不願去眞正改革政治，發揚民主，改良民生，總不願去發動廣大農民，結果雖有好時機，而不能充分利用，一時勝利也不能堅固撑持，

稍一失敗，就易厥難振，結果，只有走到名則聯邦，實則受與左右的道路。愛爾蘭的例子，也說明了他們如何不能發動民衆，以致於勞而無功。這就告訴我們，一個落後的腐敗的國家，要踏上先進道路，去對抗一個強大侵略國家，而且還要去戰勝它，那末，只有堅決團結內部，改革政治機構，堅決發揚民主精神，使全國民衆都有發揚抗戰精神的機會，都能在抗戰中出一份智力與體力，只有發動全民族的人民起來抗戰，則抗戰力量，才算充實，才能源源補充，才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最後也需得盡量改善民衆生活，使民衆有物質的相當保障，得以在抗戰中充分供獻自己的力量。在抗戰建國之過程中，民族主義是與民主民生不可分離的，在民族是高於一切的原則之下，講求民主民生，不但不破壞這個原則，而且是充實這個原則，這是民族解放勝利的基礎，這也正是這班失敗國家所未能做到的。這就充分教訓了今天在被侵略民族中，主張加緊磨擦不顧大局，或者主張只要民族，不要民主民生，不要發動民衆的人了，如果照他們這種主張做去，就難免蹈十九世紀的失敗民族運動的覆轍。

三，不積極與壓迫民族的革命勢力及與以平等對我的民主勢力聯合者失敗。匈牙利是一個標本的例子，他們不去積極援應維也納的革命，不去與壓迫民族的革命勢力聯合，而自圖一時之僥倖，坐視朋友之困難而不顧，結果朋友受到失敗，自己也跟着失敗。他們不積極與當時德國的急進民主派攜手，不願意積極取得他們的幫助以謀自己民族力量之加強，他們把民族解放的事業看成是單獨的事情，結果，自己吃虧。這就告訴我們，被壓迫民族應當要盡力去推動敵國內部革命勢力的發展，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緊密的結合起來，促進與發展壓迫民族中革命運動，並積極援助之，這是打倒共同敵人的攻守同盟政策，內外夾攻敵人的辦法。同時，還要認清以平等待我之民主勢力或民族力

量，而與之精誠攜手，不要受到敵人的挑撥離間，不要出賣自己的朋友，這是非常重要，這又正是這班失敗的民族國家所未能做到的。這就充分教訓了我們今天在被侵略民族中，仇視敵方人民以及還對國際眞正朋友抱成見的人了。如果照他們這種主張去做，就難免於十九世紀的失敗民族的前例。

第三，什麼是總的經驗教訓呢？

從這個時期的歐美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的經驗教訓中，無論是勝利的民族或失敗的民族，都告訴我們一個最可寶貴的經驗教訓，這個經驗教訓就是：無產階級是民族解放事業中最堅固的支柱，他的政黨——共產黨，是民族解放事業中最先進與最澈底的代表。他的主義——共產主義是民族革命勝利之最正確、最澈底、亦即最有保障的武器。在美國、法國的民族獨立統一與建國的事業中，固然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因爲還沒有近代的無產階級，然而那時這些國家的無產羣衆勞動者，無論在軍隊中，在一切民族鬥爭中，都是民族的中堅力量，沒有他們參加，這種民族事業決不能勝利的。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就已經有了無產階級，並且還有了這個階級先進代表——馬克思、恩格斯所創造的共產主義，以及共產主義同盟與爾後第一國際的組織。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德國的統一抗戰是起了如何偉大的推進與堅持作用，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眞正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全德國民族的利益，無論在理論上實際上，是如何爲着德國的民族事業而努力。他們不僅對於德國，而且對於一切其他被壓迫侵略的民族或國家，都是起了如何偉大的幫助與推動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鐵的事實。然而歷史的發展，並沒有使無產階級達到自己的希望，也並沒有使馬、恩的當時主張實現，這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底政治的、思想的、與組織的本能，發展得不足，大多數的工人階級還沒接受自己的馬克思主

義，他們還浸染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有些還浸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之下，甚至有些國家還根本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加之統治階級之盡力限制與壓迫無產階級及其代表者，遂使當時勝利的民族（如德、意）運動，在民族建國事業剛一完成以後，馬上變爲壓迫民族，亦卽不自由的民族；民族問題仍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同樣，使失敗的民族（波蘭、愛爾蘭、匈牙利）運動，亦無法挽回其失敗的命運，在這個時期終於一蹶不振。反過來說，假使當時這些國家，都有了強大的「自爲的」無產階級與強大的眞正爲馬克思主義所武裝的共產黨，那就可以這樣說，民族勝利的國家，不僅民族獨立與民族統一可以更早與更圓滿的得到勝利，而且民族建國的事業中，可以保證眞正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實現，可以使民族的勝利成爲全人民的勝利；另一方面，在弱小民族的解放的事業中，不僅可能保證民族運動不走上失敗而走上勝利，而且亦可能實現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

由是可知，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民族解放與民族統一的事業中，他的存在與發展，不但不妨礙民族運動，不但不違背民族主義，而且正是代表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是民族事業團結的核心，是堅強的力量與澈底的執行者。在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存在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僅不能削弱、限制、吞併或融化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力量而且還應當加強之、發展之、鞏固與擴大之，使他能夠大大發揚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就是大大發揚民族的力量，這是爭取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先決條件，一切削弱、取消與反對共產黨的企圖，都是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民族事業的。